

编辑大家秦兆阳

秦晴
陈恭怀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因多情故不老

戊辰年

老芹



ISBN 978-7-02-009615-2



9 787020 096152 >

定价：31.00元

编辑大家秦兆阳

秦晴
陈恭怀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取喜春光无限
力与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辑大家秦兆阳/秦晴等编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615-2

I. ①编… II. ①秦… III. ①秦兆阳(1916~1994)—纪念文集 IV. ①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363号

责任编辑 于 敏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6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页2
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15-2
定 价 3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秦兆阳生平

秦晴、陈恭怀 整理

秦兆阳,1916年11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枣树店村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以教私塾为生。其父能诗善画,母亲也识文断字。他自幼聪慧好学,五岁时跟随父亲读子曰诗云。九岁时,他读了平生第一本小说《精忠说岳全传》,以后又读过《聊斋志异》等各个朝代的文学作品。这些熏陶,再加上故乡美丽风光的感染,在幼年秦兆阳心中,种下了热爱美丽事物,勤于思辨的最初根苗。

1927年,秦兆阳的父亲在汉口某机关当抄写公文的小职员,他随父从乡下到汉口上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29年夏小学毕业时,父亲突然去世,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失去生活的依靠,痛感前途渺茫。

1931年,秦兆阳考入汉口市立一中,靠舅父帮助,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十七岁时曾在湖北省崇阳县政府当抄写公文的小职员。1934年考上武昌乡村师范。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在黄州城内做小学教员。

1935年到1937年上半年,秦兆阳给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漫画》《抗战漫画》和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投稿,发表讽刺时

弊和宣传抗日的漫画,同时在《武汉日报》上发表数十首宣传抗日的诗歌,其中有长诗《长城》《祖先的开拓》《松花江怒吼了!》等。这些小小的成功,奠定了他以后从事美术工作和文学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1938年8月,秦兆阳赴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先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编石印的《除奸画报》。1939年7月,随鲁艺大队行军三个多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任美术教员。从参加革命到1942年冬,他主要从事美术工作,曾在华北联合大学出版的《五十年代》杂志,晋察冀军区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发表美术作品。还有若干美术理论文章,发表于华北联大出版的油印刊物和边区的报纸。

1941年,秦兆阳由著名画家辛莽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创作了讽刺蒋家王朝的童话长诗《乌鸦王国的烦恼》。1943年调到冀中军区政治机关工作。

1943年秋,秦兆阳主动要求到冀中第十军分区平津保三角地带工作。这是平原游击战争最危险最残酷的地区。面对那里复杂、生动、丰富的生活,他心中充满激情,却又感到难以用画面表现出来。恰逢1943年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电讯稿传到冀中,他深受鼓舞,决心从事文学创作。

1943年秋至1947年,秦兆阳先后担任冀中第十地委主办的《黎明报》社长,冀中军区《前线报》社副社长,冀中文艺工作者协会常委等职务。1946年,他在刚刚解放的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长城》和《冀中导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和剧本,主要有《俺们毛主席有办法》《路》《狗》《麦收之夜》等。

1947年冬至1948年夏,秦兆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丰富了生活积累。1948年秋在西柏坡义山村《华北文艺》社任

小说编辑。并在该刊发表独幕话剧《露营》，短篇小说《歪脖子兵》《幸福》等。

1949年4月秦兆阳随《华北文艺》进入北京，同年7月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至1952年，在新创刊的《人民文学》任小说组组长。经手编发了一批优秀作品，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创作小说《改造》《老头刘满囤》《炊事员熊老铁》；撰写评论《论形象与感受》《论一般化公式化》等；创作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这篇作品获得全国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并被苏联翻译出版。

1953年至1954年夏，秦兆阳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冀中平原，满腔热情地参加合作化运动，创作出一批农村题材的小说。195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论文集《论公式化概念化》等。1957年，《农村散记》先后被译成英、法、德文介绍到国外。论文《论形象与感受》也被译介到苏联。短篇小说《姚良成》《王永淮》《老羊工》被编入中小学语文课本。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被朝鲜翻译出版。

1955年1月秦兆阳任《文艺报》执行编委。1955年12月至1957年2月，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在此期间，他倾注极大的热情和心血，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和文学新人，影响颇大。

1956年9月，秦兆阳以何直为笔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长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章发表后，产生广泛影响。但是第二年，这篇文章连同他力主推出的优秀作品，都成了他的反党罪证。因此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广西长达二十年之久。

1961年11月，秦兆阳的右派问题脱帽后，加入中国作协广西分会。1962年在《广西文艺》发表短篇小说《一封拾到的

信》，而后开始了长篇小说《两辈人》的创作，并在《广西文艺》连载。

在“文革”中，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成为“文艺战线上的黑八论”之一，致使他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1972年春，他被宣布“解放”，成为写作组成员，下到广西都安县，在上级的直接领导下，创作农业学大寨题材的长篇小说《穿云山》，历时三年。

1979年3月，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亲自批准，对1958年秦兆阳的错误结论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并调回北京。

改革开放后，秦兆阳历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1980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主编。1985年离休后继续担任《当代》主编。

在担任《当代》主编的十五年中，秦兆阳特别强调《当代》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突出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强调刊物发表的作品要引导读者积极向上，要在刊物上体现正气、志气、朝气、骨气和锐气；强调要不断发现和支持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新人，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文艺新时期作贡献；强调《当代》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要跟“风”跑。他以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艺术眼光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断推出有才华的文学新人。经他之手推出的作品和作家，如今很多都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后，秦兆阳先后出版短篇集《一封拾到的信》，长篇小说《大地》，散文集《黄山失魂记》《风尘漫记》《秦兆阳小说选》，以及论文集《文学探路集》。写了《女儿的信》《猪八戒外传》《孙猴求雨记》等中篇小说；《往事散记》《回首当年》等随笔。还撰写了一系列与当前创作、《当代》办刊有关的评论文

章。但没有来得及结集出版。

1994年10月11日,秦兆阳因病在协和医院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目 录

秦兆阳生平 秦晴、陈恭怀 整理(1)

—

秦兆阳印象 孟伟哉(3)

秦兆阳访问记 李海强(10)

我拜求您 陈健(18)

写于访书归来 李乡浏(24)

访秦兆阳 王郁森(28)

“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 何启治(31)

思慕与寻访 秦风(50)

“文章千古事,人品在朝夕” 晓蓉(55)

秦兆阳印象 陈国凯(58)

文坛伯乐秦兆阳 涂光群(62)

心底流情笔生花 曾楚风(72)

老芹的画 高洪波(75)

老芹力薄不胜风 燕治国(78)

从美术界改行而来的秦兆阳 包立民(82)

又拾丹青画霜叶 徐鲁(84)

我心中的秦兆阳 张俊彪(90)

宁静致远	常振家(93)
革命作家的情怀与艺术家的眼光	洪武(95)
欣逢柳绿春时雨,策马长途学健儿	刘文勇(101)

二

风雨长征路,丹心永不泯	屠岸(111)
永远纪念我们的主编兆阳同志	《当代》编辑部(114)
老秦的遗言	韦君宜(118)
宽心地安息吧,老秦	李纳(120)
唯向秋风恸	叶文玲(125)
秋天的怀念	崔道怡(129)
怀念秦兆阳	徐靖(136)
脚踏实地	胡德培(142)
悼念信件一束	(150)
慈祥的火——秦兆阳	蒋子龙(156)
读画诵诗哀哲人	郑秉谦(162)
失去的手书	李国文(165)
耿介一世	陆地(169)
吊兆阳同志	涂光群(175)
怀念秦兆阳	李宝靖(182)
哀念秦兆阳同志	古立高(190)
永远怀念秦兆阳同志	杨桂欣(194)
追记心底流情人	陆潜(198)
半个多世纪的情谊	李清泉(202)
重读《木鱼歌》	邵燕祥(214)
化作春泥更护花	程树榛(216)
忆兆阳师	和穆熙(225)

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	李频(229)
秦兆阳:笑着唱人生最后的歌·····	黄伟经(239)
江声浩荡·····	刘心武(243)
从何直到老芹·····	陈明刚(246)
迟到的悼念·····	陈世旭(254)
长相忆·····	李梦秋(263)
何直文章惊海内·····	王培元(275)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人·····	杨春兰(293)
黄昏时的记忆·····	张洁(298)
我所认识的秦兆阳·····	柯云路(300)
说不尽的秦兆阳·····	章仲锷(304)
兆阳先生与《九月寓言》·····	汪兆骞(308)
“板先生”秦兆阳·····	黄秋耘(314)
赤壁风骨·····	刘醒龙(316)
醉舞·····	李斌奎(320)

三

1967年,和父亲有关的一段经历·····	秦万里(325)
一辆老永久牌自行车·····	秦晴(344)
享受宁静的秦兆阳·····	秦万里(348)
丁香无语·····	秦晴(353)
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的奶葡萄·····	秦晴(362)
追忆父亲·····	秦燕子(375)
后记·····	(383)

—▶

秦兆阳印象

孟伟哉

似乎是四个人，我现在记得是：刘白羽、张光年、海默、秦兆阳。刘白羽走在前面，海默居三，秦兆阳最后。海默的头是那么大，令我好奇而意外。秦兆阳的脸红，红光满面。他右手上夹一支烟，举在胸侧，脸上一直带着笑意……

这是1956年3月，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一天晚间，他们来到新侨饭店的一个会客室，看望我们天津的代表，集中谈论的是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人家介绍说，“他是秦兆阳同志”。我记住了他一张红红的微笑的面孔。

那时他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他的口音使我觉得他像是四川人。而且我还想：这个四川人，他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呢？他怎么会熟悉华北特别是河北农村的生活呢？

那时我二十三岁。以后多年再没有见过他。当我的年龄翻了一番的时候，在生活的九曲回廊里又见到了他，而且是同他一道工作。

“四人帮”覆灭，他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许多同志为此兴奋，我当然也不例外。开头，虽然职称不明，但从社长严文井起，

大家都尊重他。是一起工作之后，我才约略知悉，二十来年，他在广西，经历是坎坷不幸的。

这回，第一次见他，似乎是在韦君宜同志主持的一个业务性会议上。他抽着烟，很留心地听着别人的议论，目光随着发言人的转移而转移，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讲话。

韦君宜说：“老秦，你谈谈吧！”

他在沙发上，动作颇拘谨地说：“不讲了！我没有什么话。”

“讲讲吧，讲讲吧！”在韦君宜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很不好意思地慢声慢气地讲起来：“……出书，编刊物，是不是要注意研究社会需要和读者心理？这些，都是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

他完全是商讨的口吻。而且，在我的感觉上，他很留意别人的反应。

我望着他。我知道他不会记得我。我可在回忆新侨饭店的那一幕。他真是变了：脸没有当年红，也比不上当年的结实丰满。他两腮瘦瘪了，牙齿稀松，头发苍白，也戴上眼镜了。然而他的思想并不陈旧，他极力追踪的正是时代前进的脚步。

我第一次到他家去才知道：他五口之家住一大间没有隔断的南房，不方便也住不开。于是在这间大房前面，不得不搭个小厨房和一间六平方米左右的小屋。这粗陋低矮的小屋，便是他的寝室和工作室。他床头有一个长约尺余、高约寸余的竹凳样的东西。我问那是什么？他说：“枕头。我爱头晕，枕这个东西清凉。”这个竹器确实被他枕得油光发亮。我猜想，这大约是他从广西带来的纪念品。

他的中篇小说《给女儿的信》，就是在这个夏天闷热、冬季寒冷的小屋里写的。确切地说，他近年来的大部分评论、作品、

书信,都产生于这个小屋。差不多每次我到这个小屋,总看到他桌上摊开着未写完的文章,一个椭圆形陶瓷烟缸和一个铝质烟缸里,烟灰烟蒂总是满满的。客人一来,他就把那老花眼镜换成散光镜,从那把吱吱响的矮椅上侧过身子,或者站起来递烟倒茶。无疑,这小屋是他沉思、想象和幻想的重要场所,也将留在他终生的记忆中。当然,来过这里的许多人,也不会遗忘这个小屋。

我到过他家多少次,跟他交谈过多少次,记不清了。然而,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作家、一个编辑、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是越来越深了。

他受过委屈,吃过苦头。我原以为,至少在最初接触的时候,他大概少不了表白、诉苦、泄怨、发牢骚。如果他这样做,我不会奇怪,并自信能够理解。然而事情不是这样。

他极少主动谈起那已成为历史的事,尤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得了。他倒是这样说过:“我一直在自我反省,真诚地检查着自己哪里错了,反复思考自己和党的关系是不是没有处理好……我这个人好激动。回想起来,也有过少壮得意和过于自信的时候……”

他说这些的时候,从椅子上向前倾着身子,音调不高而深沉,使你觉得他在掏肺腑之言。

他在广西的漫长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他到底有些什么隐痛,由于他不爱谈,我至今未知其详。提到广西,他只是带着感激之情,说起那里的哪些同志关心过他、帮助过他。他更关心的是现实和未来,热衷于讨论当前的创作、理论和实际生活。

在我面前,他无疑是一位老作家。我同他接触,即使是讨论工作,也主要是向他学习。他不摆老资格,不以长者自居,更不简单说教,而总是进行同志式的平等讨论,很注意听取晚辈人的

意见。

他写了一则文艺短论，征求我的意见：能不能发表？我看过后坦率地建议他不要发表，他真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了若干时日想起此事，我觉得我的建议是不对的，但没有向他说明，他也从未有过怨言。

我不曾料到他会向我谈他的创作构思。但这样的事竟有过好几次。谈完以后他总是很恳切地问：“你觉得怎么样？”

他近年写作的短篇小说，有两三篇在发表前曾让我看过。谈构思也好，看稿也好，他希望听到的是真正的意见，而不是奉承话。

有一回，他把一个短篇拿到《当代》编辑部让同志们先提意见。大家果真说了不足之处。他愉快地接受意见，又换了一篇来。

不光是听意见，他还让我们帮他修改某些地方。有一次，他就在电话里跟我说：“你给我改改嘛！没有关系。改吧！”

他的平易近人和虚怀若谷，增加了他作为一个老作家的吸引力，在工作上也使我们晚一辈的人觉得很好合作。

我曾这样想过：假如他不当编辑，专门从事写作，仅这几年，他就可以写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东西。然而，我渐渐知道，几十年来他实际上是个业余作家，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编辑工作上。

他不是单纯看稿的编辑。他常常花很多精力与作者研究生活，讨论艺术，帮助作者构思。并不是每个作者都那么尊重、体谅编辑和容易对话的。这种讨论，有时很愉快，有时很艰难。也不是每个作者都能面谈的。这样，他就要写许多信，有的信是很长的。因此，我总觉得，他这些书信，是他尚未发表的很重要的著作。顺便说一句，他的许多工作通信都是自己付邮的，没有用公家的邮资，这并不是一个小数。

他主张编辑对稿件进行加工修改。他说他五十年代编《人民文学》就是这样的,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那时,周立波发现了他这种做法,颇为惊讶地说过:“哎呀,秦兆阳原来是这样工作的呀!”因为这样做确实很苦。然而时至今日,他的年龄已经六十有余,还常为一些年轻同志的作品做这种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的工作。

在编辑工作中,他最大的愉快是看到一篇好稿子、发现一位新作者。一次,一部稿子他刚读了一半,便兴奋不已,在电话里跟我说:“很好呀!请你让作者马上到我家里来谈谈……”他在编辑工作中倾注了对青年的满腔热情。他把发现、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视为编辑工作的崇高责任。

我常想:他在编辑工作中对我们文学事业的贡献,虽少为人知,实际上也许超过了他自己的著作。

他在时代的大潮中投身革命。那是1938年,日寇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和一个朋友一起,由在武汉的陶铸同志介绍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从武汉经西安直到延安。尔后不久,他又从延安到晋察冀。截至1981年,他的党龄足足四十载。他确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同志了,给他多加几个头衔,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然而到文学出版社来,他没有参加党委会,不参与一般行政事务。曾给他预备过的一间办公室,去了两次他也不用了。他满腔激情(正如他说的“好激动”),却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似乎是他同自己的“好激动”作斗争的一种方式)。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曾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辞谢。一次在我们社二楼那小小的会客室里,华裔作家聂华苓对他说:“我翻译了你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他听罢只是淡淡一笑。他反感那些庸俗的事。

他不愿意掌管行政权力,安心于日常的编辑业务。这并非

消极遁世。他在默默无闻的实践中,显示着自己的党性。

社里分工,他的主要精力办《当代》。怎样使这个刊物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受到群众欢迎,常常是他考虑的中心。

《当代》发表报告文学多些。这个主意最早就是他提的。

历史在前进。生活在发展。以往的悲剧性的教训不能否认,新的现实所展示的光明的前景更应该重视。然而许多同志正痛定思痛,对新的现实还不能及时予以艺术的体现。怎么办?单个的作者尽可以写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一个刊物却应该力求多方面地全面地反映时代。他肯定文学对丑恶现象和阴暗面的批判作用,正如他说的“正确的批判是健康的头脑的产物”。同时他也认为负责的作家应通过自己的作品给读者以希望、信心和力量。记不清是在办公室还是在他家,也记不起是第几次研究这个问题了,他说:“现在是需要一些振奋之作,鼓舞人心。我们就多搞一些报告文学吧!反映四化过程中的矛盾斗争,也可以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很注意领会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力求辩证地看待问题,使自己的工作有利于党的整个事业,其中当然包括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

他把注意力放在刊物的重点作品上。我们形成了默契:凡是这样的作品,尽可能请他过目,来不及也要向他介绍内容。只要时间允许,他总要亲自看,并时常动手加工。有时,“三校”了,要付型了,他还要再作推敲。

1980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去看他。他在他的大南屋里(这时他的住宅扩大了一些,大南屋成他的书房了),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动,吸着烟,仔细琢磨着已经付型的刊物,一直同我谈到十点多钟;按他的身体和习惯,本来该九点睡眠的。每逢这样的时刻,我就想:他是赤子,有一颗丹心。

有一次,我告诉他:一位大学讲师找到了他青年时代在武汉发表的长诗。“是不是呀?真的呀?……”他的声调忽然提高,高兴得像个青年。

我对他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作品不熟悉,真是遗憾。然而我不久前读了他六十年代发表过一部分的长篇小说《两辈人》(即长篇《大地》),却衷心敬佩。这真是好作品。在政治上被误解的时候,他能克服抑郁的心情,写出如此昂扬奋发、激荡着英雄气概、讴歌人民和党的好作品,实在不易。

他又是那么谦虚地要听取意见。我们谈了两次。我谈的实际上是学习心得。我说:“你的作品使我联想到很多创作上的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感到:这是一种带浪漫色彩的、闪耀着理想之光的现实主义……”

我惊异于他对冀中生活的熟悉。他说,写这部作品他准备了许多年。那天晚上,送我出大门的时候,他还笑着说:“这部作品按构思要写一百多万字的,现在看来可能完不成了。我有时想,一个人死的时候,会把多少思想带到坟墓里去啊!”

他的感慨令我激动。然而我认为他不是感伤主义者,而是唯物主义者。

夜深人静。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想:这个为人民编辑了许多作品、写了许多作品的人,他自己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休息的方式是写字、绘画(他喜画山石、竹梅和无邪的小鸟),到故宫后面的护城河边散步,而他的享受,大概是抽烟喝茶了。他也喜欢喝一点酒,但是最近,医生可能对他发出了禁令……

他不是四川人,籍贯湖北黄冈。

1981年12月9日

原载1982年4月《文艺报》

秦兆阳访问记

李海强

在嫩绿满山的景山公园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我走进了一间有点破旧的老四合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罗君策告诉我们，秦兆阳先生住的这座四合院，是他自己1958年买下来的。刚住了几个月，就被赶出了京城，发配到当年柳宗元被皇上贬去当刺史的广西柳州市一个工厂“监督劳动”。“文革”期间这座房子被红卫兵占领，红卫兵撤离后即为几户人家长期占住。1978年，秦先生回到北京，几经周折，才在近年收回了大部分住房，靠大门的那间北屋，占住者虽然已经答应退还，但至今尚未搬出。这座坐南朝北的小小四合院，跟秦先生本人经历一样，经历沧桑，饱尝了人间风霜。罗君策说到这里，我们已来到南屋，门竟无声地打开了。一位衣着朴素，表情温厚，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口微笑着邀请我们进屋。他，就是我们要访问的六十六岁老人、著名作家、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

秦先生住的南屋，约有二十平米，是书房、客厅、卧室“三位一体”。房子四周是书册满架的大书柜，中间是沙发和茶几。靠右是书桌和床铺，填得满满的。屋里虽然拥挤，却又文气十

足。引人瞩目的除了古今中外的书册外,还有挂在墙上的一幅“梅竹图”。画上的梅竹,自然纯朴中透出一股凛然正气。我们用眼睛寻找着这是哪位画师的手笔,秦先生显然看出来,便谦和地说:“见笑了,这是我自己涂抹的。”啊,秦先生还是个画家!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个新发现呢!他见我们为此感到惊奇,便从抽屉里取出几十张从三四十年代的旧报章杂志上复印下来的版画、国画、漫画作品和解放后他出版的小说集封面和插图给我们看。这些画的功底和笔力,真不亚于一个有名气的专业画家哩!

秦先生告诉我们,他搞文艺是从作画开始的……

“我的父亲是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位私塾先生。他不仅喜欢教书,还很喜欢在工余时间画些国画消遣,在方圆百里颇有些名气。父亲让我到他任教的私塾读书,我同其他孩子一样读人之初外,他还特地在家里给我增加一课:画画!最初,他规定我只许用两笔加一点画成一条鱼,一天要画几十条,上百条。画不好不给饭吃,画得有神父亲就当面夸赞,为了培养我画画的兴趣,父母亲还教我学习剪纸、做皮影戏、临摹旧小说的插图。十一岁时,我跟父亲到了汉口,才进了正式的学校,又开始跟美术老师学习铅笔画、水彩画。后来,我上了高中、师范,更喜欢画各种各样的画了。不过,那时候我画画纯粹是一种喜爱,从来没有想到拿去发表,没有想到把它作为自己未来的一种职业。

“1935年,我在叶浅予主办的《时代漫画》上发表了第一幅作品,才真正同文艺结了缘。同时,我也学习写诗、写散文,主要是描绘乡村风俗和自然风光,许多作品也在报刊上发表了。1938年,我由武汉中共办事处介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久又上了抗日前线。我用漫画作武器,画了许多揭露、讽刺日本侵略者凶残、吹牛、虚弱的本质,鼓舞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坚决斗争的作品。那时候,我还搞了一些反映抗日根据地和

解放区群众生活的水彩画、木刻等。有好几年，画画成了我从事文艺创作的主攻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的兴趣突然改变了。那时候，解放区和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事迹，生产自救的事迹和人民群众善良美好的心灵，时常冲击着我的脑际，弄得我非要把它们写出来心里才安宁。我决定学着写起小说来。我首先根据自己奔赴抗日前线途中所见所闻编织成故事，写出了第一篇小说《路》，发表在陈企霞主编的《北方文化》上。以后越写越想写，就以写小说、散文为主，画画搞得差不多了。不过，近几十年来我从未间断，主要是给自己创作出版的小说作封面设计或插图。例如我五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的封面、最近出版的《秦兆阳小说选》的一些插图，都是我自己搞的。”

我们正饶有兴味地翻看着秦先生的这些美术作品，他突然幽默地说了这么一句：“我学会画画，还捞了个意外的好处。1958年我被下放到广西柳州机械厂‘监督劳动’。刚干了几天活，厂里发现我会作画，美术字也写得不错，便调我到厂工会搞宣传。有好几年，我都不用再干重活，也不受‘监督’了。”

当年，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在1956年第九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这篇著作里，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应该“以严格地忠实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因此，他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正在出现的“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反对“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一句话，他反对当时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为了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他还亲自在当时自己主编的《人民文学》上先后发现了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这些作品具有尖锐的批评性和讽刺性，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1957年，秦兆阳被划为全国文艺界的大右派，刘宾雁、王蒙等人也同时被划为青年右派分子。二十多年来，秦先生吃尽了苦头，“文革”中差点儿把命都送了。

谈到这里，我问：“秦先生，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脱胎换骨’般的磨难，对自己过去所主张的和所反对的，是不是在看法上有所改变呢？”

秦先生目光炯炯有神，坚决地说：“没有改变！我仍然坚持那个看法，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创作道路。现在看，我当时批评的许多现象，今天在我国文艺界仍然存在。例如，文艺创作上图解政策，行政干涉太多和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今天也仍然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形式有别，花样不一样罢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又根据自己观察到和接触到的问题，写了一些理论文章，作了几次讲演……”说着，他把写字桌上放着的一摞校样递给我看：“这是出版社准备给我出的一个论文集子，这几年写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我们认真地把校样翻阅了一下，这里有秦先生先后两次应《文学评论》编辑部之约，写的评介1978年、1979年全国获奖优秀短篇小说的“札记”，有1980年、1982年先后三次在文学讲习所的讲课记录。这些文章和讲课记录，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文艺作品要“写得真”、“写真实”，检验文艺作品的标准“无疑的首先应该是生活的真实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生存于艺术的真实性的血肉之中”。这些语言，同1956年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没什么两样。他，还是他二十

多年前的老样子！

秦先生仿佛看出了我们在心里产生的上述判断，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有什么办法，本性难移啊！”

我们钦佩地说：“不，你这不是本性难移，而是‘只要主义真，杀头也不怕’！”

秦兆阳先生在以前的文艺生涯，有一半多是在编辑文艺刊物上度过的。1978年彻底平反后，他又重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并主编《当代》文艺杂志。在北京，许多当代著名的中青年作家都用感激和敬佩的口吻谈起秦先生对自己的指导和培养，称他为“文坛伯乐”。一个五十年代在秦先生手下工作多年的《人民文学》老编辑，如数家珍似的谈到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这段时间里，经秦先生发现、培养和支持的文学新人，现在已经成名的中青年作家就有刘宾雁、王蒙、萧平、玛拉沁夫、孙峻青、白桦、曲波……仅1956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五十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中，就有一半是新作者写的。当时，执行副主编秦兆阳，总是这样吩咐编辑们，对名家的作品要求严一些，至少不能降格以求；对新人新作，要相对宽一点，因为他们写作经验不足、信心不足，特别需要发表出来以资鼓励。

那位《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还回忆说：秦兆阳作为主编，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秦兆阳当主编，喜欢时而到这个编辑案头堆积的待处稿上翻一番，时而到那个编辑枪毙了的稿堆上“沙里淘金”地再“淘”一“淘”。他一旦发现了新人的好稿，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那样喜悦和兴奋，急不可耐地递给某位编辑说：“你看看这一篇怎么样？”记得1956年五六月间的一天，秦兆阳在一个编辑的案头上看到几册六十四开的笔记本，打开一看，原来是泉州医院一位医生写的中篇小说。作者是第一次写稿，不知道要用稿纸抄写。笔记本上的蝇头小字，密密麻

麻，很不整齐，标点符号也不规整。往常碰到这样的来稿，编辑可以不看就退回去了。可是，秦主编不仅耐心地把它读完了，还亲自整理加工后送到工厂发排，改标题为《总有一天》，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七、八期上连载，后来还出了单行本。

刘宾雁是当代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特写《在桥梁工地上》也是在1956年初春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秦兆阳作为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发现它文笔犀利、深沉，对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某些领导干部的风派行径进行了深刻、尖锐的批评和讽刺，精神可贵，文字也很好。他认定刘宾雁是新涌现的文学“千里马”，立即给作者去信，热情及时地肯定了这种可贵的探索。《在桥梁工地上》很快就在1956年《人民文学》四月号上以头条、通栏，在十分显著的地位发表了。秦兆阳亲自为这篇作品写了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他还这一期的“编后记”中提出：“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

当谈起刘宾雁、王蒙等五十年代崛起的文学新人今天所取得的丰硕成就时，秦先生喜形于色。

五十年代早已经过去了，但秦先生悉心培养文学新人的“事”，没有过去。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1978年夏天，他从广西“借调”到北京，还没有正式改正平反，就在大热天赤着上身，背搭湿毛巾，连续苦战半个月，为新作者刘波泳看了一本长达九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秦川儿女》，同作者谈了两个下午，写了两万多字的修改意见，从人物、情节、细节和故事都提出了具体

的意见。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读者的好评。秦先生后来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其宗旨就是以培养新人、发表新人新作为主。这几年,经秦先生亲自培养、指导和扶持的新人新作,如李国文的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莫应丰的中篇《将军吟》、古华的中篇《芙蓉镇》、蒋子龙的中篇《赤橙黄绿青蓝紫》、郑万隆的中篇《年轻的朋友们》,以及陈中冀的《职责》、叶文玲的《心香》等,分别获得了茅盾长篇小说奖或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秦先生作为文坛上的伯乐,更加誉满京华了。

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1979年后,秦兆阳、王蒙、刘宾雁、从维熙等一大批当年文苑上的精英,又以“更有豪情胜旧时”的精神和姿态,向十亿人民呈献了一束束鲜丽馥郁的红牡丹、白玫瑰、紫罗兰……使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坛又重新振兴起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由活跃、生机勃勃。

秦先生如今已经年逾花甲。但他也不气馁、不服老,在担任繁重的社会和编辑工作之余,以惊人的精力和毅力,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创作发表了短、中、长篇小说《苏醒》、《纪念》、《回答》、《孙猴求雨记》、《女儿的信》和《两辈人》(下集),整理出版了《秦兆阳小说选》,重版《在田野上,前进!》。此外,他还写了十六万字的文艺理论和新人新作评介文章,“重放的鲜花”正放射着异彩。

在交谈中,我们问起秦先生今后的计划和打算。他说:“我毕竟年岁大,精力有限了。《当代》我已经不大管了,让更年轻的同志去挑这副重担吧!现在,我正赶着完成长篇小说《大地》的最后修改和润饰工作,全书共约三十三万字,估计不久将同读者见面。”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我现在还有个新苦恼,近年发现眼睛长了白内障,只能白天工作,晚上熬夜已经不行了。”

秦先生说：“待我完成《大地》稿的修改后，准备集中时间治一治眼病。我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和还能看得见东西时，把我的童年写出来献给下一代的小朋友们，还有我的母亲，她是个平凡、贤慧而又能干的农村妇女，我也想写一写她。还有，如果可能，希望到外面走一走，再写写散记之类。当然，我还有些回忆录，如果写出来，一定有人感兴趣。今后，短篇小说也许会写一些，长篇小说虽然早有孕育，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听秦先生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一阵酸痛，又想起那个假设：如果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时，我们的一个同访者热烈地说：“秦老，您赶快写吧，都可以写出来的！”

秦先生有些激动：“希望是这样吧！”

1983年5月抄正于南宁

我拜求您……

——秦兆阳生活片断

陈 健

我在五十年代读过秦兆阳描写农村新生活的散文，但反右以后，他就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前年冬天，我因有事相托，打听到他的地址，便不揣冒昧地叩门求见了。他住在北池子一所一般居民住的那类四合院里，这天又是雪又是雨，院子窄小而泥泞。邻人指点说，他住在后院南屋，我轻轻敲门，秦兆阳同志应声开门，先是一怔，继而把我让进屋里，又沏了一杯热茶举放在我面前，这才问：“你……？”我只能自我介绍了：“我是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个故事，故事中的女主人正在吃苦作难，她需要你的帮助。”

“我的帮助！我能帮助什么呢？”

我开始讲我的故事，起初他并不专注听我讲，因为他正在伏案写作，他的思绪显然还没有从他的故事中解脱出来，不一会儿，我的叙述便将他吸引住了。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位很有才华的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又愤然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他敢于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一己之见，批评不正之风，指名道姓，毫

不留情。正是这一点，触怒了他的顶头上司。这位顶头上司有个逻辑，批评领导，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死者曾被这种荒谬的推理错划为右派。现在，死者的品格作风一如既往，他的顶头上司的逻辑也一成不变。于是，悲剧又重演：这位上司给他定罪说：“他的右派问题虽然改正了，但右派立场没有变，右派毕竟是右派，这种人和共产党是不一条心的。”继续刁难他、孤立他、迫害他，致使他无法工作、生活。他要一死相抗，要以自己的七尺之躯，去撞断四化征途上的“绊马桩”。他给中央留下万言遗书，遗书开头引用了唐人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遗书最后大声疾呼：“要选贤用能！”

死者的妻子是一位女演员。他们邂逅相遇，一见钟情。这位自小孤苦，文化不高，在风尘中流落多年的女演员，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就在死者打入“另册”的情况下和他结了婚。她也因此被剧团除了名。夫妻俩受尽人间苦难，“文化大革命”中，又双双逃到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隐名埋姓，流浪行乞，直到死者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你是编故事还是真有其人其事？”

死者是河南省商丘县人民银行的干部吴杰，他的妻子是安徽省坠子剧团演员陈元萍。那位顶头上司就是县人民银行副行长盖书文，他已被撤职并开除出党。只是陈元萍现在生活无着，十分凄苦，按照政策，她应该回到剧团，但阻力很大，困难重重。这时，我才说明我的来意，我说，我知道你和安徽文联主席陈登科很熟，想请你帮忙联系，为她落实政策，使这位女演员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秦兆阳同志坐在他书桌前的圈椅里，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一动不动地听我讲完，眼里噙着泪。我等待他的回答。窗外无声无息的飘着雪花，屋里的气温一点点下降，因为主人忘记

给炉子下煤。秦兆阳同志怕冷似的站了起来，在屋中央搓着手来回踱着。他说：“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故事。很多人以为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没有那么容易。极‘左’思想是一种顽固症，要治好它，得反复多次，反复中要付出代价，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极‘左’路线的冲击，出来工作后，又用极‘左’的一套对人对事，不要说公然抵制三中全会精神，就是用十七年的老眼光衡量当前的是非曲直，也会和中央的精神相悖逆。”他劝我先把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托他帮忙的事，他说那是义不容辞，不过，他要打听一下陈登科同志现在在哪里。

三天以后，我送去报告文学，题名为“眷恋”。他不在，我留下稿子，附了一张便条：“我写得很不好，但写得很诚实。”

第二天我一上班，秦兆阳同志打来电话：“稿子我看了，文学性差些，但故事很感人，也很有思想，不过，你要立即来一下，因为我几乎一夜之间找到了陈登科。”

我到他那里时，他已经给陈登科同志写好信，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两大张。他告诉我陈就在北京，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写稿，叫我一定找到他，一定把信交给他。信中写道：“有一件事万分恳切地拜求你，不是我自己的事，是你们安徽省的女演员陈元萍的事，如果你能出把力帮助解决她的困难，那我就万分感谢你，比我自己得到你的帮助还要感谢你。”

“既然不是我的事，而我又与陈元萍素不相识，为什么我要如此恳切地拜求你呢？只因为我看了一位记者写的报告文学，了解到陈元萍十分令人同情，使我觉得，如果我不尽所能帮助这位女同志，那就使我终身感到惭愧，因此，我拜求你……”

一封信中用了好几个“拜求”，交信给我时又加重语调说：“见了老陈就说我跪求他的帮助。”

我不是通过文艺机构，也不是通过文艺界人士而找到陈登

科同志住址的。这是一个偏僻胡同的一个很不显眼的招待所。可见他躲避熟人、躲避热闹场面写作的苦心了。但传达室老头矢口否认陈登科住在这里。他是个聋子，我说的事他听不清也听不懂。这样纠缠半个小时，我急了，放开嗓门，冲着他的耳朵，用最简单的话叫道：“你去给陈登科说，秦兆阳有信给他，托他为一位妇女伸冤，今天不见他我不走。”“为妇女伸冤”的话似乎打动了，他踉踉跄跄、七拐八弯进到后院去。不知是请示他的上级，还是征求陈登科同志的意见？不一会儿就出来招手叫我进去。他带着我嘎嘎吱吱上了二层楼，在一间普通的房间里看见陈登科。他面前一摞稿纸，烟缸里堆满烟蒂，两眼布满血丝。一看这情景，我立刻为打扰他而感到不安了。

看完信他说：“我记得这位女演员。”我说：“当然，她是你们那里的主要演员，前不久上海广播电台还播放她当年唱腔的片断呢。”“我明天就回安徽，请你转告秦兆阳同志，我一定尽力帮忙”。我趁机把秦兆阳要“跪拜”的话也说了。“咳！这位老兄，还是那个脾气。”我不了解秦兆阳同志的过去和其他情况。看来，关心群众的命运，为人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打抱不平，是一贯的吧？

我正等待为陈元萍落实政策的消息，不料她来北京了。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住在中央上访接待站，为吴杰伸冤的“状子”已经递上去了。我立即赶到接待站，我不想详细描述那里的情况——天寒地冻，上访的人很多，能做到这一步也许很不容易了。很多人住一间大屋子，屋里有个供上访人员用的炉灶。陈元萍自己背来米面，正用一个罐头盒子在炉边煮面汤，她那干枯灰黄的头发，黄胖浮肿的面容，一对混浊无神的眼睛，一身破旧的黑色布料中式棉袄棉裤。生活的磨难，已使她失去了在这个年龄还不应该完全失去的女性的光彩。看到这种情景，想起

去年我在商丘采访时，有人告诉我，当年她从安徽来商丘演出，饰演的是小生贾宝玉，那潇洒俊逸的神态，使多才多艺的青年银行干部吴杰为之倾倒。可现在，她完全成了伛偻的老妇人了。

我奔过去，抓住她的手，告诉她秦兆阳同志、陈登科同志都愿意帮助她落实政策。她很激动，要立即来看秦兆阳。外边雨雪泥泞，又冷又滑，她穿得很单薄，我怕秦兆阳不在家让她白跑，就先赶到北池子。秦兆阳同志感冒去医院刚回来，我告诉他陈元萍在接待站的情况。还没有等我说完，他就从裤兜里往外掏钱，有十元的、五元的，还有一角两角的。他把这堆票子推到我面前说：“请你赶快转给她，她如果需要米、面、粮票我都有，要多少都行，我前院的房子要不是别人占着，她可以住到我这里。”我告诉他，陈元萍很倔强，她不会收这些钱，我多次给她钱，都被拒绝了。她今晚就回河南，现在很想来看你。他连声说：“太好了。”

陈元萍坐在他那间南屋的写作室里，从进屋时起，就用一条洗脸毛巾捂着嘴，抽抽搭搭地啜泣着。秦兆阳同志——这位中外知名的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在这个落难的妇女面前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了。他手中捏着一沓票子，想给她怕她不收，想放进裤袋里又深知她需要钱。因此，他一会儿把钱捏在手里，一会儿又把钱塞进裤袋里，而且不断重复说：“真的，我不是怜悯，你需要钱，我该给你钱。”这是阶级情谊……他局促不安和不好意思的神情，仿佛自己是一个被馈赠者。

陈元萍说：“秦兆阳同志，你这么看重我，就什么都有了。”她不肯收钱，由于啜泣也没能多说话……她必须提早赶到火车站。

秦兆阳同志感冒咳嗽气喘吁吁，也没有穿大衣，就急匆匆把陈元萍和我送出四合院，送出二条胡同，送到大街上。陈元萍一

走出那间南屋，又用毛巾把嘴捂住，怕哭出声来，只好由我再三劝阻，才使秦兆阳同志留住脚步。雪还在下，他伫立街口，我几次回头向他招手，请他回去，他都一动不动，直到我们消失在白茫茫的雪雾中……

我在北池子汽车站把陈元萍送上公共汽车后，自己漫无目的地在长安街人行道上走着。我蓦然感到吹在脸上的风不带寒意，飘落在身上的雪花立即融化。噢！这天是旧历腊月二十几，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春天，已姗姗到来。

春节过后第一天，我收到陈元萍的来信：“除夕那天，我收到秦兆阳同志从北京汇来的一笔款子……”

我眼前立即再现起几天前的那幕情景：他手中捏着一沓票子，无所适从地站在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面前，不断地重复说：“真的，我不是怜悯，你需要钱，我该给你钱。”这……”

正是这个人，他自己在人生旅程中，就坚韧不拔地走过一段“苦难的历程”。

我记起，贝多芬的话：“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原载 1984 年第 34 期《瞭望》周刊

写于访书归来

——与作家秦兆阳一次通信的追忆

李乡浏

金秋时节，访书归来，购得一册重版《在田野上，前进！》，读着这样一段内容提要，百感交集：“本书在1956年3月初版时印过38万册，在当时是一部受欢迎的小说。出版前曾在《北京日报》上连载过一段，也曾在《人民文学》上选登过一段。然而自五七、五八年以后，由于作者的不幸遭遇，对于这本书评论界再也无人敢提，图书馆一度也停止了借阅，在“文化革命”中又遭到相当彻底的销毁，以至二十多年来，除了50年代读过这些书的某些有心的读者仍然对它念念不忘外，几乎被一般人所遗忘了……”

这位惨遭厄运的作家，便是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曾经向他请教，通过一次信的。当时，他的反映农村生活新貌的短篇小说《农村散记》，博得评论界的好评，拥有众多读者。因为，他的小说以清新、明丽、抒情的文笔，歌颂了农民们美好的心灵和纯洁的爱情，充盈着新农村的劳动和幸福的生活气息，像《晌午》等使人读后感受到生活中诗意的美的力量。他的小说创作的新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中学《语文》课本，便把《王永淮》《老

羊工》等编入,冠以“特写”。究竟短篇小说和特写界限在哪里?围绕着《文学概论》课堂讨论,大家争论不休。为此,我执笔整理了意见,写信向秦兆阳同志求教。不几天,便收到了他的函示,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红字套印的信笺:

李乡浏同志:

十一月十六日来信敬悉。我首先要说的是《农村散记》中除个别两篇基本上是真事外,其他都不是写的真事。有的只是有点真事的影子,因此它中间可能有的能叫做特写,而有的则是小说或散文。但按我自己说,不如都把它们看作小说为妥。我不知道特写与小说的严格区别。特写的特点之一是真人真事,但有的特写又可以综合概括而不是真事,如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见《译文》)。但这样的特写就目前所看见的,是没有完整的故事,结构也较随便。波列伏依认为《真正的人》是特写,也可能因为是写的真人,但书中并不是用的真名字,而且情节也非完全真。关于特写是否完全要按真人真事写,或真到什么程度,尚无定论,在苏联,作家们意见也不一致。至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不如叫传记小说——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作品中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不吝赐教。

秦兆阳

11月24日

从福州到北京,当时通邮要有一个星期的历程,足知作家收到我的信件后,当即作覆的。这样解惑答疑,使我们不但能把《文学概论》课学的文学分类的基本理论,联系到具体作品,而且能够了解作家创作的意图。像《农村散记》即使教学参考书上把《王永淮》等篇当作特写,也应尊重作家的意见,“不如都把它们看作小说为妥”。至于苏联文学作品中同学们的争议,大

致也作了类别：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不如叫传记小说”；波列伏依的特写和奥维奇金的特写各有区别，但“关于特写是否完全要按真人真事写，或真到什么程度，尚无定论”。这就示知了我们应该从作家和作品的实际，分别对待。不必囿于若干名词概念的定义解释吧。

对于一个远方求教的读者，秦兆阳同志热情地亲笔作答，还在信的收尾，特地一笔“我的作品中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不吝赐教”。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倍感动人。

这封复信，我一直珍藏着。十年浩劫，作家惨遭厄运，而与作家通信的，也成为“黑线”的罪证。从“造反派”到“革委会”的专案组，不断地追查，黑字白纸，明明白白，他们捞不到什么“稻草”，硬要死“卡”不放，但我不愿意向那些不明不白的家伙去辩解，只好以沉默相对。这段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颇值永记。

三年前，也是金秋时节，我所在的区委为教师平反昭雪，当场焚毁“革委会”所“整”的黑材料，其中我一人占近千页。会后，我领回了一包残存的手稿，夹有几封“囚”而未失的作家书信。秦兆阳同志的这封信，连信封均在，仍为完璧。这是不幸中之大幸，比起被毁的或残缺的稿本，顿时，尝到了“失而复得”的滋味。

手中还买到一册《当代文学概论》，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粗粗翻阅，仅在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一节，提及了：“另外，秦兆阳（1916— ）在五十年代前期以《农村散记》为总目所写的一组表现农村生活面貌的作品，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未免过略；而在长篇小说创作的概述中，却把《在田野上，前进！》遗忘了。这是不太公允的！面对书卷，两相比画，不禁喟叹起来。还是秦兆阳同志为新版的书扉题诗为序说得好：

消逝的未必会全都消逝，
泥土在抚慰着衰草的根须……

1984年11月20日初稿

原载《文坛剪影》

访秦兆阳

王郁森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从黄海之滨的青岛专程来到首都。我拨了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恰好就是秦兆阳同志。他对我这个生活在青海高原的文学青年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且告诉我，应该乘几路车，再转几路车，下车后步行多少路，才能到他家。

我走进一座普通的北京四合院，朝大门对面一间挂着竹帘子的房间走去。一个满头白发，面色健康，仪容文雅的人半躺在一张很旧的躺椅上思考着什么。我说：“秦老师，我来探望您。”他敏捷地从躺椅上站起来，把戴着的老花镜习惯性地扶了扶，微笑着，用沉思的目光打量着我。他让我坐在一把南方式的小竹椅上。我们中间隔着一张比较旧的、类似北方农家炕桌式的小桌子。小桌上放着简单的茶具和烟灰缸。他询问我的近况，眼睛在沉思中闪烁着青年人那种热情、单纯和朝气。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不贬低任何人，也不抬高任何人，却对自己采取了严于解剖的态度。他说：“每一个为人民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带着自身的优点和缺点的，我也不能例外。”他奉劝我，不要对任何人过于理想化，也包括他在内。他是延安

鲁艺的学生，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进入文学阵地的，在此之前他酷爱绘画艺术。他告诉我：只有现实生活促使你非拿起文学这个武器不可时，再加上你对这个现实生活思考过，深切地感受和感动过，你才有可能创作出真实的能够激动读者的艺术作品。他还告诉我：干文学这一行，要靠自己摸索，不一定非上什么文科大学不可。我告诉他，西北高原许多文学青年是他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文艺理论的信奉者，并且谈及这种理论的基本论点。他的脸色这时很严肃，他对自己的论点是坚信不疑的。他用清晰的、略带点湖北口音的北京话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我们经常要用革命的、战斗的、乐观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世界将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倒退。”

我问他近来有什么大作。他走进屋里，拿出一本《女儿的信》，递给我，说：“这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一本中篇小说。”接着，戴上老花镜，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名。

我们之间的谈话显得更随便了。我问他：前一时期，您在云南呈贡和宜良参观访问时，是不是写的诗最多？他爽朗地笑了。他说：“最早学写作，是学诗的。文学青年写作品，非下苦功不可；欣赏艺术作品应该是广泛的；多写诗，会使你的文章精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经过五十年代中后期的折腾，现在文艺界，有些人因受到冲击，胆子小了步子迈不开了，但大部分人依然是富有朝气的。只要是为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说话，就不必害怕。思想解放对于作家来说，是至为重要的。”

临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去他家向他告别。我们又谈了许多。夜里十点多钟，我才起身告别。他一直把我送出四合院的大门口，紧握着我的手，用深沉的声调说：“你还年轻，我希望你对任何事情都要多思。我现在每天都在动脑筋，思虑着一切。”

我一天不思考就感到空虚。你要扎扎实实地学习、奋斗,决不要急于求成。”

原载 1985 年 10 月 31 日《陕西日报》

“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

——秦兆阳谈文学编辑工作

何启治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秦兆阳同志应邀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电影馆为北京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讲习班讲课。听众有一千多人。散会后，我陪着他出来，意外地一再遇到人群中有些四十岁左右的男女学员迎上前来问好。他们不约而同地问到兆阳同志的年纪和健康，而且都说在中学生的时候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想不到过了快三十年才见到作者本人。这时，我在兆阳同志领导的《当代》已经工作了两年多，记不得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见面了，但这一次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古柏青青，丛丛鲜花飘散着淡雅的香气。这天天气暖和，他脱下中山装外衣挎在手上，上身只穿一件灰色的衬衣，头发虽已斑白，脸色却是红红的，很有光彩，始终含着微笑回答这些老“青年”的问好，健步走向文化宫的东门——他就住在挨近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北池子。

真的，他这天一点也不像快六十七岁的老人，更不像备尝艰辛、受过冤屈的人。他平时就不爱向别人诉苦，他今天讲课末了



秦兆阳与孟伟哉、朱盛昌、何启治在一起

给文学爱好者的赠言就是：与其常常悲叹，不如自己去干；与其发牢骚，不如自己站得高；与其嫌阴暗，不如自己做火焰；与其打冷颤，不如自己变火炭。然而，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历经坎坷而律己甚严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把毕生的主要精力都贡献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

“‘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

秦兆阳，发表、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中篇小说集《女儿的信》，童话集《小燕子万里飞行记》，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穿云山》、《大地》，评论集《论概念化公式化》和《文学探路集》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是一位有成就的老作家。但是，他自己却认定了：“如果一个人必定要有一种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秦兆阳小说选·自序》）他几十年的编辑工作的经

历给这句话作了很好的说明。

一九一六年，秦兆阳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枣树店村一个贫苦教师的家中。他毕业于武昌乡村师范。一九三八年奔赴陕甘宁边区，先后在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一九三九年结业后，便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宣传科编《锄奸画报》。这是一张土黄色的四开（像今天的《参考消息》这么大）石印画报。画画，编排，上墨，上纸全由他一个人包办。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他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美术系当教员，同时自画、自编、自刻油印的《联大画刊》。

此后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在冀中地区第十军分区任《黎明报》社社长，一九四六年在冀中军区《前线报》社任副社长，均具体负责编辑工作。

一九四七年秋至一九四八年秋，在冀中文艺工作者协会编不定期的通俗文艺刊物《歌与剧》（铅印）。

一九四八年秋至一九四九年全国首届文代会前在《华北文艺》（铅印月刊）任编辑。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人民文学》创刊至一九五二年，秦兆阳任该刊小说组组长。此后两年下乡体验生活搞创作。一九五五年在《文艺报》任执行编委。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一月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执行主编）。

一九五七年一月，他请假学习。此后，党的工作的失误使他蒙冤二十年。从一九五九年，他在广西等地经受了长期反复的批判斗争，直到一九七九年三月改正，然后恢复工作，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大型文学杂志《当代》主编迄今。

秦兆阳说“‘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这除了因为他几十年来的正业是编辑，经常在约稿、看稿、谈稿、改稿、退稿

和编稿中度过繁忙的日子之外,还体现着他自己对编辑工作的深厚感情和献身精神。

最突出地表现这种献身精神的,是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和执行主编那几年的工作中。《人民文学》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家全国性的最大的文学刊物。领导上对他们期望很大,要求“发表示范性的作品,指导性的理论”(周扬语),可当时实际上稿源却非常困难。从敌后和延安来的有经验的作家一般都在各种负责的文艺工作岗位上担任行政工作,无暇顾及创作;当时全国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新作者对新文艺、对革命文艺还不大懂,还没有掌握好。而《人民文学》主要又是发表小说的。这样,作为小说组组长的秦兆阳就自觉地承担了大量的、从来稿中挑选稿子并亲自修改稿子的任务——不必改就拿去发表的几乎没有。秦兆阳自己通过实践渐渐懂得了一些小说艺术的规律,晓得创作的甘苦,因而无论给作者提意见或亲自动手删改,都能对作品的提高有切实的帮助。这样,通过他和编辑部其他同志的努力,在《人民文学》这块园地上就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玛拉沁夫、孙峻青、白桦、林斤澜、张弦、刘宾雁、王蒙、肖平、耿简、耿龙祥、李威仑、大群、闻捷、公刘、雁翼……

那时,还不到四十岁的秦兆阳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有胃病,却常常带病工作)献给了编辑工作。这几年,他最辛苦,最繁忙,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优秀作品和文学新人成批地涌现,刊物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短时期内销售量增长了将近一倍。然而,新的文学浪潮很快就被打了下去,有人利用几件事情强使秦兆阳不幸“蒙尘”二十年。

其一,是在鸣放的背景下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一九五六年五月间,陆定一同

志发表了大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代表党中央发表的文艺方针。作协党组接着动员鸣放，作协负责人一再鼓动秦兆阳写文章。耿直、深沉而又勤于思索的秦兆阳从自己的实践中，感到解放后评论界和理论界教条主义相当严重，一再干扰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很想就社会主义文艺怎样才能更好地按文艺规律办事发表意见，于是便动手写起来。写之前，《人民文学》编委会还谈过有关当前文艺思想上所存在的问题。他于六月完成初稿，七月修改，八月发稿，九月发表于《人民文学》。这期间。两次送请作协负责人看过，均无意见，这才发表，却想不到竟因此罹祸。

其二，是在他的主持鼓励下发表了刘宾雁等人“干预生活”的作品，特别是在发表上述文章的九月号上同时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品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致不得不把稿件的修改情况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公布。秦兆阳修改过那么多稿子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却因修改这篇小说（尽管修改情况公布后反而没什么意见）而挨整，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这两件事，再加上秦兆阳“不识时务”地写信给作协的另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不愿再参加关于丁（玲）、陈（企霞）问题的党内鸣放会，说他对丁、陈一方和另一方都有意见，建议由作协领导同志在一块儿谈谈解开疙瘩，他自己不了解情况，夹在中间不好说什么。可惜，这样直爽、恳切的陈辞没有得到理解和接受，反而使他从一九五八年起，被强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经受了长达二十年的反复批判和斗争。

新时期的曙光普照祖国的大地。秦兆阳刚恢复工作就选择了编辑这个职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这个岗位上，他认真地审读过《秦川儿女》、《冬天里的春天》等长篇小说。但他

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当代》主编的工作上。他沿用在《人民文学》时的做法,为了使作品更精练、合理、准确、完美而促请作者或亲自动手为他们修改作品。如中篇小说《代价》,报告文学《热流》和《中国姑娘》等作品,他都亲自动手修改过。《代价》中,在徐克文的冤案平反后,他把始终忍辱顺从丘建中的余丽娜改写为拿起剪刀作了适当的反抗,这是为了使情节更合理;有的作品在排成清样之后,他还仔细地做最后的改动,使作品的某些情节或细节描写显得更合理,格调也更健康一些……

这样做,自然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繁重的编辑工作确实影响了秦兆阳同志自己的写作计划。但只要这样做了对提高作品有好处,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有好处,他是心甘情愿的。

一九八四年七月四日,在他家里那间书房、客厅兼卧室的南屋里,他和我们几个人谈到对社会和文坛的某些看法。先说到有些作者存在三浅的问题——学识浅(学问知识根底不深),城府浅(争眼前利益),思想浅(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一知半解、短视,往往只看到局部)。他认为这样的作家是写不出大作品来的。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苦笑着说:“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只顾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很要命的。‘文革’十年,概括起来是一个‘斗’字,乱斗一气,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全国分裂,自我毁灭。现在不少人又醉心于一个‘争’字,这也是很够呛的。竞争和争名争利是两回事。经济上的竞争和事业上的竞争不同,事业上的竞争和名利之争又不同。生活条件,待遇是可以适当地讲一讲的,但总不能以这为理由不好好工作。文学事业要有牺牲精神,献身精神。一个文学编辑,更要有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接着,他和我们谈到文学史上的一些佳话,讲到文苑的风范,提到竹林七贤、李杜、韩柳的友谊,提到屈原的《离骚》如果没有人传抄也就流传不到今天。还提到现代文学史中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为亡友编《海上述林》的事，讲到鲁迅和瞿秋白、白莽、柔石等作家的友谊，特别推崇鲁迅先生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组织一些文章，讲一讲怎么做人的道理。有些事，我真希望能在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写出来啊！”

可惜他的这些意见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但他这一席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其实，对于上述主张，他自己倒是身体力行的。直到今天，他已行将七十，由于工作需要，还要他兼顾着《当代》主编的工作，还要亲自终审某些重要的稿件，还要经常为办好《当代》而耗费心力。他的确是一个久经磨难而依旧奋斗不息、在文学编辑的岗位上富有献身精神的人。

带着时代的使命感办好刊物

作为一个大型文学杂志的主编，秦兆阳同志常常提醒我们要带着对祖国、对人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来办好刊物。在一九八二年二月的一次谈心会上，他和我一起回顾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他指出，办文学刊物，不要简单地注意刊物的发行量，而要看重刊物在社会上的作用，看刊物在这个时代起了什么作用。他说：“过去《文学》、《奔流》、《光明》等刊物对我这样的青年就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很多青年那时就是读了这些刊物，读了鲁迅他们的文章走向革命的。在冀中打游击时的一位司令员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说：“鲁迅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回顾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青年》、《创造》、《语丝》都是以文学为武器，带着对时代的使命感来办的。”

联系到《当代》这个刊物，他说：“我们的刊物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创办的。人们一方面

要求思想解放，一方面又在探索文艺如何在这历史要求面前发挥作用。我们是为了建设文学事业办刊物的，《当代》这名称就意味着我们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迁就、迎合读者，而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们要走一条既解放思想，又有益于读者、有利于文学事业健康发展的路，使刊物富有朝气，比较准确，有分寸感而又思想解放。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点，应该保持下去。我们的刊物就这样从开头印七万份发展到五十多万份，可见读者也是欢迎的。”

他指出，现在文坛上有些不正之风，如钻营评奖，钻营出国，钻营别人吹捧自己的作品，钻营名人作序……凡此种种，和文学的严肃的使命感都是不相容的。这种种造成了文学界庸俗化的趋向。我们看到这些，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才能避免编辑工作上的盲目性，才不至于被出版物的市场和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左右。他说：“我们就应该从这个大的角度来看刊物的编辑工作。”

秦兆阳通过自己对新时期文学的思考，认为以“伤痕文学”来概括这几年的文学是不恰当的。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在我们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上，他明确地提出，“四人帮”垮台以来，我们的文学应该是拨乱反正新历史时期的文学。他指出，十年动乱造成了伤痕，但文学不完全是为写伤痕的，为写伤痕而写伤痕的很少很少。拨乱中主要写了正——应该改革，也涉及乱——伤痕，我们发表的主要就是这样的作品。

他认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里，搞创作，写评论，办刊物，都相当艰难。又要为群众说话，又怕伤害党的形象和党的事业，又要拨乱反正，又不能调子太灰。这路子实在难。他很有感慨地说：“可惜在这样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清醒，不少作家和编辑头脑都不冷静，带着盲目性只想冲锋陷阵，甚至求救于宗教，简

直不知往哪里去，真是一种灰败情绪啊！”

他认为，又要稳，又要准，又要写矛盾，还要给人以鼓舞的力量，实在很不容易。要处理好这样复杂的关系，对作家、对编辑，都要提倡冷静，清醒，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作家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和反映生活，就要反对就事论事的创作思想，就要努力使作品不仅有深厚的思想内容，而且有深切的感情内涵。他指出，像鲁迅的作品感情内涵就深，就不会过时。

关于“就事论事的创作思路”，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进一步的说明，指出这是一种“眼光窄浅，看局部不看全体，看个别不看关联，看表面不看实质，拘于眼前的事态，缺乏推论的能力和想象的习惯。”其具体表现为：“着眼于题材、事件、过程、小范围内的所见所闻；不少作品被事件的无关紧要和平淡无味的琐碎过程缠住了思想，笔墨黏滞，摆荡不开；不少作者淹没于生活之中，不能‘既进去，又出来’；不重视性格、内心、感情，以及震动灵魂的强烈和回肠荡气的深沉性，不作概括性大而且深的构思，不注重鸟瞰式的纵横思考；没有气魄宏大而又思想深沉的巨制；不善于深掘生活的底蕴，灵魂的奥秘，不追求‘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以达到作品内涵的深厚宽宏，人物只是在政策和问题面前表态，是说明政策和问题的工具……”他十分恳切地希望有人对这种“就事论事的创作思路（或艺术观）”产生的根源和克服的途径加以研究，“以求得文学艺术的更快更健康和更有成效的发展”（《略谈“就事论事的创作思路”》，载《当代》一九八五年第十期）。

秦兆阳对拨乱反正新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认识，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接受《人民日报》一位记者的采访时，有过更明确的表述。他在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何把刊物办成既敢于揭露矛盾，又鼓舞人心、活泼、有朝气，我们是经过摸索才

慢慢明确起来的：第一，努力反映是非曲直是当前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如通过《耿耿难眠》、《这里通向世界》、《跋涉者》、《改革者》、《厂长今年二十六》、《龙种》、《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中长篇小说和《命运》、《励精图治》、《热流》、《中国姑娘》等报告文学，较及时地反映了城乡改革事业的发展 and 举国瞩目的、振奋人心的大事。第二，掌握好所发作品的格调。不是低沉灰暗的，也不是浅薄庸俗的荒诞和空空洞洞的东西，而是严肃、健康、引人奋发向上的东西。第三，编辑作风要严肃正派，把刊物当作严肃的文学事业来看待。对稿件的判断取舍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对名家也不乞求、不迁就。同时，把培养、扶植文学新人当作办刊的重要方针，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第四，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要求在不违背四项原则的前提下反映矛盾斗争，帮顺忙，决不帮倒忙。如何真正使党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相一致，使革命的利益和群众的愿望相一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在办刊的实践中对此逐步加深体会，也逐渐明确起来，从而使刊物成为各方面反映较好，比较受读者欢迎的杂志。

文学最终要给人以希望和信心

秦兆阳同志很注意一个文学刊物的总体形象。他当然知道一个刊物所发表的不可能都是完美的作品，刊物也不可能一点都没有差错。但他历来强调，只要我们在总体上把正面的、健康的东西树立起来，其他方面，次要的方面有点问题也就不要紧。

在谈心或正式的会议上，他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并不同意“爱护羽毛”的说法。因为我们的文学刊物是面对社会的，成败得失如果只是牵涉到一个人或一个刊物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怕的是影响整个大局。所以，他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的一次谈

心会上十分恳切地说：“思想解放不是很简单的事。如果比作打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是一条原则。那么，你要站住脚就不能像曹操手下的大将许褚那样赤膊上阵，中了好几箭——这一来自然也就不能连续作战了。”紧接着，他又严肃地指出：“个人受损伤问题还不大，严重的是这会影响到整个文坛起风波以致影响到整个社会对中央领导，对双百方针、对思想解放……发生怀疑。这样重大的损失可能一时看不见，但却是实际上存在的危险。而我们当然要不偏不倚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解放思想。否则，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对实现四化产生不利的影晌。”

后来，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的文坛很活跃，我们不能乱了方寸。他对新时期的文学作了历史的回顾，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几年，文学基本上是把对现实和历史的沉思形诸于文。试看头三届获奖的短篇和头两届获奖的中篇即可了然。这是整个国家的、全民的、历史的实践所促成的。对过去肯定或否定的都要再认识，要拨乱反正，所以作品往往都带批判性。但一个民族光批判以致没有自信心也是不行的，所以当大家一片反‘左’批‘右’时，我们有意识地发表了《热流》和《中国姑娘》这样一些引人注目、鼓舞人心的作品。我们选发《在困难的日子里》、《励精图治》这些作品，也是从时代的使命感出发的。这些作品表现了我们的人民在困难面前的骨气和正气，这就难得，就比那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作品好。”

在一九八三年的新年座谈会上，他指出党的十二大以后，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在这样的时候，文学更应该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克服矛盾，帮助党和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障碍，促进改革事业向前发展。”

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把这种办刊的指

导思想表达得更加明晰。他说在编选处理稿件时,他“总是抱定一条总的宗旨:文学作品最终要给人以希望和信心。作品不怕写得尖锐,但要准确,要能鼓舞读者,所以要花相当力气组织时代气息强的报告文学。”他不愿意大家总是唉声叹气,认为那样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气质,影响人民的心理,造成一种对社会对事业不利的失望情绪。他相信历史总会前进的,人民总是有力量的。因此,他说:“我们不要回避矛盾,但也不要被矛盾吃掉。要看到希望,保持着一种健康的思想感情去写矛盾斗争。”

“留下一些历史上站得住的东西”

我们曾经向秦兆阳同志提出,希望他能根据自己的编辑经验谈判断来稿优劣以决定取舍的标准。一九八三年五月九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在阅读和判断小说稿件时应该掌握如下的标准。

首先,小说的人物和事件都应该是形象的而不是概念的,即能形象地给读者一个印象。

其次,小说应能调动读者的情绪,引起读者思想感情的共鸣与激动。好的小说应该使读者的情绪随着作品主人公命运的变迁和故事情节的流动而变化,随着整个作品情绪的起伏波动而产生喜怒哀乐的共鸣。

第三,小说的格调应该是高尚的,哪怕在反映畸形年代被扭曲了的人物和生活,也不应该是简单地集中展览丑恶的东西,而应该是从反面促使人们痛恨假恶丑而向往、追求真善美,应该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

第四,小说应该能通过形象的塑造和对生活的真切描绘引起读者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

概括起来，一篇好的小说应该有使读者获得印象，引动感情，引起思索和得到艺术享受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几条标准。他还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过多地重视那些单纯以针砭时弊、写具体问题为目的的作品，而忽略了文学的长远的生命力。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回顾一年的工作时严肃地对我们说：“不要光看我们刊物今年发表的中篇多了，社会上反映好了，就感到满足。关键在于留下一些历史上站得住的东西，让人家一想到《当代》就能想起来的東西，例如《芙蓉镇》这样的作品。”

关于“历史上站得住的东西”，他后来在文章中，在讲话里都一再接触到这个问题，并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概括为：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规律。他认为这四个方面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就是成功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

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的谈话中，他又对艺术规律这一点作了解释和发挥。他指出：好的作品要和时代的脉搏相呼应，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把握从生活的逻辑性过渡到作品情节和形象的逻辑性。这就是作品艺术的逻辑性，也就是一个艺术规律问题。事物、生活都有它的逻辑性亦即规律性，写到作品里面，就是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性，这种规律性能使你在想象的时候，知道事情应该怎样发展，人物的性格应该怎样表现，可能怎样表现，必然怎样表现。只有这样，作品才是合情合理的，也才是真实可信的。

遗憾的是，他认为我们许多编辑、许多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对此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和理解，这就是现在我们一些同志感到现实主义没有力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说，“其实不然。马

列著作为什么那么有说服力,就因为它的逻辑性是铁的,推翻不了的。这逻辑性是从生活中来的,从客观现实中来的。这用到文艺上来也一样。我们看作品,无论如何要把握住它的逻辑性、合理性,而不能光用知识分子自我欣赏、自我同情的态度去看作品。”

期待着史诗式的作品和巨人式的作家

作为一个老作家、老编辑,秦兆阳常常殷切地期待着,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和巨人式的作家的出现。为什么在当代的中国文坛上少有堪称为史诗式的作品和巨人式的作家出现呢?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这和多年来政治上“左”的干预,和作家们思想、艺术、文化修养上的不足,以及生活实践的不够等等大概都有相当大的关系,而我们的编辑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细致,不那么理想,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在一九八三年的新年座谈会上,他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许多大作家往往都是那个时代的大思想家,都是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观察、感受、认识生活,然后才写出史诗式的作品来的。列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就因为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农村的矛盾和农民的愿望,为他们寻找出路。巴尔扎克也是如此,站在时代的高度,历史发展的高度,形象地说明了金钱的本质。雨果的《悲惨世界》反映了法律和人性、人道主义的矛盾,也是这样的作品。我们能不能也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改革、找题材呢?”他指出:“《改革者》是有时代高度的,所以受重视,但可惜艺术上粗一些,细节上也不够精致。《改革者》反映的矛盾是真实的,起了开路的作用,但和《当代》上发表的另一一些作品一样,还是有点把生活、把矛盾简单化。更

有一些作品,不是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来看生活,而是多少有点实用主义,如某些针砭时弊的问题小说。过去的教训,使人们对配合形势、政策的文学作品很反感。现在也不是绝对不讲配合,但不能盲目。一个是要配合正确的东西,一个是真实,还要在艺术上尽可能提高。有这三条就不怕配合、跟形势。党的十二大以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党中央有了划时代的决议。这样的时代文学更应该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帮助党和人民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改革者》之所以引起了有关同志和许多读者的注意,道理就在这里。”

接着,他又以在《当代》上发表的、有相当大影响的两个作品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写的就是史诗式的题材:革命老干部为了制止武斗在雨夜踏着泥泞去赴死。这题材气魄大,强烈振动人心,是时代火花的爆发,应该并且可能写成史诗式的作品。但作者做得不够,还是没有达到。这样的干部为什么会为了群众去赴死?他平时是怎么工作的?跟农民有什么样的交情?对‘左’的错误有什么抵制和斗争?可惜作者对这个反极‘左’的典型写得不够充分。如果从极‘左’思潮和党的传统的群众路线的冲突这个角度把这个故事写深了,写好了,其历史意义就更大了。陈国凯的《代价》也是这样,写了十年动乱使我们的政权在此时此地变了质,写出了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是个史诗式的题材。可惜写得还不够准确,不够深刻。如余丽娜内心的痛苦和为了摆脱绝境而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的内心矛盾还写得不充分。作品对徐克文这个人物的内心刻画也比较简略,以致没有很好地发挥这个史诗式的题材的力量。如果再认真改一两遍就好了。”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他指出,“就事论事的创作思想是

史诗式的作品难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什么叫现实主义的深化？他指出，“从时代的高度看生活和提炼主题思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要把特殊的构思所涉及的最深刻的生活逻辑性充分地具体地表现出来。”“要把作品的独创性、强烈性、深刻性，跟有意追求‘以怪取胜’的胡编乱造区别开来。”（秦兆阳：《学习与探讨》，载《民族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此外，是否能产生史诗式的作品，也和作家的气质和艺术追求有关。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上午的一次谈话中，他在谈到有的作品追求所谓思想的空灵的问题时指出：政治就体现在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里。提空灵的人不一定空灵，提出远离政治的人不一定懂得政治。他说：“有的作家把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写得很美，也许有一种空灵的意向。本来很残酷的斗争在作家的笔下有一种隽逸之美。但他的弱点也就在这里——写不出长江大河式的史诗式的作品来。而有了那种纤巧的、具有隽逸之美的作品，却并不该也不能否定《红旗谱》的存在。文学中的这种现象和绘画中的虚实结合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他认为空灵的意境不是绝对不可取，“在短篇、中篇以至长篇的某些部分都可以尝试、追求，但要有一定的条件——和作者的气质一致，才能做到自然而不做作；虚实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中存在，要视具体的题材而定。”

然而，他所殷切地期待的还是那种历史感深厚的，长江大河式的史诗般的作品和巨人式的作家，秦兆阳自己就是一位有多方面艺术修养的作家。除了创作、理论，他还工于字画和辞章。一九八五年第二届《当代》文学奖的奖品中，有很别致的一种，就是他为获奖作者题写的扇面。其中，他写给《故土》的作者苏叔阳的题辞是：“故土情意厚，人生滋味长，关山几万里，处处贴心肠”。他为《新星》的作者柯云路写的题辞是：“振衣千仞岗，

濯足万里流，文章千古事，飞笔到白头”。

去年年底，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心武发表在《当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奖，他又为刘心武写了这样的条幅：“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只因历史多情意，楼头钟鼓震苍穹”。

我们从这些打心里流淌出来的文字中，不是也能体会到一位思想深邃的老编辑的一番浓浓的情意和苦心吗？

“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

秦兆阳历来认为，要做一个好的文学编辑，首要的是对工作有正确的态度。特别是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的确比编书还紧张，还累，但他认为这样更能促人进步，工作逼着你要更及时地去接触社会和文坛，逼着你去认真地思考时代提出来的问题和创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就从中得到了提高，并从办刊物所取得的成绩中得到了安慰。

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的谈心会上，他以自己为例说：“我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做报纸编辑，一九四七年正式编文艺刊物，几十年来主要做文学编辑工作。如果利用得好，善于学习，工作本身就是个学校。比如，学会精练，就是办油印小报学来的。我天天磨自己，做到多一块少一块都有办法，结果养成了尽量去掉废话的习惯。另外，只要你用心，从来稿中你也可以体会、感受时代的气息，群众的心声，以至你并不熟悉的各行各业的生活情状。工作还会促使你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为什么这样的稿子读起来就有味，为什么那样的稿子就没味？为什么写新人形象不能写缺点？怎么叫诬蔑工人阶级……那时候有的报纸和刊物一再发表文章批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品，我想老这样

不明不白的也不行,就看了一本《马恩列斯论文艺》,结合自己的编辑实践和思考写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这样思考、学习,慢慢才懂得一些文学创作的规律。”

总之,他认为要当好一个文学编辑一定不要有单纯任务观点,不要把工作当作负担。一则“为他人作嫁衣”的结果使刊物在社会上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人民和社会都不会忘记你,二则越是用心工作越能处理好这个矛盾,你也就能从工作中学到真本领,在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提高,自己也就在编辑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了。

此外,他还主张编辑不光要学习生活,还要学习理论,还要善于思索,及时地掌握信息,分析形势,才能在复杂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文学来自生活,又往往要走在生活前面,糊糊涂涂是当不好文学编辑的。他还是以自己为例说:“当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时,我一时好像成了英雄。其实,挨批评也恍恍惚惚地有点不知所措。一九五八年开始批我时,冶金工业部一个年轻人在会上说秦兆阳不是修正主义,还给我来信,而我却回信说,‘一失之误,铸成大错’。可见我当时并不清醒,也就在复杂的形势中糊涂起来。”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教训,至今对我们还是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的。

耿直、深沉、多思的秦兆阳同志已近古稀之年。他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几十年的文学编辑工作,他所披阅的稿件何止千万言,他在编辑实践中的深切感受和应该总结的经验教训又哪里是一两篇文章说得完的?真正的作家,不仅是描写人生的高手,而且还应该是严肃而又深刻的思想家;一个成熟的文学编辑,同样也应该是熟悉人生而且有深刻思想的人吧。曹雪芹为了把他的思想和从特定生活题材中提炼出来的主题思想表达出

来,曾经历过“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磨炼历程,并在《红楼梦》的头一回就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秦兆阳同志也曾化其意为一位老编辑题辞:“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在我看来,这几句话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他的自况。一个仍然坚守在编辑岗位上的古稀老人的话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铭记在心里的。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夜,鞭炮声中

原载《编辑之友》1986年第三期

思慕与寻访

秦 风

一九六一年,我在中学读书,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浏览了现、当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对于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尤为喜欢,总觉得这类作品有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能给人以质朴、广阔的大自然美的艺术享受。然而,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较为广泛的涉猎和不断“筛选”之后,能够在已看到的许多作品中使我终于找到契合自己个性和气质的作品却仅有一部,这就是秦兆阳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

记得是这年夏季的一天,一位爱好文学而又熟悉我的阅读兴趣的同班同学向我推荐了秦兆阳的这部小说,并对其艺术风格以及书中许多具体的细节描写作了极高的肯定和赞赏,要我一定借来一读。于是,我很快从县图书馆借来这部小说的精装本。它的富有抒情性的语言风格立刻把我吸引住了。那浓郁的生活气息,那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以及出色的景物描写使我震惊,令我陶醉、神往,使我至今仍然怀念那广阔的华北平原上的小小村庄——“曲堤村”。为长期阅读之便,我当时买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去图书馆对换后,才使这部小说至今仍

保存在我身边。

这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的秦兆阳的作品。从此,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位作家的名字,而且阅读范围也一下子缩小到专读他的作品上,并开始了对他的其他作品的寻找查阅。因酷爱他的长篇小说,更使我对这位作家也产生了一种近乎神秘感的好奇心: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的作品?他的相貌、年岁、生平、创作历程如何?长时期给我留下了不得其解之谜,直到一九八〇年。

此年秋,我买来几本过期的《人民文学》。可巧在这几本杂志中都有批判秦兆阳其人及其作品的文章。从其中的《秦兆阳的破产》一文中,我才知道他曾担任过《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好多篇文学论文,也知道了他是“右派”作家,也记住了何直是他过去发表某些作品时所用的化名。于是,我把这几篇批判资料珍存起来,以备查阅他的受到批判的文章。

一九六二年中学毕业后,我到—个工厂做工。到文化“浩劫”开始前,在近四年中,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以及耳闻人们私下对“右派”的种种谈论,加之自己又翻阅了一些关于一九五七年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批判资料(我对此最感兴趣),使我开始对曾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有了另一种认识。因此,反倒对秦兆阳产生了由衷的崇敬与思慕之情。同时,又在图书馆借到一本秦兆阳的《农村散记》。我才知道,在长篇小说出版以前他还出版了这本包括十四个短篇的小说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当时没有能够把这本短篇小说集保存下来,至今仍然追悔莫及。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浩劫”初期,我得到一本一九五六年合订本的《文艺学习》杂志。在这本杂志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秦兆阳用何直的笔名发表的文艺随笔《论“尖锐”之“风”》。如果说,从初读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到短篇小说集《农

村散记》，我只是从艺术欣赏角度上敬慕他的敏锐的生活感受能力和非凡的文学才华，那么，当读了这篇随笔之后，却更敬佩他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正直和胆识。正如他的笔名“何直”一样，是何等直爽！现在看来，这篇发表于三十年前的短论，对截至“四人帮”被粉碎之前的不正常之“风”所提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又找到好多本刊有秦兆阳作品的旧杂志。在高喊“最最最”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最”过，却沉“醉”于大量搜集和阅读秦兆阳过去发表过的作品。有时我甚至把秦兆阳作品中受到批判的只言片语抄在一个小本上随身携带，平时背诵。随着“浩劫”的恶性发展，由对文学作品的“大批判”，“升级”到对作家人身的摧残和侮辱，使我更担心秦兆阳的生命的安危。那时我也曾想过，也许今生再也看不到这位作家的作品问世了；如果能找到他，或许以“借用揪斗”的理由把他带走躲起来避难。然而，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不但没有关于他的消息，甚至连他的受到批判的作品也没有搜集完整。直到一九七六年二月，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才抄录了包括《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在内的好几篇文学论文。

“四人帮”被粉碎后，文艺界有了新的转机，我开始在报刊上留心秦兆阳的下落和他的作品，直到一九七九年元月，从我弟弟带回的一张剪报（《工人日报》）上看到他的诗作《悼念之歌》，才得知他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磨难之后还幸存人间。

一九八一年元月，我们通信了。在往来的信件中我才知道，由于作家二十多年坎坷的生活历程，他自己过去曾发表过的文章已无存底，又知道他正在编辑自己的论文集而搜集过去的文章，于是在三月和五月两次给他抄录了两大本我自己保存的一部分他的资料。一九八三年元月，我和我妹妹又去外地图书馆

给他抄录了一部分关于他的资料。可惜因条件所限,已为作家所做的事情,比起应该做到的却相差甚远,使我每想及此,深感愧疚。而近年来,作家每有新作出版,必先给我寄来,甚至连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零碎作品,有时也用信封寄来。

更使我受到感动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后给我寄来,因印刷厂错排误置,出现许多差错,他竟亲自用笔校正了多处。我知道他的视力很差,编辑工作繁忙而又年老力衰,要校正三十余万字的长篇,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收到他寄来的小说后,当即给他回了信;然而在相隔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是信丢失了还是他已忘记了,却给我写来一封信,询问我是否收到此书,否则,他将另补寄一本给我。一件小事他却一直惦念于心,使我倍受感动。

在思念与寻访了二十余年之后的一九八五年十月中旬,我和秦兆阳终于见面了。当我在西安市一所普通的招待所里见到了他,紧紧地握住他那温暖而瘦小的双手,久久地注视着他那深邃的艺术家的眼睛时,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二十余年来,我对秦兆阳修改别人的稿件和修改他自己的作品特别留心,只要能搜集到的,我都尽可能在原作上添加或删掉他处理后的文字。特别是他对他自己的作品要求更为严格。

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他对许多稿件的修改在分寸上掌握得极好,这也是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校对原作后才发现的。比如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结尾处的改写是成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画蛇添足。

秦兆阳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至今一直为我所拜读。我认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虽已过去了三十年,但反映这一变革的包括秦兆阳的作品在内的许多优秀文学创作,不会因为

以后的社会变革而失去艺术价值。其艺术手法及美学思想将为许多作家所借鉴。

秦兆阳在他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走了四十余年的漫长历程，同时为繁荣我国的文学事业和培养文学新人付出了许多心血。我衷心祝愿这位老作家健康长寿，沿着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写出更多的诗篇。

原载《延河》1986年12月号

“文章千古事，人品在朝夕”

——秦兆阳谈作家情操

晓 蓉

秦兆阳不赞成文坛时下一些人的消极说法：高尚操守不能福肚，不能荣身，更不能发财。

他问：“作家要不要作‘时代的眼睛’，‘人民的良心’？以个人发财、享乐，争名誉、地位为目的而去写作，还能写出好作品吗？”

他显得很激动。手中的烟蒂快烧尽了，还掐在指尖上。

或许在开始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今天，面对前进过程中种种必然出现的躁动与混乱，丑恶与泥泞，这种心态的发生，也带有它的必然性和过渡性？

“闹中取静”，是秦兆阳家小四合院的特点，也是他处事修身的方式。在出国、评奖、旅游、见报、排名次的文坛纷争中，谁也见不到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又几次要求辞去《当代》主编职务而不能如愿。

他的耳目并不那么闭塞，消息也还灵通。经他扶植成名的中青年作家常来看他。他们发现，他对新事物十分敏感，听到有兴趣处，还要记上两笔。可是，他做人的操守始终没有改变：

“作家的劳动虽然以个人为单位,但文学却永远是一种高尚的社会整体性的事业。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文学创作,他便不再完全属于自己。”他认为文坛是一个向全社会呈现精神价值的整体。每个作家都是文坛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个人纯正高洁或卑劣污浊,都或多或少影响着整个文坛的形象、素质和声誉。有时,个人偶然得之,文坛却永远失之;个人喜剧性地得之,文坛却悲剧性地失之。其结果,偶然得之也会永远失之。

谈起现当代文学史,秦兆阳感慨良多:“一个作家要想通过历史对于自己的人格的审视和检验是很不容易的!”他说,在几种情况下,文人的队伍很容易从内部分化,而灵魂的格调各显高下:一是某种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令人窒息地日益加大,形势逼迫着每个人作眼前利害的抉择时;二是在某种不正之风运用各种手段对是非进行扭曲的评断,因而产生与个人既得利益相关的种种选择时;三是在荣誉、金钱等名利得失的引诱下,庸俗心理得以放纵,个人私心无限膨胀时。在这些情况下,有些并不真以文学为高尚事业的文人,很容易去伤害别人,或者互相伤害,形成内耗,甚至结成永远的疙瘩,延续几十年不消。以至于或多或少影响当时和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以及文坛整体的素质和形象。当然,这不包括那些文学上原则问题的论争。清醒地看到这种情况很重要——会使人或者不去推波助澜,或者致力于消除疙瘩,或者欲正人先正己,或者先防己后防人。

他说,文学家不可避免地纵向面对的是历史,横向面对着社会。许多是非见解,往往会形成历史性社会性的观念,用文字公之于众。影响所及,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城市,甚至也不是一代人。究竟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值得人人严肃对待,不可轻率从事。

他说,中国改革到了关键时刻。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党内、政府中、社会上都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因此精神文明的建设更加重要。作家是打着所谓“当代意识”的幌子跟着添油加醋,“得捞且捞”,还是把握操守,净化社会呢?前者,是文学的没落,这样的文人会成为文坛的消极因素;后者是文学的光荣,这样的文人将无愧于心,并受到人民的尊敬。

秦兆阳今年身体较好,气色渐佳。他老伴儿说:“他又能写东西了!”他正在完成一个中篇。自传《回首当年》也已写了六万字。那是他参加革命前的一段经历。记叙了曾经面临的几次人生选择,以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净化灵魂的神圣事业,在一个青年心中不可更替和动摇的地位。在写散文《忆亡母》时,他早已平和和清朗的心域起了一点波澜。

一个不停地思索、不停地追求的生命,在曲道的腾进中奉献、消蚀着自己的身心,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昭示生命行程全部经验的“最后的闪耀”呢?

他要先问问自己。明白道理和有好的愿望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得到,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原文刊载于1988年8月6日的《文艺报》头版,1994年10月25日,在秦兆阳先生去世后,作者又留下了下面几句话:谨以此文追念在1994年10月11日不幸逝世的秦兆阳老师!他清寂的身影将清晰地刻在我们的心碑上。 晓蓉)

94年10月25日

秦兆阳印象

陈国凯

久闻其名,不见其人。认识秦兆阳是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先生还健在,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会议开得蛮热闹。

一晚开座谈会,一位清瘦的老者站起来发言。我问湛容:“他是谁?”“秦兆阳。”湛容说。

据说他从长期“流放地”广西借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的发言谦逊得可以。这就是秦兆阳吗?我心想。

只此一面之缘,并无交谈。

这次座谈会号召与会中青年作家要大写“文化大革命”,我也为之热血沸腾,后来写了粗浅的小说《代价》,交给了龙世辉同志。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

不久,我收到《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信上说,稿子读了,有些地方作了点修改。本来应该先征求作者的意见,因为马上要发排,时间来不及了,请我谅解。他说,如果我对修改的地方不满意,出书时还可以改回去。信上还说:原来的书名《活着和死去的灵魂》太长,他改为《代价》,不知我意见如何?……

这是一封情词恳切的信，我读着不无感动。作为一位有希望的老作家和杂志的主编，如此谦虚给一位不熟悉的业余作者写信，难能可贵。后来我客串过一个刊物的主编，知道主编事务之繁杂，我就做不到这一点。

稿子在《当代》刊发后，我发现他改动的地方很少。只是变动了其中的一个小情节。更觉得这位主编对作者的尊重。不论是他的能力还是身份，都可以在一个业余作者的稿纸上跑马。他没有这样做。

从稿子在刊物上发表到成书，他又找我谈了一次。我那时客居北京。在石棉瓦盖顶的简陋工作间里，他跟我谈了一下午。书的清样已经出来，他建议我出书前再认真修改一次。他不是泛泛而谈，而从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等等多方面的分析，很多有益的建议，甚至为我设想了一些情节。他不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跟青年人说话，完全用商量的口吻。

书稿上印着“急件”，印刷厂等着开印。我不无疑虑地说：“再改会不会影响开印时间？听说不按期送厂要罚出版社的款。”

他断然地说：“这些事你不必考虑，只要能把书出得好些，我们赔点钱不要紧。经济上的事出版社负责。我觉得你这本书可以改得好一些，你说呢？”

他吸着香烟，微笑地补充说：“今天说的，只是一个读者的意见，说得对，供你参考，不对的，你不必听取。希望这些意见不会来束缚你的思路。”

这就是秦兆阳。爱护文学新人的秦兆阳，虚怀若谷的秦兆阳。

1980年春末夏初，断气十多年的文学讲习所恢复了。中国作家协会把“文革”后一批青年作家网罗进第五期文讲所。所

里通知，蒋子龙和我的辅导老师是秦兆阳。

子龙和我都有个毛病：不爱串门。子龙是忙我是懒。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一起登门执弟子之礼。

我们拜访辅导老师的场面是奇特的。天热，兆阳师家居简陋，只有四合院的小院里有一点清风徐来。他穿一件汗衫一条短裤接待来自南北两地的门生。搬了几张小板凳，我们就在露天小院落里聊天。为人师表者不重衣冠，不作导师情状，亲切得可爱。两代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子龙第一次登门。他看过子龙的一些作品，谈得挺投机。我一边听，一边抽他的香烟喝他的茶。小板凳上放着“大前门”香烟，当时算是好烟了。

一别多年，我跟他没通音讯，不过他那淡雅而热情的形象一直铸在我心里。在某一期《当代》上，看过他写给子龙的通信式的文章，评论中篇《赤橙黄绿青蓝紫》，有着炽盛的热情和精当的分析。我感受到那一片真诚。没有什么比两代人之间的理解和真诚更可贵了！

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寒风料峭，微雪霏霏。我和蒋子龙叫了一部出租车来到那陈旧的四合院。老人案头上摊开稿纸，新开笔。

看见我们来，他很高兴。看着老人气色不错，我们也高兴。

“开会以来，一直找不到你。”我说。

他微微一笑：“我身体不好，很少去开会。开会时常常要我讲话，我也没有多少话可说。”

我们默然。

“我劝你们也别忙着开这个会那个会，你们的年纪不小了，时间宝贵，还是抓紧时间写点东西吧。”他委婉地劝我们。

厅堂里布置得很雅致，老人工于书画，又添了一项雅兴——

树雕。从山上捡一些有形有款的树头树根，稍加修饰即成一景致，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无拘无束地聊天。我发现他对文坛上事儿看得很敏锐，也许他阅历太多，早已褪掉浮躁气，对很多事儿已经蕴而不露，不想去凑什么热闹了。

车子还在外面等着，天空还是一片迷蒙细雪。我们离开秦府，出了小巷，子龙说了一句评价秦兆阳的话——“山中高士！”

原载 1989 年 1 月 1 日《文艺报》

文坛伯乐秦兆阳

涂光群

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些出色的文学期刊编辑,特别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他们长期地付出了无声的辛劳;在过去“左”的思潮对文学事业的严重干扰下,有人还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劳绩不仅不应该被埋没,而且他们的编辑工作经验,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经验,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写了本文。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1956年我在他手下干编辑。记得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说《三月雪》的手稿给了我。他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是我们编辑下班后,他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肖平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过《海滨的孩子》,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辑不算陌生。但在《三月雪》发表前,他的



1979年,秦兆阳与1953年采访过的劳动模范王永淮在邢台

名气不算很大,他的来稿从编辑手中漏掉并非没有可能,假如这个编辑粗心大意点,或者没有鉴别出来的话。秦兆阳这种眼睛向下,丝毫不烦看普通投稿者的来稿,深入、细致的作风,无疑对每个编辑都是鞭策。还有完全是无名的作者,被秦兆阳从浩如烟海的稿件堆中,“沙里淘金”地“淘”出来了。50年代中期的读者,或许还记得中篇小说《总有一天》,曾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七、八期连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作者黄远是泉州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这以前,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寄到编辑部的这部手稿,可不像个样子,是写在几册六十四开很不整齐的笔记本上,蝇头小字,写得也不规整。以往碰见这样的来稿,编辑可以不看就退回去的,一则它是好几万字的长稿;二来这样小的字写在小本本上很难吸引人读下去。可是秦兆阳耐心地读完它(作为这部手稿的第一个读者,这部小说,也是他从编辑案头“拾”去的),并亲自为它整理加工后送到工厂

发排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7 年，秦兆阳断断续续在《人民文学》干了五年小说编辑及执行主编，比他专业搞创作的时间长多了。不论是当编辑或主编，他总是花去绝大部分精力，在来稿的“海洋”中辛勤地耕耘、播种和收获。要统计他发现、支持的作品和人才吗？在如今的知名作家中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来。例如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都是经秦兆阳之手发出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前，秦兆阳选登小说的精彩片断《奇袭虎狼窝》，并写编者按语，对这位即将面世的新作家，给予及时、热情的肯定。有的人知道是秦兆阳发现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有的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

我要说，这是一种道地的鲁迅所称赞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文学编辑岗位上，我常见有两种编辑：一种人看稿很细，也有水平，但只愿为知名作家服务，不大看得起无名作者的来稿，因而在他们的编辑记录中，很少有发现人才的记录。还有就是像秦兆阳这样的编辑，他们也善联系知名作家，但绝不以此为满足。好像半年一年的编辑工作下来，不发现几个新的名字，不从大量废“沙”中“淘”出有希望的“金子”，那就还没有完全尽到编辑的职责。这样的编辑更可贵。

一个编辑要有“识”，还要有“胆”。他的“识”表现在极其敏感地发现作者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新探索和思索，以及这种探索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意义，对于文学创作发展的意义，而给予及时、明确的肯定。他的“胆”，表现在发现这样的作品后，能够大胆、果断地予以支持，有魄力将它发表出来，而这往往要受到旧习惯势力的反对，要冒些风险，甚至编辑个人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并不是所有编辑都能做到这一点。想过“平安”、

“太平”日子的编辑，当然不会这样干。但他们编辑的刊物也往往“四平八稳”得很，在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留不下突出的痕迹。

我还记得1956年初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将他的第一篇文学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宾雁长期担任记者，接触面广，头脑敏锐，又爱思索。1956年春节，他将长期积累的感受，用文学特写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吐方快，只一个星期，《在桥梁工地上》便完稿。文笔犀利、深沉，可以说在我们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上，第一次这样锋利、深刻地触及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时弊；而且不只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还第一次大胆、尖锐地触及了某些领导干部的风派气质和门派行径，这比单纯地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更见深刻。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像罗立正这样一个风派气质、“一贯正确”的人物，在我们风云多变的政治生活中，实在是个难得的典型。在这以前，刘宾雁写过大量新闻特写，翻译过苏联作品，但利用文学形式反映生活，在他还是头一次。《在桥梁工地上》是他的文学处女作。而秦兆阳作为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一下子发现了刘宾雁，他立即给他去信，以简短、鲜明的语言，肯定了他的探索。接着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以头条、通栏、极为显著的地位，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为作品写了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他还在编后记中写道：“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本刊这一期所刊登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这样的特写。像罗队长这样的人，像曾工程师这样

的人,像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是很少的吗?我们怎么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呢?怎么可以看见了而不写呢?”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新鲜,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以《在桥梁工地上》发端,随后秦兆阳又发表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作品,在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形成了新的文学浪潮,对贯彻双百方针,促进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人民文学》因而受到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短短时期内刊物销数增长了将近一倍。当然这新的文学浪潮很快被打了下去。编者秦兆阳和作者们“蒙尘”二十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沉冤得以昭雪,作品成了“重放的鲜花”。

在发现人才和对创作中健康的新倾向的大力支持上,秦兆阳堪称有胆有识。这里至关重要是“胆”,是建立在正确的“识”的基础上的。而正确的“识”从哪儿来?是建立在对生活真理不断的思索和探求之上的。秦兆阳是这样一个人勤于向人民的生活学习,勤于观察、思索的人。在观察、思索中,他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建立了热烈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感。因而刘宾雁等人的作品一来,他能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迅速地、准确地抓住它们的新颖、优长之处,而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肯定。可见,没有学习、观察、思索,就谈不上有正确的“识”,更谈不上“胆”。常见有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自以为“大胆”、“敢放”,思想“很解放”,但他们缺乏正确的“识”,更谈不上正确的观察与思索。“思想解放”而不用思想,结果放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的文学运动“帮了倒忙”。这不叫“大胆”、“思想解放”,而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地瞎干。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胆”,不能说是胆有识。

一般新作者初次写成的作品,总难免有幼稚、不够成熟的地方。有的是思想敏锐,但艺术不足;有的是艺术还可以,而思想有偏颇之处;有的思想、艺术都有些缺陷。一开始就思想精深、艺术老练的作者,实在不多见。新作者的作品还有个特点是往往优点和缺点掺和一起,不大好分割。编辑收到这样有缺点,但有思想、艺术闪光的作品,既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有缺点而看不见它的基本优点、基本长处,轻率地予以否定;也不宜放弃思想、艺术上应有的要求,明明可以争取改好的地方,也予以迁就。有时一篇作品,恰好就是思想上或者艺术上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而不完善、上不去。这就需要具体的指点、具体的帮助。譬如登山,在最难登的那几步,需要有经验的人拉一把,扶一下。需要细心地肯定作品的优点、长处,具体地指出缺点、不足,这样新作者才有所遵循,不致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中肯的意见,必要的修改,有的作品就发表不出去。秦兆阳在具体帮助新作者修改作品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小说家,他懂得小说艺术的规律,晓得创作的甘苦,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构思,因而提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对作者帮在点子上。而作为编辑,他又能以较宽阔的视野对作者提出要求,使作者尽可能跳出个人的一些局限,从更高、更宽广的角度思考作品的问题,而这正是作者十分需要的。他有时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当面交换意见,既具体又有条理地分析作品的长处和不足。有时写出长达几页十几页的意见,寄给作者。等到作品经过作者修改基本可以用了,秦兆阳又帮他们做文字上的修饰、润色。记得林斤澜的《台湾姑娘》,李威仑的《爱情》,杨大群的《小矿工》,都是作者接受秦兆阳提出的中肯意见,对作品修改后,在发表时达到了较理想的水平。

一篇好作品发表后,发生广泛社会影响,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作为这篇作品的编者最高兴、最感欣慰的事。但是编辑对作

者所做的工作——从发现他的作品到提意见修改到最后润饰定稿——所付出的心血,则是看不见的,往往不为世人所知。

要修改作者稿件,当然应该尽量做到细致、周全,尊重作者原意,最好不要“越俎代庖”。然而就是最高明的编辑,总难免有失误的时候。错了不要紧,接受教训,改了就是。但在秦兆阳的编辑生涯中,却有因修改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公开挨批评、挨整的事。这件事情背景复杂。做此决策的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但是过火的举措总难以服人。当时就有一些读者、作者为编辑鸣不平。有的投书说:“编辑改稿有一百篇是对的,人家看不见。为什么一篇的‘失误’就得公诸社会而‘大动干戈’呢?”

秦兆阳是个小说家,他在建国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儿童文学《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风格。其后发表的《农村散记》清新、俊逸,充满生活的诗意,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但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他主要是干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在他担任小说编辑的建国初期,那时创作还很活跃,老作家对新生活的适应有个过程,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写作的时间少,青年作家还没有起来,但又要求刊物发表“示范性的作品”,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从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发现有希望的苗苗,精心修剪,使它们能见诸版面,以度困难局面。后来担任《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更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日日夜夜,看稿、改稿,接待作者,筹划刊物的改进。这不能不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那时他不到40岁,正当盛年,他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则他那时患有胃病,也常常是带病工作)、才智,献给了文学编辑工作,献给了广大青

年业余作者。

一个知名作家、有才华的小说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倾全心于文学编辑工作，为作家、读者服务，为发现、培育文学新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求名、不求利，甘当无名英雄，这种精神、风格是可佩的。没有无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是决然做不到这点的。

光是牺牲吗？秦兆阳不这样看。他是以人民文学事业为重。文学编辑工作也好，创作活动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人民的文学事业，是人民需要的事业，而不是个人沽名钓誉，“功成名就”的手段。既是人民需要的事业，不论编辑也好，创作也好，他都全心全意干下去。他从不把创作和编辑对立起来，好像创作“高人一筹”，编辑“低人一等”。创作者和编辑者本来是互相需要，应当做互相提携、相得益彰的朋友。创作和编辑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例如他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当编辑部有的年轻同志不安心编辑工作，不安心看稿时，秦兆阳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最初也不会干编辑工作，由于事业的需要，他干了。他努力钻进去，逐渐摸索看稿的规律。从阅读大量来稿中，学习着提炼、分析一些问题，经常苦苦思索。为了提高分析、思辨能力，又必定要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文艺理论。这种对来稿的分析、思索，也是对创作问题的分析、思索，同时也是个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别能力，提高了编辑水平。他有感于稿中一般化、公式化的现象严重，便以来稿为实例，写了一系列批评、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以“策”或“秦策”的笔名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出版，50年代在青年业余作者中很有影响。）因为编辑水平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赏力提高了，审美标准提高了，对自己从事创作大有好处。当他1952年第一

次离开编辑部,下乡去体验生活,很快就写出了一组风格新颖、构思别致,生活气息浓郁的《农村散记》。秦兆阳说,要是没有在编辑部几年工作中对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批评,对艺术规律的钻研、学习,从学习、思索中得到了提高,他不可能写出《农村散记》。反过来,创作水平提高了,对创作的规律学习、了解得深入些,也有利于做好编辑工作。秦兆阳这些意思,我觉得对做好编辑工作,对从事创作,都有启发。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秦兆阳署名何直,在题为《欢迎文学战线上的新的主力军》的文章(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3期)中写道:

“在我国文艺路线的阵地上,新的战士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了!而且将要更多更好地涌现出来!”

“我们的文学运动是以空前速度在蓬勃发展着。但是,我们文艺队伍的扩大的速度,比起人民的需要来,还远远地赶不上。”

“优秀的新作家,好的作品,不断地涌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趋势。一个有作为、有远见的编辑便要看到这种趋势,并以自己毫不放松的努力去促其实现。”

我粗略统计一下,1956年(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是秦兆阳担任执行主编),《人民文学》发表的50篇小说,有半数是新作者写的,好些作品很出色,发在头条地位。这一年的评论、诗歌方面的新作者,在版面上出现的也不少。新人的出现是如此众多,如此活跃,这当然跟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分不开(这一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但也跟编者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主观努力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17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1956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

秦兆阳在编辑工作中是掌握着这样的选稿原则：对名家宁可严一点，至少不降格以求，对新人稿件，则相对宽一点。因为他们写作经验不足，信心不足，特别需要鼓励。随着写作实践增多，水平提高，渐渐地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几年，文艺刊物空前活跃（有的刊物专门发表青年新作家的作品，面向青年），新人辈出的事实，更加证明了：重视发现、培养文学新人，是有远见的做法。

……

原载涂光群著《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心底流情笔生花

——记秦兆阳

曾楚风

10月底,编辑部派我们去北京,拜访几位湖北籍老作家,见到的头一位是秦兆阳。在北海附近的一条小巷,有一座小小的四合院,院子有两进平房,最里头一层便是秦老的书房兼卧室。门前有一棵大的白丁香树,依然是绿叶满枝。这一天阳光如此灿烂,天空这样澄澈碧蓝,时不时掠过鸽子的翅影,留下串串哨音。秦老高高的个子,穿着唐装薄棉袄和黑布鞋,操着改不了的黄冈乡音,客气地说“请进”。

屋子相当宽敞,有几柜子书籍,从马列选集到新出版的小说,种类繁多。墙壁四周挂着他自己的水墨画和书法作品,题材是竹、荷、老鹰之类,落款“老芹”,据秦老自己说近年来身体不好,日常工作稍减,可以以书画为娱乐。最近他做了一件事,便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秦兆阳自选集》一书写了个“自序”。这部集子收录了他数十年来各种体裁的创作,包括诗、词、评论、小说。序是这样的:

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战争的洗礼,人民的培育……时代的要求与个人的特点相结合,几十年来走了一条艰



1990年,秦兆阳在家中

难的文艺之路。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探索、耕耘、倒下、起来。遵从历史的使命,天经地义;经受“左”风右雨,不改初衷。亦云有愧,奉献甚少;亦云无愧,赤子心肠。

老来更识征途远,回首常惊步履迟;
犹有豪情似往昔,花开花落岂由之。

小序完成于10月20日,我们登门的前几天,另外应编辑的约请,秦老还选了两条格言准备用一条印在书的扉页上。一条是“远名利则清,亲人民则纯,爱生活则真,善思索则深”。另一条是他自作的一首绝句:

须经大海绘潮汐,应上高山绘云霞;
放眼关山十万里,心底流情笔生花。

大海,是生活之海,潮汐乃生活之运动、矛盾、进步。作为一个作家该经大海,上高山,要深,要高,才能真见生活之壮美。当

然最后他只能选一条入书,不过这两则都能见秦老之做人做文章的襟怀和追求的目标。

此书的出版计划中还有“作者手迹”一项,秦老写的是秋瑾诗:“亘古丹心正气歌,雄风凛凛正山海。杜鹃啼血丝丝雨,化作春潮万里波。”他解释说,录这首小诗也是想说明自己的人生态度,那便是做人应是正气丹心,文章当如杜鹃唤春。

秦老一生著述很多,但用心最深,用力最多的当是长篇小说《大地》。这部小说从义和团失败写起,直到卢沟桥事变。作品通过重大的题材和细致的生活描绘,反映了中国大地上的战争风云和人民生活的变迁。他曾经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大地之上生命的律动,正如书前题词中所写的:

最应该惊奇的最易忘记;

谁惊叹大地的无限生机。

他感受到了,惊叹不已,并用笔记录下来。直到现在,秦老仍给我们这种力量感。在他病弱的身体中,有一种正气和力量,它来自大地来自与人民的联系。

原载 1991 年 11 月 3 日《湖北日报》

老 芹 的 画

高 洪 波

老芹的画和字,如今是日益地好了。

老芹的画,以竹与荷为多,他的竹子不截不断,顶天立地郁郁葱葱一大蓬,而且画出一个明显的弧度,在这弯曲的竹干上,你能读出风的强猛,自然也可以悟到劲竹的顽韧。

甚至还有弹性。

老芹的荷也像竹,劲气内敛,荷叶坦坦荡荡地张开着,仿佛在承接风雨的洗濯,荷梗却倔犟地不肯低头,于是也弯成了个潇洒的弧度,风在荷梗上留下恶作剧的痕迹,老芹却偏偏题曰:《荷之舞》。

老芹的竹与荷,每每借风力点染主题,同时又冠之以“舞”,于是您仔细瞧吧:竹之舞,舞得满纸是苍凉之气,让你几乎能听到竹叶在风中的沙沙声,竹节在雨中的哗啦声,如果再看细一些,你还可以从竹之舞的画面上感觉到老芹内心世界的丰富,他是把画当成小说来构思的。

老芹不是画家。他本来应该是位资深的画家,往远处追溯,老芹的画史起自于延安时期,他曾专攻版画创作。可惜不知怎么搞的,老芹竟写起小说、搞起评论来,于是人们全知道秦兆阳

的大名。

秦兆阳便是老芹。

“芹”者，“秦”也。当年辛弃疾有《美芹十论》，或许这也是“老芹”的由来。反正秦兆阳给我的画和条幅上一律盖上“老芹”的印鉴。当然还补一方“兆阳”，否则人们还真弄不明白。

我感到好奇的是老芹为什么爱画风荷风竹？他沉思着，说出一番话来：“我一生很坎坷，晚年学画，心中有些奇崛抗争之气，便借这风中之竹与荷表现出来。”墙上悬有两帧五年前的旧作，绘的是月色下的荷花，大概取自于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荷花浴在浅蓝色的月光中，别有一番幽静典雅的气象。老芹却摇摇头，说我近年作画，自感提高很快，五年前的画已显得很一般了。

老芹说到兴奋处，把近作一幅幅张悬在书柜上，我发现他的近作的确不俗，尤其是动感极强的竹子，有的弯向大地，如一张弓，好像一旦风停雨住，它便要把竹箭射向苍穹；有的枝叶扶疏，但竹子的风骨气节却满纸溢出，令人悚然。我猛然想起苏东坡谈文与可画竹的一段议论：“竹子始生，一寸之荫耳；而节叶具焉。”画竹贵在画出其“节叶”，须成竹在胸，像老芹这样借风竹吐胸中之块垒，可谓文人画中极高的境界了。

临行前我向老芹索画，他赠我一帧岳飞的诗，一幅静荷图。岳飞的七绝首句为“终年尘土满征衣”，老芹写得笔墨酣畅，颇得岳飞诗意的真谛。静荷不是老芹的得意之作（得意之作他留着办个人画展），但满纸荷香却也可人，更妙的是老芹有段题款：“生于污泥而秀洁芳香，画时使人心静神清，更易悟于为人之道矣。”虽然我更偏爱老芹舞于风雨中的荷花，可这帧富有哲理思考的静荷也不错，由画荷悟为人之道（或许还有为文之法），至少告诉我一个道理：一个作家应具备多方面的修养，向

不同门类的艺术汲取创作的营养,然后才能做到出手不凡,摆脱平庸。

我把秦兆阳的这幅荷花图翻来覆去地读,终于读出了上面这点体会。顺便补充一句,老芹是位极和蔼的老人,求他的画和字,容易得很,谁叫他是作家呢!作家和画家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尤其在画价日昂的今天。

原载《团结报》第 1154 号

老芹力薄不胜风

燕 治 国

当年湖北人秦兆阳奔赴延安的时候，心头肯定升起来一轮红红的太阳。

他说，呵！瞧吧，多么广阔的地！多么平坦的地！它伸向无际的远方……假使你骑着快马，你跑吧，在这月光浸透了的天空之下跑吧！你敞开胸襟，让夜风吹拂你身上的汗水，树丛和村庄会从你身旁闪过去，闪过去。星星也会像银色的箭似的，闪过去，闪过去，有什么东西阻挡你的进路呢？

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得住他，挡得住这位后来自称“老芹”的革命青年的脚步，他到了延安，考上了陕北公学校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一年之后，他成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的教员。

再往后，他投身于革命战争之中，在冀中平原打了四年游击。想老芹一介文人，也是一身甲装，也是腰里别着盒子炮，两只脚支撑着瘦弱的身体，或是拔“钉子”，或是炸岗楼，那是何等的威风和气派，又是何等的紧张和神秘啊！

有一次秦兆阳所在的游击队到分区集中，一夜之间穿过三四道封锁沟，每道沟里又有数十道用荆棘编成的寨篱，更不用说

四处林立的岗楼碉堡了。过寨篱时，他们得把整个身子浸在冰凉的泥水里，再把寨篱撕开口子，然后猫着腰钻过去。

可是那时候秦兆阳和他的队友们胸膛间燃烧着一堆火，他们就不觉得害怕和寒冷。一来是仗打多了，似乎也就习惯了；二来呢，解放战争眼看就要取得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

老芹多么盼望和平的日子呀！他在1943年写的一篇小说里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正是农人们回家的时候，牛的哞哞声，大车的轰隆声，打水辘轳的轧轧声，狗咬声，人们说话嚷叫声……炊烟渲染着黄昏的景色，将村庄变得如此神秘。人们在里面劳碌着，生活着。一家人围坐在小桌前吃饭，在温暖的炕头上休息，在大门口跟街邻说闲话……这是人的世界呵！当你被迫脱离了这世界时，你才知道，如果是和平年月，在这世界里生活着是如何的好，如何的令人留恋！

秦兆阳的这种想法，代表着当时革命队伍里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即令是现在，即令是将来，又有谁不希望生活在和平年月，又有谁希望自己脱离了这个世界呢？

因此，当秦兆阳进了北京，坐在《人民文学》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编辑稿件时，他肯定是祈求天下太平。他期望新中国蓬勃向上，一如飞驰的列车，驶往美丽富饶的人间圣境。

他是《人民文学》最早的小说组组长，之后又任《文艺报》执行编委和《人民文学》副主编。那时候他已经出版了短篇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出版了长篇《在田野上，前进！》，出版了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还出版了《论概念化公式化》。

坏就坏在老芹不该去写文学评论！你已经有了好几本书，

你的作品朴实淡雅，你满腔热情地讴歌人民战争，讴歌农业合作化运动，讴歌普通的劳动人民，你又是国家级文学刊物的副主编。文字之外，你又独擅丹青，你何苦要倔脾气上来，去写什么文艺批评文章呢？

一篇署名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犯 50 年代末期中国文坛之大忌，引来诸多名家与无名家对他的轮番臭批，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人民文学》的交椅，往广西“体验生活”去也。他体验到了什么呢？二十年之后，老芹在一篇序言里无可奈何地写道：

1962 年之后，直到动手写这篇小序时为止，在短篇创作上完全是一段空白——有 16 年之久。如果再加上 58 年到 61 年这四个年头，则一共有 20 年之久。生长和收获十分困难，而毁弃和浪费则非常容易。“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

因此当我在紧傍天安门的那座私人小院见到秦兆阳的时候，对于他病弱的体质就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了。何直，何直，何以为直也。

老芹喘着气接待了我。他的书房在私宅的后院。我不知道他的房屋经过了几朝几代，只见门窗漏风，墙皮脱落，顶棚上是一片一片的水渍。老芹的女儿秦晴是我在文讲所时的教师，有了这层关系，秦晴的小弟有话不避我。他说，我夏天是泥瓦匠，负责抹房糊瓦。到了冬天又是小炉匠，烧三个炉子，负责土暖气供热。我这才知道，在京城繁华重地，原来也有人在烧土暖气炉灶。想我在太原家中，到冬天洋暖气烘得浑身燥热，后生家无功而受此厚禄，面对了曾为打下江山出生入死的秦兆阳同志，我心里只好道一声惭愧了。

好在老芹心高志洁，并不以春寒为苦。书房里方桌一张，权

当画案。墙上挂有老人自画的鹰、竹、陡山、虾。还有一幅写意，作于1991年夏，上书：离别故乡五十余年矣！

书房里当然有书。书架遮住一面潮湿的砖墙。屋里一硬板单人床，显然是老芹下榻之处。还有树根两坨，于无声处焕发出它们的坚韧与倔强。一架老式电话搁在书桌旁边，如果让拍抗日战争故事的电影导演看见，一定是抢手的热货。老芹祝福山西人民，且一句三喘地说，要时时刻刻记住中国的历史，如今人民的日子好过了，那些倒在血泊里的烈士也就能够瞑目了。谈到创作，老芹说，眼界要开阔，头脑要清醒，心情要乐观，这样写出文章就有了真情实感。

我到老芹家中时，好友高洪波私下说，你一定要请兆阳同志给你写一幅字，老人心好，不忍拂人之意。北京有好多人向他写字要画，他都尽量满足了。你自山西来，芹老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可是我能张口吗？小风自门缝里钻进，芹老已把手袖起来了。我母亲半生哮喘，我知道那种病的厉害。可我能不张口吗？我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吗？

犹豫间，芹老指着已经写好了的“诗情”二字，笑微微地对我说，这一幅归你了。然后屏气握笔，添写了“治国同志正之”，又钤了印章。那字遒劲酣畅，力透纸背，不知道用了老芹多少气力！

走时芹老送出门来，我才看见小院里有丁香两株。一白一紫，都已经在早春时节绽出来碧绿的花蕾。便想起他的两句诗：“欣逢柳绿春时雨，策马长途学健儿。”还想起他的长篇小说《两辈人》，不知完稿也未？

倘若世上真有仙药，我愿意给芹老偷来！

1992年4月3日子夜于太原家中
原载1992年5月18日《太原日报》

从美术界改行而来的秦兆阳

包立民

我是在翻阅三十年代的两种漫画杂志——《时代漫画》和《抗战漫画》时，无意中发现了兆阳、秦兆阳署名的作品。开始不经意，世上同名同姓的人不少，这个兆阳、秦兆阳未必就是作家秦兆阳。于是向两位漫画前辈（当年两种杂志的主编鲁少飞和叶浅予）求证，得到的答案是：画漫画的兆阳、秦兆阳就是后来当作家的秦兆阳。在我国现代作家中，由美术改行搞文学创作的，不止秦兆阳一人，李金发、闻一多、艾青、胡考等都是，所不同的是，秦兆阳没有进过美术院校，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也没有名师指点，而是完全凭着对绘画的兴趣，自学出来的。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亲——一位在乡村里教馆学的私塾老师。青少年时代的秦兆阳，曾立志当一名画家。为此目标，他学书法、学篆刻，书、画、印齐头并进。学漫画的老师就是《时代漫画》杂志。他边学边画边投稿，至今他还感念着这位他不相识的《时代漫画》的主编（他原以为是叶浅予，实际上是鲁少飞）扶掖后进，多次发表他的习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叶浅予为首的一批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漫画家汇集武汉，组成了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据秦兆阳告诉我说，叶浅予曾委派廖冰兄找过他，商量

在他任教的黄冈县城内中心小学举办一次抗日漫画宣传活动。他觉得自己只是一名青年教师(当年他才19岁),人微言轻,不敢担此重任。从此他与漫画宣传队,与叶浅予失之交臂。倘若他与漫画宣传队接上了头,一起从事宣传活动,并且加入了漫宣队,那么秦兆阳也许不一定投奔陕甘宁边区,不一定报考陕北公学,不一定进鲁艺学美术,不一定改行搞文学……一句话,他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漫画家,他的历史应该重新改写。秦兆阳为什么要改行?他说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绘画的专业技巧性较强,而他的基础较差,在战争年代又无法补课;二是在表现时代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他认为美术不如文学那样深入丰富。

秦兆阳一身两栖,应该说是集两长于一身了。但他不这样看。请看秦老在自画像上题的打油诗:

学画不成学爬格，
想从方格求超越。
转眼爬了数十年，
酸甜苦辣难尽说。
而今双鬓已如银，
又拾丹青画霜叶。
兴来信手涌颠狂，
管它要得要不得。

在《回首当年》的自叙中,秦老提到了他性格上的呆气和板气,而且呆、板二气相伴了他的一生,不知读者从这幅自画像中,闻到了这二股气息没有?

原载 1993 年 9 月 3 日《文艺报》

又拾丹青画霜叶

徐 鲁

一

最早知道“秦兆阳”这个名字，还是十年前在大学里的当代文学课上。

1956年，秦兆阳先生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以何直为笔名发表在当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讨论。秦先生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学的现实主义，以无限广阔的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就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探索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秦先生对当时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表达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其中特别对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简单地把文艺当作某种政治概念的图解等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在当时，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秦兆阳先生为此

也确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7年反右开始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被批成了“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到了“文化大革命”,此文又被定为“黑八论”之一,受到更为粗暴的批判。秦兆阳本人则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开除党籍,被发配到边疆……其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深重的屈辱。

现在看来,其中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不值一提了。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却是沉重的,正如秦先生自己所言:“历史,从来就是无字之处的文字比有字之处的文字要多得多。多少事,多少话,被活着的人忽略了,被复杂的矛盾抵消了,又被死去的人带走了……”

二

再后来,陆续读到了秦先生的一些文学作品,如中篇小说《女儿的信》、长篇《大地》、散文集《风尘漫记》等。从《风尘漫记》中才知道,秦先生是湖北黄冈人。1936年从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1938年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艺”美术系学习过数月,先后担任过编辑、美术教员、《黎明报》社长、《前线报》副社长等职。早在师范读书期间曾立志当一名画家,为此,他在乡村小学里自学书法、篆刻和漫画。他的启蒙老师便是他的父亲,一位学识较为丰富的乡村私塾教师。他边学边向当时的两种漫画杂志——《时代漫画》和《抗战漫画》投稿,所画漫画内容多是宣传抗日,歌颂民众的。居然发表了不少,发表时即署名“兆阳”或“秦兆阳”。

抗战初期,以叶浅予(他当时任《抗战漫画》主编)为首的一大批漫画家云集武汉,组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据说,叶浅予当时曾委托廖冰兄到黄冈去找过秦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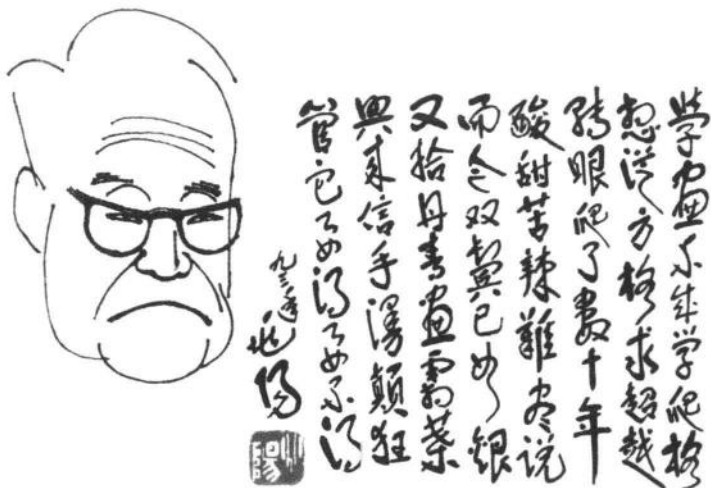
阳。打算在他所任教的学校里举办一次抗日漫画宣传活动。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能接上头,以至于秦先生至今想起来都引以为憾事——他与叶浅予、廖冰兄们的失之交臂,或许正是他后来没能在美术上继续发展的原因之一。当然更加上世道不济,命途多舛,一个乡村知识青年的画家之梦,最终没能得以成全。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用秦先生自己的一段话来做总结:“我常常问自己:‘我从哪里来?’回答是:从美丽而又困苦的地方来。‘我往哪里去?’回答是:往那革命的理想的未来去。‘我经过什么路?’回答是:如果我的故乡,我的祖国,必须经历难以想象的艰苦的路程,那么,我所走的路也就不会是平坦的。”(《风尘漫记·童年》)

三

秦先生曾为他的一幅自画像题过一首“打油诗”,那上半首是这样写的:

学画不成学爬格,
想从方格求超越。
转眼爬了数十年,
酸甜苦辣难尽说。

这是他的夫子自道。的确,他学画不成,旋即改弦易辙,转向了文学。抗战后期写有长诗《长城》、《祖先的开拓》、《松花江怒吼了》等。另有短篇小说、独幕话剧数种。解放后则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和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等。这些作品以朴素清新的风格反映了新中国农村的巨变。而《大地》则以肃穆伟岸的气势描写了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轰轰



1993年，秦兆阳自画像

烈烈的斗争生活，是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他的文学评论，除了那篇著名的长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外，还有《论概念化公式化》、《再论概念化公式化》、《形象与感受》等。这些论文对于摆脱教条主义、庸俗机械论的束缚，繁荣和发展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除了创作和评论，秦先生在建国后，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上。他曾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新时期以来则一直担任《当代》的主编，孜孜矻矻，切切实实，发现和扶植了一大批刚健、厚实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极强的新作品。而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时，他也不忘自己所钟情的文学理想，写下了不少文学散论，评衡清浊，直抒胸臆，为美德懿行唱赞歌，而对浇风漓习施针砭。一切服从于真理，个人的升迁荣辱则在所不计。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常常想，依秦兆阳先生在

文坛上的曲折经历，他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或许比一般人更添了几分寒温吧。

余生也晚。到目前为止，我与秦兆阳先生只有一面之缘。

四

1991年5月，我作为湖北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到北京参加那个被称为是“培养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接班人的大会”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会议是二十三日开幕，而我们在二十二日就到达了北京。报到后，刘醒龙提议去看望一下湖北黄冈籍的老作家秦兆阳，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刘醒龙、刘益善、陈应松、邓一光、叶大春和我一共六人，便七拐八拐地拐进了离故宫不远的北池子胡同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

这是秦兆阳先生的家，他清瘦而慈祥，话语间仍带着黄冈的口音。醒龙是秦老的同乡，用地道的黄冈话向他讲述了一番家乡的变化景象，并热忱地邀请他能有机会回故乡看看。秦老的眼睛里似有泪水，不时地点头说：“要回去的，一定回去……”

一切作家都是“还乡”的，秦先生也不例外。我还记得他的《风尘漫记》里有这么一些句子：“童年啊，从一片混沌开始，在血光泪影中结束。在穷苦里诞生而不知穷苦的滋味，在忧愁里孕育而不知忧愁的意境，你的每一段情节都是在故乡美丽如画的背景上映现出来的，你就是我一生几十年的故乡，是美丽、多情，然而又是血和泪所浸染过的故乡，永远忘不了故乡……”

我们去拜访秦先生那天，他正好在家里写字画画。墙上钉满了他刚画完的墨竹，署名则为“老芹”。他告诉我们，他正在筹办他个人的书画展览呢！

这使我一下子又想到了他早年那个未圆的画家梦。盖情之

所钟，终难割舍啊！他的为自画像题写的那首“打油诗”的后半首便是这样写的：

而今双鬓已如银，
又拾丹青画霜叶。
兴来信手涌颠狂，
管它要得要不得。

是啊，“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生活里的许多事，就是这么值得咀嚼和回味呢！

原载 1993 年 11 月 12 日《长江日报》

我心中的秦兆阳

张俊彪

我总是固执地坚守着一种偏见：一个真正属于伟大这个称号的作家或艺术家，他的主要贡献，既要凸现在高于他的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总体水准平面之上的辉煌成就，还要显示在他善于发现、扶助和培植文学艺术优秀人才的博大善念与包容百川的胸襟气度等方面。否则，在他的名字前面就不配享有“伟大”这个神圣的字眼。

于是，我在心中说：秦兆阳是我们这个特定时代中的一位伟大的作家。

还在读中学时，就知道中国作家里有个秦兆阳，没敢想过当作家，只企冀此生见到他，哪怕只一次。八年前，我的长篇《最后一枪》问世后，产生过一阵儿影响。最初我将一本样书和写给秦老的信封好了，在案头冷了三三天三夜才敢寄出去。其实这之前我已出过三部长篇了，只是没有勇气寄给他。好像日子很短，就收到他一封热情诚恳的信，我当即送给一家省报发表，令所有读过的人都感动。似乎相隔不久，秦老又写了评介文章在《文汇报》登出来，后又转载在《新华文摘》上。于是，才有人看见一个小小的我。

终于有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心里忐忑不安地找到一条胡同里红色的门，见到了他。秦老清瘦，衣着简朴，满面和气，令人敬意顿生。聆听他大半生为文，一整世坎坷磨难，似乎悟出了什么。以后几年里，又有两次见到他。

秦兆阳对青年作家的厚爱，足可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路遥向我们这个时代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奉献出他的最后之作《平凡的世界》便匆匆而去了。在他那短促而辉煌的生命过程中，秦兆阳是起到了铺路奠基作用的。当路遥以一位刚刚走出黄土农家小院落的青年业余作者朝着作家这个目标拼力冲刺的关口，在他作家生涯中起着转折作用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曾历时两年先后寄了十几家编辑部均被退了回来，在希望与失望的长时间心里苦闷中，最终被秦兆阳慧眼识中，并亲笔函请路遥赴京改稿。在秦兆阳的指导与帮助下，这部中篇很快在《当代》上发表，接着荣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尔后，路遥才有了《人生》，有了《平凡的世界》。对秦兆阳的感激之情，对《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路遥人生历程中所产生的作用，路遥在他的绝笔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记得1978年，我29岁，写了我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

朋友写信问我怎么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刊物《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寄回，他随后一烧了事。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的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

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

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我心中的秦兆阳,路遥心中的秦兆阳,还有许多的得到过秦兆阳扶植的作家们心中的秦兆阳,都是无愧于“伟大”这个特殊的专用辞的。

我想起了武则天的无字碑。还有珍藏在心灵深处的秦兆阳笔下生成的墨竹……

宁静致远

——记秦兆阳

常振家

在北京北池子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里，住着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就是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

秦兆阳是一位资深的文学出版工作者。早在50年代，他就主持过《人民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近年来，除了担任《当代》杂志的主编以外，他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不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天性就不喜欢“热闹”和应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想尽量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他说，作为一名作家，做到心里平静是很难的，否则他就不能自制地去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思考有关文学创作的一系列问题。“我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做到心里平静，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政治环境和文学创作环境，许多过去令人担忧的问题现在已经不用担心了。”

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在他主编的刊物上，他经常写文章阐明自己的编辑思想和办刊主张。他50年代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曾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事业和出版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各种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色彩纷呈的今

天,秦兆阳仍然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强调刊物要办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力戒“跑野马”。他还亲自在《当代》杂志上撰写“谈艺录”,对创作现状发表有针对性的言论。他认为表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国家民族的价值和尊严,是文学期刊的志气和骨气。他提倡文学刊物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要多样化,但反对在文学刊物上发表那些缺乏思想内容、单纯在形式上要花架子的作品。在他的主持下,《当代》杂志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独特的风格,其发行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同类文学刊物之首。

秦兆阳一向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他担任《当代》杂志主编以后,又专门把“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作为刊物的一条宗旨。

50年代末,秦兆阳曾被错划成“右派”发落到广西,一去就是二十年;十年浩劫又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状况不仅影响了他的行动,也影响了他的写作……多年的气管炎一直弄得他无可奈何,有时写不下去了,他就练字习画。他说,他的画是年轻时自学的,后来在延安鲁艺学过一年,抗战期间他在晋察冀搞过木刻和宣传画……这些年他主要是画国画。他家南屋那间书房兼卧室里,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条幅写得大气磅礴、神采飞扬,而那屹立于峰巅的苍鹰、挺拔的墨竹以及那醉甘露、舞长风的荷花,又会令人想起他的人格、情操与追求。

原载 1994 年 8 月 28 日《中国文化报》

革命作家的情怀与艺术家的眼光

——秦兆阳印象

洪 武

秦兆阳对当代文坛的读者来说,已是熟悉的文坛老人了。由于他的人品与文品而受到人们的爱戴,故人称“秦老”。一提起秦老,我们就会联想到他坚持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岗位上默默地奉献了几十年;也联想到他为探索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如何向前发展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不管是前者与后者的经历与风雨,他都以革命作家总要勤于奉献的情怀来对待自己过去的一切,而从不斤斤计较,总是向前看去,把个人的得失融化在继续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加兴旺与繁荣的事业中去。

“秦老”从小家境贫寒。勉强上完小学后,为生计着想就读于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便在清贫的小教生涯中求生。以后为向往革命,追求真理,便在抗日的烽火中毅然来到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以他从小喜爱的画笔为革命斗争服务。1943年又转移到冀中平原津保一带。以后因现实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他逐渐从绘画转行到写文学作品,开始用语言文字来反映现实,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抗战后的1946年他开始了小说、报告文学和话

剧的创作。虽然这时对他来说还属于练笔的阶段,但却为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基础。

建国初期,他从另一个编辑岗位上调到《人民文学》任小说组组长,后升任副主编。由于工作需要他接触并注意到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这些新现象便引起了他的思索。由此他开始了他的创作和理论上的新探索。于是,一篇针对当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端的理论宏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就这样诞生了。影响所及,一时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线生机。然而,好景不长,事情从希望的“生机”转为自己的厄运。很快这篇文章被点名批判为大毒草,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从此,秦老同许多正直的文坛中青年一样突然消失了。直到“四害”被除,他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平反”以后,他不同于某些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去抚摸自己的伤痕,而是以革命作家大无畏的情怀,把昨天的积怨一股脑儿掷还给生活,以党的“二为”和“双百”方针为指南,砸烂“四人帮”强加给文坛和他自己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全身心地又投入到新时期党的文学事业中去。

秦老复出后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大型文学刊物的领导工作。他在自己的岗位上除了勤奋认真地做好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社的日常组织工作之外,一方面积极组织和投入当时“文坛”上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他原有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文坛与理论上出现的新情况,从“左”和“右”两个极端方面来澄清自己对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理解,进一步阐发和完善他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内涵。

他首先从作品入手,及时地从主流方面肯定和鼓励了最初

冲破“四人帮”的“高大全”，“三突出”的一批伤痕、反思作品在文坛上的地位，如对卢新华的《伤痕》、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的支持与肯定。他的可贵之处在于，除赞誉乔厂长“是广大人民的需要”外，又指出其“把复杂的生活的必然性简单化了”的不足。对《伤痕》等作品亦如此。这种好处说好，不足之处也如实指出的实事求是文风，不但在当时的文坛显出个性来，就是在今天的文坛上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此后，他对许多新人新作进行奖掖与扶持，并针对现实文坛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结合具体作品，通过他一系列的评论、理论探讨及创作辅导，阐发和完善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关于现实主义中的“写真实”论，就是在这方面的重点论点之一。显示了他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见识。

秦老在鲁迅文学院一次讲课中，针对近年来在创作中出现的所谓“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论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所谓生活的本来面貌，必须跟一个大的时代，甚至跟整个历史发展的大的真实联系起来考虑。即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大的真实，这个大的真实就是：人类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总是要进步的。无论经过多么大的曲折，遭受多么大的挫折，历史总得前进。社会总要发展。可能某一个时期出现曲折，出现大的历史悲剧，但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总能够经过斗争克服这样的挫折，总能够把这种悲剧转变为喜剧；也可能转变为喜剧后又发生悲剧，然后又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前进的。所以，每个时代总要提出合乎人民愿望的要求。最初也许是由少数人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来的，后来逐渐变成大多数人自觉的要求和行动。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以个人狭隘的生活感觉为真实，甚至以自己颓废的、消极的、看破红尘

的思想为真实。这就离开了历史的大真实。

接着秦老用历史史实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他指出,从历史的大真实来看,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机是不可灭的,不可摧残,不可窒息的。不论斗争多么残酷,人民还是迎着残酷上,为历史的发展而前仆后继。所以,搞文学就要对社会有一种信念,没有这种信念就会违背了历史的和时代的大真实——也就是违背了大的“本来面貌”。在文学发展史上,一些颓废派、悲观厌世者搞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不能长久流传?就因为他们违背了历史的大真实。所以,搞文学的人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人民中所存在的生机,要善于从社会矛盾中看到生机,要有这样一个认识真实的本领。要有这样一种对自己、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信念。

他说到这里用近代史作了说明。这对不很熟悉近代史的年轻朋友也许有些参考价值。他说,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满清政府腐败得一塌糊涂。所谓推翻三座大山,山大极了,而最初推山的只有少数热血之士。但是,民族的生机毕竟逐步发展了,形成了“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然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是有少数坚决的,有觉悟的共产党员领导人民搞武装斗争,终于获得成功,夺取了政权。

他认为,在强调了历史潮流总要向前进这个大的真实前提下,也不能用一个主题,一个题材像一些“样板戏”一样去硬套。他认为,生活是复杂的,要善于从复杂的生活里看出通向历史发展的道路。既应该批判也应该歌颂,而批判和歌颂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各种各样的侧面进行,路子是很宽广的。秦老在这里还批判了“四人帮”用教条主义的框框来理解《沙家浜》中的主要人物是郭建光,而不是阿庆嫂的谬论。

接着秦老联系到现实。他说,我们现在(指八十年代初)困

难很多,问题不少。有些人在这种困难的年代容易失去信心。他强调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思想水平不应该像某些思想简单的群众,特别像一些落后的人那样。我们应该从困难中看到出路,从似乎很少变化的情况里看到大的变化,这不是主观主义,而是客观事实,并且要促成这种变化的发生和发展,用你的作品去促进,去扶持,去歌颂。对那些应该死亡的东西也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这样我们的眼界就会宽阔,写作的时候感情就不一样,对自己的作品也就比较有把握有信心。

紧接着秦老举一个青年作者写《聚会》这个短篇来说明他并没有把握好真正的“真实”。因为从作品所表现的范围看颇有真实感,但作品里看不到一点希望,这并不是要求在作品里写个光明尾巴,或者说一套报纸社论的话,而是说多少总应该表现青年人对国家的希望,而不是以绝望的心情去表现他们的绝望。作品中有的人可能是绝望的,但总有人在内心深处抱有希望和怀着理想而奋斗的愿望的。所以,《聚会》所写的真实,是部分地在他所看到的范围内的事实,但联系时代来看就不够真实了。

秦老认为,《子夜》这部鸿篇巨制就是企图表现时代的大特征。如果一篇作品做不到,可以用若干篇作品来做到。文学怎么前进,怎么突破现状,应走这个路子。

秦老在强调“真实”同“事实”的关系时指出,按照事实写,不一定就真实,还要看你写的是什么矛盾,是不是跟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看作品里面是不是隐含着希望。

最后,秦老还谈了真和善、美的关系。他说,如果认为真是客观存在,善和美则是作者主观的东西,这看法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善和美既是来自作者的主观,也是来自客观现实,而且首先是客观存在。如果生活中没有善和美,现实生活里就没有热力和生机,就不可能发展。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善和美包括在真正

的真实当中。

所以,他认为,“写真实”这三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包含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此外,秦老在另一些文章和辅导及评论中还谈到了在作品中如何写“观念”,写“人物”,写“意识流”,写“情”,想象同创作的关系以及作家的情操,作品的格调等创作中诸种重要问题。秦老是集编辑家、革命作家、评论家于一身的具有多方面的素养来写论文的。所以,他的见解不仅从实际出发,常常精辟而独特,又深入浅出。读后对于青年作者有很大的教益,对于文学上的作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他虽然已经离休住在简陋的平房里,但仍然时刻关注着文坛的动向。

原载 1994 年第四期《人民文学》副刊

欣逢柳绿春时雨，策马长途学健儿

——访秦兆阳

刘文勇

京华重叙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世上有很多事情，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有谁会料到，经过“文革”十年之后，1979年7月，我以香港作家的身份赴北京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竟然能在北京秦兆阳的寓所里，访问了阔别多年、劫后余生的秦兆阳先生。而这次访问，我还在秦兆阳先生身上，发现了奇迹：他一反16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种郁郁寡欢、沉默寡言的性格，变得乐观而健谈起来，连外表也似乎比16年前变得年轻健壮了。秦兆阳先生，高个子，长方脸，高鼻梁，有一双深沉而敏锐的眼睛。16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脸庞瘦削，目光呆滞，面色苍白。如今，他脸色红润，目光炯炯，脸颊丰盈，连走路也轩昂起来了。一见面，稍作寒暄之后，秦兆阳先生就高兴地告诉我：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于去年冬天得到平反了。现在，他是“三恢复”（恢复党籍、恢复职务、

恢复工资级别)。其实,对于他平反之事,我早已从广西文联主席陆地先生的口中知道了。这次见面,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一些具体的内容,知道他已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更知道他目前正争分夺秒地从事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而且,在重逢后,我们曾进行过一次详谈,我向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为什么1956年他要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他对“写真实”的看法,对当前文坛形势的评价,对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先生的看法……一连串的问题,他都一一坦率地作了回答,甚至对他当前的心境,他也即席挥毫,写了几首诗赠给我。

邕江漫步

笔者和秦兆阳先生的认识,始于1963年8月在广西文联召开的一次小说创作会议上。因为大家同在一起开会,历时十数天,很容易就认识了。那时,秦兆阳先生在广西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虽然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摘掉了,但在他的头上,还有着很大的压力。仅从以下几件事,就可以看出来:(1)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仍被认为是文艺“黑八论”之一,还常常受到批判,有的文章,有的书籍,对他的称呼还左一个“右派”,右一个“修正主义者”,也就是说,虽然已摘了帽,但有的人仍把他看作是大右派。(2)当时所谓“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权威”、“金棍子”,实为反动文痞的姚文元,对秦兆阳的攻击仍一再升级,说“他实际上是国际修正主义的‘传声筒’,帝国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代理人”(见姚文元:《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一文)。(3)有一次秦兆阳因病到××市一所疗养院治疗,起初该院一个负责人仍把秦当作敌人看待,不想收他治



八十年代初,秦兆阳与孟伟哉等一起研究稿子

病。那个时候,秦兆阳寡言鲜笑。同在小说组讨论,有时大家有说有笑,他却沉默不言。其实到会作家,大多数对秦兆阳都是理解的,而且还深表同情。

人们知道,秦兆阳1938年8月(年仅22岁)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曾在冀中平原打过游击,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从1946年开始写小说、散文、独幕剧,就已闪现才华。1949年到北京后,历任《人民文学》小说组长、《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务,出版过脍炙人口的《农村散记》,也出版过《论概念化公式化》《在田野上,前进!》等论文集和长篇小说,是一位既有资历又有才华的作家。可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反右派斗争中,也竟然因为一篇学术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而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分子,沦为“人民的敌人”,引来了一场巨大的全国性的围攻。这不仅在政治上、学术上打击了秦兆阳,而且妨碍了当时刚刚提出的“双百”方针的贯彻,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不少作家,在背后也纷纷为秦兆阳的遭遇抱不平。正因为这样,多数人对秦兆阳的沉默寡言也是谅解和理解的。那个时候,笔者还很幼稚,一天晚上,在和秦兆阳先生饭后散步的时候,我们漫步到了邕江河畔,我竟然好奇地问他:“您为什么这样沉默寡言?是不是对反右派的问题还想不通?”

秦兆阳先生听了我的话,起初不作声。

我当时很后悔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想不到秦兆阳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竟坦率地说:“是的,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很苦恼。1956年,我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写出来的,目的是为繁荣文艺创作而‘抛砖引玉’,引起争鸣……想不到,竟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秦兆阳先生当时苦笑了一下,说:“当我开夜车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为党的文学事业而奋斗呢。”

接着,秦兆阳还说:“一个人最痛苦的是,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要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秦兆阳先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58年,他因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受到批评时,在会上,有人说他的出发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难受极了,痛苦极了,他借口上厕所,一个人跑到文联大楼的顶楼上,想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放眼四望,艳阳高照,绿树葱茏,花香鸟语,歌声阵阵,巍峨雄伟的故宫建筑群,壮丽的天安门……首都的景色,多么美丽,多么雄奇啊!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看见过42个春天,他舍不得永远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在中国文联大楼的

顶楼上，他整整站了半个小时。当他回到批判会场，那次会议的主持人问他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想自杀？他，一个在日本侵略军屠刀下不流一滴眼泪的硬汉子，竟然伏在桌上哭了一个多小时……他知道，无辜地沦为人民的敌人，身败名裂是什么样的滋味，但他也觉得，不管怎样，也不能轻生，不能随便离开这个世界，于是，他咬咬牙，又顽强地活下来了，他觉得，只要留得青山在，总可以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财富。

1963年，秦兆阳先生坦率地对我谈述的这些情况，我深深地埋在记忆之中。想不到这次重逢，它们竟又像潮水似的，涌上心头……

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秦兆阳先生又蒙受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如果不是有好心人的搭救，也许，他早就不在这个地球上。

我觉得，这次欣喜的重逢，不必再重提这些已成过去的灾难了。但愿这些东西成为一种历史的教训，从此以后，祖国的大地上不再重演这类的悲剧吧！

心 情 开 朗

在这次访问中，我明显地发现，秦兆阳先生的心情，比过去在广西看见他的任何一次都要豁达开朗。

在快要结束这一次详谈前，我问他：“您对目前中国大陆文坛的形势是怎样看的？有什么感想？”

秦兆阳先生兴奋地说：“当前我国文艺创作的形势大好，新人新事很多，突破禁区的作品很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加强民主、加强法制、实现四化以后，文艺界的劲头更足了，现在全国文艺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可惜就是印刷力量赶不上，纸张也不

够,很多作品不能及时出版。”

我问:“您对贯彻‘双百’方针,有些什么看法呢?”

秦兆阳先生说:“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主要是实现艺术民主的问题。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做到‘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才能为贯彻‘双百’方针提供一个前提。这也是当前普遍的呼声。现在,各地学术讨论风气浓厚,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中,大家都敢于畅所欲言,比如对三十年文艺工作的看法,对过去批判错了的作品,不少人都敢于写文章陈述自己的看法,文学艺术界初步出现了比较浓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我问:“您认为出现这种新鲜气氛的原因是什么呢?”

秦兆阳先生说:“我以为,主要是加强了民主,加强了法制,为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比如对过去的错案的平反,为被迫害致死的人昭雪,为被批判错了的作品平反,等等,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在文艺界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也诚恳地承认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比如周扬同志,态度就很好,在好几次会议上,都承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并表示今后要很好地吸取教训。这样的态度就很令人感动。其实,过去的事已成过去,我们也没有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要能够真正地吸取经验教训,不重蹈过去的覆辙,今后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心协力,繁荣文艺,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这就好了。”

秦兆阳先生继续道:“我当然也是不甘落后的。最近,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叫《女儿的信》,已经交给长春的文艺刊物《新苑》发表,大约过几天,你就可以看到了。目前我正在动手写一篇大型散文,初步定名叫《不连贯的联想》。最近,我还准备写

一些理论文章,写《女儿的信》的续篇。争取在今年年底开始写作《两辈人》。”

秦兆阳先生笑道:“要了解我现在的心情吗?好,送几首诗给你,诗为心声,我用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吧。”

这时,秦兆阳先生拿出了几首墨迹刚干的诗送给我,现抄录如下:

其 一

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
欣逢柳绿春时雨,策马长途学健儿。

——书奉文勇 指正

1979年夏 老芹

其 二

大海千秋涌,长河亘古流。
生命无休歇,万事永开头。
人民最伟大,泥土香味稠。
高天悬日月,浩气满神州。

——1979年夏 兆阳老芹于北京

其 三

物换星移几冬春,漫惊两鬓白为银。
风云廿载情犹热,万里河山赤子心。

——老芹

看了秦兆阳先生这几首诗,心里一热,我想:一位由于响应“双百”而蒙冤受辱达十多年,连命也差点丢掉的老作家,如今竟然能够振作起来,仍然有一颗赤子之心,有“策马长途学健

儿”的壮志,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觉得,如果今后能真正发扬艺术民主,实现周恩来提出的不再搞“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一套,则中国大陆文坛是大有希望的。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的文化传统,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就曾经出现过许多闪光的名字: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只要大家能胸怀宽广,确有繁荣艺术的真诚愿望,恐怕在中国文化史上,就不会再重演“八亿人八出戏一个作家”这样的悲剧了!

我们生活在外地的中国人,也多么盼望,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上,再出现一批闪光的名字啊!

1979年9月9日于香港

原载香港《广角镜》1979年10月号

(编者节选)

—
—

风雨长征路，丹心永不泯

——沉痛悼念秦兆阳同志

屠岸

十月十三日晨，我从上海出差回京，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兆阳同志已于十一日与我们永别了！这仿佛晴天霹雳，使我的脑子一下子木然了。

兆阳同志虽说是我的同事，其实是我的兄长和老师。我很早就读过他的小说和文艺评论，从中得到过教益。但他教我的不仅以他的创作和理论，主要的，还是以他的人格力量。我认识他是在“文革”结束、他“复出”之后。我们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在他担任《当代》文学双月刊长达十五年的主编职务期间，我见到的是一位深思熟虑、多谋善断的编辑行家，是一位胸有韬略、指挥若定的文学期刊主持人，更是一位全心全意发现新人、提拔后进的文学前辈和辛勤园丁。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对社会的使命感极其强烈。例如，逢到一篇有争议的稿子，他必须亲自审阅，与作者，编辑部商量修改，亲自定稿，已经发稿之后，他还不断琢磨，考虑这篇作品的社会效益，是否有利于人民。他对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一生遭遇坎坷，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文学事业的爱始终炽烈如火，

在胸中熊熊燃烧！

兆阳同志曾对我说起过“文革”期间他在广西的遭遇。本来，“右派”是死老虎。但因为他是所谓“黑八论”之一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的创始者，而这是被江青在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点名批判的。因此，“造反派”对他批斗得极为凶狠，他所受到的摧残，几乎难以想象，以至我今天仍不忍形诸笔墨。但兆阳同志从不乞求宽容，也从不动摇自己的信仰，他是一个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真正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说：“写一部真正的作品不易，做一个真正的人更难。但是如果不去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做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大意）这句话始终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我永志不忘的铭言。

兆阳同志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散文家，文艺理论家，编辑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画家。他在自己的书房兼卧室的墙上挂着他书写的一副对联：

犹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岂由之

这是把鲁迅的两句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七绝《悼杨铨》的前两句）改了两个字而成。鲁迅说的是愤激之余的反话，透露出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进步人士的愤慨之深切。兆阳同志所受到的迫害，极为惨酷，这使他反而敞开心襟，直抒胸臆，大声宣告。表面看，这对鲁迅诗是“反其意而用之”。其实，并没有反其意，恰恰是一脉相承，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兆阳同志的这两句诗，自有一股凛然的正气，是他人格的体现，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兆阳同志曾用他的刚劲有力的书法，写成一张条幅赠我，上

面是一首诗：

文章千古事，
荣辱百年身。
风雨长征路，
丹心永不泯。

屠岸同志赐教。

一九八四年夏 兆阳(印章)

“赐教”实在不敢当。恰恰这四句诗是对我最好的教育。这张条幅也是我把他当作老师的缘由之一。可以说，这四句诗正是兆阳同志一生的准确写照。路上，还会遇到多少风，多少雨。但，让我们把个人的荣辱抛开吧！让我们记住他最后的一句话：“丹心永不泯”！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想，这将对兆阳同志最好的纪念。

原载 1994 年 10 月 22 日《文艺报》

永远纪念我们的主编兆阳同志

《当代》编辑部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下午六时,我们的老主编秦兆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位慈祥和蔼的师长,《当代》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编,我们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这些日子里,我们时时回想起秦老在主编《当代》的十五年中所做的一切,他的办刊思想,他的工作精神,他的道德风范,将长留在我们心间。

秦兆阳同志从一九七九年《当代》杂志创刊后就任主编,领导我们编辑部工作了十五年。十五年来,在他的主持下,《当代》沐浴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办刊的唯一宗旨,注重作品的思想艺术品位,注重题材的新颖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已经出版的上百期刊物中,发表了大量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改革和时代风貌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目前,《当代》在国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发行量在国内同类刊物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十五年来,秦兆阳同志以多病年迈之身,为《当代》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人有人品,刊有刊格。秦老非常重视刊物的品位和个性。他自始至终强调《当代》要名副其实,要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



上世纪80年代初,秦兆阳(中)与韦君宜(左二)严文井(右二)孟伟哉(右一)黎曙光(左一)在一起开会

性,在近年来各种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色彩纷呈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强调刊物要办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力戒“跑野马”,不要跟着“风”跑,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强调我们发表的作品必须从生活出发,反对歪曲或粉饰生活,主张既要敢于直面人生,不回避或掩盖生活中的矛盾,又要正确认识和表现现实生活或历史生活,给人以希望和鼓舞。严肃、深刻、尖锐、准确,是《当代》多年来追求的思想艺术风格。

秦兆阳同志提倡文学刊物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要多样化,但他更看重那些朴实厚重的作品,反对在刊物上发表那些过分缺乏思想内容,单纯在形式上要花架子的浮华之作。他还提出了“五气”的办刊主张,即《当代》要有一股正气,发表的作品要表现出志气、骨气、锐气和朝气来,要为人民鼓气而千万不要

泄气。他认为,表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表现国家、民族的价值和尊严,是文学期刊的志气和骨气之所在。

秦兆阳同志十分重视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早在五十年代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就曾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二十年后,他在主持《当代》的工作中仍然乐此不疲。他为刊物发现了新的年轻作者而高兴,经常在家中接待他们,亲切地同他们谈创作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十五年来,我们编辑部一直坚持扶植文学新人的方针,并且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文学新人大都来自生活第一线,思想敏锐,朝气蓬勃,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给《当代》带来勃勃生机,而他们自己也在《当代》这块园地上成长起来,其中许多人还成了当代文坛上知名的作家。秦老为此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秦老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主编。尽管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但对办刊的重要事情十分关心,对一些重要稿件常要亲自过目,认真审读,提出意见;有些稿件还要亲自动手修改。近年来他虽然年迈体衰,目力不济,却仍然时刻关心着自己主编的刊物。他常常为刊物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反复思索,甚至因此睡不好觉。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让女儿为他读《当代》的文章,口里还在叨念《当代》目前的工作……他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秦老在与编辑部同志的接触中,从来不摆大作家和领导的架子,总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在我们眼里,既是一个忠厚长者,又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在同他的接触中,深深感到他的人品高尚。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有很强的党性原则;他淡泊名利,正直廉洁,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爱憎分明,对于党内外种种腐败现象,痛心疾首;他一生虽然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委屈,却

从不愿意甚至也容不得别人说党一句坏话。秦老高洁的精神世界,时时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秦老的不幸辞世,是我们编辑部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在今后继续坚持他的办刊思想,学习他的优良品德和崇高精神,像他那样去做人,像他那样去办刊,用办好《当代》的行动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秦兆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载 1994 年第六期《当代》

老秦的遗言

韦君宜

十月十五号惊闻秦兆阳的噩耗，恰巧就在同一天，收到一本刊物——《散文选刊》封二登出他的照片。是他在院子里微笑着散步时照的，还有他的题句：“月到中天处，风来水面时：散文所应达到之境界也。九四年春老芹”。没想到，没想到，他正在散文应达到的境界里，竟离此境界而去。

我认识他很早。在一九五〇年，我还在青年团中央做青年工作。那年我们招待苏联来访的客人，得找几个文艺界青年陪客。来了秦兆阳、康濯（还有一个忘了）。我以青联派出的主人身分，认识了青年客人。他知道我正编《中国青年》，就给了我一篇小说稿《壶嘴儿说媒》。交稿时附一短筒，说自己干了些年，成果止此，自愧得很云云。我当时想这个人要求自己太严了吧。我和他一般大年岁，什么成果也没有，当时还毫无自知之明呢。

后来我离开青年团，见到老秦一篇一篇写农村人物的特写《农村散记》，不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记得有《王连君》等篇，很引人注意。同时，我也到了作协，知道他在《人民文学》当副主编了。他爱当编辑大概和我一样，当编辑似乎比自己写作

更热心,连续发出了许多震动一时的名作。例如王蒙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了发表这些作品,他本人挨了许多非议。但跟许多青年作者成了朋友,许多作者由他的识拔成了作家。他对作品的看法越来越热心明朗,那篇提出自己主张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轰动一时。但一下子成了他的重大罪案。其实他这个人,只是对文学作品有真正爱好,跟谁也没特殊关系,什么派也沾不上,但是竟由此划成右派,谪往广西许多年。

二十年的坎坷,回到北京时他已经衰老,非复当年了。使我高兴的是他竟答应了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当代》。更使人未能想到的是他对作品、对青年作者的热心,竟与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为了人家的作品不惜心血提意见,直到使它成功地与读者见面。作者蜚声文苑,成为作家;而老秦则默默地一篇一篇仍旧成天忙着人家的稿子必使之达到“月到中天,风来水面”的境界。

他家里的常客是《当代》的编辑们。商量了这篇,又商量那篇,他对于这一行就这么乐此不疲。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为了某某稿子,自己睡不着,怎么也放不下心。他能书能画,在家除了看稿,还有时对客挥毫。我家存着他一九八二年给我写的一幅单幅。文曰:“辽东老将鬓成雪,犹向旄头夜夜看。”至今挂在我的床头。在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再看这单幅,顿觉老秦在对我这个同时代人谈心!“就是双鬓成雪,也得夜夜惦记着你终生从事的事业啊!”

是啊!极是极是。虽然又是十几年了,这竟可当作老秦临去留给我的座右铭,我怎能像老秦那样一生律己极严才好。

原载 1994 年第六期《当代》

宽心地安息吧,老秦

李 纳

秋天刚过,天气转凉;不时想起老秦的病。他怕过冬天,但是那间寒气逼人的长条房子,仅靠一只小煤炉散发出一点可怜的热气取暖,怎能熬过今年的冬天?万万想不到,肆虐的寒风尚未袭来,他便撒手长逝了。

去年入冬,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肺心病缠得他很痛苦,近日发现肺上长疤,疤如破,生命也就随之破灭。他担心过不了冬天。我很不安,找了个上午,带上我的小保姆双妹去看他。老秦喜欢双妹,他说,听到双妹年轻的声音,他很愉快,觉得自己也年轻许多。在路上,我和双妹直嘀咕,我们害怕接受不希望的现实。不料门铃响过之后,来开门的竟是老秦,我和双妹都极其宽慰。

屋里过早地升起火炉,但仍寒气袭人。老秦和以往一样,总用火钩捅炉子。老秦告我,他全身没有一个舒服的地方,眼力不好,不能看东西,终日一个人坐着,心里闷得慌。他还是牵挂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牵挂倾注全部热情的文学,对有些现象忧心忡忡。这个时候,他应该保持心理平衡,太多的忧烦,对他孱弱的身体是致命的。他承受不住。我想说几句鼓舞的话,又找不

到合适的语言。

他似乎也意识到了，站起身，取出一大捆书和画，有装裱好的，大部分没有装裱，他将字和画一幅幅地挂起。画，大部分是荷花。以前他爱画竹，曾送过几幅给朱丹和我，我们都觉得枝叶过于柔弱。而荷花却精神饱满，虎虎有生气，虽是几枝残荷，也枝杆挺拔，傲战秋风，显得倔强可爱。画法遒劲有力，笔锋刚健，气势磅礴，扬扬洒洒，不下几十幅，都是近作。我说：“你的作品，大有进步，有气势，不像出自病人之手。”他笑笑，眉宇间透出首肯。我也很高兴，我觉得他在努力超越，超越，去获得更高的境界！

从他家走出，我有几分宽心，不过总的感受却是：他应该过另一种生活，他太寂寞，内心太孤独了！

人的一生，要和许多人交往，有的人接触虽多等于一晃而过，在脑里不留任何痕迹；有的人带着独特的风格从身边走过一次，便在脑里留下来。老秦属于后者。我和老秦认识于解放初期，他那专注于某种事物，其他都满不在意的冷漠外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五七年，在反“丁、陈”斗争之前，文艺界各路“诸侯”齐集北京，准备打一场声势浩大的歼灭战。这时，秦兆阳正在北戴河，作家协会召他回来参加战斗。他公然拒绝回来，还发来一封信。这信，在会上散发。原文我已记不确切，可那意思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对这场斗争持保留态度……好大的胆！我真替他捏着一把汗。为此，对这个人，又增添几分敬意。

后来，他因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而错划右派，“发配”到广西。“文革”后期，朋友陆地从广西来；告我秦兆阳在广西某工厂劳动。陆地说：“这是个好人，有才华，近来写长篇小说，已写了七万多字。我看过，写得很好。我打算将他调出工厂，让他安心完成他的作品。”

陆地提的小说，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大地》。

一九八〇年一月，作家协会组织六位作家去海南岛和云南访问，其中有秦兆阳和我。多年不见，他苍老许多，可是落落寡合的态度依旧。千里行程，他总以同一个姿势坐在汽车前座，默默地抽烟，两眼专注地凝视窗外，似乎不愿放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同志们的欢声笑语，根本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

有一天，我有点事找他，办完事，顺便告诉他陆地对他的评语，听到陆地的名字，霎时间，他一反常态，兴奋地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并对我说：“我听美术界的同志介绍，朱丹是个大好人，反胡风斗争时，保了几个好同志，五七年，表现得也很好。”

秦兆阳投身革命初期学美术，后来才转入文学界。

接着他又说：“可惜我们住家相距太远，否则，我和朱丹倒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可以常来常往。”

越谈越近，话题转到“文革”，我们有共同的遭遇，而保卫自己的手法又同样的傻。大约就是这一点，使我们忽然看清了对方，甚至觉得相知已经很久了！

老秦是个严肃的人，对工作和战友一往情深。他是编辑，看稿子一丝不苟，不论是谁，一视同仁，该发的发，该退的退。有的来稿，出自名家之手，他认为该退便退。有的稿子退后，又出现在别的刊物，得罪了作者，有的名家甚至因此对他疏远。当然，他不无烦恼，可是，他认为应该坚持的便永远坚持，决不因个人得失而与世俗妥协！他是个铁铮铮的汉子！

他说他“呆”，我说他不但“呆”，还“迂”：

比如满桌开怀畅饮间，他只和其中某位同志干杯；又比如将要出访外国，只因某人说了句“出国是好事情，名利双收”，便要要求从出国人员名单中划掉自己的名字，从此再不涉足出国的

行列。

八十年代将尽，朱丹已卧病三年，这期间，我心力交瘁，每日蓬头垢面，度日如年。有一天，他来看严文井同志和我们（我和文井同志住前后楼），见我神情恍惚，讲话辞不达意，他沉吟好久，才说：“你太难了，这副担子太沉重，落到你肩上……能不能想想办法……”

可是他一介书生，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呢？

第二天，他来电话，问我能否找到合适的上层关系，将朱丹送进医院，让病危者有个安然的去处，得到及时治疗。并嘱咐我，如果写信，一定要找可靠的人代交，一定要交到本人手里。而且劝我：“人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不得不做一次自己不愿做的事！”

我照他的话努力去做，朱丹还是在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解脱了，却把凄风苦雨的日子留给我。这时，老秦和他的夫人张克打来电话，老秦说：“我和张克决定接你到我家住些时候，你什么时候来，好去接你。”张克说：“被子都洗好了，等着你。”

极朴素的语言，产生扣人心弦的力量。我接完电话，强忍的泪水顷刻化为阵雨。

老秦性格内向，郁郁寡欢，难得有快乐的时候。但他快乐起来，却真实得像孩子，不由人不感动得洒下泪水，当我们访问云南时，从昆明出发去石林，路上老秦嘲笑我：“李纳，你一路夸你的家乡美，我看脏乱穷可以概括。”他的评语使我很泄气。

在红土高原上行车，有点累，不是上山，就是下山，转来转去还是满目青山。大家颇有倦意，正在闭目养神，不知谁喊了一声：“石林到了！”

只见蓝天白云，石林躺在灿烂在阳光下，车刚停，老秦便一个箭步跳下车，张开双臂，朝着石林欢呼、跳跃、奔跑、呼啸，活像

一匹撒欢的小马!“我愿用我所有的一切,交换这里的一块石头……”

说真的,这时候我想: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人的愿望,真的是罪过。但要满足愿望又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好说:“石林永远向你敞开胸怀,你常常来,整座石林不是属于你了吗。”他说,他喜欢石头,并自称自己是块“顽石”。我说:“那你今天是回故乡了。”他开怀大笑。唯有心地纯净的人,才笑得那么由衷,那么快活。

这天,他爬到石林最高点,他与石林融为了一体,我以为。

老秦多才多艺,有多方面的才华,为人耿直,可惜坎坷的路太长,才华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打算描写一个时代的作品也没有留给后人。

熬过去冬,我庆幸他的生命有了转机。不料春天刚过,又入了医院,我天天念着去看他,终因年老体弱不能成行。他出医院后,曾给我来过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很虚弱。他说,被病魔折磨得很苦,很厌烦病人的生活。尤其难过的是拖累儿女,每件事都要儿女做,他愧对他们。这样的话,他重复过多次。对张克,也有说不尽的感激。他说张克跟他受了许多罪,现在境况好一点,是回报的时候了。可惜,他走得那么早,那么快。

在他弥留前一长段日子,我一次也没有去看他,想到这里,真有说不出的内疚和遗憾!生死相隔道路茫茫,要弥补已属虚幻。这篇简陋的小文,权当一束素花,敬献在他的灵前。深望他宽心地安息!

1994年10月21日老秦逝世一旬

原载1994年第六期《当代》

唯向秋风恸

——悼恩师秦兆阳

叶文玲

偏偏又是，果然又是香山红叶时！

屋里浓暗如墨，再也止不住这腔清泪，我痛悼您，恩师秦兆阳！

苍天啊，你别马上开亮，我怕难以阻隔的市声会骚扰我的思绪，唯有黎明之前的清寂，才能倾泻如瀑的思绪……

一晃就是十四年。兆阳老师，您一定记得十四年前的那个隆冬，人民文学出版社小小招待所的一角，我在昼夜奋笔疾书，用文学赤子的全部挚诚，点燃一瓣《心香》……

您知道我不能不“疾”，兆阳老师，经受了二十余年的炼狱煎熬，从身体到灵魂，我伤痕斑斑；刚盼来春回大地，就像菱苗枯萎，我是那样渴盼甘霖如雨！

您知道我不能不“奋”；兆阳老师，卑微如草芥的我，刚从生活的底层挣扎出来，终于落回文学的芳草地。哪怕依然是一株小草，我也要奋力生长，生长得芊芊郁郁。

一九八〇年初，文学创作是一条条开闸的江河，是一炉炉迸溅着愤火怒花的钢水，柔弱如小草的我，只能颤颤地舒茎展叶：

只能兢兢地拾薪，燃起久萦心头的这瓣《心香》。

我没料到，就是这缕淡淡袅袅的清烟，居然被您注意了，居然得到了《当代》的召唤！

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兆阳老师，我怎能忘记，怎能忘记您是我满怀第二次解放的喜悦，踉踉跄跄急奔文学之途时，为我揩灯点火的灯塔工，是指点我迷津的导师。

兆阳老师，也许您已经忘记，因为似这般殚精竭虑扶持后辈之举，在您不是第一次也决非最后一次；因为，在您的一生里，种树不乘凉是您的永远情怀，施恩不图报是您的人生宗旨，文坛如您德行的前辈，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文坛应当擎起你们德行的大纛，猎猎高扬，清风祛弊……

兆阳老师，您也许全然不知，一九八〇年春天，有幸成为文讲所学员的我，在听命教务处分配创作指导老师时曾经发生的微波小澜，因为，我曾那样渴望我的老师就是您。为此，我曾那样嫉妒我的同学蒋子龙和陈国凯——他俩与您并无“前缘”，居然洪福齐天地“抢”走了您！您也许全然不知，兆阳老师，当这两位文坛骄子兴冲冲去您家“拜师”并谢却意欲同行的我时，年纪老大不小的我，气得撅了半天嘴……

兆阳老师，您也许不知道，您在我心中的老师地位，决非一九八〇年初修改《心香》始。早在您那本大作《在田野上，前进！》问世时，早在您坦陈创作与生活关系的种种卓见时……如此金玉良言却蒙莫名之冤，如此洋洋大著却遭箭镞如雨的批判，天理、公道在哪里？无庸细说，无庸细说，那是指鹿为马的年代，树怕倒头理怕翻，年代都不正常了，何说天理？遑论公道？

世事偏就奇诡，不意复得的往往就是曾被粗暴褫夺的。时代驱邪扶正之日，兆阳老师，您终于讨回了公道，您的大著再次饮誉文坛，您那有关创作的论断有如鲜花灿然重放，您同时收获了文心和人心。

兆阳老师，我无法忘怀终于能够的一次拜访，那是我到您“寒舍”唯一的一次。是的，按常情，不称“府上”也该称“家院”。可我无法讳言，您那是地地道道的寒舍，朝北的房子怎能抗拒朝向和坐落的偏差？破旧的四合院无言地诉说中国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清贫！这些境况是那样怆然凄楚，怆然凄楚如钝锯，一点点一寸寸锯着我的心！……我无法表述无庸表述，兆阳老师的家居就是当时我们中国万千知识分子生活的写照和缩影！在八十年代初，我们根本无法指望有关方面能够迅速持平荒谬岁月布施我们的种种刀伤弹痕！就因为如此，我才掩泪于笑地写了《藤椅》，才发出《送药》的呼号……

但是，恰恰就是这间寒舍，使我真真切切徜徉了一次精神的伊甸园，灵魂的芳草地！兆阳老师，在您和师母为我生起的火炉边，我温暖如沐春风，由您和师母为我沏泡的热茶中，我从从容容地品味了您安详旷达山中高士的气质，品味了弥漫全室熏染人心的那脉不散的书香！

我永远不能忘怀，不能忘怀您书斋的布设。那满得无法放置的书籍，那漆色全无的书桌和破旧的藤椅木凳，那套浸透了您毕生心血的笔砚，那幅您仅仅用以自娱的水墨画！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兆阳老师，我们永远记得住这两句小诗。一角老藤，一茎葫芦，是否是您的自喻？那把小壶那支烛，更该是您的精神写照。我凝目环视，神思走马，兆阳老师，您怎知我在您书斋小坐的这个把钟头，岂止是胜读十年书的感慨？您怎知我心头的那股泉流啊，有如高山悬瀑！

我多么后悔,多么后悔!这十多年我差不多每年都要来一次北京,年年来京我都想来拜望您。可是您坚贞卓挺骨鲠之士的品格和胸襟,总是提醒我千万不能有如俗之念如俗之举,您浩浩如海的学问更提醒我拿不出比《心香》更有分量的作品岂可贸然去访?我迟疑着,努力着,我祈望再次拜望您时,不光又二次得见您清癯的面容慈颜如故,更祈望您亲切的眼神再次溢露嘉许的微笑。

月余前,当得知我马上就能将长篇《无梦谷》捧到您面前时,我曾那样兴奋急切!急切中我得了您让女儿燕子转述的电话:即使我看不清书上的字,我也会让燕子读给我听,你的新作,我当然乐于知悉……

兆阳老师,您可知我听到这些话语的心情?五十岁出头的我,手握话筒,再次热泪盈眶……

我这么那么忙碌着,数着指头期待着,我盼着很快来北京,很快,很快,就在十月的金秋,就在香山红叶时……

苍天无情,人世不测,就在我兴冲冲拿了机票时,您突然谢世!

我怎能相信?我不愿相信!不愿相信!!

明知您近年辗转病榻体力渐衰,明知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还是不愿相信……

兆阳老师,纸笺一张泪两行,我实在写不下去……

人生丰于书,师恩长如泉!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哭于北京

原载 1994 年第六期《当代》

秋天的怀念

——秦兆阳同志在我心中

崔道怡

一九五六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工作不久,刚搬进杂志社那座四合院后花园的一间小屋,正在安顿行装,突然有个人静悄悄地踱进门来。我一下愣住了,这就是我心中崇敬的作家、我即将共事的领导秦兆阳。

他完全不似我想象的模样。在大学里,也曾接触过几位当着教授的作家,无不具有学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而眼前的这位,虽也有些文弱的书生气,却更像一位文书类的农村干部。清瘦的面孔,和蔼的笑容,一双让人一望见底的眼睛,像拉家常一样问到我这样那样的情况。显然,这是一次礼节性拜访,是代表着编辑部对我表示欢迎。但他做得那么随便,一点儿也没有领导的派头和应酬的味道。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一时间不大自然,回答得就相当拘谨。他大概看出并理解了我的窘态,宽慰地说:“今天你太累了,早点儿休息吧,以后交谈的日子多着呢。”

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位作家直接的交谈。此前,我只是通过作品来了解作家,对他们具体的为人并不真正了解。读着《农

村散记》的时候，曾猜想能写出如此优美文字的人，一定是很有才气因而也未免有些傲气的。不料身为名家又正主持着文学国刊的秦兆阳，竟这么平易，这么随和，这么亲切。过后，我几曾懊悔自己的愚拙，怎么就不趁那机会也问候他，跟他畅叙，向他讨教呢。

当时，何曾想到，以后交谈的日子，其实并不多。共事仅仅一年，再没有单独相处，突来一场风雨，阻隔了廿载春秋，重逢时都有了两鬓霜雪。又怎能想到，三十八年之后；当我展开稿纸，要跟他无所顾忌倾心交谈之时，他却已不在了。那样的日子没有了，永远不会再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默默独语，落到纸上最凝重的，惟有泪滴。

——秦兆阳同志，我怀念着你。

人间的交往千千万万，初次见面就留下难忘印象的为数无多。头一日结识了秦兆阳的场景，那几分尴尬又几多温馨的氛围，像一幅珍贵的历史镜头，多次映上我心底的荧屏。不仅仅因为，他是我刚涉世事所遇到的第一个上级，他是我开始实际接触的第一位作家。还因为，他是我走上生活旅程的第一个领路人，他是我从事编辑事业的第一位带头人。

为秦兆阳所写的讣告新闻里，开具了一系列光荣的头衔，在优秀党员、著名作家、评论家等后，还赫然列有编辑家这一称号。可以想见，编辑家这一称号，会引起文学界更多人的叹惋。而我作为他早年的部下，作为在他影响下大半生投身于编辑事业的后进，对这一点更是感慨至深。与其说我是把他视为作家而相识的，不如说我是把他当作编辑家来了解的。那时候，我对能分配到《人民文学》来当编辑，既感到荣幸，又有所不甘。一方面惟恐力不胜任，另一方面还想圆作家梦。正是秦兆阳的人品和文品，如春风细雨，滋润我心田，使我认清并充实自己，打消了不

切实际的念头，坚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志愿。

——秦兆阳同志，你曾是我修身的明镜、敬业的旗帜。

他并没有找我谈过关于端正思想之类的话，他是以实际行动、以他的精神感召着我的。为了办好显示国家水准的《人民文学》，为了匡正公式化、概念化的文风，为了把真正关切时代命运、真正具有艺术情味的作品，奉献给年轻的共和国和解放了的人民，他放弃了个人的创作全身心投入编辑事业，常常通宵看稿改稿，直到天明。

我具体见到的，就是那耿耿长夜不灭的灯光。关于那灯光，我曾在一篇评论文章里顺带提到过。那时候，《人民文学》杂志社坐落在一条小胡同的一座大四合院里。垂花门内，带抄手游廊的大北房和西厢房为办公室，东厢房便是秦兆阳同志的家。后花园里新建的平房，住着几个年轻编辑。我有时深夜穿过庭院，总见到东厢房还亮着灯光。秦兆阳伏案劳作的身影映在窗帘上，常引起我崇敬的情感和好奇的猜想：他在审读谁人显示了特色与潜力的作品，或者是在修润哪篇准备作为重点发上版面的稿件？他本人早已是名作家，又正当驰骋笔墨的最佳年华，但他却把精力和文采，全都用来培育有苗头有厚望的年轻人了。

对年轻人，秦兆阳总格外关心。记得我上班当月，正巧刊物发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一次会议上，他便指着我说：“你就是编辑部里新来的青年人，该对我们的工作多发表意见啊。”我明白这不是顺口说出的风趣之言，他是在表达对一个新手的鼓励和信任，编辑部里比我早来的年轻人，已经跟他相处得非常亲近。他们都亲昵地称呼他为老秦，其实老秦那时才不过四十岁，只要听到有人说“老秦过来了”，就会隔窗看见，他端着茶缸子，绕过丁香树，漫步踱到办公室来。他到办公室，要么是来发布消息：“这个青年人的处女作显出了才气呀，是不是

把他调进京来好好改改？”于是，四合院外院的客房里，就会住进来一个夜以继日修改稿件的年轻作者。要么是来发表见解：“昨夜我又有了个新的想法，咱们是不是交换一下意见。”于是，编辑们放下手头的稿件，一个小型的随意的座谈会便临时凑拢起来。有一次我从来稿里挑出了一篇小说，作者是一个大学毕业之后新到科研岗位的年轻人。那作品的情感表述比较真切细腻，但思想蕴涵却显得浅露直白。为使稿件改得达到发表水准，秦兆阳叫我把他请到编辑部来面谈。那简直是手把手地在教作者，谈话一直持续到傍晚。意犹未尽，秦兆阳决定留人家吃便饭。那天雨雪霏霏，大街上湿漉漉、冷飕飕的，编辑部附近的小餐馆里，则雾蒙蒙、暖融融的。潜藏于年轻人内心的智能和美感，沉醉中一下子得到了醍醐灌顶幡然顿悟的放释。那次欣鼓舞的情景，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位现在也已年近花甲的作者，想来更是不会忘记的。

——秦兆阳同志，每一个承受过你恩泽的人，都会永远感念着你。

秦兆阳是《人民文学》创刊的元老。从登载毛泽东主席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第一期起，一本本刊物，一篇篇文章，无不都铭刻着他辛勤耕耘的汗水足迹。尤其是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七年夏这一段美好时光，他出任副主编，和葛洛同志一道，具体主持版面，强调新人新作新观点新风貌，使刊物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以发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标志。《人民文学》把我国小说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真个是万紫千红，人才辈出。有多少香花，有多少俊杰，就是因秦兆阳的发现、扶持，才得以开放，才脱颖而出的。他慧眼识人，鼎力相助，再生造化，点铁成金，推举了、成就了整整一代文学新人。如今诸多享誉文坛、蜚声世界的大家，在回顾他们的处

女作、成名作，一炮打响、一鸣惊人之时，也该都会想到秦兆阳的名字。而这情状，在讣告新闻里，并无记叙，只是简化为编辑家三个字。但那些经他手编辑发出的《人民文学》，可以作证，他头衔中的编辑家三个字，通连着千万名读者的情感和心愿，通连着上百位作家的成果与声誉。

——秦兆阳同志，那就是你的没有名字却凝聚心血的非人工纪念碑。

1957年夏，正是那一场被称作“阳谋”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骤起之时。可叹我那时候天真幼稚，竟没有觉察到“扩大化”的罗网已罩临他高昂正直的头颅。有一次，我因编务到他房间里去，偶然看到他书桌上添了一纸字幅：“毁誉不计，荣辱自安”。作为文学家的秦兆阳，同时还是一位艺术家，书法家，所以我浑然不觉有异，还以为那只是他即兴信手下写的自律格言。事后我才明白，那实际上是他敏感到噩运临头的心理写照，是他面对不公正待遇的人格自白。就因为，作为编辑家，他广开文路，编发了一批确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出色作品，他不拘一格，选拔了一批卓有艺术良心和才华而各具特色的精英才子；就因为，作为评论家：他见微知著，切中时弊，推陈出新，仗义执言，以何直的笔名，发表了至今看来仍不失为特定时期真知灼见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他的路，被粗暴地截然切断，他和一批同甘共苦的文苑挚友，一道蒙受了不白之冤。从那时起，东厢窗下，熄灭了灯光。

——秦兆阳同志，你一定知道，你已经知道，太阳的光辉是不会熄灭的，尽管曾经发生过日蚀。

在历史的长河中，日蚀的劫难不过是微乎其微短短一瞬，但对人生的旅程，那沉重的阴影却长达二十二年。幸喜新时期毕竟到来，当他作为历尽坎坷的老作家重返文坛时：日子又已春光

明媚。而他依旧回到编辑岗位，出任了《当代》杂志的主编。工作不在一起了，心灵却是相通的。那一次难得的重逢，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九八六年夏天，我按照中国作家协会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的安排，在北戴河组织了一次文学编辑的学习班，特邀秦兆阳同志来讲课。他的课程，鞭辟入里，语重心长，我们收获之丰美，自不待言。我要说的是，我曾和他一起，到海边去采集卵石。那一刻，我们彼此都忘掉了各自的年纪、身分，忘掉了身外的人际、世态，真是达到了忘我、忘情的境界，就像两个无邪赤子，弯着腰，低着头，东瞅瞅，西看看：无声地，专注地寻觅着、捡拾着。当我们都捧着一堆自认为精致的卵石，相聚一处，互相展示时，犹如争强好胜的小孩子比试高低，便炫耀起各自寻到的宝贝。

“这一块，你看看，漂亮吧？”他手捧一块卵石，伸到我眼前，脸上洋溢着自得。

“你看我这一块，比你那个强多了！”我也伸过手去，捧给他看我那最得意的收获。

他一下子睁大了双眼，接过那块卵石对着阳光观赏起来。那的确是一块难得的精品：质地圆润，花纹俊雅，色泽晶莹：

“真美啊！”他爱不释手，由衷赞叹。

“送给你吧。”我的审美眼光，能够得到他的赞许，这就很满足了。

“真的吗？太好了！”他珍惜地收存起那块卵石，指着 he 收集的那一堆，“你喜欢哪一块？咱们交换。”

难道我们真的如儿童游戏般的进行交易么？难道我还像跟他相识时那样蠢笨么？我心里颤颤的，有些哽咽地说：“我捡到它，就是为了奉献给你呀。”

“那……谢谢了。”他大概没听出我那句双关语，还沉浸在

童话似的境界里。

而我那时,心里想的是,秦兆阳同志,我这才懂得了“毁誉不计,荣辱自安”,乃是你澹泊清明、宁静致远的人格体现。你不就是这坚韧而剔透的彩石么?多么愿意跟你一起,多么愿意像你一样,做一块彩石?去铺展那绚丽斑斓的文学路途。

——秦兆阳同志,后来我又捡到几多彩石,却不料再也无法奉献给你,只能将它们致祭于你灵前。

如果不是《当代》杂志副主编朱盛昌同志约稿,我是不会写下这篇回忆的。因为我了解秦兆阳的脾气,他不愿听赞颂的语句。那一次我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回顾到当年情景,曾顺带提到了他不朽的功绩,事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他看到后便有些生气。以致后来有人约我描绘五十年代《人民文学》春光烂漫的花季,我一直迟迟疑疑未敢动笔,这一次,这一次我不再顾忌,只恨我才疏笔拙,只恨我写得不全不够不深不细。但我多么希望能再听到他的声音,同意也好,生气也罢,只要他再说一句,就说一句。而他已经离去,此去永无归期……又是秋天,又是夜晚,暮霭沉沉,万籁寂寂,最大的悲哀,原来在这里。

——可是,秦兆阳同志,我们的好老秦啊,你应该谅解,你会谅解的,秋天里每一颗成熟的果实,都必然将深深怀念护花园丁的拳拳心意。

1994年10月22日夜

原载1994年第六期《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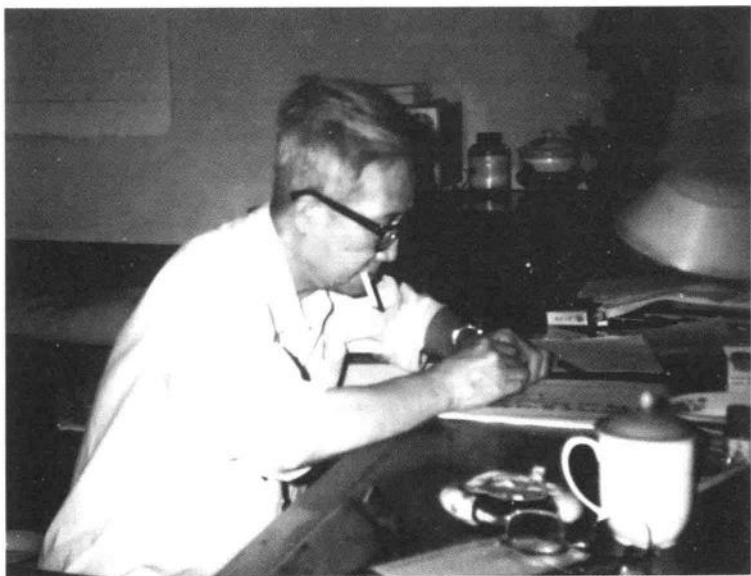
怀念秦兆阳

徐 靖

我的客厅，挂着幅画，画面为竹，竹干粗高亮节，竹叶刚劲有力，是著名作家、理论家、画家秦兆阳在 1991 年秋送给我的墨宝。

那年我到北京去看他，他正在画画。墙壁上、画案上摆了好几张画，画面有竹子、有荷花，我挑了一张向他索取，他欣然同意给我，并提笔在落款处签了名。

那是我初次见到秦兆阳，1979 年 11 月。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照着地址，走进一个四合院。在后院的北屋找到作家秦兆阳。进屋时，他正在生煤火炉。忙了一阵，将炉子生着了。然后他洗了手，给我让座、倒茶。我看了看这房子，西头他的书架占了大半间屋，中间安的煤火炉，东边靠墙放着张床，那是秦老睡觉的地方。书桌紧靠窗户，桌旁有个单人沙发。北墙挂有几幅中国画“竹”和“荷花”。落款处写有老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秦兆阳自己的画。这间房子就是作家秦老的书房、画室、卧室和会客室，还兼《当代》主编的办公室。秦老高高的个子，着身棉衣，鬓发斑白，戴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是双透着沉思目光的眼睛。他坐在书桌前椅子上，袖着手，不时地咳着。他不善言语，也没有寒暄话。对我这个初次来访者也不知说什么好，不



担任《当代》主编后，在家中工作的秦兆阳

不停地翻动书桌上的稿子。那书桌上的稿子可真多，左边一摞，右边一摞，面前还放着一摞。他是《当代》的主编，每月要终审《当代》几十万字的稿件；还要看年轻作家、老作家、不认识的业余作者请他看的稿件；还要读信、复信；还要自己写作品……可见他的时间是多么宝贵。我先开口，直截了当地谈了来访意图，他知道是出版社来组稿的，沉静的脸上露出了歉意的微笑。他说：最近编了两本书，一本给了百花出版社，一本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两辈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定下来要出。他看我很失望，想了想说：还有本“小集子”给你们吧？我当然乐意了。书稿定下后，我问：秦老，这房子这样冷，能工作吗？他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

通过编者和作者的多次交往，我认识了秦兆阳，并建立了友谊，每年到北京我都去看望他。他学识渊博，又爱思索，往往以

《当代》主编的角度,看全国文艺创作上的倾向问题。在秦老面前我爱问,他也爱谈,他的谈话如同授课一样,使我受益匪浅。他对朋友诚恳坦率,无一点虚假之言。他不图名更不争利。有次我问他,日前刚成名的小年轻,频繁出国访问,怎么一次出访都没有你?谈到这个问题,秦老也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当他谈到自己时说:那些时尚的事,不愿和别人争。秦老一贯淡泊名利。事实也是,在众多的文化部门出国访问团的名单上,我从未看到过他的名字。

我也爱同他谈《当代》上发表的作品,特别是震撼读者的“报告文学”作品。发表报告文学这一主旋律而名扬国内外,是大型文学刊物《当代》的一大特色。但作为《当代》主编的秦兆阳,总是说:“是编辑部别的同志所做的工作。”不过对“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他还是谈了自己的主张:中国代代都有脊梁骨式的人物。及时用报告文学形式去反映真实的,鼓舞人心的,现实主义性很强的人和事,很重要。真正地抱着鼓舞人心的目的去组织作品,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不少鼓舞人心的脊梁骨。如《中国姑娘》、《励精图治》、《战马的风骨》、《热流》等等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百折不挠的硬骨头精神,很鼓舞人,给群众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也是编辑部同志和作者,共同创造的《当代》这一刊物的形象。其实,这是他这个主编倡导的。秦老在“磨稿”中发现了一股“伤痕”文学的创作倾向,他觉得刊物不该沉浸在“伤痕”之中;他主张文学创作也应该“歌德”。但如何能及时地表现现实生活中鼓舞人心的人和事呢?一时不易用小说形式表现。因为小说的取材和生产的时间不是由编辑部主观努力来决定的,只有去组织报告文学的写作才能达到此目的。《当代》主编秦老倡导了“报告文学”这一主旋律。秦老不喜欢伤痕文学,我感到这是秦老的胸怀博大。

说起伤痕来，秦老心中也是伤痕累累……

1957年为写一篇文章，他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自己跟着党革命了几十年，一篇文章叫他时运倒转，由《人民文学》副主编变成了阶下囚。他多想为自己辩白，但那股风暴来得太猛，不容他说一句话。无处辩白自己的委屈，是人生最难忍受的痛苦。还好，妻子能理解他，她知道丈夫是个老老实实的好人，他平常埋在稿堆中，为编好稿件，他忘记回家，忘记吃饭。有时还翻字纸篓别人丢掉的稿子，经他救治后发表了，一篇稿子救活一个作者。他真做到全心全意了。妻子知道，没有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他秦兆阳，他绝对不会反党反人民。但妻子也无回天之力，只有分担丈夫的委屈，双双面对而泣，哭一阵，说一说，心里要好受些。但这在自己家中的行动，还被保姆给奏了一本。害得妻子在单位也受到批判。

这是我听他妻子谈的一段往事，秦老自己从未说过，也未见他写进文章中，但我却听他谈过这样一件事：

“文革”中凡是党的生日时，总要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加强管制。有一年过“七一”，他被加强管制了一天，放回住地，他躺在床上，越想越委屈，越想心里越难受。半夜独自一人走出寝室，走到一个山岩上，悲痛地放声哭了。他真想一头栽下去，了却这屈辱的日子。当时他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他的童年，那时的父母、他同弟弟四口之家，靠父亲教书的薪水过活，虽不富裕，但全家过得和和美美。可是好景不长，才满十四岁时，他父亲因操劳过度，得肺结核病死了。他靠父亲教的一手好字和绘画，帮别人抄写点东西，有时画个漫画在报纸上登上一张两张，换点微薄的收入，这收入怎能养活一家三口哩？他为寻找出路，找到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将母亲和弟弟寄养在舅父家，告别母亲到了延安，后又奔赴抗日前线。一别多年，不知

母亲情况。全国解放后，他回到故乡——湖北省黄冈县枣树店村，才知道母亲的悲惨遭遇。原来舅母嫌弃他们母子，先赶走弟弟，后又将母亲赶走。母亲一气之下回到了家乡那两间草房居住，在回家的路上，因长年想儿子，哭坏了眼，眼神不好，在上渡船的吊板时，一脚踩空摔断了腿。她拖着断腿，爬回了家，靠左邻右舍的施舍过日子。一天夜间，不知是病痛的折磨，或是太饥渴了，想到门口缸里掏碗冷水，还是想去要点吃的？当白天别人发现她时，她头枕门槛，已经断气了。每想到母亲的情形，他就心酸落泪。作为儿子，他没有尽到孝心，但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他对祖国是尽了“匹夫之责”了。他在党的领导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他秦兆阳。他爱党，他要纪念党的生日。他想到此，面对夜空高声呼喊：“是党昭我以真理，亲我以人民，炼我以战争，溶我以时代，引导我走进了胜利以后的新中国，使我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内心的寄托。”他呼出后，心里升起一股火热的味儿。他心里豁然亮了。他盼望总有一天，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会被党和人民理解。想到此，他感到全身轻松。从此，他悄悄地拿起笔，在劳动之余抽空写作。用那支蘸满了爱的笔，去歌颂该歌颂的，去鞭挞该鞭挞的。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两辈人》、中篇小说《女儿的信》。沉浸在悲伤中他没有生路，只有心中有了寄托，有了光明，才能去克服最难克服的困难。才能摒除那呵斥声、辱骂声，和泼在脸上、身上的污泥脏水。总之他熬过了那二十年的日子。

平反后，他没去想自己受伤的心。很快写出了《心的歌》、《悼贺龙》。作家秦老就是想以自己乐观兴奋之情去激励遭受了十年浩劫以后的人心。任《当代》主编后更主张刊物应发表激励人上进的作品。

秦老自称是“板大先生”，说“这是小时候家乡父老给他取的绰号。板者，古怪也，遇事爱咬死理、不通常理也。几十年过去了，仍本性难移”。重返文坛后，又到编辑群里来了。看稿、改稿、退稿、谈稿、约稿，总起来名之为“磨稿”——是对稿件切磋琢磨之意。他写了这样一首诗：“磨稿亿万言，并无辛酸泪，休云编者痴，我解其中味。”

秦老一恢复编辑工作，板劲又来了。他对“伤痕文学”、“意识流”、“问题小说”、“从意念出发而形成的新框框”等，都有所看法，有所思索。他是《当代》主编，所感到的问题均带有全国性，我同他交谈时，常听他谈论这些创作上的倾向问题；对这些问题他都有极其独到的见解。但我想这些意见如及时发表，也难堵挡那股风，作者难免要担风险。“人老了，惹那麻烦干吗？”我常这样劝他：文章可写，但不忙发表，将来可出一本《磨稿笔记》。他是否同意我的意见，我没去管。但他那“板大”劲，我还是很敬佩，很称道的。那哪里是“板”，这不正说明秦老那颗热爱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不老的心吗？心如明镜。我希望有更多的“板大”先生出现，关心、爱护党的文学事业。

现在这位让人敬重的“板大”先生逝世了。他那未发表出的《磨稿笔记》，也可问世了。让世人看看他是怎样一位编辑、一位作家、一位理论家。他的一生是无愧的、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

秦老，我们永远怀念你。

脚踏现实

——一生敬业而正直的秦兆阳

胡德培

1956年春,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热浪中,秦兆阳一部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曾使如我这样在大学中文系求学的年轻学子们热血沸腾,多么向往着欲投身于这场社会热潮当中,去拥抱这个现实。没有想到,二十多年以后,我与秦老都先后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有了许多接触、交往和相互了解的机会。1992年,我还有幸调到《当代》杂志编辑部,在秦老主编的领导下担任副主编的工作,对兆阳同志一生虔诚地信仰、执着的追求、兢兢业业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永远脚踏现实的精神和品格有了更深的感悟与理解。

从《人民文学》到《当代》杂志

1916年11月,秦兆阳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枣树店村一个贫苦的教书先生的家里。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5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编辑部任小说组长,1955年底任副主编,主持《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1979年春到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0年1月任副总编辑,创办《当代》杂志并兼任主编,直至1994年10月病逝。秦兆阳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用他的话说,一直“看稿、改稿、退稿、编稿、谈稿、约稿,总起来或者可以名之曰‘磨稿’”,即是对稿件反复进行切磋和琢磨。他终日致力于案头工作,给人的印象总是兢兢业业、勤恳认真、一丝不苟的。

从《人民文学》到《当代》杂志,是两个不同生活年代,不同历史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舆论一律到思想解放,从一元化到多元化,改革开放,民主法制,与世界接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和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作品大量涌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社会有种种的变化、发展和不同的时代色彩,秦兆阳的办刊思想和文艺观点在不同时期虽有某些变化,但十分明显的是有其共同的基本思路,有其共同的发展脉络。

秦老一贯主张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现实性,文学作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群众性、社会性。在五十年代大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情境下,他还强调文学的战斗性、鼓舞性;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他更强调文学的当代性、审美性。总而言之,他始终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主张,认为这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正是在他的主持及其影响下,经过编辑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杂志先后推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明镜台》等颇受群众欢迎的引人注目的作品。八、九十年代的《当代》杂志陆续发表了《将军吟》、《芙蓉镇》、《改革者》、《跋涉者》、《故土》、《新星》、《钟鼓楼》、《大上海沉没》、《白鹿原》、《我是太阳》、《尘埃落定》、《代价》、《布礼》、《秋天的愤怒》、《妯娌》、《女性三原色》、《二嫫》、《生生不已》、《生命通道》、《雕花烟斗》、《心香》、

《最后一个渔佬儿》、《麦客》、《命运》、《中国姑娘》、《超越自我》、《世界大串联》、《“希望工程”纪实》、《澳星风险发射》等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同时,通过编辑部着力扶持了一批文学新人,为我国文坛演练着一支朝气蓬勃的文学生力军,像王蒙、李国文、刘心武、从维熙、张炜、冯骥才、焦祖尧、蒋子龙、陈国凯、柯云路、陈忠实、邓贤、邓一光、柳建伟、阿来等一批响亮的名字,今日已流传在广大读者群中。

1959年秋天,我被分配到中国作协,秦兆阳正遭受意外的打击而被调离,后在广西二十年,因此我与他无缘得识。1992年,我到《当代》杂志社任副主编兼编辑室主任,不几天,朱盛昌副主编约好与我一同去秦老家拜望,听取他对编辑工作的意见。见到我们,他很少客套。我们一边落座、沏茶,他一边便和我们谈起了工作。他特别强调:《当代》是以靠近时代、服务现实为宗旨。办刊物,应该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要跟着别人跑。我们不赶潮流。他说话时,一字一句,缓慢而坚定,立场鲜明,态度果决。一句句话语,从他清癯、干瘦、骨骼挺拔而有力的身躯中传出,显得胸有成竹而深思熟虑。我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一种意志,一种精神,一种情感,一种信念,一种品格,一种追求,实在耐人思索和回味。正如他在自己一本小说选集的《序》里所说:“在旧社会里我是个几乎不能生存的人,也看到过许多劳动人民如何挣扎于穷苦的命运之中,更看到过亲爱的祖国经历巨大的危难。所以在参加革命以前的学生时代,当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些不像样的诗歌时,就自自然然地宣扬过爱国思想。以后,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给我以光明,昭我以真理,亲我以人民,练我以战争,溶我以时代,引导我走进了胜利以后新的中国,使我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内心的寄托,所以我心里总有一股火热的味儿。”几十年来,秦兆阳办刊物。写文章,搞创

作,提主张,一切言行,皆是以这般火热的味儿和人格力量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的。

秦兆阳病重住院期间,直至他病势垂危、在逝世前的一两天,他还在关心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的评奖工作,关心着青年作家的成长,关心着《当代》杂志出版一百期的有关活动……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人生的许多事情,往往是人们所难以逆料的。

秦兆阳少年时代最喜欢绘画,曾经梦想过要当画家。后来在湖北和上海漫画界崭露头角,希望将来自己靠画画为生。到延安后,他先是在陕北公学。1939年春,与华君武、辛莽等一同被保送到鲁迅艺术系学习。1940年他在华北联合大学当过美术教员。可是,后来的工作需要和事业发展,却让他做了几十年的文学编辑。

他从事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创作,到组织安排他做编辑工作,促使他“去研究生活规律和创作规律”,并“越来越认真地思考一些创作问题”,从而于1956年写出了那篇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篇论文及别的一些原因,使他遭受到二十多年的苦难折磨。其内心的苦闷和煎熬,实在是难以诉说的。秦兆阳在八十年代回顾过去岁月时说:那时,“支持我生活下去的仍然是对于革命和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情,给我以寄托和安慰的仍然是文学创作。”到了1979年春天,“法轮妙转”,我“又投胎到编辑群里了”。

生活历程的坎坷曲折,激动人心的悲欢喜乐,随时碰到的困

难和矛盾,许许多多的爱和恨,种种的理想和追求,都促使他学习、思索、总结、概括,不断受到锻炼,获得提高,铸就了他这样一位现实主义热情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

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主张文艺创作“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过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同时,他号召作家们“勇敢地从自身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大胆地刻苦地来进行百花齐放”,从事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二十多年后,他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仍然坚持认为:“人民迫切需要文艺真实反映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的生活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是的,秦兆阳始终关注现实,立足现实,站在现实的泥土中,主张作家以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服务于现实,服务于人民。

八十年代初,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前后,我有几次机会去他家里。他拿出一摞小笔记本给我看,共约十来本。我一看,那都是色泽陈旧,规格各异,纸质泛黄,仅人手掌般大小的笔记本。显然年代已很久远了。上面的字,真是小得很,只有芝麻粒一般大小。他说:这是为了当时行军带起来方便。当时墨水也没有,那是用染布的那个染料来写的,今天看起来实在太费劲。他桌子上摆着一个圆圆的放大镜,他便是借助于放大镜慢慢地翻看。那时,他在《给一位青年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搞报纸工作和搞群众工作之余,在地道里,在农家的炕头上,经常把所见所闻的故事、语言、人物记在小本子上……尽可能按照他们讲故事的口吻记下来。”战争年间,他这样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思索,一边练习写作。五十年代初,他深入农村生活,写了十几篇“农村散记”和反映农业合作化趋势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后来,他根据那些笔记和多年的思索和体验,构思创作了反映冀中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用他的

话来说,这是描写中国大地的不可毁灭,人民力量的不可制服。冬天一片荒凉,春天大地又是一派生机。小说出版后,他迫切地想直接听到读者的感受和意见。为此,我社总编室和当代文学编辑室于1984年11月16日在北京朝阳区专门召开了一次读者座谈会。秦兆阳兴致勃勃地到会听取大家意见。读者们觉得,小说中活鲜鲜地展现出冀中人民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性格,其气质、个性、形象、语言都很生动。秦兆阳说:我不是北方人。读者阅读后有这种感受,全靠了人民群众那种伟大的精神和品格。他反复说:“我是凭良心在写。”他原来搜集的材料很多,构思规模比较大,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动笔,经过反复地琢磨、修改,现在这一本《大地》只是写了个开头。他很想继续写下去(实在可惜,秦兆阳后来未能续写下去)。

秦兆阳几十年来的工作和创作,就是这样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民,充满着热烈的爱和深沉的恨,他对国家、民族,对事业、理想的热爱与执着,始终坚定地勇敢地捍卫并实现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竭心尽力地为之而奋斗、而抗争、而倡导、而实践,身体力行,直至最后一息。

始终脚踏实地,敬业、正直

秦兆阳是从贫困生活里走出来的,一直热爱生我养我的大地和故乡的泥土。他说,他是“吃泥土生长的粮食长大,后来又是革命给我以寄托心灵的泥土,而革命又需要我把生命变成泥土”,所以,他的一生,直至衰老之年,都在为人民、为国家“努力做一把铺路的泥土”(小说选集·序)。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血与泪、风与火的斗争里去,进一步跟人民一起去共生死,同悲欢”,“我到了平、津、

保三角地带——来到这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上”，那里“有最好的老师——人民，斗争，生活！”从1943年秋到1948年秋，五年多时间里他都生活在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建国后，他工作忙了，任务重了，仍抽出1953、1954两年时间回到战争年代老根据地去生活，所以，他很快就写出了那些带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散文、短篇及长篇小说。以后，二十多年痛苦的生活煎熬，他始终不忘祖国大地上的人民群众，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构思长篇小说《不平的平原》，1963年在《广西文艺》上连载时改名《两辈人》，这即是后来在1984年重新写定、共四十二万字的《大地》。

历史的错案被改正后，秦兆阳回到北京，他一直住在北池子二条的一个小院子里。这是当年戴帽子时为安排家属匆忙买下的。我们走进小小的大门，穿过窄窄的夹道，才能走到他所住的后面院子。院子更显紧窄，不及转身就到了他那间低矮、破旧、狭小而阴湿的南屋。那一次，外面已是草木返青、迎春花开的季节，他那一小屋依然生着火炉，可是，我进屋后感觉仍像冬天一般阴冷，一直没有想到脱掉外面的罩衣。看到这情景，我真有些忧虑这对他年老多病的身体实在是不利的。秦老好像并不在意（也许是环境逼使，没有办法）他与我颇有兴致地谈起近日写作和他挂满墙壁的书画。

他在工作之余，常常拿起画笔，寄情丹青。风荷墨竹，强枝劲根，都是他所喜爱的。他屋子里摆了好几苑树根，那都是原始状态的略带泥土的僵直有力的一些树根。这是否是他热爱大地、喜欢泥土的一个旁证？那些根茎大多显示出一种桀骜不驯而强劲有力的逼人气势，这是否又是他个人气质和人格力量的一个表征？在房间东头靠墙放置着一张长长的大桌，那是他写字、绘画用的。桌上及旁边经常放着许多张字画，是他写作间隙时独自赏玩或与朋友互相切磋、鉴赏的。如有朋友喜欢或索要，

他往往即请朋友自选。有一次我就是在他那些字画中挑选了一张墨竹和一幅书法。

工作上,秦兆阳对编辑部同志要求很严。他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工作要对得起广大读者。他自己更是时时谨慎,事事认真,兢兢业业,刻苦勤奋。他刚直不阿,耿介忠贞,襟怀坦荡,而且顾全大局,与编辑部同志在某个问题或某件稿子上有不同看法时,他总是充分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同志式商讨的方式交换看法,务求以理服人。他自己的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尽可能达到较完美的程度。他是一位知名作家,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主席团成员,担任过作协书记处书记,但他不务虚名,淡泊名利。有关领导多次安排他出国访问,都被他婉言推辞。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要对社里所出的优秀长篇小说评奖,他的《大地》获得大家提名,他恳切地向有关负责人表示:自己是社里的人,最好不要参加评奖。可是,对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他却十分热忱帮助,对他们的作品真是不惜心血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直至作者修改成功。能够请来的,他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来不了的,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问题,他常常亲自复信,尽可能谈出自己的看法,以使对方受益不浅。秦老逝世后,陈国凯、叶文玲、蒋子龙等人都非常动情地写了悼念文章。西北边远地区一位不知名的读者也写了一篇沉痛缅怀秦老的文章,虽然他们素昧平生,从未见面,但多年以前却收到过秦老一封感人至深的复信。

秦兆阳就是这样,脚踏实地,立足于生活的泥土之中,几十年兢兢业业地耕耘着,奋斗着,创造着。

悼念信件一束

张克同志并

大姑娘、小燕、万里：

今日从《文艺报》上惊悉，兆阳同志作古，不胜悲伤。

兆阳同志是我非常敬佩和感激的人。是他和康濯同志推荐和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中风偏瘫，丧失行走能力已经六年多，不能亲赴府上吊唁。我派我的儿子刘松萝代我趋前致哀。

如开追悼会，请代我敬献花圈。

刘绍棠 1994. 10. 14.

秦晴同志：

惊悉秦兆阳同志仙逝，不胜悼念。

兆阳同志是我湖北同乡中杰出的作家。早在 1935—1937 年他在中学读书时，我就看到他所作的画，给我极大鼓舞。此后他去解放区，深入生活，参加抗战工作。

特别是在解放后，担任《人民文学》编辑工作，对文艺理论上的建树，开拓了我的眼界，虽然因一时不被理解，蒙受了不应有的批评，但他的理论还是深入人心的。

在创作上，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也写出了在

一定时间的历史风貌,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也极为感人。我们以失去了这样一位勤勤恳恳为文学事业尽心尽力的老同志而悲痛,但他的贡献是与新文学成长而长青的。

盼望你和你的家人节哀。

邹荻帆 10月17日

张克同志:

因近年来身体不好,已不能骑车,好长时间没去看望你们,原想在年前找机会去和兆阳同志聊聊,万没料到他突然病逝,昨天听到这个坏消息,心里感到难以承受地悲痛。

近几天因为气候变化,我更感不适,头昏,心脏跳动过快,不能前去看你和孩子们,只望全家老小节哀,冷静料理家事。兆阳同志的一生是光彩照人的一生,刚直不阿的一生,他人不在了,但精神还在,力量还在,大家都要挺得住。

张志民 1994.10.18.

张克同志如见:

惊闻兆阳噩耗,顿失深交,真非语言所能表达无比哀伤!

人既寿终,痛定思痛。但望与同万里、晓晴等儿女节哀,老人保重晚年,儿辈则奋发前程!

我身居远道,天涯咫尺,未即前来告别,情不能已! 谨借笔墨写成挽联于此,作为彼此相识一场的悼唁……

文章千古事,耿介一世人。

陆地 1994.10.19.

人民文学出版社秦兆阳同志治丧小组:

刚出差回沪,惊悉兆阳同志不幸去世,十分哀痛!

兆阳同志对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高尚的品德,尤为我们后辈所敬仰。记得拙作《大上海沉没》发稿前,他

特地约我到他家去谈了一个多小时,给我的创作很多启发。嗣后,他又应我的要求,给我写了一副对联:“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我一直悬挂在我的书房中,指点我如何为人,为文。以后几次去北京,都想去拜访他。可惜因忙于事务,来去匆匆,均未能如愿。没有想到,这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我不知道追悼会举行了没有,只好匆匆写去这唁函,表达我的哀思,并请代我向兆阳同志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请他们节哀,因为,兆阳同志将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耑此即颂

时绥

俞天白 1994. 10. 24.

秦晴:

知道你爸爸去世的消息已经有些时日,几次想提笔给你写信,但觉得笔沉,更准确地说是心沉,惋惜更胜过悲痛。他离开了,对他自己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太敏感,老年的病痛已超过他能承受的极限。

有些同志和我谈起你父亲时总说:“真是太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是的,人们为他的处境深感不平。

社会对他太不公平。因为他太真实,他不愿伪装自己;因为他太谦让,不愿意降低人格;因为他太正直,不愿意卑躬屈膝;因为他太善良,不愿意损人利己。他不会完全知道,他的亲人和朋友,他的学生和下级,以及凡是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对他曾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评价。他远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也能够得到的承认、尊重和辉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惋惜。

我和你爸爸认识于1956年,我在他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担任小说编辑。那时,你们的家和我们的办公室紧紧相邻,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和了解秦兆阳。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小燕子。她常常静静地站在门前的小花园里，听你爸爸和我们谈创作、谈工作、谈生活……万里则好动一些，穿堂过室，跑来跑去。你则更多的时间在学校。你妈妈忙出忙进，承担着全部家务，非常辛苦。

你爸爸常把自己写成的小说拿到编辑部传阅，要大家提意见。他就是这样信任着大家，激励着大家。他是党支部内负责领导青年团的委员，常和我们一起开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反右初期，他在会上强调团员应做好党的助手。在《人民文学》反右运动期间，他从不张牙舞爪，态度十分平和，也很实事求是。直到最后整到了他的头上，就经常在作协礼堂开大会，记得那是冬季。

我因神经官能症病重回家休养，虽然不明详情，但我会常常想像着他坐在“被审判”的席上，一个有思想有良知的共产党员，一个毫无反击之力的文弱书生，在种种不实之词的狂风巨浪中，寻找着“前行的路”，多难啊！因而在1979年的四次文代会上，我在大会宣传科担任大会发言的组织工作时，曾千方百计促使秦兆阳做了一次讲话——一次正直的也是充满智慧的发言。

我记得我曾和你说过，你爸爸是我的“第一个上级”。因为他的为人与品格，他的学识与才情，的确能为我师表，值得我尊敬和效法。

虽然我仅仅是一个极普通的文学工作者，我们之间各方面的差距都很大，但是他并不轻视我对他的真挚友情。1993年新年我收到他一封短筒。1994年元旦我收到他的贺年片，这是在他罹患严重的眼疾之后，但字迹仍然潇洒自如，蕴含着他对人生的回答。我有幸保有一幅他为我作的梅花，这是最珍贵的纪念。

你妈妈身体很不好，你的身体也不好，节哀是最重要的保护，要努力渡过这痛苦的时光。

史超叔叔于九月底因车祸右肩负重伤,已住院手术,至今一个月了。我常常在此陪住,他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

关于你爸爸的讣告及遗体告别时间,请务必寄给我,可打电话给我女儿史禾(她家的电话……)她早中晚在家。也可写信给我,地址(略)。

紧握你的手。

你忠实的朋友小珊阿姨

94.10.24.于301医院

张克大姐:

我们没有订《文艺报》,消息不灵,最近才听说兆阳兄不幸逝世,殊感震惊和哀痛。

我们与你们一家,于五十年代初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如一日,长青不衰。十几年前,我们还在小羊宜宾会过一次,想不到那一次竟成永诀。后来虽然通过电话,但彼此身体都不好,再也没有见面了。但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上了年纪,弃离人世,这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挽之者,因此希望能节哀,自己格外保重。

祝你们全家好。并候

大安

吕剑 赵宗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

大嫂:

我去上海刚回来,在飞机上还想:该去看望兆阳同志了,谁知到家才知,他已经走了,真使人悲怆不已。

我和兆阳同志是抗战时期认识的。他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我一直很尊崇他,当成我的老大哥,谁知老大哥却辞我先去了。

大嫂,从我们见面就这样称呼您,不知合适与否?望您节哀,多注意保重身体。待我出院后,天气稍暖一点,再去看望您。

致

最诚挚的问候

孙铁 12月3日

张克及孩子们:

老秦的告别我没得去,实在遗憾。我多么想最后看看他,却错过了。

我接到通知及“生平”,记得根据老秦的遗嘱,不举行告别及任何仪式。后见了报,不知怎么回事。我与中央各机关住得远,又没了什么联系,所以消息闭塞。现在想来,应再打电话问问。

我写了篇悼念老秦的小文,本给“人民”的,但“人民”说已先收到了胡德培的文章,答应用了,便将此文转给了“光明”。“光明”于今天发表了。但删去了三分之一强,原3300字,现只摘登了1900字。今后如果出了“纪念集”,还是应当把原文全补上。短文章你们一阅。

张克同志多保重。孩子们会全心全力的照顾你的,他们都很孝顺的,这是你的幸福。要节哀。

即此,祝

安好

立高 1994.12.12.

慈祥的火——秦兆阳

蒋子龙

秦兆阳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没有惊动他自己——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急。前不久，他还对女儿说：“我的文章没有做够，书没有读够，画没有画够，字没有写够，人没有做够。”和他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二十多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位将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记住的重要作家，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投身革命的“高干”，更没有想到他会死在普通百姓中间，死得这么仁义，不吵不闹，不兴师动众，静静的默默的温慈的告别了大家，让人感到生死就在呼吸之间。

这就是秦兆阳的风格。

大约七八年前，在北京召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秦兆阳没有出席这许多年一度的“文坛盛会”，选举的时候却得票很高，在前六名之列。当时没有人公开说破这一现象，但有相当的人记住了这件事，并生出许多感触……

因为秦先生自1978年复出文坛以来，不“炒”别人，也不被人“炒”。但他从不对别人使用“炒”术发议论。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成功地躲开了文坛的热闹，几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秦兆阳与作家曲波、张洁、孟伟哉等

十年来在所有著名的会议上、在电视上，绝对找不到他的影子。他本来是一个无处可躲的人，50年代初，先以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深刻有力、大气磅礴的作家。继而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题，发出雄浑的强音，震惊文坛，被批判了二十年。无论批判者或称颂者都无法超过他，这篇文章成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巨石。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披坚执锐，扶植新人，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是经他的手问世的。此后到广西过了二十年“右派分子”的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之后重新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用冯牧先生的话说，秦兆阳是大作家、大编辑家、大评论家。这样一个人物能往哪儿躲呢？何况他又多才多艺，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我见过先生为我画墨荷翠鸟，笔风飒飒，墨浪滔滔，荷秆高二尺，一笔贯到底，挺直灵逸，雄健质朴。时下正是“全才”走红的时候，先生却默默地躲开了时尚。他并不轻视时

尚,也不鄙视喜欢热闹的人,有热闹才叫文坛,才叫社会。直到去世他没有出过一次国,当然也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我不想以出国与否论雅俗得失,我就出过国,到国外看看是我所希望的。提起此事只想印证秦兆阳的性格,想知道他是怎样消除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诱惑?

他,隐逸而不逃避,沉博而不孤傲,超拔清脱而不落落寡合,清雅而不闲适,热忱而不偏激,深邃而不沉郁,旷达而不圆滑。所以他不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组织活动的人并不记恨他。人们习惯了他,但没有忘记他,且越发尊敬他。

当今文坛被人爆炒、被人议论、被人艳羡的人不少,被人尊敬或者说值得尊敬的人不是很多。提起秦兆阳,人们很容易生出一种敬意。他躲开热闹却没有躲开人们的尊敬,这简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小小奇迹。他的突然去世同样也使许多人对他的生命生出一种崇高感。

历来文坛上少不了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秦兆阳以前是否和人结过恩怨不太清楚。应该说,他被打成“右派”就是搅入一场大的是非当中去了。他为文个性雄强,喜欢创设新说,以他的为文揣度他的为人,大概也相当锋利。曾取笔名“何直”,这样的性格可能容易得罪人。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近二十年来,谁能说得出文坛上的哪一件是非和秦兆阳有关系?谁能说得出秦兆阳和什么人结过怨?

他并不是老好人。一位还健在的文学大家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秦兆阳改过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见,敢改任何人的稿子。”这不是责怪,语气里带着敬意。既不当老好人,又不得罪人,该怎样掌控这种火候呢?

他爱自己的国家,并未因这种爱没有得到回报而变为恨。他长期情绪负重、愤世嫉俗,并未转化成为牢骚和叫骂,也不以

喜怒笑骂表达自己的机智和清高。自己挨过大整,并未因此而报复别人以泄怨忿。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谁没有挨过整,谁没有整过人”,对秦兆阳不合适,他关心现实又襟怀高淡,洞彻人事对生活又充满热情,厚重耿介又平正清穆,为文几近炉火纯青,为人宽展谦和、气度从容,人品与文品相契合、相映照,高标当世。

先生是文坛一蓬慈祥的火,温暖着人心、文心,净化着当代人文精神,他的去世使文坛又失去了一片洁净的天空。

然而,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先生是我和陈国凯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读书期间的导师。有一次我们俩到家里去看望老人,正赶上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在座,听两人纵论天下大势,得益殊深。原来先生对社会状况、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形势了解得相当多,相当透彻,外和中介,壮怀不已。

一个多月前先生发病住进首都医院,由于不是部级干部,不能进高干病房,只能住进三十人的普通病房。先生安之若素,自己本来就很普通,理应住普通病房,心里坦然,这境界真的是很普通吗?去年冬季先生突然发病,人们把他送进了海军医院小病房,他显得不安定,不自然,向家人唠叨:“出版社没有钱,我的级别又不够,只要能治病何必非呆在这高干病房里!”危机一过就坚决逃出了医院。他有肺心病,最怕冷,最怕过冬季,一冷就感冒,一感冒就引发肺炎,剧咳不止,继而引发心肌梗塞,这次就是这样丢了性命。几年前医生就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受凉,不能感冒。然而每到冬季他总要不断地受凉,反复地感冒,因为他住在阴面的旧平房里,没有暖气,到冬天阴冷阴冷。去年冬天他为了不感冒,只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子睡觉,起夜也方便。从这一点看他又不普通了——北京市最普通的住宅楼里都有暖气,然而没有一间是属于他的。也许因为他有自己的老房子,单

位便不再给他新房,他不属于那种能给自己搞好几套房子的人。也许他对这所早已被房管所下了危房通知的老平房怀有特殊的感情,舍不得丢弃它,或拿它去换一间暖和的房子——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知道自己前途黑暗,在中国作家协会肯定呆不住了,便拿出全部积蓄匆匆买下这房子,安置家属。岂知,当时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属,有了房子也难以安置得住,很快就被赶出了北京,二十多年后才得以房归原主。秦兆阳又怎会对这所房子没有感情呢?

房子问题——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容易碰到的难题。正是这个难题,葬送了一位老作家的性命。

如果说秦兆阳先生是“高人”,恰恰因为他普通,他真实。1990年8月29日先生给我一信:

“……数月前你给我的复信,至今记忆犹新,原因是你把我看得太好,使我惭愧难消。近几年渐入衰老之境,不免常对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顾,深觉自己各方面都很平常,所以有点‘名气’,是二十余年被当作批判的典型造成的,这连我自己也出乎意外。从本心说,我对自己是颇失望的,再加上经历多了,对许多事情易于看透,故不争不求不扩张,极少参加各种热闹场面,且不通世故,迂阔成性,不善处事,只得时常逃避世事。这样可能就显得与人有些不同,不同就不同,任其自然过自己的日子,求得内心安静而已。因此,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忘年之交的平常朋友吧。”

平朴,坦诚,宽厚,自然,先生不希望我们把他看得太好了。读了此信我仍然无法把他看得不好,听了别人几句真诚的好话,一定要直来直去地还自己以本来面目,眼下这样的人就不多,单凭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先生是大好人。

其实,对他的任何赞美都没有必要。他的一生就是对自己

最好的赞美。

1957年前，一个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少年，提着一个旧皮箱，告别亲人热土投奔延安。他走出了很远，再回头，看见母亲依然站在湖边望着他，形神清穆，目光灼热。从此这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前不久秦先生还对大女儿说：“原来母亲的眼光盯了我一辈子。”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注视下是幸运的，是充实而强大的。这母亲也是他的大地，他的民族。

所以，他的内在稳健专一，树立了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不为当世的浮嚣所动，使淫丽夸饰的风气也难以近身，保持了大家的严格和恬淡。这是秦先生能获得普遍尊敬的主要原因。虽然他走得太匆忙，但他走得气度超拔，神风卓萃。

1983年秋天，先生写完长篇小说《大地》之后，曾即兴向我念了一首打油诗：

莫道人生易老，苦辣酸甜味好；
且喜大地多情，天涯处处芳草；
若无酷暑严寒，哪得绿溶春草；
白头犹自繁忙，只因吐丝未了；
回头无愧于心，始可安然定稿。

秦兆阳先生安息。

1994年10月29日

原载1994年11月21日《羊城晚报》

读画诵诗哀哲人

——悼秦兆阳同志

郑秉谦

妻子住院动大手术，一个多月来，我每天均在病床前度过。今日回家，偶翻积下未阅书报信件，始知秦兆阳同志已于十月十一日去世，我不觉泪流满面。

五十年代前期，中国作家协会通过《人民文学》与《文艺报》，大力发现和培养新中国第一批青年作家。这两个刊物的编辑们，甚至注意阅读各省报纸副刊，从中发现苗子。一天，《人民文学》涂光群同志从谢狱同志主编的《浙江日报》副刊上，看到了我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此稿经严文井同志拍板，便在该刊1955年1月号上转载了。涂光群同志后来说，当时“往往在《人民文学》上选载一篇小说，就等于推出一个作家”。这年12月，兆阳同志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上任伊始，便为此文写了《与人民在一起》，发表在这年最后一期《文艺报》上。不久，在难忘的1957年，他同我一道从文学界消失了。但此后20年，我一直带着知遇之情在挂念着他。

1978年，我终于又同他联系上了。从此开始，他不断将新著寄给我，把他的言志诗写在信里寄给我。1988年11月19日

书赠的,是后来文学界广为流传的那首步鲁迅原韵诗:“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欣逢绿柳春时雨,策马长途学健儿。”1980年2月25日书赠的则是“风霜催鬓发,日月暖心肠。不知年已老,但觉事情忙。”两首诗都表达了一个“虽九死其未悔”的作家,对文学对人民事业执着追求积极投入的可贵心态。

这十多年来,我每到北京,北池子二条二号是必去的地方。除其中一次与绍棠、一次与前辈康濯同去外,其余都是单人造访。每到他那个大而无当的书房里,我们便絮絮谈论人生,谈论创作,说旧日遭遇,说今天生活……从他的长篇力作《大地》杀青后,我发现墙上他自己的画逐渐多了起来。一次他莞尔而笑,说:“目力差了,用它寄托一点感情。”我是知道他早年学过画,参加革命后也从事过美术工作的。他学画的地方,就是我们杭州的“西湖艺专”(即今中国美术学院)。

1986年的夏天,我经北京去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养,他指着墙上重叠挂着的那些画,向我说:“你自己选一幅吧!”事出意外,我惊喜莫名,便认真地挑选了起来。我要了一幅尺寸颇大的风荷图。这幅画经裱后,多年来一直挂着,后来怕弄旧了才收起来。他画的是一池荷叶,被风吹得只见叶背不见叶面,其中有的已经破碎开裂,但仍劲立不折;万叶丛中,尚有一朵两朵已开未开的荷花,从容地露出一两点红艳。“你爱荷?”他问。“爱的是顶风而立。”我说。他会心一笑,若有所思。

1991年,我突然收到他从邮局寄来的一幅画。这次是风竹!画面是一段被狂风吹歪,却仍然坚韧不折的竹竿;竿上斜生一枝,枝上几片竹叶,虽偃蹇披伏却生机勃勃。它“冗繁削尽留清瘦”,咫尺却有拂云之势。每当我烦恼时倦怠时看到这幅画,都不由想起黄庭坚的题竹诗:“眼入毫端写竹真,枝掀叶舞是精神。”它以白当黑,风随竹出,笔在翠竹,意在顶风。这次,我初

闻他的噩耗时，双眼不由又转到它身上去。它的落款“老芹”仍那么黑，图章“兆阳”仍那么红，但作画人却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兆阳同志是作家中的铮铮铁骨。他不羨荣华富贵，只知默默地写作，作画，当编辑，作人梯。他自奉甚俭，在不少人已成了“公费出国专业户”时，他却屡次把出国机会让给别人。他坚持真理，绝不屈服于高压，更不趋附于权势。而另一方面他对人民，对后进作家，却数十年如一日，甘于俯首当牛。这有他的创作活动，编辑活动为证。80年代中期，他出版了他的文艺理论选集《文学探路集》，在他过去为后进作家写的多篇评论中，只选了上述《与人民在一起》一篇（集中改题为《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他事先曾向我说：“此文仍有现实意义，当今文学脱离群众成风。”他曾感慨地写过诗：“最应该记住的最容易忘记，谁记得母乳的甜美滋味；最应该感激的最易忘记，谁诚心地亲吻过亲爱的土地！”

郑板桥的题竹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唯其立根青山，以大地为依托，翠竹才能不为恶风所拔所折。这就是兆阳同志的一生写照。

1994年11月14日写于西子湖头

原载上海《文汇报》1994年11月24日

录自香港文汇出版社《留得枯叶听雨声》

失去的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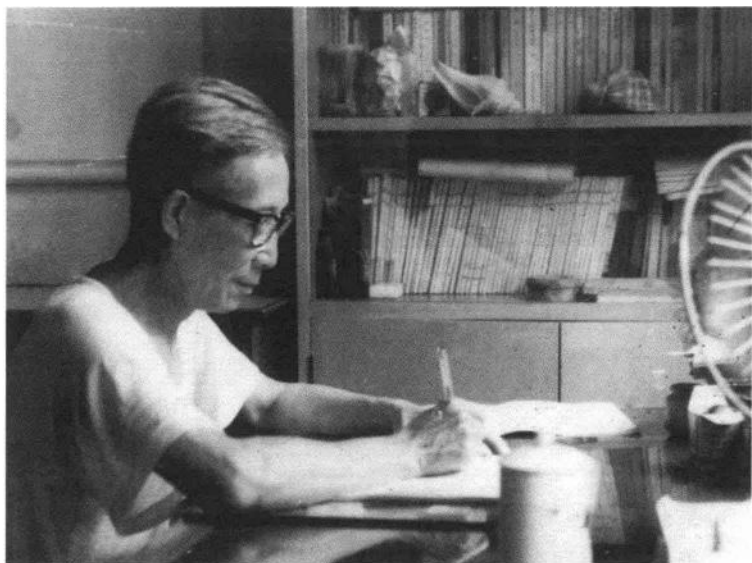
李国文

秦兆阳老师最近离开了我们，走了。

近年来，每届冬季，秦老都因屋旧且破，室温太低，犯病而经常住院，这对他来讲，每到冬天，便是一次生命的考验，实在太苦痛了。没曾想今年，终于未能熬过来，而与世长辞了。

当我获知这一不幸消息时，马上想起了失去的那封极珍贵的万言长信，那是兆阳老师在1979年为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写给我的。这真是我此生中最为悔之不迭的事情了，因为那是我“文革”后重新提笔的第一部作品。如果说1957年，兆阳老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改选》，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那么，1979年他的这封长信，给了我重新创作的勇气和信心。

这封信，随后就再也找不着了，而且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十几年前是怎么丢失的。兆阳老师认真地读完了那近百万字的原稿，然后用他那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的信，他的视力本来不佳，我的原稿墨色颇淡，这实在是使我觉得非常内疚的事。而后，他还伏案写了万余字的信，还找我去他那里谈了好几次，为了让我有一个能够安静改稿的场所，还把他的办公室腾给了我。



秦兆阳在家中给作者复信

当我捧读这封提携后进、循循善诱的长信时，被兆阳老师的人品文风深深感动。他鼓舞勉励有之，但又不失严格要求；而且没有摆出任何长辈架子，语气平和，态度恳切，甚至有一些显然应该修改的意见，也以商榷的口吻写来。没有训斥，没有挑刺；没有高高在上的老爷子感，更没有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老革命感，老作家感。他是良师，也是益友；他是前辈，但在文学上，视你为平等同志，他不炫耀卖弄自己的学问，但他是博大精深的，思路如泉，文采斐然，从这封信中，我获得很多教益。

当时，我意识到信的价值，因为不仅对于我，是再度创作的肯定，对于了解兆阳老师的品格，或者，对于文学界，也是难得的如此关心后辈的范本。那数万言的长信，集中到一点，就是满腔热忱地助年轻人一臂之力，使他成长。字里行间，无处不感到兆阳老师那颗无私至诚的心。但未过多久，这封原信就杳如黄鹤，

一无踪影。是被人借走，或传读中丢了，还是留存在出版社，或是兆阳老师自己又要回去了？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幸好当时，我曾把原信的大部，誊录到另纸上，以便在改稿过程中随时阅读。那时复印机尚不多见，要是原样复印下来，真该送给现代文学馆珍藏了。被我弄丢的这封兆阳老师的手书，在他乘鹤仙去以后，便成了我永远的心痛。

对于年长的文学前辈，都是要尊称为老师的，有的是礼貌，有的是客气。对于兆阳老师，是从心底里由衷地称呼的。但他也是唯一正正式式地对我说过：“不要这样称呼，以后，国文，你就叫我老秦，好不好？”这是1980年在东四旅馆，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座谈会上的事情。但要我称呼他“老秦”，真是很难张口，我后来把这两字颠倒了一下，他笑着答应了。在我的文学道路上，得益于前辈之处很多。抗美援朝的时候，在前线坑道里，多少次听杨朔先生的谆谆教诲，称得上是我的文学启蒙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茅盾先生能在那种政治气候中，为一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说上几句好话，也是令人永志不忘的。在此以前，我还曾向碧野先生（那时，他是铁道系统的作家，我也在铁路上工作）写过求教的信，他也回信勉励过的。有一次碰见碧老的女婿，还说过这件往事，但我想，年事已高的碧野先生，怕记不得50年代初一个文学爱好者求知的信了。还有韦君宜先生，从《文艺学习》起，她的全部精力，就是在关注文学的将来，无时无刻地在为后来者铺路。当我不知深浅，抱着将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她说，她还记得50年代有一个写《改选》的青年。她的话，无疑为我的小说开了绿灯。在此以前，秦兆阳、李清泉两位老师，还有刚从新疆回来的我的同辈人王蒙先生，都在关心我的下落，每当回忆起这些，我的心总是很暖很暖。

被人惦记着，总要比背后被许多人指指戳戳，不以为然而为好。

其实，我这一生是努力循规蹈矩，不触犯任何人的，但不知为什么，总不能见容于个别文学前辈。我不能忘记一位从解放区来的大作家，得过国际大奖，是怎样残忍地把我一棍子打死，一劫不复二十有二年。话说回来，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占多数，文坛也如此，这是规律。固然个别爱咬人者不少，但牙不痒者更多，一想到这里，我为我有机会受到这些前辈的照顾，而感到幸运了。

直到兆阳老师去世的最近，我还听到柳荫先生谈起的一件往事。70年代末，秦兆阳老师从广西调回北京，一些文学界的朋友聚会，兆阳老师特地谈到了他因为修改了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使之受了无妄之灾，以及发了我的《改选》，几乎毁掉我的一生，是他最为痛心和歉疚的事情。听他说到这里，历经二十二年磨难，已经流不出太多眼泪的我，也觉得眼里热乎乎的了。

这时，我更后悔我失去的那封兆阳老师的信。兆阳老师离开了人世，但他文学上的成就，他《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生命力，将会永存。除了文学上所创造的业绩外，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对后来人的提携之情，那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风范，确实是令人高山仰止的。这世界所以美丽，就是因为这世界有许多好人，而在我一生中所认识的好人当中，引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兆阳老师，是我最最难忘的了。

原载 1994 年 12 月 3 日《光明日报》副刊《周末文荟》

耿介一世人

——悼念秦兆阳

陆 地

秦兆阳，一代作家，终也放下他生花妙笔，撒手而去了！

痛定反思：人，耄耋寿终，生命的必然归宿，人世的哀荣。何况一个作家身后能有如此丰富多彩、抚慰人心的真正文学著作以及璀璨可观的书画，金石，按说应当“死去何足悲”的了。

然而在我，枉与知交于忧患，相濡以沫，情深谊重，非同一般。乍闻噩耗，顿为沮丧，不禁口出悼唁：

文章千古事，耿介一世人！

人说，长歌当哭，我这谨挽短联，遥奠故人，不尽千言万语。

我想起他在一九八九年的《新文学史料》上连续发表《回首当年》长文。叙述他早于一九三九年春，从陕北公学和华君武、辛莽等同学得到学校组织的保送，进鲁艺美术系学画。这期间，打心眼里，一厢情愿，偷偷看上一位窈窕夺人的图书管理员。每天端只听课用的小板凳，坐到图书室窑洞门前的坪地画素描。这竟使我忆起那时节，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着了魔似的，三天两头尽往图书室跑。惹得那位美人儿诧异，问我：“你那样喜欢屠格涅夫的书，是不是真要研究他呀？”在她，哪里猜得到，我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而在我,也没想到,正在此刻,竟有位学美术的人也在把她看作蒙娜丽莎。

可见我们在那时候,就该成为“有共同语言”的跨系同学朋友的。可惜,那段日子短,秦兆阳他便和大部分同学一道,由副院长长沙可夫等老师率领,开赴华北前方建立华北联大去了。失之交臂,彼此也就未能相识。

等到认识这个名字,已是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了。那时,我在哈尔滨、沈阳等地的东北局《东北日报》社编文艺副刊,就便能看到关里来的华北局的《人民日报》,不时读到带股清新气息的《农村散记》系列短篇。秦兆阳这个陌生的名字,俨然成了引人瞩目的文坛新人。

建国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宣部为振兴、繁荣新中国文学事业,从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全国各省市,借调为期一年的第二批作家、诗人集中北京,学习短时间的政策文件,然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统一分派去部队,去各地工厂和农村,深入体验生活。要求这批多少具有全国水平而较有把握拿出作品来的作家,领头创作一批反映新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当时从各个实际工作岗位能够暂时调得出来、集中于中国作协宿舍小羊宜宾胡同学习的,记得有:北京的艾青、卞之琳、赵树理、秦兆阳、路翎和束沛德;天津的孙犁;武汉的李季、孙峻青;成都的邵子南、戈壁舟;沈阳的罗丹、崔璇(女);广西的陆地;贵州的邢立斌,等等二十多名。

直到这时,在学习讨论会上,我才初次见到这位《人民文学》编辑的庐山面目了。

他,瘦长身躯,一脸深沉、凝重、寡言;常爱侧身枯坐于不显眼的地方,不惯,或不肯在人前抛头露面。

跟他虽近在咫尺,却因彼此矜持拘谨,始终没谈过话。所以到此,仍旧不了解他起初是学版画的,曾同古元、彦涵和钟惦萑他们一道,在鲁艺学习过。而且有幅初作的木刻,为周扬主编的有全国影响的《文艺战线》采用于第四期的封面。

这之后,他重返河北农村,深入他在抗战中生活过的旧地。一年后,由于他的才华加勤奋,果然有了收成,比我们一批人领先拿出长篇《在田野上,前进!》。作品,体现了“合为时而著”的政治思想要求;作者,借此一跃而知名于文苑。

令人悲哀的是,稍后不久,一篇署名何直的专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作为《人民文学》的头条发表。其立论对当时正统的文艺思潮,多少带点顶风逆鳞的犯忌意味。但料不到这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骤然来了一九五七年那场风暴,这就无异雪上加霜。文章被指责为右派进攻的号角,作者的桂冠,就此变成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于是,放逐柳州,被安排到郊区的机械厂劳动改造。两年后,“右派”帽子虽然得脱了,党籍却未得恢复。抑郁的情绪,老缠住他不放。

一九六〇年,农垦部长王震将军来广西视察,特向区党委书记韦国清转达:说临来,周扬请他就便过问一下秦兆阳下放广西的情况。说如已脱帽,工作,广西要是不便安排,拟将他调回北京。

这时,也只有这时,区党委才要我代表组织,找秦面谈。这才成为我和他交往的开始。组织的意思:以为广西人才欠缺,诚意留他在文联做专业作家;借重于他,以影响、带动青年作者队伍的成長。他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觉得回京,生活虽好,但工作上,想想,自己素性落落寡合,特别是,跟某些人实难相处。一旦回京,只怕陷于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尴尬境地。犹豫几天,最后才同意将妻室子女接来,落户于当年柳宗元

羈身之地，甘心做个柳州移民。

兆阳到底是位才气出众的作家，随手即有表现城市青年生活的短篇《一封拾到的信》问世，告慰读者对他沉默几年的期望。

翌年，正当大跃进的余波未消，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也不免染上营养不良的肝炎疾病，去到柳州羊角山医院，住上享受特殊待遇的高干楼房，借助于食物疗法。这时，恰遇秦兆阳正闹十二指肠溃疡，也需饮食调理。于是为他特向老红军院长商量，幸得慷慨允诺，破格准予住我隔壁做伴。从此，我们两人有了进一步交往的机会。早晚一道散步、聊天，消磨惆怅的时光。

养病山林，借得空闲。我便应《人民文学》约稿，试探写起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短篇《故人》。另外，日夜思索，构架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瀑布》的工程。兆阳他则或不时应付机械厂编写厂史的工友们来求辅导，或尽日埋头苦读《鲁迅全集》，或随意磨石、刻印名章。再不，就是闷声不响、也在悄悄创作反映抗战前后的河北农村风情的史诗长卷。雄心勃勃，发誓要为中华民族争口气。私下对我讲他自我许愿，不信写不成《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巨著。为了先睹为快，我向他要来已经写出开头十多万字的初稿看看。那里头，见他描绘华北农村的场景和刻画的人物面貌，好歹都觉似曾相识，可读、可信。因而鼓励他拿给《广西文学》发表，探听更多的读者的反应。他却谦虚：“你说可以吗？只怕我现在这样身份，居然敢写长篇，别人会怎样看呢？”在他，这种过虑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我却不以为然。好在《广西文学》主编肯听我的推荐，也就敢把它连载出来。原来草稿的篇名叫《不平的平原》，作者可能多虑，唯恐“不平”这类字眼，对当时的风气太刺激，改成《两辈人》。到八十年代出书，又定名为《大地》。是预作多部头的首卷。至于后面的

部分,或许后来作者心情有了变化;或许身体欠佳,力不从心;或许专注于《当代》的编务而分了精力,迟迟不见再有续部之作了。

这,对其本人的文学生涯,不能不是令人痛惜的遗憾,对中国文坛,当然是一笔难得补救的损失!

回想在羊角山的日子,白天,我们各自闭门不出。黄昏时分,照常结伴徜徉于林下村路,闲话逸闻,往事:臧否人物,感叹人生。

某日,雨后斜阳,虹挂林梢,天地清新。饭后,和秦依旧踽踽村道,也许是如同俗语说的,“伤心人别有怀抱”吧,彼此沉默半天,等到路尽转回,秦才开口倾诉他憋了多时的心曲:说那回,我向他传达王震对韦国清打听他的事,恐怕未必真是出自周主动托王对他的关怀。说某年,他曾同王住北京医院而相识,王对知识分子是特别爱护的。可能是王拿他个人自己对待成了右派的艾青那样照顾的心情,临来广西之前,特意向周提起他的。

一场十年历史闹剧,终归落幕了。

秦兆阳不变初衷,再作冯妇。组织上尊重他的作家专长,派去都安县辅导一个写作小组,体现“三结合”集体写作一部反映山区农业学大寨的长篇。柳州的同行真诚仰慕他的才气、人品,极力挽留他定居下来,做个现代的柳宗元。

但在秦本心,以为柳州棺木虽好,却不情愿“死在柳州”。因为妻子儿女都已回京,而且自有独门独院的旧居,足以避风雨。

这事,从我个人的工作着想,为了发展、繁荣广西文学事业,理应把秦挽留下来的。但在感情上,对秦的苦衷却深表同情,也觉得他的舞台应当在首都。

一九七八年我去京出席筹备恢复全国文联会议。见到昔年

的广东省一师同学陈涌。他老兄也是一九五七年和秦同命，下放于兰州。如今幸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照顾，借调回京，工作于“鲁编室”，从事《鲁迅全集》重版的注释。于是，灵机一动，联想秦的去留，觉得大可如法炮制。即去会见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代秦走人情，说要是北京对他予以关照，借用于他，我们广西可以放行。幸好韦系秦的华北战友，欣然同意，先用借调办法，人能回京再讲。

不久，历史的错误终于全盘得了平反。

由此，秦最终结束了长达二十个春秋的逐客生涯。回京后，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创办、并兼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主编。一九七九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听熟人来信，秦回京，逢人便说：在广西二十年，要不是遇上我这个与人为善的大好人，当他正在受煎熬的考验时刻，敢于伸出手拉他一把，他可真是不可能有“死去活来”的今天这样平安的晚年了！

为了表达他的感激吧，特意给我画帧而且裱好的墨竹，还题上五言四句：

南国有绿竹，意趣超凡俗；

清风金石声，不计荣和辱。

这，与其说对我的过誉，倒恰恰是他本人情操的概括啊！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南宁

原载 1995 年第一期《当代》

吊兆阳同志

涂光群

秦兆阳终于离我们而去了。在他逝世前一个多月，我领一个来自异国远道的朋友前去看望他。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肉体很痛苦，几乎难以进食，没有力气说话。但是他的头脑仍然很清醒。当这个久别的、远隔重洋的，一九五七年的受难者在他耳边低声向他致意时，他们两人的手紧握在一起，他睁开了眼睛，连说两声：“你好！你好！”——这就什么也无需说了，他是认得她、记得她、理解她的。这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朋友顿时眼泪夺眶而出。

一个人离开人世时，他总要给世界留下一些印痕，一些可纪念的东西，精神的、物质的，否则这个人在世间的匆忙存在，便没有多少意思了。而秦兆阳留下的东西，分量是很重很重的。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的革新者、倡导者

秦兆阳一九一六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家庭，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富有正义感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屈原、鲁迅的传统。他始终是一个探索者、追寻者，一个思考

型的文化人。他起初爱好的是美术、诗歌,后来立即投身到民族救亡图存、人民求解放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中。在战争后期,他放弃美术,转而从事文字工作。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解放区颇有名气的一位青年作家了。然而他并没有当一名专业作家,而是服从需要,马不停蹄地投入新中国第一份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筹建。随着《人民文学》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创刊,他成为一名职业的文学编辑。他 不免相当长期抑制了想投入新的生活、投入创作的巨大热情。在编辑岗位上,他仍然是个不倦的探索者、思考者。他一方面大力支持那些真实地描写了生活、讴歌了创造着新生活的人们的作品,这既有孙犁、马烽、康濯、方纪等等那些成名作家的新作,还包含披沙拣金,推出一批新人如孙峻青、白桦、玛拉沁夫、寒风、陆柱国、石果等人的小说。同时在阅读大量来稿中,他发现并思考着一个关系文学创作成败的大问题,即简单地配合各项政治任务,直至图解政策的提倡,造成文学写作中大量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既不尊重生活真实,又不尊重艺术和艺术规律的倾向。这一倾向继续下去,不仅对于初学写作者而且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今天和未来,为害甚烈,后果堪忧。于是他在编辑工作之余,暂时放下了他喜爱的创作,而写起了读稿札记。他从来稿中无数的实例出发,归纳那些最常见、最普遍的毛病即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并分析其根源,深入浅出地正面阐明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艺术规律,忠实于生活真实的规律,个性化的规律等等。这用“策”或“秦策”的笔名,日积月累一篇又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文章,对于全国广大的青年业余作者真正进入文学创作之门,起了及时、切实的导引作用。这些最早地揭示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创作危害的文稿,表明了作者锐敏的洞察、思考力,对文学写作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坚持,对我国文学创作健康生长、发展的热望。这些读稿

手记在成书之前早已不胫而走，被一些地方文艺刊物或文艺团体印成小册子，向青年投稿者广泛散发。

秦兆阳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坚持、倡导和革新，还表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他受命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执行副主编之时。那时，他在同编辑部同志的谈话中，鲜明地反复地提出了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和评论应坚持古往今来文学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和革新的精神，即反映历史的趋势，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不是回避，而是正视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支持先进和新生事物，批评消极现象和落后事物，反对腐朽事物；在作者方面，除了经常联系作家，尤应重视发现文学新人，他们处在生活的激流之中，所写作品往往具备健康、新鲜的气息……这些是改进刊物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刊物的现实性、群众性、战斗性。这些谈话的精神不久即写进他起草的《人民文学》改进方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和《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一九五六年秋）之中。现在回过头来看，秦兆阳实际主持工作的这一时期，是《人民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这时《人民文学》杂志无论在封面装帧、内容形式、栏目设置等方面确实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佳作纷陈，新人迭出，刊物的发行份数在一年多时间内连续增加了近十万份，首次接近二十万份，真正实现了秦兆阳所期望的现实性、群众性、战斗性。而最主要的是它贯彻了秦兆阳所体现的正确的文学思想和编辑思想，其核心是对文学现实主义的坚持、倡导和革新。像轰动一时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明镜台》等作的发表，其中有的虽然存在着某些缺点，当时也有一些争议，但对于刊物和中国的文学创作，的确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些新作家的作品，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时代复

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人民建设新社会的热情、积极性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等不良思想作风之间的矛盾,它们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读者热烈的欢迎(《人民文学》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即是个证明),评论界不少人也给以好评。但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中,它们都被错误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横遭批判。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它们成为“重放的鲜花”。最重要的是,它们并非像当时某些批判文章所指责的那样,仅仅是消极地“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阴暗面”,而是积极地正视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矛盾,批评或揭露是为了求得矛盾的可能解决,推动现实前进。这正是主编人秦兆阳所一贯坚持的。这些作品既是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革新之作,给文坛吹进一股股清醒、清新之风,也是坚持革命理想之作,它告诉人们,现实并非处处山花烂漫,还有荆棘:社会的进步,仍需要人们不断付出艰巨努力。

秦兆阳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倡导、革新和思考,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他留下的那篇大著《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是他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的产物,包括考察、思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文学中某些消极现象和经验教训,如某些教条式的文学理论,某些作品对现实的粉饰(“报喜不报忧”)等等。他数月酝酿。数易其稿,又听取文学界一些人士的意见而成定稿,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将该文在《人民文学》发出。这篇论文,虽说仍存在一些缺点或不足,但对于作者从五十年代初期即已开始的对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的批评和现实主义问题的思考、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个可喜的突破,一次大的飞跃,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这篇论文的写作、发表,表明作家兼编辑家、理论家的秦兆阳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成长发展,热切地鼓与呼,甚至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安危。这既表现了

他的胆识与理论勇气,也见出了他的人品、文品,这难道不是屈原、鲁迅精神的继续吗?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他在文中绝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文学,而只是在现实主义这一重大的文学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表达了他经过一番研究、思考的一家之言,以参加当时党所积极倡导的百家争鸣。即使某些看法有不周全之处,毕竟属于学术范畴的探讨、研究、批评,难以归结到政治问题上去。但在“左”的指导思想已占上风的年月,秦兆阳文章的冤案还是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并且他本人为此付出了二十多年惨重的代价。“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曾被定为所谓“黑八论”之一。

秦兆阳对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开拓、倡导和革新,其最后一个成果,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参加创办并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十几年来的出刊史已经表明,它是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大型文学杂志之一,好就好在它始终不渝地坚持现实性(也可以叫做当代性或时代性)、群众性,始终不渝地反映历史的趋势、时代的大潮和人民群众的心声,这正是它的主编当年主持《人民文学》刊物时的文学思想、编辑思想的继续、发展。我认为文学或文学刊物如果没有当代性(或现实性、时代性)也就没永久性了。任何文学,不管它属何种流派,都是现实、时代的产儿,都有它的当代性,失去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具体的文学生命。至于群众性、战斗性,也和当代性、现实性分不开,只有及时地深刻地反映时代、历史的呼声、人民群众的心声,文学或文学杂志,方有长久的生命。

总之,对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倡导、推进和革新,这是秦兆阳作为一个作家、编辑家、理论家杰出的贡献。我认为他通过编辑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推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发展、兴盛,其成就,甚至超出了他本人在创作方面的

贡献。尽管我无意贬低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可观成绩。

清贫、守本

我见到的中国当代著名文人中，清贫、守本者，莫过于秦兆阳了。清贫、守本，还加上敬业、乐群。在他的身上，我似乎常常看见他父亲，一个清贫、守本，敬业、乐群的穷教师的身影。这正是中国那些正直、高尚的文化人一贯坚持的品格，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们以自己的德行、学问，赢得人们的尊敬。

从我认识秦兆阳起，他就是住着北京普通的平房，直到他去世。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他住在《人民文学》办公院的两间东屋，家属则住在前院偏西的南屋。他的住房兼办公室都不大，下午西晒难当。他在这里改稿，作文，接待来访作者。家属住房则阴暗，少见阳光。那时他已是作协领导成员之一（党组成员），可是从未见他要求改善自己的住房。

后来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套不大的四合院。可是不久，他即被打发去广西长期劳动改造，自然无法享受住四合院最好的北屋。“文革”期间他的房屋被四周的群众长期占有。落实政策后，很晚了，这些人们才迁出。七十年代后期，我去看秦兆阳时，他是住在平房院后边一间临时搭盖的简陋小屋里，真可以叫做“柴房”了。他就在这间小屋里读书、写作，接见客人。其后，长久地，他的书房一直是平房院最后一间最阴冷、潮湿的房屋。除了出去晒太阳、散步，秦兆阳一天大半时间是在这间房里。这间房冬天尤其阴冷，即便是烧个炉子，也难以保温保暖。秦兆阳已是有了把年纪的老人，长期住在这里，显然对他的身

体造成了损害。他原来就有较严重的胃病,逝世前数年又患了哮喘病、心脏病等等。可是一直未见他住房条件改善。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当代》杂志主编就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他逝世。他在这间屋子里主持《当代》杂志的编改,看稿、处理稿件。晚年视力不行了,更多的时间,则是画画、写字,完全过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简朴的书斋生活。但他的格调是清高、高雅的,他喜欢画老梅、劲竹、苍鹰,“醉甘露、舞长风”的荷花,或是长河,大川,这正是他清贫、守本,自我完善人格的体现。

安息吧,兆阳同志!

1994年11月16日

原载《当代》1995年第一期

怀念秦兆阳

李宝靖

生活中有些事情竟那么相似，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因主张改革，失败后被贬到柳州，当代有影响的著名作家秦兆阳因为写了一篇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被打成右派，也从北京下放到柳州。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从秦兆阳的作品中去吸收艺术营养。他是我尊敬的作家。1960年我和潘荣才到柳州机械厂组稿，很想去看望他，厂里政工处的同志不同意，只带我们到厂工会会议室从窗外往里看，只见秦兆阳站在桌边写大标语，他原来是学美术的，字写得好。看到秦兆阳写标语的样子，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个蜚声当今文坛的作家竟然沦落到在工会写标语，命运之神实在太委屈了他。

1961年我到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做干事，那年的11月秦兆阳脱掉右派帽子。当时王震同志到广西，他跟韦国清同志说要安排好秦兆阳。陆地同志当时是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协广西分会主席，他钟爱人才，便通过组织把秦兆阳从柳机调出来，安排他住在柳州市委干部宿舍里。他爱人张克从北京调来，安排在柳州某中学做校长。因此我和文联秘书长蓝鸿恩曾随陆地同志专门到柳州去看望他，了解他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创作打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秦兆阳在广西都安参加《穿云山》创作组

算。秦兆阳对领导的安排感到很满意,并说他在抗日时曾在晋察冀边区生活战斗过一段日子,熟悉那里的农村生活,很想写一部长篇。

作为作协干事,我是为作家们服务的。从此,我有机会和这位我尊敬的文学前辈接触,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1962年秋天,作协主办我区少数民族、工人青年作者文学讲习班,我写信请他来讲课。他欣然应允,把长篇写作搁下,从柳州来南宁。我安排他住在明园一座幽静的小楼里,他一住下就向我了解学员们的情况,写作水平,要谈什么问题,安排多长时间。然后,他在花园小径里边抽烟边沉思作准备。

学员们听说秦兆阳来讲课,喜出望外,他讲课那天,工会培训班的老师,《广西文艺》编辑部的同志都来了,教室里挤得满满的。

秦兆阳熟读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学识渊博,又经过长

期的战火锻炼,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他讲得十分生动。他通过古今中外成功作家的经历,谆谆告诫青年写作者,一个作家要想有成就,首先要熟悉他的时代,他的祖国,熟悉人民的生活,要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观察生活,然后才能从生活中发现有意义的主题。他善于把思想、生活和艺术三者糅合起来,对作品作具体的分析;又以自己的作品的某些情节谈如何把生活的素材变为艺术形象,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具体生动,使学员们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他讲了两个上午,学员们尚不满足,要求他再多讲一些。我下午到他的住处,向他谈了学员们的要求。我知道秦兆阳十二指肠溃疡,不能过分疲累,我说:“你身体不好,如果吃不消就不讲了。”他笑笑,高兴地说:“学员们都是初学写作者,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我再讲讲吧!”后来,他又讲了两个上午。

秦兆阳对初学写作者的那种满腔热忱,使我深为感动。当年听过秦兆阳讲课的青年作者,现在不少成了我广西稍有名气的作家了。

此后,我和秦兆阳接触的时间更多了,有了更多向他请教的机会。我当时是个离开学校不久的青年干事,他是誉满文坛的作家,年龄的差距没有使我们之间有隔阂,因为他作风朴素,平易近人,襟怀坦白,待人以诚,从不摆前辈或名作家的架子,相反却像一个慈祥的长辈,非常关心人、体贴人。和他谈话,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艺术眼光敏锐,所以我经常抓住一切机会向他请教。一次他从柳州回南宁开会,住在国旅,我去找他聊天,谈了我替当时百色地委书记赵世同写一篇访苏散记的经过,我和赵世同从早到晚生活了一整天,他对群众的体贴关心,和群众的亲密关系,使我肃然起敬。秦兆阳听后高兴地说:“你就写革命老前辈与群众的亲密关系,一个地委书记在群众中就

像鱼生活在水里。你把经过写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末尾加两句即可：想起和赵书记生活的一天，心里感到满当当的。”我于是以那些生活素材进行加工，写了《长青的松树》，发表后反映尚好，后来收入了《广西短篇小说选》。

我有一篇作品，北京一个出版社拟选用，我想在收入集子之前进行修改，我把它寄给秦兆阳，请他出点主意。很快他就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为我的作品修改设想了许多情节，谈得很细致，甚至有些人物对话都设想了，他还谆谆告诫我：“如作修改，当然篇幅要长些，有的地方要展开，但切忌啰嗦，以免反而改坏了。”“所有这些只想引起你思考。”我读着这封长信心中涌起一股激情，心想秦兆阳正在写长篇，他的时间是宝贵的，竟然愿花那么多时间去看我的作品，花那么多时间替我去设想多种情节，又花那么多时间给我写信，这不是一般作家愿意的吧！秦兆阳就是这样一生无私奉献，甘为人作嫁衣，以帮助文学新人取得成就为自己的最大幸事，他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一位热情而细致的园丁。

秦兆阳对人热心快肠，对自己严格要求，完全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1962年他摘帽之后不久，领导希望他在刊物上发点文章，以告读者他已复出。我于是写信给他，请他在构思长篇之余，写一两个短篇在《广西文艺》上发表。不久，他寄来了两个短篇，是写工厂老工人为大跃进作贡献的。他信中说，虽然生活在工厂，但当时很少跟工人群众接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不够熟悉，加上多年没动笔，现在写来，感到没有把握，你看能不能发表。看了他的信，深感秦兆阳的谦虚、诚实，一位大作家对我这个年轻的小干事也如此尊重。从此，我对他更敬仰。他寄来的两个短篇我和编辑部的同志看了，认为没有超过他以前的作品的水平，显然他对工人生活不够熟悉，我们想还是不发为好。我

给他去信，他来信同意我的看法。大约过了半年，他给我寄来了《一封拾到的信》，写了一对年轻人朴实、真切而深沉的感情，他那纯朴、老练的文笔，巧妙的构思，使作品透出一股清新的气息。作品在《广西文艺》发表后，受到读者喜爱，引起强烈反响。

1965年，我和秦兆阳都在作协专业创作组，他对我完全像平辈或同事似的对待，而我对他像前辈和导师一般尊敬，于是我们相处融洽，便结伴下乡。我们一起到百色、凌云、隆林、田阳、灵川，这段日子，我们朝夕相处，谈文学、谈生活，每逢采访回来，就谈自己的看法，那些可作为写作的素材。我非常钦佩他观察生活的敏锐，他的见解给了我许多启迪。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在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就得到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前辈热情而细致的教诲。

秦兆阳对文学执著追求，不管所处环境、生活条件如何，都在孜孜不倦，刻苦写作。经济困难时期，他患十二指肠溃疡，饮食需要调理，陆地同志通过组织让他住到江滨医院，一边治病，一边写《两辈人》。当时江滨医院四周都是菜地，到盛夏酷暑，细小的黑蚊蚋很多，医院病房虽有纱门也无法防避，我每次去医院看他，见他两腿被咬得一个个红包。他伏在桌上写作，脚两旁点着蚊香，青烟萦绕，一股刺鼻的六六六粉味。对于一般人，像这样的生活环境都会感到懊恼，哪里还谈得上写作，秦兆阳却处之泰然。十年浩劫后，他回到北京，我曾去看望他。他在北池子的家，中间宽敞的明亮的一排，“文革”期间被某厂的工人占住，多方交涉就是不归还。他儿女都回来了，挤住在后屋里，他就在后屋前的天井里搭了间简陋的小房，仅放得一张床，一张桌，一个取暖的煤炉，他就这样蜗居斗室，写他的《大地》。他只潜心写作，从不计较生活的困厄。他生活简朴，吃的要求很简单。有一次我们下乡回来，很疲累，他在我家的躺椅上休息，我想弄点

好的东西给他吃，他说：“不用忙，我只要有稀饭馒头就可以了。”鲁迅先生说，作家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真是秦兆阳的最好写照。

秦兆阳虽然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却始终不改对党对人民事业的耿耿丹心。他被错划右派，取消了党籍，这使他非常伤心。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秦兆阳为这事哭了。他曾对我说：“我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把自己的生命、一切都交给党了，心感到有依托，1958年被取消党籍后，仿佛取消内心的依托，取消了第二生命，取消了灵魂一样。我为此痛哭过多次。现在摘帽了，我希望能恢复党籍，哪怕给我重新申请也好。你有机会就替我向领导反映。”我听后十分感动，他对党的亲情，对党的爱，溢于言表。于是我去找当时的文联主席郭铭谈了。郭铭同志说：“秦的问题是北京处理的，还必须由北京来解决，在广西谁也不敢定。”我将这意思转告他，他沉默地点点头，似乎理解领导的为难。后来，他亲自去找区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没有着落。1964年他亲自回北京去找有关领导，多方奔跑，没有结果。1965年春，我和他去百色地区采访，又谈起这个问题，他说：“虽然问题暂时没有解决，可我的心不能冷下来。”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文革”后期，领导派他去都安辅导一个写作小组，写一部农业学大寨的长篇，一去二三年，这要花费他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啊，可他毫无怨言。他曾说：“要是我能重新入党，我的心有多少热力可以发挥啊！”

秦兆阳正是这样一个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

由秦兆阳执笔整理写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1956年9月发表后，由于它联系实际，提出了不少切中时弊的见解，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时间，文艺界形成了一个以现

实主义问题为中心的百家争鸣的热潮。但这场讨论正在展开，就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广”文被打成大毒草，原来的文艺问题变成了政治批判。他也蒙受不白之冤成了右派分子。到“四人帮”时期，批判无限上纲，“广”文被升格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八大代表性论点之一。“文革”初期，他回来参加学习，住在我隔壁的小房里，一天我到他那里聊天，当时他很紧张，说这篇文章是经集体讨论，由他执笔的，原稿送给了几位领导审阅过，后来要他一个人担当责任，他成了历史的罪人。因为这篇文章他在十年浩劫中受了不少罪。

1978年落实政策，秦兆阳回到北京，1979年7月，我们《广西文艺》发表了刘名涛写的《在实践的检验下——〈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辨》，为他的文章正名。1980年我去北京开会，到北池子看望他。他十分高兴地问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他告诉我他过去的冤案都已平反，党籍恢复了，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主编。那天他心情特别好，我们一起从北池子经新华门大街沿故宫护城河散步，边走边谈，末了他高兴地说：“你能喝啤酒吗？我们找个小馆喝两杯去。”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情为什么这样好，因为他又回到党的怀抱，又重新获得了第二生命，心又有了依托，他心里积存的许多热力得到了发挥。正如他在广西时写的一首诗所写的：“若逢柳绿江南雨，策马长途学健儿。”我问他的写作打算。他说把《两辈人》的下部写完后，打算以《大地》为书名出版，然后写一些往事回忆的散文。

秦兆阳长期受“左”的迫害，浪费了他许多宝贵时间，到了晚年，仍然勤耕不辍，又写了《风尘漫记》，篇篇字字，饱含真情，优美高洁，发人深思。

毕竟年岁不饶人，1986年8月，我去北戴河参加编辑读书班，路过北京去拜访他，他明显地衰老了，他说由于长期伏案写

作颈椎增生,眼睛也不好用了,闲时就画画写字刻图章,前屋占住的工人搬走了,后屋成了他的画室,他领我到画室去,只见四周墙上挂满了他画的画,有竹子、君子兰。他说也要到北戴河读书班作讲话。

我先到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住了几天,秦兆阳和爱人张克来了,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俩夫妻都在广西生活多年,很关心广西文艺界的情况。

秦兆阳在学习班上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文艺界有些人把外国作家摒弃的东西捡来,刮起一阵阵“风”。许多编辑感到迷惑。秦兆阳强调刊物不要跟“风”跑,要突出时代性、现实性和群众性,要在刊物上体现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他的讲话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更坚定了自己的办刊方针。

后来,我们一起游了秦皇岛、山海关,在龙回头照了相。

1993年11月底我出访路过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寒气袭人。我到北池子秦兆阳家,只见张克和儿子在。张克说:“老秦现在病多,家里的暖气是自己装的,温度不够,只好住到海军医院去过冬。”我看客厅里的土暖气,又旧又小,室温很低。看到他住房条件如此恶劣,心中有点凄然。本想去医院看望他。张克说:“海军医院离城远,要转两趟车。”因为我第二天要离京,没有时间去看他,不想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了。

秦兆阳的作品人品都堪称楷模,他的作品将彪炳文坛,他的精神品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4年12月

哀念秦兆阳同志

古 立 高

老秦呵,我真想痛痛地哭你几声。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几天来,回忆着你这几十年的经历,心沉沉的,难于安枕。生死乃自然规律,我们谁也不畏死;但死者撒手而去,活着的人怎禁得住这难忍的悲凄!

肺气肿这种病,如果生活条件好一些,还是能够对付的,而你却没有这个条件。多年来,你住在又潮又冷四面透风的平房中,解手还要到院中去蹲坑。冬天一到,冷风猛烈地刺透你的全身,半个小时还缓不过气来,在房中工作还要穿棉衣(有时还要披上大衣)。孩子们建议你向机关申请住房,你不肯开口。孩子们擅自向组织讲述了你的困境,组织上答应研究,后来说党组决定给你解决两间楼房。你耐心等待着。去年冬天你设法住进了海军医院。我去看你。你说,要争取在医院熬过这个冬季;机关如果不能付出住院费就自己付,要争取多活几年,还有许多事要做。我真为你着急、难过。讣告说,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是的,老秦,你的一生虽然坎坷凄楚,却是轰轰烈烈的。

你是旧社会的叛逆者,青年时期即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参



1952年，秦兆阳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那一年，他与古立高是同事

加抗日活动，游行、讲演，作文，画画……后来你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又拖着羸弱的身躯冲向敌后战场——晋察冀边区。在血和火的斗争中，你与广大群众一起，出没在青纱帐、坑道里，日日夜夜和敌人周旋，将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坚强战士、农民的知己，为你尔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46年有了出版条件，你就拿出了你的第一批成果：《路》、《俺们毛主席有办法》等小说及一些诗

歌和剧本。你的作品在文坛上吹起了一股清风。尔后你又陆续拿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精品：《老头刘满囤》、《炊事员熊老铁》、《歪脖子兵》、《幸福》等等。你的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获得了第一届儿童文学奖，远播海内外。1953年出版的那本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把你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把你和康濯誉为描写农村的能手。

你担任《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力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将大批作家和文学青年团结在刊物周围。你既创作又写评论文章，四面开弓，八面作战，批评公式化、概念化，批评狭隘的极左观点，提出广阔的现实主义创作

道路,主张真实地反映生活……这怎么能不赢得广大作者和读者的赞扬和拥护呢?于是,你又担任了《文艺报》的执行编委,被选为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

老秦啊,还记否?《人民文学》创刊之时,我们不仅在一个办公室,又都住在办公楼后一排小平房中,日夜相处,无话不谈。你大我七岁,你是兄长、学长、师长。你对我的帮助和提携,我怎敢相忘?我看小说稿,每每向你请教,你总是诲人不倦,那么谦虚而又热情;我每写出一篇作品,也是首先求教于你,你总是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于我。1956年,你身兼数职,已忙得两脚朝天了,仍开夜车读了我那五十六万字的长篇《屹立的群峰》原稿,并细心地提出修改意见。我怎么能不怀着无限感激之情想起这一切呢?你深知培养后进,是关乎革命大业后继有人的问题。你的责任心驱使你以久病之身,吞服着小苏打,咀嚼着馍馍干,用枕头抵着巨痛的胸口伏案工作,为人改稿,这使我想起焦裕禄。人人都看得见,你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你是十分敏感的,但你绝不是那种看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人。你对是非曲直态度明朗,对丑恶的事物疾恶如仇,但你总说自己太脆弱,不讲难受,讲呢又有顾虑,最终你常常还是按捺不住。而这一切你全不是为了自己,可是,你却无端地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广西劳动改造,一去二十余年!

老秦啊,1958年我虽然也陷入冤狱,但我却难以忘却你、舒群和公木这些解放后我各个时期的搭档。四人帮倒台以后,我们又相聚了(公木做了东北大学副校长没有回来)。老秦,你是显得更加衰弱而且衰老了。我请你们来家小酌,我们发誓为了党的事业,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余生。在这之后,人人都看到的,你和舒群都写了大批高质量的新作,而且雄心勃勃,以古稀之年做着最后的冲刺。你完成了长篇巨制《大地》;舒群也出了

《毛泽东的故事》合集。

老秦啊,1983年我六十岁生日时,向你求画,你寓意深沉地画了一株老梅。在那粗大的树干梢头冒出了新枝,在那新枝之上绽出了朵朵火红的梅花。你以此激励我继续前进。我把它挂在我的房间,日夜为伴。我要把它作为座右铭,秉承你的精神和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最后一个细胞破灭!

原载 1994 年 12 月 12 日《光明日报》

永远怀念秦兆阳同志

杨桂欣

秦老，您走了！我知道，您是很不愿意走的，人世间给了您那么多的坎坷和劫难，但您仍然深深地挚爱着人间，挚爱着生活，挚爱着您所从事的工作——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编辑和出版，还有为她的发展和繁荣所须臾不可或缺的理论探索。您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凭着您思维的更加敏捷和深邃，您是可以把这许多事情再干一番的，再创辉煌也大有可能。然而，您终于还是走了，不是撒手而去，而真是恋恋不舍啊！

秦老，您走了，您是准备悄悄而去的。这，我知道，完全符合您的性格特点，是其逻辑发展的势所必然。您一生不愿喧哗，更何谈什么自我张扬，自我吹嘘更为您所不齿！1980年秋天，我在一篇文章中称您为著名文艺理论家，您得知了，便马上给我写信，约我面谈。您很恳切地告诉我：您读书不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读得更少。写一点理论批评的文字，那完全是从生活和工作的实感出发的，是从创作实际考虑问题而成的，难于引经据典，想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可是，实在力不从心呵！我说我就是佩服这样的理论家而不赞成掉书袋、言必称希腊之类的所谓理论家！从实际出发引出理论，再让这理论回到实践中经受检

验,求得发展。怎么不是理论家!您50年代论公式化概念化的文章,至今还有不少学者提及和引用,岂不也成了经典!遑论那恢宏的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啊!……说着说着,我便慷慨激昂起来。您没有正面批评我,也没有表示不高兴,而是用平静来抑止我的激动,不无幽默地对我说:“现在有一种时尚,动不动就称某人为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作家就是作家,发表作品就得署名,文责自负嘛。如果碰上谈错别字的,把著名读成署名,那倒很有意思,大家都因为要署名而都成了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这就势必还有不署名的作家、评论家,成何体统呢?著名之家满天飞,飞到哪里也难得有人知道你哟!”

秦老您想悄悄地走,这怎么可能呢?人世间连为您送行的事都不曾发生,那还算什么人世间,哪里还有人性和人情!您的儿女们只是应至亲好友的要求,送您之前打了个招呼。结果还是来了一百多人。献给您的挽联中有云:“著述编纂堪称国宝,立身处世实为楷模”。我以为,这还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您为人的特点的。战争期间,在华北平原,在抗日前线,您主动舍弃留在司令部工作的机会,而到敌我拉锯的村落里去,那里的斗争是最残酷的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呀!半个世纪过去了,那里与您同辈的老乡和他们的儿女至今还在念叨您,称赞您呢。80年代初,我为您通读《文学探路集》的初编稿时,发现其中有您《致路遥同志》的一封信,那是为发表他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写的。那时候我很粗心,没有问您为什么在发表这封信之际,开头要用“……”,这里删去的是什么内容?更没有打听这篇作品是怎样投到《当代》编辑部的。直到您病危的日子里,我才听人们说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曾经有过一段旅行过程,遭受的都是退稿的命运。只有到了您这里,它才成了珍宝,使作者更加自由地驰骋于文坛。而您在这封信里面,

虽然喜悦溢于言表,但更多的则是严格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对文学创作的既传统又崭新的追求。这封信,不只是有益于年轻的刚刚登上文坛的路遥(可惜他比您走得更早!),而且对于所有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人们,又何尝不是一种有力的激励和启迪!?

秦老,您走了,我未能为您送行,这是我后半生的一大遗憾。我是应当为您送行的,因为这十多年间,我对您的打扰太多,而您给我的教诲,则是有益于我这一辈子的。出差之前,我是很犹豫的,尽管此行可以一览黄果树瀑布的壮观,领略龙宫的鬼斧神工这大自然的杰作,还可以瞻仰遵义会议的会场以及娄山关的雄险,然而,我还是犹豫着,生怕错过了送您远行的机会。最终,我还是出差了,因为我考虑了:此行的根本任务就是和一批学员讨论他们的作品,也可以说是面对面地对他们进行创作辅导。我想,这不正是您未竟之大业之一部分吗?如果我滞留在家而不去执行这样的教学任务,您肯定会不高兴的。在途中,在驻地工作中,我和我的同行们没有浪费光阴,工作一办完便上了火车。可是,当我回到家里,正要给您的儿女打电话之际,妻子告诉我:今天上午,已经把秦兆阳同志送走了!昨天他女婿来过电话,说是应你的要求,通知你去为秦老送行……我愣了好一阵,静静地看着妻子,心里叩问苍天:老天啊!你高高在上枉为天,你为什么如此无情,不让我最后看一眼我心中的人之楷模、我尊敬的秦兆阳同志呵?不就是只差半天工夫吗?……秦老,您走了,您可以免受那破旧而寒冷的小院的困扰和袭击了。它夏潮冬冷,早就由房管所通知为危房了。

虽然您的走,对一生挚爱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也是难于弥补的;对我个人而言,更是如此。现在,可以告慰您的是:和您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张克老太太,其病残之躯终于有了

一个过冬的住处了！您安息吧，我尊敬的、永远怀念的秦老兆阳同志！

1994年12月6日晨

原载1994年12月17日《新闻出版报》第三版

追记心底流情人

——悼老芹

陆 潜

老芹即老秦。好多年来,秦兆阳老师在为文友赠书,赠墨宝时,常以“老芹”落款。这除了与“老秦”是谐音外,我想总是意味深长的。这枝在疾风中历经创伤的“老芹”,终于不幸在这萧瑟秋风的时节里,告别了亲人同仁,告别了读者作者。享年78岁。

为悼念这位当代的大作家、大编审,我好多天思索着想为他写一点纪念文字,但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在当代文学史资料中,很难找到这位作出过杰出贡献作家的片言只语。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我们不说老师从1935年起从事文艺创作,1938年去陕甘宁边区投身革命,60年来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话剧剧本、童话、文学评论,甚至还有大量的漫画,并长期来主持《人民文学》《当代》大型文学期刊工作。单就他在全国解放后,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部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就应在当代的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它是与丁玲老师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全国解放后第一批奉献给中国读者反映新生活的巨著,当时的影响波及海内外。在50年代,我们就是读了这部巨著,知道秦兆阳的。



秦兆阳与陆潜

笔者与秦老师虽有十多年的通讯联系,但有幸在去年5月2日、3日才有面缘。两个半天的晤谈,真是相见恨晚。我说有幸,一点不假。一是,由于地址的不确,费尽周折;二是,一见如故,促膝晤谈,录了音、照了相;三是,老师不仅题词赠书,还在我册页上题签,并赠了条幅墨宝。这真亦是“三生有幸”。好多年来,与老师联系的地址总是写“北京北池子北巷2号”。去年5月去首都,因借住南池子旁《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北池子很近,所以5月1日一清早,我便骑车投访,结果在北池子附近所有胡同转悠了半天,问遍“老北京”,都摇头说:北池子从未有过北巷。我更傻了眼。说也有缘,这次我也真不见老师誓不罢休的犟劲,终于在翌天“北池子二条”,这条简陋的巷子,一个简陋的书屋里,见到了多年想见而未谋面的老师。那天老师穿着一件中式棉袄,清癯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银发翩翩,彬彬有礼,一口湖北黄冈话,话语铿锵,刚中带柔,给人的印象是刚正不

阿，年迈而心静。老师虽是《当代》主编，但这些年来是“无为而治”，常年在家，宁静淡泊，不参与社交活动，患有严重的哮喘，只是每天清晨去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或劳动人民文化宫甩甩手，扩扩胸，很少见客。按他的话说，“与人聊，话不对头，半句也多”。

那天，我们谈人生、谈创作、谈文化市场，他哀叹“现在喜欢发财的人太多，看书的人太少”。在闲谈漫聊中，老师说与我说话很畅快。我看得出来，老师有点欣喜若狂。我环顾这简陋的书屋，门的右侧放着一张旧式的写字台，在它的前侧放着唯一的单人沙发。那天，他便是坐在这旧得可以的沙发上与我说话。门的左侧放着半张乒乓台，上面铺着浅蓝色的旧台布，没有一只像样的书架。进门迎面的墙上是最近老师的书画作品。这书屋是我与当代大大小小的作家接触中，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样简陋的居住与写作环境了。我顿有这环境恐怕和他的人一样，是一个将要被人遗忘角落的感觉。这环境与一位当代的大作家简直格格不入。但这又是现实，我心里颇有一阵心酸。这时我才有一点省悟：老师是大名人，你给他错位地址的信，他总是收得到的，但他从未要求我们更正地址的原因。

那天老师高兴地送了我一本他的新著《秦兆阳选集》，在书上题词“心底流情——陆潜同志赐教”，落款“兆阳”，盖有阳文篆体“秦人”印，他还在我的册页上题写了“剑胆琴心”，盖有阴文篆体“兆阳”章。那印章都镌刻得如此得体，都是老师的作品，说老实话，都是够得上在刊物上发表的。那吊在墙上的墨竹图，也颇为入神。此时此景，遥想历代有大才气的文人清贫的生活图景，一瞬间在我的脑中闪过，联想老师耐人寻味。因为下午还要去约见祖光和凤霞夫妇，所以我跟老师说，我明天早晨还要来见见您。老师高兴地说：好！

5月3日早上,我带了几盒民族音乐的录音带作为赠书的“投桃以报”。老师颇为惊喜地说,“这很贵,很贵的吧!”说老实话,我此时在想,也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录音机呢。这天老师特别认真地洗了澡、沏了茶,精神焕发迎接客人。我替他拍了一些照片,他还请邻居的小保姆为我俩在一起留了影。那天,我说要替他录音,回沪后准备为他写一篇报导,老师执意不就。所以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录了一些,但总是留下了老师的声音。在闻悉老师去世的哀讯,我重放他的录音,心底流情,悲哀不已。那天,老师还特别慷慨,我向他索要条幅墨宝,他一口应允。他说,墙上挂的都是新作,你欢喜哪幅,就挑哪幅吧。我挑了“璧归珠还”。老师在题写上款时,写着“陆潜贤弟清正”,款落“兆阳九三初春”。这确实使我受宠若惊,而今捧看更感慨系之,老师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作为“被改造者”贬到广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他漫长的风雨人生中,百折不回,直至1979年回京。而今缅怀老师坎坷的人生,不也是“璧归珠还”吗?!

写于1994年冬至

原载1995年1月23日《读者导报》

半个多世纪的情谊

李 清 泉

一

今年五六月间,受人之约,要我写篇关于北京胡同生活的文章。我在北京时间不算不久,住胡同的时间却不长,只不过其时正好遭受了犁庭扫穴般凌厉的打击,难以忘却,于是便写了《我在小羊宜宾的时候》。且摘引其中的片断:

“有个青年从斗争右派的三楼会场上跳楼自杀,目睹者告诉我他看到的景象,没有多少血,但是手腕上的表破碎了,指针停止了。这青年是《人民文学》的投稿者,听说他的评论文章有些见解。我没有看,秦兆阳约他来编辑部交换意见时见过一面,转瞬之间,便‘手表碎了,指针停了’。

“还记得老秦拿着脸盆,攀着梯子上房顶,他坐在屋顶上,我坐在我那偏院里,都拿着脸盆当锣敲,有麻雀飞来,还须高嗓呼喝。这是按街道通知的一致行动。小麻雀在杀声震天中,惊吓得扑扑棱棱。麻雀是良善有益的,竟列为四害之一,成为新增



五十年代初，秦兆阳与夫人张克在刚刚进入北京后不久的一张合影

的讨伐品类。

“一九五八年春我和俞林都劳动改造去了，我的家从《人民文学》迁出。我离开小羊宜宾时，老秦尚未进行批斗，是‘待罪’之身，在院子里受着精神折磨……”

这么一篇限定字数的千字文，自己的事都嫌地盘狭小，却信马由缰写到老秦身上去了。写了也罢，心想反正我们都在这里被埋葬，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墓地，等印出来给他看看，共同凭吊一番，唏嘘唏嘘。然而未待印出，老秦便溘然辞世了！

一九五六年老秦在《人民文学》上有些大动作，发了王蒙《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他自己亲自上阵，写出了煌煌大作，《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都有十分显著的社会影响，外地刊物不断发文章，响应和讨论。那一年我却正好脱离了《人民文学》的业务，肃反运动结束之后，到作家协会搞干部审查，限

一年内完成几百人的任务。那时候我对组织交给的政治任务，首先是不讨价还价，其次是不敢马虎乱来。对于《人民文学》发生的事，即便耳闻，也无心去详细追问了解。

到了下半年，《人民日报》载文披露秦兆阳修改王蒙小说一事，真如晴天霹雳。摸不清为什么会这么大做文章，眼看林淡秋等上老秦屋子去作解释，我也避开。任务压身，报上整版整版的长文章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某天我又偶然回到编辑部去，听老秦在屋里长吁短叹、捶胸顿足。我进去知道还是为《人民日报》的文章，但不知原委，说不出贴切的话去疏导和劝解，不免呆立一旁，觉得老秦倒霉，不得不安慰两句，也都不着边际，不痛不痒。

到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紧着催我回去，审干工作基本完成，剩下点儿零星。于是三月初便回编辑部了。一看老秦已不在，不知是仍在为那件事闹情绪呢，或者是该轮葛洛当班了。而葛洛又由作协安排脱产短期学习，谁来主持，没有人了，又不能唱空城计，便推我出台，连歇气儿工夫都没有，葛洛移交给我着手编四月号。

事有凑巧，几天工夫，作协党组又下来督阵的了，连续开了几个晚上的党团员骨干会议，必须贯彻“双百”方针，不许照老样子办。那些日子真是手忙脚乱，任务层层加码，负荷沉重，老感到有鞭子在后面步步紧逼。总得有时间去思考，听取反映，有个规划，还要撒开人马出去组稿。于是才有了六、七月合刊出革新特大号的主意，以便腾出长一点的时间争取将它编好。

说实在话，没有党组来人督阵，革新特大号根本不可能那么火急火燎地赶着出世。而革新特大号出世，又正遇反右号角吹响，可谓生不逢时。“乱放毒草”的罪名，便无法推卸了。

在专号出世的几天之后，刊物的几个主事人相约到中山公

园的“来今雨轩”相聚，就专号这一期聊聊意见。最少这也该七月中旬了，老秦仍然没有回来。只有张天翼、葛洛和我。大家虽然都说有点新鲜感，似乎也并不强烈。葛洛对李国文的《改选》排头持异议，他认为初登文坛，跃居高位，有点轻率。应多看两眼，看准了，再发不迟。打头一篇天翼同志不至于不看，但他没有表示意见，我虽然觉得考虑作者总体水平是对的，但也还是要具体对待具体作品，何况还有作品之外的时势因素。从这次讨论看来，这期作品无论谁编都是可以获得通过的，至于“乱放毒草”的帽子由我来戴，当然是命中注定了。当时我若举出这个实例，等于拉人下水。何况我还有编后记，还有“反党反周扬”等等许多罪名。就连编后记中说的一句，“抱枪而卧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这样的话，都被判定为放弃斗争，意志消沉，附在我右派结论的附件中。

继“丁、陈”的大批判会后的小型批判会，我是头一名，记得丁玲同志有点跌跌撞撞地走进我的会场。马上就有人领她出去了，受批判人没有参加别人批判会的资格。开丁、陈会时我和老秦坐在一起，我们都没有发言，记得联名写过一个给主席团的字条，估计大概只作一般性表态。事后我又有不满的表现，为“丁、陈反党集团鸣冤叫屈”，是我罪名中的大端。老秦曾是不愿意回来参加会的，会不会也有这个罪名就不知道了。

从八、九月开完会，到第二年四月，我的右派立案签字，开除党籍等各种程序均已完成，剩下就是从小羊宜宾迁出和下乡劳动了。

我离开的时候，老秦的会仍无消息，又不给工作做，焦灼不安，自然也难以安心读书，日子真是难熬啊。我们院子里上班的照常上班、有问题不上班的又还在这里住着，碰面怎么办？不招呼，不说话。我和老秦之间也只能如此，免生枝节。这是我们在

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培训出来的。

大概是在涿鹿乡下，从什么报刊上知道老秦的那篇理论文章被论定为“修正主义”，不但从文章本身挑不出这个所谓的主义的依据，就是老秦的大量创作，都可以用作这顶帽子的反证。世界上岂有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创作实践上的革命现实主义？！

至此，《人民文学》的在编人数（包括清扫和收发），不超过二十二三人，却有了七名右派，在全国怕也是比例最高的了。

二

我记得很清晰，老秦和我对坐在延安坟头上的情景，没有什么联系我们的因缘，因而没有情节，虽然我们说过话，互道过姓名，但留下的也只是斜阳夕照中的一个画面。无论是面容、身影、动作、谈吐，老秦都是清癯的，散淡的，温文儒雅的。虽然大家都是读书人出身，可是在他身上更浓，好像是未经社会磨损的原生态书生。他很少笑出声，更没有见他大笑或狂笑，似乎这对于他，是不可能的。但除非他有时愁苦缠身，在他不笑的时候，脸上也总透着和善的笑意。

我们每天从山上的窑洞，到山脚下伙房前的空场上吃饭，吃完饭，当做饭碗的茶缸，在腰带上一挎，筷子或勺子往上衣口袋一插，各自便散了。山有一二百米高，谁都不吃完饭便钻窑洞，大都是上河边遛遛，进城逛逛，或是访友，还有的在一片乱坟中闲坐聊天。一个个坟头，恕我们不敬，且供我们当坐凳了。荒坟中立着一座陈旧得发黑的石牌坊，是延安文庙唯一的遗迹。这里是紧挨着刻着“肤施”二字的城头，是北门外，创办时期的鲁艺，就在这一片山上山下安营扎寨。

一九三九年延安大批人马开赴晋察冀边区，光是鲁艺的人

就要走二百多。因为要作各种长途行军的准备,学习生活不免有点乱套了。等到男男女女背着背包在广场上列队出发那天,留下不走的同学围着他们,情意绵绵向他们挥手告别。我现在不禁涌出老秦在一篇散文中的话:

——当我呼吸到第一口人间的空气时,就把你呼唤,用我与生俱来的语言:“国呀!国呀!”

——我的童年——黄金时代没有黄金;我的青年——青春时代没有青春,不是你 not 给我,不是你 not 怜悯,是因为你跟我一样贫困。

——那时啊,我享受的热情很少,看到的,却是更多的无情。我还看见过,你跟我一样的不幸,受尽了来自多方面的欺凌。

——于是,你教育了我,走向革命。

老秦清癯的身影也在这支队伍里,他勾着头,背着包,跨上征途。那时他脑海里和血液里流动的,就是未来表现在文章里的这种种思绪。

周扬同志主编过叫做《文艺战线》的刊物,在国统区出版发行。某期登了老秦的木刻,还有我的一篇小说,于是一九四〇年,我和老秦在此处重逢。那时周扬还在边区政府教育厅。我不是投稿者,只是一篇习作,被学校里的有心人辗转递送去的。老秦到前方去了,更不可能自己投稿。算得上巧遇。

老秦的木刻,题名似是《陕北秧歌》,不是大场面。几乎没有背景,只有三两个舞着的男女,然而民俗风情和地方色彩都很浓郁,舞蹈的动感,流韵四溢,姿态诱人。他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就走了,日子不长,但作品却看不出人地两生,而是十分相得又十分相投,也只有如此才可能创造出美。老秦的木刻比我的小说有光彩。

三

一九五七年的枷锁还原样儿压在身上，到了一九七八年夏天的时候，就不是无人敢摸敢碰的事情了，我竟然在北京市文联获得了一份工作。这种事有点喜鹊登枝的味道，是个好兆头。它必定会暗地里传递，会使受难者暗喜，大家原都是冷暖相连的。待到进入一九七九年，果然便不断有一批批获得平反的人，那年头有过多少个喜相逢，喝了多少二锅头。

记得第一次到北池子二条，抬头便见仅能容身的小门框，院子里也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天地，转到后院更是紧窄。心里先是起疑，然后便作出判断，公家决不会买这种房子，眼下老秦也还买不起，肯定是当年戴帽子时饥不择食找下的栖身之地。但相逢的喜悦冲决了瞬间的阴云，桎梏解脱了，心地平衡了，精神流畅了，身轻脑快，老秦的小屋，除一床一桌，就能摆下两人对坐的凳子，炉火正红，小屋里暖烘烘的。

回想延安分手，五十年代第一次北京相聚，十多年间革命由弱到强，由农村到城市，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国家，这都是历史转折中的伟大过程。个人相逢的喜悦，与历史性胜利相融合，更其生色。然而小羊宜宾一别，历时二十一载，只是漫长的屈辱与折磨。相逢虽仍然欣喜，却只是对于劫后余生的庆幸而已，这么长不堪回首的时间，只希望国家能有新转机。

我们当然少不了那个项目，相约上四川饭店：还有钟惦棐和另外两位，为了老秦，也为了大家，难友共贺。大家记得戴帽两三年后，都先后当众摘过一次帽子了，是否阶级斗争的纲又要绷得紧点了，还需要留我们作演练的靶子，所以那次摘帽含糊不

清,谁都不觉得可庆可贺。这次真正是还人以本来面目,只有表示庆贺才能使内心获得满足和安静。

那一年开四次文代会,老秦站在讲台上说,“有些同志希望我再谈谈《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是个学术问题,不好在这里谈。”明明它出生未几,便顶着政治大帽子,使不少响应它的人,纷纷落马,万劫不复,算得是文坛大事。如能摆摆当时派定为政治问题的种种依据,把这个本不是政治问题的学术问题,还它个本来面目,不也既合身分又合时宜么?可是老秦竟然几句话就撇开了这个遭受磨难的主题,老秦这件事上的书生气,是很典型的。

我毫无意思要当作发泄和批驳的机会,应当平静地说理,因为这是个正当的文坛大题目,避而不谈反而不利于形成健康的文坛风气。

珍惜散失掉的许多时间,一阵欣喜之后,各自便守着自己的一方阵地,埋头到稿件中去了。在小羊宜宾的时候便不计昼夜,无所谓上下班,如今都已年过六十,很有点和时间赛跑的味道,未敢懈怠。

四

一九八五年末我下岗时,老秦仍在坚持,后来人不上班了,《当代》的责任还担着。我经常要到东城区协和医院看病,看完之后只要有点儿余裕,便绕道去看看老秦,聊聊天。老秦日渐力不从心,不那么珍分惜秒了,感到朋友聊天的需要和乐趣。他除了绘画写字,可以消闲养性,再没有什么爱好和娱乐。社会交往很窄,总是别人去看他的时候多,他自己总是老守田园。他的居室比先前防震棚似的房子好些了,原来强占他房子的人搬了,他

住了较大的正房,因为终日不见阳光,坐在那里常觉阴冷。多年前便听说房子经过检查,因有重大隐患,判定为危房。眼下干部的居住条件有明显改善,老干部自不必说,狡兔三窟的也大有人在,而老秦的住房,还远不如四十年前的小羊宜宾,夫妇二人长期体弱多病,在防范养护上都有很多困难,儿女们为此愤然不平完全可以理解。是非曲直常常依靠具体比较得到显示。住着扫地出门时的房子,住着危房,对于从不发怒,从不索取的老秦,能够问心无愧吗?我知道老秦夜尿甚频是他的老毛病,且不说病倒在床上了,便所在大门口,离得远,院子又不平,只好在室内将就。若是冬天就是在室内起夜,也非披挂齐全不可,稍不小心,着凉感冒,便会引发出大病。而反复的穿穿脱脱又不胜其烦,所以经常棉袄棉裤和衣而卧。老秦只和我说情况,心平气和,毫无诉苦的味道,虽然政策是明白的,可比的例子俯拾即是,他也决不这么来谈。老秦的态度,既能叫有的人动情,也能叫有的人麻木。世界上有一种占有者心态的人,有一种奉献者心态的人。

由于去得多了,不免遇上吃饭,开始我还叫吃便吃,老秦拿出酒来,我们对上两杯。几次之后,我摸着一点情况,因为老秦夫人有病,买菜下厨都靠保姆,烹调无术,口味不合,老秦和一家人都闷头吃,无一句挑剔。这和我家里饭桌上议论纷纷大不一样。后来老秦身体又差了,医生禁止他喝酒。他还端着酒瓶,继续留我吃饭,我坚决不再吃了,即便不会引他犯禁,让他眼巴巴看着我喝,也于心不忍,我深感老秦生活太清苦,曾向秦晴叮嘱过,要注意加强你爸爸的营养。虽然儿女都很孝顺,在具体的家庭条件下,未必就毫无困难。我看老秦自己在吃的问题上就是不买,不做,不求,不说。

五

老秦好骑车，我向他进行过劝解，说了种种老年不宜的理由，想不到他骑车有悠久的历史，大概因此而十分自信，默不作声。他有些骑车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部队缴获了一批自行车，发给老秦一辆。后来突遭日寇奔袭，急切之中，多亏了自行车的速度，帮他摆脱日寇，安全地钻进了青纱帐。

——五十年代末，他下放到柳州某工厂，住在一间放工具的竹棚里。买了一辆破旧的日本车，为了到大自然中去敞开自己的胸怀，吸收一点生机，获得一点慰藉。这辆车陪伴他好多年，走了好几个地方！忽然“文革”一声雷，有人厉声喝道：“秦兆阳骑日本车，可见贼心不死。”理当抄没。

——六十年代下半期，造反派之间闹起了派性，把斗争目标搁一边了，老秦趁机买了一辆“永久”。成天用布擦，用螺丝刀拧。自然表示他喜爱的心情，也是他一个精神寄托，要不然孤苦伶仃，魂归何处？等到派性闹够了，注意力回转，老秦这辆车又被抄没了。

这是我从秦晴写的一篇散文中略略引用的一点点。

秦晴说，她一方面希望父亲能常骑车出去走走，以解寂寞。然而毕竟年高，骑车会遇危险她也是知道的，因怕父亲骑车外出，常常故意把车骑走。相反的感情流向，却是一个目的，冀求老秦平平安安。

从一九九三年冬开始，老秦连续三次住院。秦晴总是说我年纪大，不告诉我海军医院的地址，不告诉我房号。一九九四年八月间，我闯到北池子去了，正巧老秦二次住院回家，家人都不

在，保姆开的门，虽很不愿意人来打搅，却又不便拒绝。不久保姆扶着夫人从前屋到后屋来坐了一小会儿，又走了。我们两人东一句西一句的应对中，老秦忽然脱口而出，表示愧对自己的母亲，说她一生太劳累，太辛苦。声调有点凄清，不像对我诉说，有点像自言自语。

我不免惊讶，一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经历过多种方式长期的磨炼和考验的人，一个天宽地阔、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人，忽然发出了母恩未报之叹！

老秦久病，我不敢长坐。告辞时他也只能从沙发上慢慢站起，再也不能相送了。我独自一人步出院门，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

老秦第二次住院时，在病榻上零零碎碎笔录了一点病中的感念，他的亲人对我信赖，我读后挑选无需解释加注的几条于后：

——我感谢高空的明月，如果没有她，世界将失去多少诗意，虽然她不是宇宙中的重要角色。

——我钦佩海边的百丈悬崖，它们永远无言地沉思，面对千古的喧嚣，绝不有所动摇。

——如果没有人类，宇宙照样存在，但如果没有人类，宇宙就失去了思想。一个没有思想的庞大的宇宙，多么寂寞的世界哟。

——夜、深沉、星光月影，无边的寂静之中，在那天地交界处，正悄悄地日染黎明，粉白色的新生，静静的——伟大的苏醒，啊，宇宙的神韵！

——黄昏，夕阳以它最后的余晖，创造了永恒的美——留在远路归来的人们记忆里，形成永远的美的回忆，啊，人生的滋味！

老秦向我提到的母恩，病榻笔录中也有一条：

——那时我很年轻，黎明时分，提着一个小破箱子，走在门前池塘的岸上，想要赶上去汉口的轮船，村庄还沉静在睡梦里。我回头一看，大门口站着母亲的身影，手搭凉棚，在目送着我，是叮咛，是鼓励，是怜悯，是希望，在黎明的微光里，是那样深邃。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仍然常常记起，原来这目光凝视了我一辈子。

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蕴含着人类生离死别，一个普遍而又永恒的命题。一个快八十的人，以儿童一样纯净的心怀，记下和母亲告别的情景。他没有指明，这是他奔赴延安时的长离别，他只说别离时母亲的目光，凝视着他一生。

作为人之子、祖国之子、党之子，老秦堂堂正正，正气凛然，无愧于心。

我不是个在送灵路上乱撒纸钱的人，我还是和老秦在生日一样，想起我们坐在延安的乱坟堆上，好像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原载 1995 年第二期《当代》

重读《木鱼歌》

邵燕祥

秦兆阳同志(1916—1994)在去年十月十一日去世,转眼就是百日祭了。四十多年间,我读过他不少小说和散文,尤其难忘他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之论,一鸣而令四座皆惊,因此罹祸。为使“铁案”难翻,把他一个时期写的文章、改的稿子、编的刊物,举凡不落陈套,略显锋芒的,通通网罗到一锅里,烩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但我此刻缅怀他的生平和作品,不知为什么,老是想起他的《木鱼歌》:

自从被刨雕,命里注定了。摆在供桌上,
呆头又呆脑。无论僧俗人,皆可来敲捣。
一敲降吉祥,二敲福祿保。三敲显法相,
四敲通大道。狠敲三百回,灵魂便出窍。
飞升上云端,成为扳不倒。从此世上人,
皆知敲捣好。你敲我也敲,敲得真热闹。
借问木鱼儿,苦恼不苦恼?木鱼咧大嘴,
似哭又似笑。有口不能言,般若波罗妙。

作者诗前有序说：“1978年春，‘四人帮’倒台久矣，权威人士仍在《人民日报》及《人民文学》上批判我的《道路》。愤极，无可奈何，作此打油。”

当时是什么人，以个人署名还是大批判组署名，大写继续批判秦兆阳那篇论文的文章，我因司空见惯，未曾注意，事后更无暇去查询了。我只知道，老秦并没有长久地陷于无可奈何之境；他自拔出脚来，上黄山，遛河沿，董理旧作，赶写新篇，在承担了主编《当代》的繁重任务同时，献出长篇力作《大地》。这是对某些专擅“敲木鱼”，并以为所有被“敲”的人都真是有口难言的“木鱼”者最好的回答。

这首《木鱼歌》，与其说是作者借木鱼以自况，并为一切被整得啼笑皆非的人代言，不如说它寥寥几笔刻画出一类日日月月年年靠“敲木鱼”以为生、以为业、以为青云之路的典型：敲得福祿禎祥，敲得灵魂出窍，这出窍的不是被敲者而是敲者的灵魂，一边是飘飘欲仙，一边是行尸走肉，于是“成为扳不倒”矣，扳不倒者，不倒翁也，在有些人，是看作最高境界的。

倘要把人当作木鱼敲，须以被敲的人“有口不能言”，像一段呆木头为前提。然而毛泽东说过，“捉猪猪要跑，杀猪猪要叫”，猪犹如此，欲人而不如猪，岂可得乎？一时得之，又岂能持久？

听说出版社将重印秦兆阳的小说。他的新旧体诗都不曾结集，极易失散，希望其家人子女注意珍存。将来总会有出版机会的吧。

化作春泥更护花

——怀念秦兆阳同志

程 树 榛

秦兆阳同志匆匆地走了，噩耗传来，使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闭上眼，眼前便映现出他那和蔼可亲的睿智面孔，耳畔又响起他曾对我的谆谆教诲。

我知道秦兆阳同志的名字，还是得自五十年代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那篇著名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那时，我还是刚满二十岁的文学青年，正在大学里念书，课余，也舞文弄墨，偶尔发表一点文学习作。因此，对文坛上发生的事还是关心的。凭我对文学粗浅的理解，兆阳同志的这篇轰动文坛的力作，我是心悦诚服地拥护并接受的。因为他讲的是真话，而真话是最能打动青年人的心的。

遗憾的是，不久他便遭到了批判，报刊上连篇累牍，帽子大得惊人。此后，他便在文坛上消失了。除非是每当文艺界有个风吹草动，又把他的这篇作品“示众”一番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不知他的去向。

我和他真正认识，是在他复出后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的早晨，那时，他是新创刊不久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主编。



1993年，程树榛、杨桂欣到海军医院看望秦兆阳

我是《当代》的一名作者。

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一部长篇小说稿，有机会常和《当代》的编辑同志接触，因谈话投机，彼此成为朋友。当其中一朋友得悉我来自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时，立即把我“盯”上了，约我写一篇反映该厂新厂长宫本言事迹的报告文学；因为他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通讯，记述了宫本言在“一重”的几则动人的事例。他认为“此人大有写头，值得搞一篇有分量的作品。”同时着重说明，这也是秦兆阳同志的意思。老主编希望《当代》的作品能够与时代和现实贴得更近些。这是他的一贯主张。

我当时虽然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对报告文学却从未涉足，未敢骤然应允；可是，我是在宫本言身边工作的人。他的那些撼人心灵的事迹，在“一重”已家喻户晓。我耳濡目染，早已为之感动，焉能轻易放弃！于是便说个活络话，“我试试吧！”

谁知回到富拉尔基“一试”，却难以放下笔了。无数动人的

“材料”，扑面而来，稍加梳理，便即成篇，于是，立即给《当代》寄去。这就是那篇曾在工业战线上引起较大反响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

稿子寄出不久，便收到《当代》回信，说此稿决定刊用，尚需稍作修改，要我立即来京，共同商量改稿事宜。

收到回信的第二天，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径至《当代》编辑部。住处早已为我安排好，并派了一位资深老编辑担任责编。《当代》的热情，令我感动。随之便共同研究修改方案。商讨中虽有不同意见，但经过友好切磋，大体上取得共识，遂即下厂付印。

任务“完成”了，我便去火车站买了票，拟于日内回去。谁知次日一大早，《当代》的一位副主编来到了我的住地，他说：你且慢走。主编秦兆阳同志看了你的稿子后，还有些想法，很想见见你，和你谈谈。

听说秦兆阳同志亲自约见我并谈意见，我当然喜出望外了，随即随着副主编来到了秦兆阳同志的家。我万没想到这位当代著名作家的家庭陈设竟是那么“寒碜”：低矮、破败的院落，斑驳残旧的门窗，饱经风雨剥蚀而变得不规整的砖墙、瓦顶，令人有隔世之感。一堆蜂窝煤堆在庭院的一个角落，杂乱而无序。会客室是一间低暗的北房，光线艰难地从门窗逸入，照在主人花白的头发上。室内有些阴冷，虽然正是四月初的天气，主人仍然穿着一身棉衣。

秦兆阳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亲自沏了一杯茶放在我的面前，简单地叙了寒暄之后，谈话便切入正题：关于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他一章一节地加以剖析，耐心细致地指出必须修改和补充的地方。看得出他是经过认真思索的。我对他的意见从心眼里感到心悦诚服，和我所思所想是完

全一致的。但是,我也表达了当时的顾虑:清样已经排出,版面有限,再补充和修改,如何处理?他当即表示:可不受版面限制,根据文章本身的需要而定。坐在一旁的那位副主编,也当场表态:请按兆阳同志的意见办,不必多虑!

回到住地之后,我立即动笔进行补充和修改,因有兆阳同志割切而中肯的意见垫底,我改得既快又顺畅,当天便交卷了。责任编辑看后,也较为满意,认为较前有明显的进步。只是由于我的水平所限,未能完全达到兆阳同志的要求。

《励精图治》发表后,第一重机厂因而名声大震,远播海内外,一段时间内,被人们视为大型企业改革的典型。前去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作为厂长宫本言,也因此得到社会的广泛了解,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器重,此后不久,便被调往哈尔滨,成为省委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并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一切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宫本言同志个人出类拔萃的才干与突出的贡献,但此文的宣传效果也是不容低估的;其中《当代》和兆阳同志的关键作用更是难能忘记。

因为这篇文章,秦兆阳同志和我以及宫本言同志结下了深深的缘分。他不仅关心我的创作,同时还关心宫本言同志的工作。当年夏天,当宫本言同志来京开会时,秦兆阳同志专门把他请到《当代》编辑部与编辑们座谈。秦兆阳同志抱病参加座谈会,与宫本言同志交谈了很长时间。此后,彼此还经常通过我互致问候。宫本言同志说:这样的大作家、大编辑,对企业改革如此关心、如此支持,真是难能可贵。而秦兆阳同志则说:中国需要宫本言这样的改革家!只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不久,《励精图治》的续篇,又在秦兆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于《当代》上发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于对工业战线改革开放的关注,决定将这两篇作品,合并在一起出版单行本。为此,我

又找到了秦兆阳同志,请他为这本小册子写个序。他笑着对我说:“我向来不给人家的书写序,但这次对你却要破一回例。”第二日,他就把序言写出来了,题为《列车上产生的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兹抄录于后:

1980年6月某日,《当代》编辑室的一位同志出差到外地去组稿,在列车上碰见对面座位上一位年轻的工人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刚刚发表在《当代》上的《励精图治》。等他读完了,编者和读者就面对面地谈起话来……

“你觉得这篇《励精图治》写得怎么样?”

“嘿,前几天我读了《人民文学》上的《乔厂长上任记》,觉得真带劲,心里老是想;要是真的有乔光朴这样的人,要是有这样人到我们厂来当厂长,该多好!可真没有想到,倒真有这样的真人,比乔光朴还要乔光朴。不过,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不顶事……”

“也许慢慢会多起来的……”

“也许?‘也许’到什么时候?连我这样年岁的人也怕这样的也许,更别说你这样年岁的人……”

“也许生活里本来就有不少的宫本言和乔光朴,只不过,第一是没有人用他们,第二是没有人写他们。”

“这两个‘也许’倒是有些道理——也许是这样的。”

……

最后,他在这篇序言中写道:

“……宫本言同志已经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了,这说明我们党是多么重视宫本言同志这样的人才!两年前那位青年工人所希望的‘也许’,正在多么广阔的生活场景里成为事实!今后这样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必定会更加广阔——这是毫无疑问的!产生在时代列车上的序言是无穷无

尽的,需要有多少报告文学的集子把这些序言抄上去啊!”

我之所以这样长的引用他的文章片断,是想证明这样一点:这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老作家,是怀着多么大的热望寄重于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啊!忧国忧民之心变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

这与他以后每次见到我总是劝导我“不要脱离生活、不要忘记你的富拉尔基”是一致的。他一再说,现实生活充满着丰富的创作素材,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决不可对火热的现实生活无动于衷,否则,你的艺术生命便枯萎了。

1983年,我调离富拉尔基去省作协当专业作家。对此种调动,他并不十分高兴,只说了句:“对你的创作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富拉尔基可是块宝地啊!”

事实正如他所料,调到省作协之后,我便被大量的行政工作缠身。每天忙于出席各种会议、处理各种琐碎事情,迎来送往,应接不暇,而创作却被搁在一边了。有一次,我来北京开会借机去看他,他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最近怎么看不到你的作品了?”我告诉他我的处境和苦恼。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尽快摆脱掉这种尴尬处境,投入到生活中去!没有作品的作家有再多再大的头衔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听信了他的劝导,回到哈尔滨之后,便找了由头先后到齐齐哈尔、大庆、富拉尔基厂矿、油田深入生活,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新的生活,又燃起新的创作灵感,我的笔不再那么锈涩了。我把新作寄给了他,请他指教。当我来京又去看他时,他的脸上绽出欣慰的笑纹,又进一步鼓励我说:只要和新的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你的思维就能始终保持活跃状态,创作的路子就宽阔多了!

有一段时间,文坛像打摆子似的,热一阵、冷一阵;各种流派、艺术主张,异彩纷呈;这个潮、那个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文坛上的各种风云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若干天”,气象万千,让人眼花缭乱。此时,我又去请教兆阳同志。他对此种现象表现出空前的冷静。他笑着说:热闹点比冷清要好,但一个成熟的作家,要保持冷静,要有自己的主见,不随波逐流,要走自己的路。文坛就如天空中的星星,各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轨道,至于亮度如何,则靠自己发出的光和热了。对于文坛上的论争和几十年形成的恩恩怨怨以及由此而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从不轻易卷进某种漩涡中。他说,有些是非掺杂着历史的纠葛,斩不断,理还乱,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你们年轻人,且不可陷进去,把前一辈的矛盾继承下来,那么,文坛就永无宁日了。大家还是度量宽一些,既让自己活也要让人家活。他的宽厚待人、不计个人恩怨、处处从大局出发的长者之风,实在令人敬佩。

我奉调来京到《人民文学》工作,曾专门拜访他这位老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并征求他的意见。想不到他这次倒表示赞成和支持的态度。他说,这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在那儿锻炼一下也好,不过,你不会感到轻松愉快的。最后,他再三叮嘱:要注意团结各方面的作家,能容百家之言。还要扶植新人,看准好苗子就加意培养,我们那会就这么做的。他历数许多现在已成为名家当年在《人民文学》崭露头角的人。

他的这些话都是金石之言。每次同他谈话都大有收获,总想多坐一会儿,多听一点,只是怕他身体欠安,讲话多了会劳思伤神,故才依依告别。

最后一次看他是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他患了心脏病,报了“病危”。但在某合同医院却无法住单人病房,原因是他的

“级别”不够。像他这样参加革命五十余年、国内外闻名的老作家,还不够“级别”,真令人感慨万端。最后是靠一个好心的同志走了“后门”,方才住上这个医院。当我们为此感到愤慨时,他却一再摆手说:“各有各的难处,总得有个限制嘛!否则,都有此要求不也是很不好办吗?”他总是处处替别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就在这一天,他提出来快点出院,因为这儿的住院费太贵,他不愿公家为他花太多的钱。我们劝他还是多住几天,等病情稳定了再出院,他却执意不从。家人只好连声答应,他才重新坐下来和我们谈话。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又谈起文坛上的事。他关心地问起《人民文学》现状,我告诉他,现在给《人民文学》写稿的人越来越多了,艺术质量也有所上升,新人佳作也时有出现。他听后欣慰地笑了,说:“那就好,以后写稿的人还会更多的。《人民文学》是全国作家的刊物,没有理由拒绝为它写稿嘛!不过,你们还要多做团结工作。”谈到当前文学上某些理论的歧见,他说,简单问题被某些人搞得复杂化了,要认真澄清起来也不难。随之,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见解。我们听后,感到句句鞭辟入里,令人心悦诚服。当即劝他形成文字发表出来,定会给纷乱迷离的文坛一清泾渭。可他慨叹一声:力不从心了。我们建议:可否由他口述,请人代为整理。他初始似乎首肯,但转而又说:以后再说吧!看来他也有难言之隐。

原以为他出院之后,病情会逐渐好转,以至康复。谁知,过不多久,听说他又住院了(这次由于他的固执,没另找医院,而是与众多病人合住一病房),而且由于病情太重,不让外人探视。再以后,就听说他溘然长逝了,我竟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一代文豪,就这样默默地走了,作为他的后辈和学生,我感到悲痛不已。当我又来到他那破旧的院落为他凭吊时,看着他

那遗像清癯的面容,我不禁悲从中来。我再也不能在此聆听他的亲切教诲了,我失去一位敬爱的师长,中国失去一位优秀的作家。我们多么需要他呀!文坛上像他这样人品文品都受人敬重的作家太少了、太少了,因此越发显得他走得太早了,太匆忙了……

兆阳同志,您安息吧!

原载 1995 年第二期《人民文学》

忆兆阳师

和 穆 熙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主编秦兆阳同志不幸于10月11日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文坛的一大损失，我个人也痛失一位良师益友。

初见秦兆阳同志，是在1956年下半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那时，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四期学习，全所百余学员均列席了会议。那天，先是听了周扬同志的报告，随后听了老舍大师妙趣横生、发人深思的一个发言；接着是兆阳同志一个娓娓动听，侃侃而谈的发言。他那天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起了，但总的感觉是颇受启迪，获益匪浅。他那时不过四十岁，正是英姿勃发，风华正茂的时刻。顾长的身材，乡音未改，操着一口湖北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并不相识，故曰“初见”。

接着是他那篇引起文坛广泛瞩目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来的严厉批判。我那时正少年气盛，撰一长文为之辩，一家刊物限于版面，嘱我压缩篇幅，因手头工作忙，暂时放了一放，尚未压缩，更谈不上发表，旋即陷入1957年那场风暴之中，它便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周勃兄才思敏捷，他立论深刻、严谨，引《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同调的宏论已经发表，故

亦同为“牛鬼”。

1978年底重新工作后，因编大型《中国报告文学丛书》，1980年初，对拟收入此丛书之作品的在京作家，如夏衍、萧乾等均一一作了拜访，征询有关作家对自己所收作品篇目的意见。因拟收兆阳同志三篇作品，故至他在京的寓所，作了拜访。这才算初识。

他的寓所是典型的四合院，前院住的是子女，他在后院上房他的书房兼卧室会见了。正事谈完，自然谈及那场风暴及他此后下放至广西和我下放后的一些遭遇。因我从湖北来，且有那些文字瓜葛，虽为初识，所谈却广，且相投。我们一个共同的结论是：世上的好人多，尤其在工人、农民中，我们均受到了善待。他的夫人在旁始终是静静地听，期间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的口音一个样。其实我的口音与黄冈口音还有不少差别，因她是河北人，就辨不出这些差别的细微之处。偶然看表，已是夜九时许，不觉已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立即起身告辞。他嘱咐我返汉后将周勃兄当年之文找出寄他一读。我返汉后立即照办了。时值隆冬，他送我至大门口时，才发现我未戴帽子，颇惊奇地说：你怎么连帽子也不戴？我说：不想戴了。两人相视一笑，于昏黄的路灯中互道再见。

其后通了一些信。约在1982年，为《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三辑第一分册中他的《小传》中“著名作家”的称谓，他给过我一封长信，大意为“作家”即可，不必另加“著名”，著名与否，还得靠作品本身。对他这种谦逊、耿直的性格，我深为感动。

约在1986年初他给我一信，说5月他来汉参加一笔会。我复信说会后我愿陪他去黄冈家乡看一看。他又来信说黄冈已无甚亲人，但他在黄石市还有一八旬余的舅父，他想去探望。5月笔会后，我陪同兆阳同志和他的夫人，奔赴黄石。正好黄石市文

联有一活动，就把我们一行也安排在海关山宾馆下榻。当天下午兆阳同志及夫人即去看望舅父，畅叙了亲情，翌日晨我即返汉。车行至鄂城江边时，我请小樊师傅停车，请兆阳同志隔江远眺了一下黄州。兆阳同志漫步走上江堤，久久地凝视着黄州全景，默默不语，他此刻的心潮，我想是如脚下那奔腾的大江吧。这，也许是他遥望生他养他的故乡的最后一瞥。一直到四年后的1990年，我在他北京寓所聊天时，他还突然前言不搭后语的，冒出来几句：长江！那宽广的胸怀，那奔涌不息的波涛……他养育出来的儿女……从这断断续续的自语中。我觉出了他的自策和对故乡刻骨铭心的依恋。

他返京后，随即给我汇来了两百元，嘱我转交黄石文联作食宿费。按当时的物价，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即如数汇去，但黄石文联来信说账已结，不便收，如数退我，我即如数汇给兆阳同志。他这种公私分明的品格，于此可见一斑。另有一例，约在1991年春，我在京开会期间去看望他。在他的书房正闲谈中，来了一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似是搞总务工作的同志，看样子是事先约好了的。他那时正在筹备个人画展，他向来人指着一个堆满了画和宣纸，看似一扇相当陈旧的白木门板的画案——我疑心那就是一扇门板——说：我还要用一阵子，能否作价卖给我？来人爽快地说：行。其实，他虽也是画家，但并不以画为主，买了以后也不会经常用。但他这种廉洁自律，洁身自好的美德，于细微处也闪耀着光辉。

自1988年以来，我每年进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每次总要去看望他。先前他还抽点香烟，后来气管炎严重，心脏也不太好，索性连香烟也戒了。虽身体渐见衰弱，但每次谈兴均浓，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虽很为高兴，但也对违背现实主流的杯水风波，乃至胡编乱造、脱离生活的不良创作倾向，深表忧虑。

去年的一次谈话,对腐败现象、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建设,均表示了相当关注。遗憾的是今春会议期间,我再去看望他时,他的孩子告诉我,因天冷他和夫人已去另一个取暖设备较好的孩子家过冬去了。不想去年的会面,竟是诀别。

兆阳同志生于1916年,长我十四岁,无论从年龄,从常识上说,我都是晚辈,但他平易近人,真诚相待。一次我在他府上用完午饭后,要去东四搭车,他说由他的住处到东四抄小路颇近,他坚持要送我,我怎么也不肯,相持不下,最后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以他的高龄,陪我步行了十来分钟,到东四公共汽车站。对许多问题,他也均以探讨的口吻发表见解,绝不摆权威架势,使人在不觉中受益。他生活相当朴素,家中陈设虽颇典雅,但多为旧物。就连衣着,这多年,我总见他穿着不知穿了多少年的旧中山服。

兆阳同志去了,单从做人上,就给我们树立了楷模。而作家,首先是要做人的。

1994年11月11日子夜

原载1995年3月29日《长江日报》《纪实文学》副刊

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

——缅怀秦兆阳先生

李 频

秦兆阳先生去世已两年多了。我一直揪心地怀念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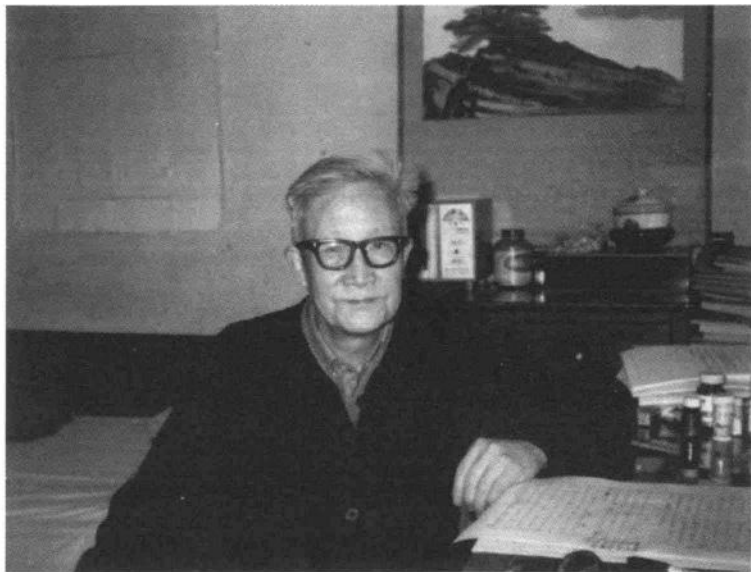
我只见过先生两次。但我梦见他却远远不止两次的，在他生前和死后。

现在移居北京了，应该说对严冬有了更多更深的体悟。回想起来，1994年郑州的冬天是最冷的。在那个冬天，秦兆阳先生去世了。在那个冬天，我知晓了这个噩耗。

我是从《新闻出版报》上看到先生去世的讣告的。当时我正参与创办一张读书类小报，够忙碌、劳累的。晚饭后便斜靠在沙发上随意地浏览当天的报纸。看到讣告，我只是默默地流泪。稚气的儿子跑去厨房告诉正在洗涮的妻子，“爸爸哭了”。妻子大惑不解，夺过报纸一看，把孩子支走了。

那个晚上真冷。我猛蹬着自行车在郑州市里瞎闯。也不知在街上瞎骑了多久，到底转了哪些街道。后来我跑到一同事家里，告诉了她这一噩耗。她也只惊讶地“啊”了一声便说不出话来，便默默地陪我坐着、坐着。

她也知道我曾想写一部秦兆阳传。



秦兆阳在家中工作

但那个可咒的冬天使我的写作思路冻僵了，把我的计划冰封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冻，无法解冻。

我是在收集、整理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的过程中，在研究《林海雪原》、《将军吟》、《芙蓉镇》等当代文学名作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逐渐增多对秦兆阳的侧面了解的。在《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一书的写作过程之中、之后，我都曾涌起一种向往：要是能有人细致、深入地研究秦兆阳的文学、文学编辑思想与成就，该多好，该多精彩；以他的人生里程为主题的文学雕塑该是一片多么丰厚、亮丽的人文景观。面对一些收集在手但又来不及细致研究、没有披露于世的材料，我也曾产生过这方面的写作欲望和冲动，潜滋暗长，或者此消彼长。

听说我想研究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早

春先生是积极支持、热情肯定的。我手头没有秦兆阳在该社出版的《文学探路集》，他便特意安排总编室的同志在没有余书的情况下从样本室找一本送我。大概是担心我过分集中于秦兆阳文学编辑家的侧面，他还特意提醒我，研究秦兆阳，除文学编辑外，还可以研究他的文学创作。顺着这指引，我才发现那一个让我惊异的秦兆阳的文学创作世界：《农村散记》清新隽永，《大地》气壮山河……

也是经陈早春先生的引荐、联系，我于1988年11月3日拜访了秦兆阳先生。这是第一次，是在北池子的秦先生家中。秦先生花白的头发，红光满面，映衬得很是精神。那天下午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围绕着《人民文学》、《当代》等编辑工作我问他答，他说我记。不知是他平时讲话就那样舒徐、沉稳，还是他见我在一旁笔记便有意放慢了语速，他说的话我都没有多少遗漏地记了下来。听一位历史老人谈论我感兴趣却又久疑不决的话题，我油然感到他的南书房特别空旷，书房中一桌一椅一床，两个书架几幅字画简单陈设也特别亲切。在记录完一个答问后抬头向他老人家提下一个问题时，看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慈祥、智慧的眼神，我才第一次知道，到底什么叫睿智，睿智的文化老人到底该是啥样的感性形象。我曾问胡风编《七月》时，通过编刊物组织了一个文学流派，请问这是否是中国当代文学编辑的发展方向，今后是否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他回答说：“这种事情是自然要发生的。有理论的负责人，围绕着他，便形成一种流派。但并不一定每个刊物都这样。我比较主张这样，但是在中国，要求每一个刊物都这样是不现实的。”这简单的几句话，就给当时的我很大的启迪。当然，就文学编辑与文学期刊、文学编辑与文学流派的关系问题，他还谈了很多。直到他送我出门的路上，我才忽然想到：秦先生今天的谈话很重要，便问他是否

可以整理来发表。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谈了些什么，我也忘了。”这话真让人回味，懈怠的我便因此而一直没有整理。只在写《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一书时，就涉及的有关内容引用了两三处。现在想来，要是整理出来，经他审阅、订正一次该多好！

后来对秦兆阳了解稍多了，才知他的南书房就是他的办公室。他是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的老党员，但他在新时期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当代》主编后，却没有参加社党委，一般不参与出版社的行政事务，社里曾给他预备了一间办公室，他去了两次便不再去了。日常的办公、写作都在那间书房里。《当代》的编辑向他汇报工作，在这书房；与来京修改创作的作者谈书稿也在这间房里。有一次，一部稿子他刚读了一半，便兴奋不已，在电话里告诉另一主编孟伟哉说：“很好呀！请你让作者马上到我家里来谈谈。”自然也在这书房里。想到那么多文学作者向往着这一书房，想到那么多名作家、名编辑在这里的凳子上坐过，在这书房里谈过，我于1992年4月为求序再次去见秦老时还特意观察了一下：椅子是木头的，年轻人的家庭中早不用这种旧款式的椅子了；地板也是木头的，但没有装修镶嵌，走在上面还一动一动的，有点像我们湖南农村家庭中冬季用来贮藏红薯的地窖里的活动木板。因这书房是平房，那天我忽然萌生一个念头：地板下是否有老鼠冒出来？要是地板下有老鼠，它们又耐不住寂寞，趁秦兆阳先生正与几位青年作家们谈天说地时跑出来听一听，再叽叽喳喳发几句言，这书房可就热闹了。后来我还真留心看是否有作家写这方面的文字。至今未见，可见我是胡思乱想，大概老鼠也耐不住先生书房的清贫、寂寞吧。

近年来，我执著于编辑出版科学的研究，对文化人物、文化现象的审视、思考自然坚持编辑、出版的专业本位。最让我动

心,也最激发我探究心理的还是秦兆阳作为文学编辑家的跌宕人生;他丰富的文学感性与深刻的社会理性交织而成的文学编辑抉择;他只眼发现、精心培养出来的一代又一代当代文学作家;他极力推出而又精心编审,甚至于可以说精雕细刻出来的一系列当代文学名作。

死去的作家路遥曾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在1978年写了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却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潮流不合而退稿。绝望中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路遥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了热情肯定,并在信中与路遥商量,如果不愿意再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愿意改动,请速来北京。结果,秦兆阳指导路遥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道路”。路遥反思自己的人生时这样意味深长地说。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路遥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细究起来,名单是可以开列一大串的。

秦兆阳说:“我是个搞写作的人,却不愿意自己认为是作家,也不喜欢别人称我为作家。如果一个人必定要有一种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秦兆阳的文学编辑工作集中在文艺刊物,从四十年代的《锄奸画报》、《联大画刊》、《华北文艺》到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文艺报》,到八十年代的《当代》。《人民文学》和《当代》既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的两座大厦,也是他个人文学编辑生涯的两座高峰。真不知是历史选择了他,还是他改写了文学期刊历史,他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的那些年月,分别是两刊最辉煌的重要时期。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

编政。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俄国19世纪《祖国纪事》、《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人民文学》从1956年4月号起,相继推出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作品,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剖析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人民文学》因此深受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读者喜爱,发行量在一年之内由10余万份跃至近20万份。一年间发表的50篇小说,竟有一半是新作者写的,其中好些写得很出色,发在头条。但他本人却因为这一年的编辑工作(包括撰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而罹祸,远离京城,蛰居广西20多年。

新时期后,有出版社将那组作品结集为《重放的鲜花》重新出版。为此,我在1988年11月3日访谈时问他:《重放的鲜花》中,很多作品都是您签发的,如果您不从《人民文学》副主编的职位上下来,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作者群?他回答说:“有可能,但作者群不一定是《重放的鲜花》那样的作者群。当时形势朝气蓬勃,我比较注重歌颂性的作品,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林斤澜的《台湾姑娘》等我都很重视,当时带批判眼光的作品刚出来,更容易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如果说形成一个作家群的话,是这样的作者群:现实主义文学水平较高的作家群,不光是像《重放的鲜花》那样的作家群;既冷峻地批判现实的阴暗面,又看到生活的光明面。这样两者都顾到的情况,我到现在也是这样,生活总要有希望,有光明也有黑暗,刊物要给人以力量、鼓舞,不能偏到哪一面。这一思想,到现在我还坚持。”这看似平淡的话却总引起我的沉思。我以为是解析秦兆阳一系列编辑实践活动的一把钥匙。由秦兆阳,到目前为止也还只有秦兆阳,我才强烈地

感到：有现实主义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那么顺延开来是否应该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编辑家？现实主义文学编辑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秦兆阳是否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编辑家的典型？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秦兆阳的死，即使不说给他们那一代文学编辑家画上了一个句号，也总该打上了一个沉重的分号吧。我真不知道成就、思想出其右的当代文学编辑家还有几个，还有哪几个，如果真有，也屈指可数吧。这或许是我的仰视角度和交往太少的眼光所致。惟其如此，我才一直都不敢向秦先生谈我的写作计划，我才一直都想先操练自己研究编辑家的步伐。

“曾经沧海难为水”，就我对先生的侧面了解而言，秦兆阳先生似乎对一切的一切都清淡了。国外有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辞谢了。有位美籍华裔作家曾告诉他：“我翻译了你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只是淡淡一笑。1991年8月，我曾将《〈林海雪原〉再版的编辑加工面面观》（后作为《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一书第三章中的一节）一文寄交他指正。他在8月23日的回信中说：“文中多少有些对我的赞词，请删去。”

在写作《编辑家茅盾评传》的过程中，我多次想从他口里了解一些茅盾主编《人民文学》的情况。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到1952年，秦兆阳任该刊小说组组长，1956年至1957年1月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执行主编），他对该刊主编茅盾的编辑思想应该说是最了解的。挖掘整理他这方面的回忆，不论是对《人民文学》这一重要期刊的研究，茅盾研究，还是秦兆阳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但我终于没有提采访要求，因为《人民文学》杂志的老编辑涂光群先生1982年10月写的《秦兆阳与文学新人》（后刊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3期）最后说：

“秦兆阳饱经风霜，满头华发。但他那不倦地探索和写作

以及对新作家,无名作者关怀的精神,一如既往。但他的精力大不如前,时间对他也更显紧迫。他还有好些过去长期酝酿的作品未写完,还有好多写作以外的工作要做。我建议有志写作的青年人,不必再去打扰秦兆阳,以便于他安安静静地写作,为我们的读者献出新作品。”

秦兆阳先生为我国解放后几代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涂光群先生的奉劝是很合理的,是应该遵循的。

我也曾计划,待《编辑家茅盾评传》出版后,将书呈献给先生指正,同时斗胆提出以他的文学编辑生涯写书的请求,再全面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我哪里会想到,《编辑家茅盾评传》在郑州正出清样,即将付印时,秦兆阳先生却在北京去世了呢?这怎能不让我痛心疾首,悔恨终身。

1980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当时同为《当代》主编的作家孟伟哉去看他。秦兆阳向孟伟哉谈了他以冀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为此,他准备了许多年。把孟伟哉送出大门时,秦兆阳笑着说:“这作品按构思是要写一百多万字的,现在看来完不成了。我有时想,一个人死的时候,会把多少东西带到坟墓里去啊!”先生十几年前的笑谈终于铸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不知道先生的“回忆录”写得怎样?1988年拜访他时,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晚年是否打算写有关编辑方面的回忆录?他说,“也曾动过这个念头,但总觉得不好写,很多当事人都在,关系复杂。二则有些事情很琐细,写起来不一定有深度。”我是奉劝他写的。如果他没写,损失就更惨重了。

老人走了。秦兆阳先生说走就走了。调来北京后,我多次想去秦先生那个南书房看看,但我终究没去。不敢去。不敢面对自己的心灵悔恨。

还是1988年见他那次，临走时，我请他写个字作为纪念。略一思考，他挥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几句诗：

磨稿亿万言，多少悲欢泪；
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

这是他从《红楼梦》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化来的。后来我发现他给我写的这几句诗与别处略有不同。他给《当代》一老编辑的书斋题名“磨稿斋”，并为这老编辑题辞：“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见《编辑之友》1986年第3期第21页）《当代》杂志《创刊十周年的一点表白》也引用了此诗，但作：“读稿千万言，多少灼心泪，休云编者痴，自识其中味。”（见《当代》1989年第4期）从秦兆阳先生为我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一书所写序言手稿中，我也看到，他曾想在序中添加上“磨稿亿万言，多少欢欣泪，休云编者痴，自识其中味。”但他最后还是把它删去了。他为何老是变换“悲欢泪”“欢喜泪”“灼心泪”“欢欣泪”的用字呢？“磨稿亿万言，多少悲欢泪”是否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秦兆阳的心灵世界呢？哲人已去，我再问谁？

在撰写《秦兆阳小说选·自序》时，秦兆阳先生才对自己有忽然的、惊异的发现：

这几十年竟是在许多矛盾中走过来的。搞写作而不愿意以作家自居；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失去了写作的年华；是歌颂者却长时间变成了“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离开了革命所教导的认识生活的能力和对生活的感情，我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长期以来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反对者；在取消了这种“代表性”以后反倒写了一点批判意味的作品；一直不愿搞编辑工作却一直使劲地搞编辑工作，甚

至就是在编辑工作上摔了很重的一跤也不后悔；本来是个搞创作的人竟被人认为是搞理论或搞批评的人；自己确实不愿意搞理论，也自知学识基础极差，“理论水”很少，麻烦性也很大，但又常常被环境推着在理论的圈子里打转；明知干文艺这一行有种种极难克服的困难，却非在这条难走的路上跋涉不可；已达衰老之年，仍有“板大”之性……

这是历史与人生的尴尬？这浓缩的是秦兆阳先生的人生精华？我真判不准，也真说不清了。我只知道其中有沉甸甸的内涵，社会历史的，他个人心理的。

但是，还没有人求索、展开其中的故事与情节。

我愧对秦兆阳先生，也愧对自己。

原载《出版广角》1997年第二期

秦兆阳：笑着唱人生最后的歌

黄伟经

秦兆阳曾在大陆文坛消失了长达二十二年。不过，比起许多已经死去的“右派分子”，他还有幸笑在最后：看到了“四人帮”一伙恶人的下场。

京城初识秦兆阳

那是1980年春夏间，在北京开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我初识秦兆阳。这个会开了近半个月，与会的各省市文学刊物主编、副主编和编辑共约一百人。秦兆阳和我虽然不同在一个大组（他在第一大组，我在第三大组），但我们都吃住在国务院西苑招待所，可说是日夕相见。那时秦兆阳已年逾花甲，头发花白，穿着蓝布中山装，黑面布鞋，给我印象与其说像个作家、编辑家，倒不如说挺似农村中学教师或小学校长（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村私塾先生，秦兆阳本人在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也在小学教过书）。

这次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可说是大陆文坛和出版界在

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次重要的聚会。当时，两个“凡是”的论调在大陆还很有市场，所谓“歌德”与“缺德”、“伤痕”文学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文艺界和文学刊物何去何从？与会者展开了极为热烈的讨论。开会期间，会议主持者组织各组代表在全国政协礼堂作过几次大会发言。许多发言我现在都已淡忘，惟独秦兆阳的精彩发言，至今犹在我耳边回响。他列举“文化大革命”给文艺界造成的灾难最大最深的事实，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与谬论，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针对一些人把揭批“文革”的罪过斥为“不是歌德”而是“缺德”，在回答“谁是真正的歌德派”时，他以洪亮、带有浓重湖北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他的发言，一再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没有逆转。当年秦兆阳这个被某些理论家视为“大逆不道”的发言，而今在大陆已成了平凡的真理。

《忆萧也牧》赐《随笔》

也是在这次会议之后，《随笔》从不定期出版的丛刊定为按期出版的双月刊，开始向包括秦兆阳在内的一大批老作家赠阅。我去京组稿时曾到他北池子住处探望，并曾去信向他约稿，他复信说“因视力衰退”，已“很少写作”，“等以后万一有合适贵刊的文章，再寄。”直至1987年他才寄来《忆萧也牧》，附来一信说：“为了不辜负你的信任，我将一篇旧作《忆萧也牧》寄给你试试。

此文写好搁了一年多,因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迄未拿出去发表。你看看,如无甚意味,退回可也,毫无关系。”

《忆萧也牧》实在是篇佳作,安排发表在《随笔》1987年第四期。它详细地记述了秦兆阳同作家、《红旗飘飘》丛刊创办者之一萧也牧的相识和友情,还记述了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后来萧也牧也被划为“右派”,及至“文革”遭受迫害而死的经过。其中一段话,读来令人特感沉痛:“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犍,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如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遗毒立即消亡!”

帮助修改《我们夫妇之间》,并将它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是秦兆阳当年被打入“大右派”另册的一条罪状。又一条罪名是他公开自己的创作自由倾向,发表了那篇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应当说,他所以获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他当年太过“呆气、正直”(他夫人的评语),给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一连写了两封信,不赞成周扬、刘白羽他们狠整丁玲、陈企霞,看不惯丁玲、陈企霞和周扬、刘白羽两派“互相明争暗斗”,“使其他同志受愚弄,受伤害”(详情见北京《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

《最后的歌》吐衷肠

秦兆阳因此而在大陆文坛消失了长达二十二年。不过,比起许多已经死去的“右派分子”,他还有幸笑在最后:看到了“四人帮”一伙恶人的下场。1979年3月,这位曾经写出长篇小说《大地》和《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等作品的老作家,从广

西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主编，一直主持此家大型文学刊物至1994年10月11日病逝。

我收到秦兆阳最后一次来信是1993年春。这时他已病重，身体衰弱；他此信，是我编辑生涯中收到的最简短的一封信：

黄伟经同志：

祝

健康！

秦兆阳 93.2.15

秦兆阳去世以后，天津《散文·海外版》1996年第一期发表了他住医院期间由女儿录下的遗作《最后的歌》。他这篇浸透了自己的人生感受的文字，既发人思索，又令人欣慰。他写道：

我经历过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有一件最大的怪事，我千思百虑也找不到解释，有的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里整自己的同志——在党章上，在马克思著作里，哪能找到解释？

时代把我做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些恶狠狠的正人君子，直到现在我还在照见他们的灵魂。我一生未做过什么大事，仅是这一件就没有白活。

1998年10月27日写于广州

原载香港《镜报月刊》1998年2月号

江 声 浩 荡

刘 心 武

直到如今,还有一些作家企盼能被作家协会公派出国。某作家终于遂愿,坐飞机抵达了异国机场。机场漆黑一片。来接的只有我国驻该国文化参赞。进了汽车,窗帘密掩。到了大使馆,送进房间,窗帘也密掩。原来,该国当天发生了军事政变。一夜无眠,参赞不断地联络,问机场何时恢复航班,终于有了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作家被摸黑送到机场,送上了回国的飞机。某作家没见到一位外国人、一瞬的外国风景,甚至没看到“外国月亮”。这算不算享用了一次“出国指标”?

“出国指标”很金贵。许多人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可是,作家协会几次请一位资深作家、编审率团出国,却回回都被婉谢。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交流及开阔眼界持消极态度。这只体现出他个人的一种性格。性格人人有,难得是带棱带角、执着刚劲。“出国指标”于他可无,办好刊物于他则事比天大。当然,你也知道,我说的,是业已作古的文学前辈,长期担任过《当代》主编的秦兆阳。

《当代》二十年,里面倾注着秦兆阳大量的心血。当然,《当代》的“含血量”很大,心血不是他一个人在沥,办刊的同

仁们哪个不是呕心以献？不过，秦兆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象征着《当代》这刊物的性格。“严肃文学”一词，有人质疑，这里不作讨论；但秦兆阳曾亲自设计过《当代》的封面，那风格好像一直延续到现在，真是既严肃，又文学，一望就有厚重感，也有儒雅气。

八十年代，对国内的大型文学刊物，曾有“四大名旦”之谑。仿佛是，有的被指认为正旦，有的被形容为青衣，有的则被说成是刀马旦、花旦。其中就有《当代》，记不真被指为了“正旦”还是“青衣”。其实“四大名旦”的含义不是四种旦角的行当，而是梅、程、尚、荀四种艺术流派。以哪一流派比喻《当代》更为恰切？其字正腔圆，颇似梅派，而宛转沉郁，又极近程派；我们都知道尚小云很早就大胆排演过《摩登伽女》，穿钟罩般的西洋大落地裙上场，革新“文本”，敢为人先，况“摩登”即英语“当代”译音，据此似乎又以尚派喻之更为对榫……

比喻永远是“半残废”，难令苛求准确性的人们满意。总而言之，《当代》有独特的性格。长期担任其主编的秦兆阳任期中虽没出国，《当代》可是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订户。这本厚重的刊物，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脚步坚定，越走越远。

曾写过一部《钟鼓楼》，稿成，想在某杂志分两期刊出，被告可以，但只能跨1984、1985两年处理；当时对跨年度刊登产生了心理障碍，另求《当代》，被容纳于1984年第五、六两期。没想到因此竟符合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畴，又经《当代》大力推荐，竟意外地获了奖。1996年，于是把《栖凤楼》又投给了《当代》，也被爽快地容纳，这回无望得奖，但心里总觉得，跟《当代》有某种特殊的缘分。

二十年了。忽然想到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开

篇的句子：江声浩荡。这不是比喻。听得很真切。一定的，《当代》将把跨世纪的浩荡江声，传递得更加清晰，更加激越。

1999年3月28日

绿叶居

原载1999年《当代》第二期

从何直到老芹

——怀念秦兆阳同志

陈明刚

秦兆阳同志逝世已经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近来我常梦见他，怀念他。怀念他，梦见他，有许多缘由，因为他是当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杰出的编辑家；因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革新者、倡导者；还因为他是我们黄冈人，我们是老乡啊；更因为他是我曾为之奋斗过的《金潮》杂志顾问，他为《金潮》写稿，他为《金潮》编辑部的同仁们挥毫泼墨题写“诗情”巨幅条幅，他先后给我来过五封信，他的“诗情”书法和五封亲笔书信已经成为我珍爱的收藏。

怀念他，梦见他，心里有许多话想说；怀念他，梦见他，计划着想写许多篇文章，甚至是不吐不快。关于他的小说创作，我已写过多篇论文，那些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写得很苦，一篇论文要做两三个月。这次写十年怀念的文章，我想换一种写法，想选取指名道姓悟谈笔名的角度，也许是一种创新写法，更是别有意味的一种写法，别有深意的怀念。

秦兆阳的出生地是湖北黄冈回龙，回龙这个地名如雷贯耳，从回龙走出了李四光、林彪、张浩（林育英），还有秦兆阳。秦兆

阳出生于1916年11月15日的黎明时分，秦兆阳在回忆录《回首当年》中写道：“正是在我落地以前的那天夜里，多年不见阳光的祖父恰好梦见一个耀眼的太阳落进了我家的破屋。于是父亲和祖父一致同意，给我起了个象征着希望的名字：兆阳。从此，我既没有乳名，也没有小名，秦兆阳三个字就陪伴了我的一生，就像长在我额头上的一块招牌。”接着，秦兆阳温馨无限且诗意盎然地写道：“那么，我是不是真的跟阳光结下了不解之缘呢？我相信是的。我相信，当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所看见的是母亲美丽的脸面，还有温和恬静的笑容。我相信，这就是人世间的第一片阳光，她给我以温暖，给我以生机，给我的性格注入了某种人生的基因和素质。以后，每当我仰面躺在摇篮里被摇动着，听着母亲柔和的、自成曲调的‘呵哦卧儿’的歌声时，又总是在入睡以前看见黑色的屋顶上有一片亮光在晃动。因为，这间卧室正像村里有些人家的卧室一样，没有朝户外开的窗户，只靠屋顶上一片玻璃‘亮瓦’透进一条金色的光带。我相信，这神奇的光带和母亲柔和的歌声，在这寂静而且阴暗的屋子里交织成了一种美妙的梦境，又在我那幼小的心灵深处理下了某种人生的意境，它将于无形中影响我今后的气质。”

如此美妙的回忆，如此寓深情于平实叙写的妙文，读来令人过目难忘，喜爱不已。然而，更令人难忘的是如此宝贵的《回首当年》首发在《金潮》杂志上，1989年第二期开始连载，一年以后，《新文学史料》才开始连载。

秦老给《金潮》写稿，给好稿，给首发稿，而如今的有些“著名”人物给地方报刊的稿子则往往是孬稿，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赚钱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浮躁伪情，欲望奔突，这更令我怀念秦兆阳了！

秦兆阳没有乳名，没有小名，没有字号，只有本名秦兆阳。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在《武汉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在大地上》、《遥远飞来的风沙》等十三首诗歌和四篇散文,还在上海《时代漫画》杂志和《新华日报》上发表漫画作品,这些作品署的都是本名秦兆阳。

40年代秦兆阳开始小说创作,无论短篇、中篇和长篇,均署本名。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组组长、当执行副主编期间,秦兆阳还撰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除少数署本名外,则多用笔名发表。用得较多的笔名是“秦策”和“策”。

以一个单字“策”为笔名,颇有意味。我猜想,秦兆阳当年决定以“策”为笔名时是多么认真,又是多么欣喜。“策”是马鞭,亦有鞭打的意思。在《左传·哀公十一年》:“抽矢策其马。”后来“策”引申为促进、促动。以“策”字为词头的词也颇有意味:策士、策名、策论、策划、策励、策应、策府……秦兆阳正是想通过自己那“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的批评与研究文章,努力促进、促动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以“策”为笔名的秦兆阳亦时时策励自己努力工作,勤奋写作,警策自己永远不丧凌云之志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诚如他晚年的诗作所总结的:“须经大海绘潮汐/应上高山画云霞/放眼关山十万里/心底流情笔生花。”

50年代,秦兆阳还有一个笔名,这个笔名第一次使用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就使他名声大震,把他“震”成右派,“震”成“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把他从《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震”成阶下囚,无处辩白,不容他说一句话,只有低头认罪,发配广西柳州去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

这是怎样一个笔名呢?

这个笔名叫“何直”。

以此笔名署名的是怎样一篇文章呢?

这篇文章叫做《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洋洋三万言，发表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这一长篇论文是革新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纲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该文仍然光芒四射！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的当代文学学者陈美兰曾对我说：“秦老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丰富深刻，我们今天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与研究仍未超过秦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百花文学》一书，该书是一部两卷本的长达千页的大书，它所辑译的资料基本上勾画出从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到1957年“反右派”以至“再批判”这一阶段我国文学的轮廓。该书第一卷是理论卷，其主要部分便是围绕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等文章引起的“论争”，实际上是批判。最近，作为教育部“二一一”工程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华东师大中文系已启动为期三年的《人民文学》专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以《人民文学》史为题的专题研究也已启动。由此可见，《人民文学》史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而毋庸置疑，《人民文学》史的热点、重点又在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编务工作的那段难忘日子，又在以何直为笔名刊发的雄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雄文彪炳千秋，何直名垂千秋！

50年代，秦兆阳发表了大量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方面的文章，或署本名，或署笔名“策”、“秦策”，唯有这一篇他重新取了一个笔名——何直。为什么呢？

也许秦兆阳看重一个“直”字，直者，正直、公正、坦率、率直、爽直、心直口快也；直者，直笔，不弯曲，直起腰也。

也许秦兆阳敬佩古代史官直笔写史，按照事实，忠实记载，无所避忌。《晋书·郭璞传》：“忝荷史任，敢忘直笔，惟义是规。”

也许秦兆阳呆气与“板性”使他选择了这个“直”字。

也许秦兆阳选择这个“直”字的时候已隐约感到曲易直难，要实事求是讲道理，理直气壮摆事实，难，难，难，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虽然何直之有，仍然选择“何直”！因为“直”而酿成苦酒，秦兆阳喝了几十年。

也许有人为秦兆阳惋惜，直通“值”也，一人遭难，累及老婆孩子，亲戚朋友，不能提干，不能住好房子，不能出国，不能享乐，不能积累财富……你秦兆阳值不值呵！然而，秦兆阳从不后悔，不改初衷，这就是这位“板大先生”的为人在世顶天立地的人格品质！他在其《无题》诗中对世人“忘性”曾感慨不已：“最应该计算的最易忘记/谁算过先行者的无数血滴。”

当然，也有人记住了“先行者的无数血滴”，死去的作家路遥活着的时候曾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是俄国著名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先后主编俄国著名杂志《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辞海》第2150页有关于涅克拉索夫的详细条目。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出任《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主持编务，他在编辑部内部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俄国19世纪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那样有影响的第—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

新时代以来，秦兆阳花甲之年又作“老夫聊发少年狂”，一手创作小说、撰写散文和文论作品，一手创办主编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李频在《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一文中提出：“《人民文学》和《当代》既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的两座大厦，也是他个人文学编辑生涯的两座高峰。真不知是历史选择了他，还是他改写了文学期刊史，他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的那些年月，分别是两刊最辉煌的重要时期。”

在新时期里，在编刊之余，秦兆阳亦老骥伏枥，既写小说，亦

写评论，仍然是小说散文署本名，评论大多署笔名。他的笔名鲜为人知，因为我和贾婵林女士合作编辑《秦兆阳研究资料索引》，所以要他就新时期以来使用笔名问题作一明示，秦老来信言明有“郁林青”、“许可”、“谭云”、“余之鉴”和“顾言”等五个笔名，譬如，《文坛四忌》署名“郁林青”，《“失去了”引起的思索》署名“许可”，《略谈“就事论事”的创作思路》署名“谭云”，《说短道长》署名“余之鉴”，《从“假托性”的构思说开去》署名“顾言”，等等。

为什么不用本名发表文学批评文章呢？个中缘由，一言难尽，鲁迅不是本名，本名周树人，笔名鲁迅取代了本名，然而，鲁迅之外，他还有近百个笔名！鲁迅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杂文，其缘由我们不难体悟。那么，秦兆阳用笔名发表文学批评文章，其缘由虽一言难尽，但我们仍不难体悟。下面我摘引几段秦兆阳的文论言语，你就更不难体悟了。“轻浮相尚，名利是图，门户相投，权势争求。利害之心盖过是非之心，变争鸣为争逐，顺我者亲如手足，逆我者视为仇寇。我你他，张王李，扯不清楚。高尚淹没于庸俗，互相消磨，互相掣肘，看得见摸不着。此整个文坛之大忌也。”“视工作为畏途，以看稿为负担。个人写作第一，编辑工作扯淡。提意见隔靴搔痒，笼统含糊；编稿子照收照发，免得费事。无建设文艺事业之心，有本位主义之意。为了争取多销，迎合低级趣味。专走名山拜佛，不事辛勤耕耘。有意捧名角，无心扶幼苗。拉稿玩弄手段，商人习气。交往专讲排场，庸俗作风。此编辑工作者之大忌。”还有作者之忌、评论工作者之大忌就不一一摘引了。如此文字犀利透彻，一针见血，剔肤见骨，深入骨髓啊！遍视今日之文坛，秦老所遍指的文坛四忌，真可谓是遍地“开花”！秦老地下有知，该是怎样的遗憾，怎样的愤怒！

从《当代》主编岗位退下来以后，秦兆阳钟情书画，这仿佛又回到他人生的起点上，他早年原本是学绘画，在延安鲁艺里，他就是绘画教员。他晚年的书画作品以朴拙示人，个性独具，其呆气板性寓其法书画作之中。他的书画作品曾参加过当代作家十人画展，有的作品被北京博物馆收藏，大多数作品为亲戚朋友们收藏，丁永淮先生生前就收藏有秦兆阳书法作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该书法的朴拙之气韵扑面而来，令人怦然心动！我收藏的巨幅条幅“诗情”更是秦老书法作品的上品，作家古清生来我家观赏后连连赞叹，观之再三。

秦兆阳的书画作品署名颇有意思，既署本名，又署笔名，而这专署书画作品的笔名却是借用一种极普通平凡的蔬菜以自况自嘲，且寓有深义。这个笔名就是“老芹”。

芹者，菜名也。《诗·小雅·采菽》：“言采其芹。”《吕氏春秋·本味》：“菜之美者……云梦之芹。”古有“芹献”之典，《列子·杨朱》：“昔人有美戎菽，甘桌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旧用“芹献”或“献芹”为自谦所献菲薄，不足当意之辞。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秦兆阳用此笔名的自谦自况自嘲之意了。秦兆阳是智者，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都钦佩他的高风亮节，称他为“文坛高士”。然而，晚年的秦兆阳似乎把一切都看得淡了，国外有大学请他去讲学，对别人是求之不得，而他却婉言谢绝了。有位美籍华裔作家曾告诉他：“我翻译了你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只是淡淡一笑。李频曾将《〈林海雪原〉再版的编辑加工面面观》一文寄给秦兆阳指正，秦兆阳在读后给李频的回信中说：“文中多少有些对我的赞词，请删去。”

芹菜极普通平凡，何况老芹菜呢？哈哈，何等的胸襟意境！老芹与老秦谐音，谐趣独具，意韵悠悠。秦兆阳的女儿名叫秦晓

晴,晓晴与小芹谐音,老芹与小芹,父女知音,父女情深。女儿秦晓晴在回忆父亲的长文《父爱永存》中体悟到父亲取“老芹”笔名的深心:“父亲有一些笔名,但晚年在字画的落款上用得最多的是老芹二字。大家都说好,一为谐老秦音,二是淡雅,三是幽默中不无沧桑之感。”然而,最具丰富而深刻的沧桑之感正是秦兆阳从何直到老芹的人生历程啊!诚如秦老的诗句——

历史的河流啊,长流不息
流的是历史的深沉的思绪

原载 2004 年《问鼎》第二期

迟到的悼念

——怀念秦兆阳老师

陈世旭

在我步履维艰的文字生涯中，不知得到过多少让我铭心刻骨的帮助。有的帮助出现的时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二十年前的一天，当我突然接到下面这封信，真是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陈世旭同志：

我们未曾识面，但前几年读过你的《小镇上的将军》，至今印象颇深。近来从吉晋东同志处得知你对文学创作虚心而且认真，作品不断有所进展，非常高兴。目前文坛上轻率之风日盛，像你这样深知写作艰难的同志实在不多，使我不禁要引你为同调。也许我们在年龄上有所差异，愿与你成为忘年之交。如有新作，如蒙惠寄，当以先睹为快，如你愿意，我会给《当代》发表。

敬礼

秦兆阳

1984. 8. 4

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姐姐的高中课本上见到过“秦

兆阳”这个名字,后来又知道他是“大右派”。对我来说,所有这一类人都肯定不是凡人,即便是“坏人”,也是伟大的“坏人”,一般人只能是仰望。这样一个像星星一样遥远的大人物现在忽然给我来信,要跟我“成为忘年之交”,真让我不知所措。

我1979年在《十月》上发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1980年,由《十月》推荐到中国作协第5期文讲所(文讲所据说是丁玲创办的,办了4期,就因为“丁、陈反党集团”案停办了。“文革”后续办,故称“第5期”)学习;半年后回到江西,被有关部门从县文化馆调到省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先前在县里舞文弄墨,玩票而已,而今事惹大了,实不知怎样当这个“专业作家”。之后有两年时间,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苦苦写出的东西,屡遭退稿。1984年,情况似乎稍稍有了一点儿转机:短篇《惊涛》给我带来第二次全国奖,中篇《天鹅湖畔》也多少有一点儿反响。但我的状态仍旧是糟糕,对自己全无信心。

秦老信中的“吉晋东同志”是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晓蓉老师,她来江西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的会,不知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回去也不知怎样向秦老讲到了我,使我收到这样沉甸甸的一封信。我感激她,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荣幸难于承受。

回信折磨了我好几天,比写一个中篇还难:

秦兆阳老师:

您好!

接到您8月4日的信,先是一惊,继而是非常感动。这使我惶愧不已,真是不敢当。这之前,我做梦也不敢想这样的事,尽管您的爱护青年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并不是“未曾识面”。我是有幸见过您的。第一次是1980年春,《人民文学》请您给我们几个人(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天津的冯骥才)开小座谈会。我那次是进京领奖。

您当时用很大篇幅谈了《小镇上的将军》。我紧张得要命。那时候,我是莽莽撞撞地很紧张瞎闯到文坛的,对文学创作远没有您说的那么多自觉性。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获奖作者吃饭,您很诚挚热情地希望作者们在“人文”出书。这也使我很感动。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用得着约稿吗?第三次是您到作协文讲所来讲课,我就坐在下面同您正对面的第二排座位上。后来,您是蒋子龙、陈国凯同志的指导老师,还有古华同志也得到您的热情扶助,我从他们那里也常得到一些关于您的信息。我这人很没出息,加上久居乡间小镇,造成我的孤僻拘谨,任什么场合也绝不敢趋前的。何况,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以能到这种场合上来,完全是由于幸运、机遇。

从去年起,我开始有计划地对原有的生活积累作了一些浅开发。这次寄您指正的“下湾洲纪事”两篇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下湾洲是我插队的地名化过来的,以此寄托一点儿怀念。我已用这个题目写了两篇,在《文汇周刊》发了,往后我还将写若干篇。一方面由此对短篇写作作些摸索,另一方面希望由此增加一些技术上的准备,写这些短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一部长篇作准备。这部长篇背景是十年动乱,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农村的那段经历。这个计划我一再提起,又一再搁下,一是怕才力不够;二是我又有些好高骛远,不太愿意用一些浅薄的牢骚或豪言壮语,或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赚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眼泪。但我觉得,我还没有把握站得很高。您在文讲所讲课时,讲历史的大真实给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强烈。可以说,您那次讲课,是我一再放下这部长篇写作的一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历史感,不能使人增加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不能增加人们对民族以及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自信心,那是很难谈得到真实的。我担心的就是我还不能把握这种历史的大

真实。这部作品写完之后,我大概顶多还会写一部现实感强些的长篇。力量大概也就会耗尽了的。与其写些敷衍的文字耽误读者的时间,就不如老实罢笔。这就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计划。已经耽误您许多时间了,不写了,很对不起。

我非常感谢吉晋东老师这样非常热情、热心的人。在我略有一点儿进展的时候,就给我极大的关注。你们这样对后进的关心,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特征吧。这种无私、真诚的关心,对一个在艰难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温暖。

寄去的这两个短篇,请您教正。这两篇的想法是对现实生活提一点儿探幽的意思。有些至今仍对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人,肯定认为,道德同金钱反比,这在当前现实中看,自然是很陈腐的观点。但反过来,绝对认为成正比也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没有人明确这样说,但有些文学作品却是这样表现了,似乎农民有了钱,就什么都变了。灵魂深处的因袭的负担就那么容易消除了吗?毫无疑问,净化和美化灵魂,对任何人都是必须的。而生活是光明的,生活的趋向更是光明的。这些意思小说是否讲清了,我也没把握。只是一心想尽可能把短篇写短点。您看不行就退给我。如觉得可发《当代》,我自然很高兴。由您转,编辑老师会不会怪罪我,说我这人不像话,竟让您劳神?我有些担心。我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治血吸虫病,打算不久出院后,写个扎实些的改革题材的中篇给《当代》,如能写出,到时再打扰您指正。不过也可能写不出。最近一段我想集中精力把《下湾洲纪事》一组十来个短篇写出来。

好,再不打住就真不像话了。您那么忙,我的字又像狗爬,改也改不了,真是惴惴。

叩颂

撰安！

江西省文艺研究所陈世旭

8月12日敬上

如今看来，这封信知人论世的幼稚和浅薄是再明显不过的。就秦老来说，敬业、责任感、对青年的关爱，这是一种品格。任何社会都会有具备某种品格和不具备某种品格的人。就小说来说，这样无知可笑的认识，能写出怎样的“佳作”来，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除了那两个加起来不足一万字的小短篇，我手头上什么稿也没有。我把小说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明明知道那两个短篇毫无意思，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现在却寄给了“秦兆阳”，并且指望《当代》的发表。真是神差鬼使！人要是犯起糊涂来，根本就无可救药。

更使我觉得罪过的是，秦老竟然没有嫌弃这样的文字垃圾，而且看得极为仔细，写了极为仔细的意见。其字端劲，一丝不苟，其心切切，恨铁不成钢：

陈世旭同志：

首先得说明：我不是退稿，是就原稿跟你交换意见。至于我的意见对不对，则由你考虑，也许可供参考。

1.《恩怨记》的缺点，我认为正如你来信所说的，把握历史感不够。……

这篇东西如果抓住代仁和性格上的这个“聚光点”来展开故事情节，那就可以删节许多无用的叙写，而把重点放在分家前后的情节上。

……

这样，小说就有味道有深度了，就不是“照搬平庸的生

活”了。

2.《天仙配》的缺点是揣度人物心理不够。

……

3.从这两作品看,你还没有学会在描写、用笔、表现内心等方面“爱抚”或“抚摩”你所喜爱(你应该喜爱)的人物。必须比所写人物站得更高,从高处透视他们,然后抓住情节(关键性的情节),着意写他们的可爱、可同情、发人深省的言谈、思想、举动、行为等。这样,短篇小说方能写得短而有味,才能生动活泼、文浅意深。

从来信中看出,你的确是对文学事业态度比较严肃,所以我也无顾虑地对(你)细说。另外,切不可“就事论事”。比如,你想通过这两个故事说明“富了不见得就思想坏了”。但如果不是主要着眼于人物性格——把它想透,并产生富有表现力的形象,那就是把人物当棋子,用以表现一种观念,其结果是艺术上思想意义上都不够成功。

敬礼

秦兆阳

8.20

我很难描述接到秦老的这次来信时的心情。有一点儿如释重负:总算了结了一次出丑。更多的是为他老人家难过:以他那么殷切的期望和那么滚烫的热心,却错爱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庸才。秦老在信的一开头就小心翼翼地说明“我不是退稿,是就原稿跟你交换意见”,但我知道,他是生怕挫伤了我的自尊心。那稿子其实是无从修改的,朽木不可雕。他煞费苦心出了那么多主意,简直恨不得手把手帮我写出来,我却根本没本事实实现他的意图。

我没有再翻那稿子，也没有给秦老回信。那些日子，我长久地把自己反锁在房里，静思默想。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此罢笔，另行择业；要么咬牙挺下去，看看还能干点儿什么。结果是选择了后者。这选择的最重要的心理根据之一就是：不能辜负秦老！

后来的几年时间，我努力给秦老主编的《当代》杂志写稿，稿子都直接寄给编辑部，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秦老。我是希望一旦有稿子得以发表，能让秦老得到一份意外的欣慰。遗憾和无奈的是，我笔力不逮。

在前后十几年时间里，我给《当代》寄过两个中篇、两个长篇，只有一个中篇勉强留用，刊发以后毫无反响，还不知道秦老是否看到——那时他似乎退休了。我终于彻底死心，对自己不再抱非分的希望。惟一能指望的就是所有像秦老这样错爱过我的人尽快忘记我。

但我却永不能忘记秦老。忽然从报上看到秦老过世的消息，脑子轰然一下，几乎傻了。看到这张报纸已是秦老过世几个月后的事。这样一个老人，一旦过世，本是最值得我哀悼的人之一，我却错失了机会。从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之后，算来已是十年过去，因为我的偏执，我没有给他回信，没有再见到过他，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我们失去了任何联系。现在，连这联系的可能性也永远地失去了！

尽管如此，在心目中，秦老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对我的影响，在我的写作里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每次写稿、寄稿以及稿子发表出来，我总会莫名地想起秦老：他会有什么意见？他会看到吗？2002年我写中篇《救灾记》，主人公是个老编辑，给他取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姓秦。事后发现，这个人物身上实在有太多秦老的影子。

一直动着念头写关于秦老的文字,但以我始终的迄无成绩,拿什么告慰秦老?这样想着,又屡屡把念头放下。2004年8月初,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甘肃采风,其中有秦万里兄,好几天之后我才偶尔听说他是秦老的公子,此前我只在《小说选刊》上见到过这个名字。此番结识,他的朴素热诚,有识见而毫不张扬,处处透着秦老的风范。

那天我们闲坐在拉卜楞寺主殿的台阶上,我向他说起秦老,说起我的遗憾和无奈,说起我的错失,说起我多年来那些提起又放下的念头,他静静地看着我,若有所思。

从甘肃回来不久,接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署名“秦晴”的信,从信上知道,“秦晴”是秦老的女儿,随信附来了前面已经全文公开的我在1984年给秦老的那封回信的复印件。我想,这应该是万里兄回京后在家里讲起我们在拉卜楞寺那次谈话的结果。

秦晴的信中特地说明:“友人来信,我父亲留存的不算太多,这是其中一封。”这使我再一次格外清晰地感到了肩上的沉重压力。二十年来,这压力其实从没有放下的一天。它使得我的做人和为文都从不敢稍有懈怠。

不幸的是,尽管不可谓不努力,我却始终不能够越出自己的平庸。在二十年前给秦老回的那惟一的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的写作状况,我说:“……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如果说那封信通篇是那么幼稚和浅薄,这句啰啰唆唆的话倒是一个老到的预言。直到今天,我依旧确实没有找到自己的职业自信,除了数量(其实也很有限)上的平面积累,别无建树。惟一能最大限度做到的只是安守本分、力求真实,断不敢哗众取宠、欺世

盗名。这样,对一个不才弟子,九泉之下的秦老纵不能因我的长进开颜,却也不至于因我的劣行切齿。以其对我的寄望之高和错爱之深,如此告慰也许太过苍白,但对于一个在物欲横流的生态环境中苦苦挣扎的俗物,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2004年10月11日,是秦老去世十周年。这一则苍白的文字,就算是我对一位仁厚前辈的一种迟到的悼念吧。

秦老安息!

2004年8月28日

原载《中国编辑》2004年

长相忆

——记文学前辈秦兆阳先生

李梦秋

秦兆阳这三个字,最初出现在我眼前,那是1956年在朋友家里做客,无意中从一本高中语文课本上,读了他描写北方农村的一篇小说,那细腻的笔触,人物形象生动的描绘,深深地吸引了我,不忍释卷之余,从此便记住了秦兆阳这个名字。

万万没有想到,三年之后,我和这位全国闻名的秦兆阳,竟然生活、工作、相处在一个单位,长达五个年头。

曾记得,1959年的一天,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中年人,挟着一副简单铺盖,到柳州机械厂来“劳动锻炼”。他独自一人,到厂图书馆背后一间小小的、黑黑的冲晒照片的暗房里定居。他身高单瘦,如果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则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在那到处是钢和铁的切削、电焊弧光闪闪、火红的重锤锻打、上千度的冲天炉铁水浇铸的柳州机械厂,他能做什么呢?考虑再三,只能让他干点轻活,在厂工会抄抄写写打杂,否则,下车间与其他“老右”捞堆干重活,不出工伤事故也会活活把他累垮。在这段时期里,谁都不认识厂工会这个极不起眼的编外人员。

直到有一天，柳州机械厂大门口的花圃中，矗立起一幅巨大的“高歌猛进”宣传画，许多人才蓦然发现，工厂来了个了不起的人才。因为，许多新闻记者来厂采访，几乎都要把这幅宣传画收入镜头。外地领导、兄弟企业来厂视察、观光，对这幅画无不交口称赞，认为这幅画的构思新颖独特，气魄恢宏，它较好地体现了柳机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康庄大道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擂着金鼓，一路高歌猛进，屡创生产、科研佳绩，令职工和外来观光者精神为之一振。加上画旁书法刚劲有力，人们观赏之余，都乐意在画前留影。对这一切，职工们先是感到惊讶，打听是谁画得这么好。终于秘密是保不住的，慢慢地，中国文坛“大右派”秦兆阳的名字，便在职工中悄悄传开了。

出于作家的责任感，兆阳先生默默工作一段时期后，觉得自己在素有文风兴盛的柳州机械厂，应该在培养职工文学队伍方面尽一点责任，于是在一次厂史编写小组座谈会上，他小心翼翼地厂党委宣传部长建议，是否可以协助厂工会办一个小型墙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培养文学青年。这位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部长，虽然知道兆阳先生这番好意，但却沉吟半晌不作答。先生当然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发现，此时他是何等的不安和尴尬。

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尽到了作家的义务，当后来厂史写作遇到了困难，无所适从时，他奉宣传部指示，指导我们详细拟写柳机工厂史写作提纲。他受命后，先让我们详细叙述柳机历史，然后按照所收集到的史料和老职工口述记录，深思熟虑，布局谋篇，和我们三个小青年，足足讨论了一个多月，最后确立了柳州机械厂厂史《金凤凰传》五千多字的写作提纲。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中，大家无话不谈。先生性格沉静，

也许是1957年那场运动，使他变得慎言的缘故吧！每逢工厂史的题外话，都是我们把说笑的话匣子拉开的。什么你在北京工资是多少啦；你的大部头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稿费不少吧？有时甚至怀着“童言无忌”的好奇心问他：“让你‘栽’的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到底怎么回事？”他回答仅是淡然的一句：“有些事是需要具体分析。”这句极为含蓄的话，包含先生内心莫大的痛苦，在那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喧嚣的年代，先生的直抒胸臆岂能为当时环境时尚所能容？先生遭大难而处之泰然，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的仁者胸怀与智者气度，令我肃然起敬！

我们每次与先生闲聊，其实都是一次很好的文学课。最使我感受深刻的，是一次他烟瘾来了，我们趁他慢慢撕烟叶卷喇叭筒的时候，向他请教如何构思小说和在平凡的工作中，发现和提炼题材。他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肯定会有所启发。”于是他详细讲了俄国作家果戈里著名小说《外套》的形成。

先生说，小说的原型很简单：一个机关小职员，买了支鸟枪去打猎，不慎过河时枪掉到水里去了，很不高兴。他的朋友见他失枪闷闷不乐，为让好朋友不难过，大家凑钱，买了一支新枪送他，于是大家都很喜欢，狩猎时收获甚丰，一路高歌而归。

先生说，这个故事情节简简单单，毫无意义，要把它写成小说，从故事原型中是很难挖掘出什么闪光的东西的。可是，聪明的果戈理却把这个平凡的小喜剧，来了个大翻新，结果，小职员们消闲打猎的鸟枪，换成小职员身上唯一一件可以穿着上班装阔免人耻笑的外套。鸟枪落水换成外套被强盗抢劫；朋友凑钱买枪，变成小职员因失去了外套而没了体面，贫病交加；小职员得枪后的欢乐，变成饥寒交迫含恨死去……先生告诉我们，果戈理利用这个平凡的小事件，通过概括、提炼、集中、虚构，重新创造了一个新人物，深刻地描绘了沙皇时代的某些黑暗和机关小

职员穷困悲惨命运,小说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先生还特别提示:生活里永远不会有有一个十分完整的故事等你去记录,《外套》给我们提示了如何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摄取和提炼素材的范例。四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先生讲文学创作的故事情景犹似昨日。

我不忍回忆,先生在讨论工厂史时,每隔些时就要抽烟,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哪有烟哪!何况,先生自从戴“帽子”后,为争一口气,就从来没有领取过每月给他的那份四十元生活费,他掏不出那么多钱买高价烟,即便买得起,他也不敢买,人言可畏呀!我不会吸烟,却深知烟客断烟的难受,每当看到先生从一张旧报纸包里将剩下的一些烟叶碎末十分慎重珍惜地卷进喇叭筒时,我的心就产生一种凄恻。终于,我鼓起勇气,直接去找总务科长,问他要烟。总务科长眨巴眨巴眼睛,望了我好一会说:

“李秘书,你开什么玩笑? 哪有什么烟哪!”

“有!”我当即揭穿他的谎言:“厂党委听取了工会主席的汇报,知道车间主任一级干部,已经有人在上下班的路上捡烟头了,影响不好! 要财务科拿出一点钱来,由你们下农村去采购一些高价烟叶,这通知还是我写的,盖的党委公章哩! 你忘啦?”

总务科长无言以对,笑笑说:“李秘书你不会抽烟嘛!”

“我是不会吸烟,可我要烟是为了工作。”

“啥工作? 没听说呀!”

“你当然不会知道什么叫编写厂史……”

“啊! 你是要烟给那个姓秦的?”我话没完他就打断:“这不行! 这烟规定只给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工段长一级都没份,又怎能给他? 别人会骂我丧失立场的。”

我一听气往上冲,“你把党委秘书的那份给我! 就不存在什么立场不立场了,快拿来!”

“李秘书，你不会抽烟嘛！还是留给会抽的吧？烟不够分哩！”他还在坚持。

“我现在会抽烟了！烟瘾大着呢！”我开始耍蛮了，硬是从科长手里夺走了不该属于我的那份福利，这是我在生活小节上的第一次恃强。

一斤烟叶送到先生手上时，他有说不出的高兴，而我却不胜凄楚！

一次在讨论写作文体时，我问先生：“有一种文体，既不用第一人称，也不用第三人称，而用‘你’来写，它叫什么？”

先生说：“这是书信体。用这种文体来写作的确很少见，因而许多文学青年对它陌生。”

几个月后，《广西文学》月刊发表了先生用书信体写的小说，题目是《一封拾到的信》，我读后猛然醒悟：这是先生为回答我的提问特地写的范文。当他把载有这篇范文的《广西文学》默默地递给我时，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在我心中掀起一阵狂浪！

一九六〇年六月，因柳机一贯重视企业文化，教育、文化艺术、体育都较出色，尤其是柳机业余歌舞团，在业余、自愿、小型、多样方针指引下，十多年来，在创、编、演方面作出了成绩，频频获得市、地区、自治区会演多种奖励。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全国职工文艺大会演，柳机一批文艺精英，带着自编自创自演的文场歌舞《游春》，文场舞剧《出嫁之前》，山歌剧《找对象》以及许多歌唱节目参加，获得演出优秀成绩。为此，柳州市事前赠予柳机“文艺活动中的一面红旗”称号，颁发奖旗，并推选李梦秋出席一九六〇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全国文教群英会）。会演结束后，柳机的全部演职员留在桂林，

参加长春电影制片厂《刘三姐》的拍摄。事情是如此重要,可我总没有把出席群英会那份“经验总结”写好。写了两次,都被市里审查退回。我十分难堪,没法,我只有在下班后,钻进了兆阳先生下榻的那间晒相暗房,请他救救我。

先生详细看了我那被退回的文稿不禁失笑,说:“你在编演唱词方面有些小聪明,可在总结文字上却差劲,你知道两次退稿问题在哪里吗?”

我木然地摇摇头。

先生说:“问题出在你文体运用不对路。”

“不对路?”下面的话我不敢在老师面前说出口,但心里却在说:怎么不对路呢?总结群众文艺活动方面的文稿,用生动活泼的文词来表达不正是很对路吗?

先生似已看准了我之所想,说道:“经验总结最好不用文学的语言和手法,这在目前是绝大多数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长期以来,总结经验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所以……”

“可是我厌恶这种干巴巴模式!所以……”

“所以你的文稿不逗人喜欢!”

我沉默了……

这一夜,先生就这个问题,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也就是单独地给我上了一课。他讲道……

那是一八二四年的俄国,年青诗人普希金在伏隆卓夫伯爵的衙门充当小吏。因普希金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不愿阿谀谄媚,所以伏隆卓夫很冷淡他,还不时傲慢待之。普希金非常生气,可就在这时,伯爵却发给他一纸委任状,叫普希金立即到农村去,调查蝗虫灾害并设法消灭。这么件灭蝗大事,怎么可能由普希金个人所能完成?普希金气得差不多想发疯。他知道,伯爵不是把他当诗人看,而要把他当个衙门小吏来使唤。他想当

即拒绝,但朋友们劝他别这样,否则后果是严重的。普希金忍气去了,回来时,他给伯爵写了这样一个报告: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讯!

伏隆卓夫看了调查报告勃然大怒,认为普希金玩世不恭,加上他在社会上参加了一些集会活动,行为不端,立即撤职,押送原籍,由当地行政长官监视……

先生告诫说:“普希金是个诗人,他在任何时候都喜欢用诗化的语言,这不一定好,官场有官场的规矩,加上他的调查的确有玩世不恭之弊,所以倒了大霉!你是柳机党委秘书,一切公文往来文字,切不可运用文艺笔调。看来,在例行文牍方面,你喜欢也好,厌恶也罢,你还得耐着性子学一学。”

先生一席话,说得我默默无言。

于是先生便为我修改文稿,反正先进事迹文稿上都有,他只是上面东勾西涂,再在每个段落,加上当时流行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所谓“经验”,一篇相当“规范”的经验总结便完成了,通过了。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我坐进了人民大会堂,受了奖,听取了十来天的经验交流。惭愧!

赴京前,我问先生是否想与北京亲人联系。他摇摇头,半晌,似有所感地说:“北京的家现在仅是一间空屋。”

我还不忍回忆,先生在结束了柳机几年的“锻炼”之后,一天,他从那间狭小的暗房搬出,回到柳州市第六中学他妻子的住处。这时,他行李虽少,可书籍却是满箱满袋的了。他不好意思叫别人帮忙,更不好要公家派车送,独自一人,一件一件气喘吁吁地运到公共汽车站。恰巧这时我经过这里,吃惊之余,不觉埋

怨。先生涨红着脸，喃喃地说：“我……不好惊动公家。”

我的鼻子忽然一酸，心想一个延安时代的作家，三八式老干部，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抗日战火纷飞的年代蹲窑洞，出没于荒原或青纱帐中打日本，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人物，因一篇学术论文有争议被贬戴帽且不说，怎么在搬家困难时，连请人帮个忙要个车都不敢呢！先生也太拘谨小心了！这时刚好有一辆小吉普空车开出厂，我拦住了它，和司机一道连人带行李送到市六中楼上。

他为此显然激动不已，随即从书箱中摸出一本厚厚的书——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著的《猎人日记》。他说：“我现在不在柳机住了，今后接触肯定会少，这本书送给你。屠格涅夫写农村生活，文笔十分出色，你细细研读，对你写作会有帮助。”就是这一部《猎人日记》，从六十年代一直伴我到跨世纪的二〇〇四年，“文革”中，我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被抄光了，独有《猎人日记》逃过了歹徒的脏手，这是因为我的俩孩子睡熟了，把它压在屁股下才幸免于劫。这大概是我和先生的一番情结吧！

先生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奉调去南宁。一次他因事返柳，把我们写工厂史的三个小伙子叫去柳州饭店。时隔几年他仍念念不忘柳州机械厂厂史，建议说：“《金凤凰传》，书名有些花俏，不如改为《艰苦创业》朴实。”非常痛心的是，史无前例的灾难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这部二十多万字的《艰苦创业》被斥为大毒草而付之一炬，先生的一番心血尽付东流。

不久南宁方面便有人来向我调查，要我这个也被扣上黑帽子的人“立新功”大胆检举揭发秦兆阳在柳机活动情况，对文学青年散播了什么言论等等。我深知“立新功”将意味着什么，于是，当派来的两个搞政治阴谋的外调人员，所获仅仅是“秦兆阳在柳机几年一贯沉默寡言”的旁证时，悻悻而去。

悠忽之中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一九八六年，昔日是小伙子的我，因执着于文学，五十七岁就请求退休，领取打了折扣的退休费，受聘于柳州市文联，协助蒙智扉先生办《柳絮》文学函授。不久，老蒙调市委社科联高就，《柳絮》文学函授业务便压在了我的身上。这时，我又想起了秦兆阳，我写信给他，请他担任函授院顾问。他很快就回信说：“你们没有忘记我，我也没有忘记你们……顾问之事，顾而不问，反而不妥，你若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书信联系、研究……”并且给我寄来一本长达四百二十四页的书——《文学探路集》。这部鸿篇巨著，是先生一生研究文学的结晶。于是我又一次读到几十年前，他写的那篇引起中国文坛轩然大波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感叹之余，复又在书的另一章读到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打倒“四人帮”后他在中国第四次文代会第三次作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现实主义——艰苦的道路》，更是感慨系之！这时更使我油然想起他在柳州机械厂那几年中，对文学青年的孜孜辅导，海而不倦。先生毕生都在辅导、探讨文学。一部《文学探路集》，记载着先生在文坛上的每个脚印。作为曾面聆先生教诲的我，怎能别无心境？我不仅将此书珍藏，并在《柳絮》函授教材上，转载先生的许多作品——《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文学心潮录》、《形象与感受》、《理想与人物》、《概念化公式化剖析》等等，让“柳絮”文学函授院四万多学员，都能享受到我曾领受的教益。先生虽然没有正式担任顾问，实际上先生是我最好最负责的真正顾问。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北京传来噩耗，秦兆阳先生因素有心脏病，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又引起心肌梗塞，抢救无效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先生逝世的消息使我大感意外，我总认为他不该在这个年龄去世，老天应留给他更多的岁月，让他有更多的翰墨遗留人

间。他在病前还对人说过：“我的文章没有做够、书没有读够，画没有画够、字没有写够、人没有做够。”五个不够，概括了先生对人生的抱负与遗憾，也反映先生的多面才华。昔日矗立在柳机厂门口的巨幅和劲道的书法已尽为人知，而他那斗室暗房中的一幅“竹蝉”条幅，却是鲜为人知，那透明立体感的竹节，栩栩如生，蝉儿栖在竹枝上，似在鸣唱，先生把国画技巧展示得可谓极致。先生的去世，使文坛陨落了一颗灿烂的明星，共和国失去了一位坚持真理的卫士，广大文学青年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更不忍听到的信息是，先生生前十分怕冷，几年前医生就劝告切不可受凉，否则会引起并发症。北京最普通的住宅楼里都有暖气，然而没有一间是属于他的。原因是一九五七年他戴上“右”帽后，深知前途暗淡，在中国作协肯定呆不住了，就倾全部积蓄，在北池子买下一套平房，安置家属，谁知，右派分子的家属，有房子也要被撵出北京，二十多年后才房归原主。因为自己有这套老房子，单位不便再给他分新房，他不是那种能搞几套房子的能人，他又对这老四合院有着特殊感情，舍不得丢弃，于是在北京长长的冬季里，只有围火炉取暖。为免感冒，只好穿着棉衣戴着棉帽睡觉，起夜上厕所方便。谁料，就这样一个中国老百姓最容易碰到的难题——住房问题，断送了一位资深老作家的生命。我曾天真地想，当年他若是定居在气候温暖的柳州多好。

更令人感叹的是，他病后，因为不是部级干部，只能住进三十人的普通病房，先生安之若素。有一次他突然发病，紧急情况下，送进海军医院小病房，他心中很是不安，向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当代》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唠叨：“我们出版社没有钱，我的行政级别又达不到，只要能治病就行了，何必呆在这高干病房里！”病况有所好转后，他坚决地、逃也似的走出了高干病房。

当他的病又一次发作时，他自料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突然栽

倒,他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把在柳机暗房里就已构思成熟,并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两辈人》写完,其间又经反复构思,易名《大地》,其含意更为深远。五十七年前,他还是一个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小青年,提着一只旧皮箱告别亲人和故乡的热土,投奔延安。他走出了很远,回头看时,看见母亲依然站在湖边望着自己,她的目光灼热。从此这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他。他曾对大女儿说:“母亲的眼光盯了我一辈子”。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关注下是幸运的,是充实而强大的。这母亲也是他的大地,他的民族。

一九八三年秋天,兆阳先生写完了长篇小说《大地》之后,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

莫道人生易老,苦辣酸甜味好;
且喜大地多情,天涯处处芳草;
若无酷暑严寒,哪得绿溶春草;
白头犹自繁忙,只因吐丝未了;
回头无愧于心,始可安然定稿。

先生走了!无可挽回地走了。走得那么安详,去得这么仁义,在他病前,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位副部长在他家做客,言谈中,这位副部长惊诧发现,先生对机械工业竟谈得条条是道。这位新上任的副部长哪里知道,先生在广西机械工业的摇篮——柳州机械厂,“劳动锻炼”长达五年啊!先生毕生探讨文学,古稀之年仍执着地在文学领域中“探路”,其治学精神和扶持青年进步的学者风范,实为后世师表。先生去了,永远地去了,我没能和先生见上最后一面,唯有遥望北方,痛心地吟出一首古老的《葬歌》:

留不住你啊!老师!

像春天留不住桃花；
让你去吧！随春风飘遍天涯……

留不住你啊！老师！
像青春留不住岁月；
让你去吧！两鬓终会变白发……

留不住你啊！老师！
像芳草留不住东风；
先生去吧！杜鹃为您啼血泣晚霞！

2004年5月5日于柳州

何直文章惊海内

——记秦兆阳先生

王培元

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编辑部，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楼下。我刚到人文社时，《当代》的主编是秦兆阳。我曾问一个老编辑：“这个秦兆阳，就是当年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署名‘何直’的那个秦兆阳吗？”他反问道：“那还有错吗？”

1986年4月16日，出版社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建社三十五周年暨“人民文学奖”颁奖大会，秦兆阳也出席了。他是获奖者，获奖作品是1984年在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他坐在台上，人瘦瘦的，头发花白，戴着深色镜框的眼镜。只远远地看过他这么一次，此前此后，楼上楼下，竟未谋面。

1985年秦兆阳离休后，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职务，虽仍然是《当代》主编，但他很少到社里来，就再也没有和他见面的机缘了。

在友人和同事的印象里，秦兆阳“瘦长身躯，一脸深沉、凝重、寡言；常爱侧身枯坐于不显眼的地方，不惯或不肯在人前抛头露面”。他“性格内向，郁郁寡欢，难得有快乐的时候”。

有人注意到，在社里的一次业务性会议上，他“动作颇拘



1956年夏,秦兆阳和严文井在小羊宜宾胡同《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严文井任主编,秦兆阳任副主编

谨”,“抽着烟,很留心地听着别人的议论,目光随着发言人的转移而转移,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讲话”。在1978年人文社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也发了言,“声音徐缓,温厚谦和,没有文人堆中常见的慷慨激昂之词”。

1980年1月,他和几位作家去云南和海南岛访问。一路上,他总是以一个姿势坐在汽车的前座上,默默地吸烟,两眼专注地凝视着窗外,别人的欢声笑语,根本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

虽然,他在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但他不参加作协书记处会议,也没出席过人文社的党委会,从不参与社里的行政事务。给他专门准备的办公室,他只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挪威奥斯陆大学曾请他去讲学,他婉言

辞谢了。有一次作协安排他到意大利访问,他执意不去,此后出国的事他不再与闻。

就是这个在众人眼里性格内敛、寡言少语、面容清癯的秦兆阳,在五十年代的那个多事之秋,曾经在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物。

他191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寒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性格就很倔强,因此乡亲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板大先生”。他说自己有“呆气”、“板气”,“又硬、又呆、又傻、又怪”,“傲视一切富有的人和势利眼的人,傲视金钱,甚至傲视一切的人情礼俗”,“对失败和挫折基本不后悔”。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他的书桌上有一幅字,写着“毁誉不计,荣辱自安”八个字。他的书房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副对联:“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这正是他的人格和襟怀的写照。



1979年,秦兆阳与严文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时二人均已年过六旬

《大地》的责任编辑彭沁阳告诉我：“秦兆阳人很质朴，不喜欢虚的浮的花的不实在的东西；和他在一起，心情特放松，他愿意听你讲话；别看他平常沉默寡言，其实内心特别有激情，只要看到好稿子，一下子就会激动起来，不管不顾的。”

一次，一个作者的稿子他刚看了一半，就兴奋不已地给编辑部的人打电话，请作者马上到他家去谈谈。有时，他给作者写信，一写就是三四十页。看到了一篇好稿子，发现了一个新作者，对他来说，是最愉快的事情。他说过，自己“太爱激动”，“爱思索爱放炮”，并认为这种性格，和自己一生的遭遇命运多少是有关系的。他后来的遭际，似乎给那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提供了一个注脚。

1949年，他担任了刚刚创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1955年反胡风时，《文艺报》进行改组，他被调去担任常务编委。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号的杂志上刊登了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到了批评，情绪低落，想撂挑子不干了。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找到萧殷，请他到《人民文学》做副主编，但萧殷一心想搞创作，没有同意。刘转而又找秦兆阳，让他来干。秦兆阳答应了。

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1955年11月，从《文艺报》又回到《人民文学》杂志，似乎注定了他要和《人民文学》有割不断的纠结。这真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不久，人们便对这位主持编务的三十九岁的副主编刮目相看了。

在编务会上，他以一贯的平和语调，却不无豪迈和激情地宣称：要把《人民文学》办成像19世纪俄罗斯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一流的文学杂志；编辑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编辑部要有共同的明确的思想倾向；要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从

1956年5月号起,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还亲自撰写“编者的话”(后改为“编后记”),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据说,他曾对编辑部同事表示,“如果办一个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当一辈子编辑……”还说过:“我若是别林斯基,你们就都是杜勃罗留波夫。”

1956年秋天,他起草了一份锐意革新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共十八条,其中第一条是“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在发表作品上,应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而没有尊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四条是“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明确提出了“正视现实”、“干预生活”的主张。秦兆阳本打算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作家协会也曾印发出来,以供研究。然而,上述文艺思想和创作主张,并未得到作协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刊发出来的想法也被制止了。

但是,主持编务的秦兆阳,仍然在实际编辑工作中,殚精竭虑地思考筹划刊物的改进问题,努力落实改进计划的思路。为了得到作家们的帮助和支持,在北京举行了数次作家座谈会。还委派了几个编辑,到各地访问作家、征求意见、组稿。这一年的《人民文学》,连续刊发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著),《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著),《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著),《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秋耘即黄秋耘著)等受到广泛关注和引起热烈反响的创作和批评作品。杂志的印数一年内由十几万份增加到近二十万份。他主持编务的这一年多,被认为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7年的《人民文学》,继续锐意改进。7月号编辑出版了

“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小说，穆旦《诗七首》等诗，沈从文《跑龙套》、端木蕻良《传说》、汪曾祺《星期天》等散文，果然面貌一新。而此时，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已经拉开大幕。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给创作带来的消极后果，早已引起秦兆阳的不满。1953年6月，他就把自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分析小说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八篇文章，结集为《论概念化公式化》一书出版。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代表中央向知识界的两千名代表发表谈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月中上旬，作家协会党组两次开会，研究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要求作协所属刊物带头鸣放。

在会上，秦兆阳发言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

刘白羽听了，很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

“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应。”与会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也说道，并认为“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

对写文章鸣放的事，秦兆阳很慎重，没有马上动笔，而是在会后邀请《人民文学》的编委葛洛、何其芳、吴组缃、张天翼、严文井，专门进行了一次讨论。他们聚在何其芳家里，就此谈得很热烈。秦兆阳主要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针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种种弊端。何其芳讲到“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提到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

编委们的看法,使秦兆阳鼓足了勇气,最终下了决心。冯雪峰 1956 年 11 月在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讲话,也给了他很大启发。冯尖锐地提出:“苏联文学的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缺乏后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还指出:“历史上伟大的作家们促进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我们丢了”;“我们的文学变成软弱无能”,“没有很好地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家是看到了,但不敢讲话,思想有顾虑”;“文艺作品表面歌颂,不去反映新的困难”。

在小羊宜宾 3 号的一间斗室里,秦兆阳冒着炎热,挥汗如雨,赶写出了几万字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草稿。

先请另一位副主编葛洛看过,提了意见。经润色加工,题目改成了《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后在编辑部内传阅,征求大家的意见。秦兆阳接受了一位编辑的建议,文题仍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

文章又呈送周扬、刘白羽等人阅示,他们看后,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7、8 月间,秦兆阳专程去北戴河,对此文做最后的推敲。之后,署名“何直”,在 9 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

这是一篇声讨教条主义的檄文,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尖锐、大胆、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质疑。文章剖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不够科学”和“不合理性”,及其对文学创作造成的严重危害,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周勃在第 12 期《长江文艺》上,发表了题为《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的文章,呼应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的质疑。

《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在第24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一文,则对秦兆阳以及周勃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取消当代进步人类的一个最先进的文艺思潮”。

对于这样的批评,秦兆阳觉得实在难以接受。没想到自己响应党的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却引起这么大反响,竟被当成了政治性的问题。他感到,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957年1月,秦兆阳请假离开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他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学学哲学,以回答和反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评者提出的问题。

在一次会上,他对周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能讨论吗?我希望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安慰他:“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

3月6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幕了。会议开始之后的第三天,毛泽东邀集文艺界部分代表座谈。周扬发言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很紧张。”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秦兆阳很快就从周扬那里知道了毛的意见,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秦兆阳一直主张,编辑不但要审稿、选稿、编发稿件,还要动手改稿。有些稿子,就是他改出来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发现以

后,颇感意外:“嗨呀,原来秦兆阳就是这样工作的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前,就经过了他认真、细致的修改和加工。

中宣部编印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关于《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这篇小说的报道,想不到毛泽东看了之后,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主张要进行公开批评。顿时,秦兆阳又紧张起来。周扬则认为,共产党员总是经常受批评的,受到批评就有情绪,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

4月16日上午,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会议,初步决定以《人民文学》发表编辑部讨论会记录的方式,将编辑部修改王蒙小说之事公布。4月21日上午,作协党组又开会研究此事究竟如何处理。4月30日和5月6日,作协书记处召开了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认为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是“错误的”,在会上作为重点进行了讨论。秦兆阳专门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会前经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审阅过。

会议认为,秦兆阳对小说文本的修改,强化了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作者王蒙在会上发言说,修改使小说更精练、更完整了,但也使“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

秦兆阳从三个方面,检讨了修改的问题:删去了原稿结尾时林震多少有些觉悟,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一段文字;原稿并未明确区委书记是好是坏,赵慧文说过他是个“可尊敬的同志”,他最后还派通讯员三次去找林震,修改中删去这些文字之后,此人便有可能给人以官僚主义者的印象;修改后林震和赵慧文的爱情关系明确了。

对于秦兆阳的修改加工,王蒙在发言中虽然也表示了某种肯定,但从整体上他是不满意的。他说,原来他是想写林震和赵慧文两个人交往过程中,“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但是,经过编者增补的若干文字和结尾的大段描写,“就‘明确’

成了悲剧式的爱情了”。他还希望编辑在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

张光年在稍后写的《应当老实些》(署名“言直”，载于1958年第3期《文艺报》)一文中，指责秦兆阳的修改，“帮助渲染了林震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删去了原稿中隐约透露出来的那个区委会的一线光明”，“重行改写了这篇小说的结尾，尤其突出了林震对党组织的悲观绝望的情绪……从而强调了这篇小说的消极方面”。

近半个世纪后，王蒙在他的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写道：“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

结果，1957年5月9日的《人民日报》，以《〈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为题，将这篇小说的修改详情公之于众。秦兆阳的压力更大了。他在写给刘宾雁的一封信里说：“我感到威胁最大而且最烦恼的，不是文艺界，而是报社，包括《青年报》(王按即《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他们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和舆论的体现者……在他们面前，谁有中流砥柱的力量？”

4月间，由于秦兆阳不赞成“不要立场，不要头脑清醒，对名人来稿一律照登”的“鸣放”原则，被当做教条主义批评了十来天，一气之下，他请假去了北戴河。

时间刚进5月，北戴河尚无游人。他住在作家协会的一幢小楼里，孤零零一个人，寂寞而又郁闷。每天，除了到海滩上散步，观潮，望日出，看海浪拍击礁石，就是关在屋子里，读书，写小说。

在北京这边,5月14日,刘白羽对郭小川说,秦兆阳认为这次揭露《人民文学》事件,是周扬为了过关,所以首先拿《人民文学》做牺牲品。刘愤愤地说:“这完全是诛心之论。”

此刻的首都文艺界,正在紧锣密鼓地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专门致函秦兆阳,希望作协党组成员的他回京。他两度复信,对周扬、刘白羽等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明确表示反对“宗派主义”的“明争暗斗”,拒绝回去参加这种伤害同志、破坏团结的“斗争”,说“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的、狷介的秦兆阳,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在是非面前,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做人原则和党性原则,而去做一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和政治投机者。

然而,就是这两封信,给他种下了“极大的祸根”。过了一段时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突然被抛了出来,当做文艺界“右派”的典型言论,进行重点批判。这步棋,是秦兆阳所始料未及的。

日渐成为思想文化界整人、打人的一根“棍子”的姚文元,在1957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副题为“同何直、周勃辩论”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一场对秦兆阳的批判拉开了序幕。

接下去的《人民文学》10月号,专门设了一个栏目,发表三篇文章: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段创作上的逆流》、孙秉富《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本刊编辑部《这是什么样的“创新”?》。李文批评《人民文学》“近年来从

理论到实际编辑工作都提倡和宣扬了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创作,为创作上出现的一股‘反党的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文批评“当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右派展开猛烈反击的时候”,《人民文学》“却通过七月号向读者推荐了大量的毒草和莠草”;《这是什么样的“创新”?》是对二百六十余封读者来信的整理综述,这些来信“严正谴责了本刊七月号所表现的背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倾向”。

栏目目前的《编者的话》,不但表示对上述批评和意见的接受,而且还特别指出,“错误的产生”绝不是从7月号才开始,早在去年9月号上就以头篇的地位发表了“具有明显而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消极影响,引起了某些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的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过了一年,《人民文学》的3月号又辟了栏题为“秦兆阳思想批判”的专栏,刊发李希凡的《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樵渔的《秦兆阳眼中的农村》。

紧接着,4月号又专设栏目,发表四篇批秦文章: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左随《谈“毁誉”》、朱寨《秦兆阳的身手》、常础《秦兆阳的前言与后语》。《谈“毁誉”》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挨批之后,秦兆阳在自己的屋里贴了一张纸条,写了一段“毁誉不计”的话,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讥嘲秦兆阳“又毁又誉”,“毁人自誉”,“‘自誉’的时候多”,还说他在一些青年人面前“自比为别林斯基”云云。

5月号又有专栏,刊载的是艾芜《评“沉默”》、贾霁的《所谓“灵魂”的“挖掘”》——可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堪称一场思想讨伐、理论批判的大“围剿”。

1958年1月至7月,作协连续召开秦兆阳批判会,长达半

年之久。还印发了三辑《秦兆阳言论》，以供批判。这场喧嚣一时的大批判，以刘白羽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做总结性的发言《秦兆阳的破产》而告落幕。

刘白羽给秦兆阳戴上一顶“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大帽子，说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他还大上其纲地反问秦兆阳道：“你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攻击，不是资产阶级在最后崩溃时的疯狂反扑又是什么？”刘白羽这篇文章，后来登载于这一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195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默涵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认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文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个系统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不仅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而且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者是这一时期“大风浪中出现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者”。

姚文元则又在1958年第3期《文学研究》上，发表了批判调门更高的《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甚至说“秦兆阳的‘理论’和国际修正主义者是一只裤筒里的货色”，“他实际上是国际修正主义的‘传声筒’，帝国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代理人”。

《人民文学》从1957年12月号起，副主编一栏，陈白尘替换了秦兆阳，葛洛仍然保留着；主编则由原为编委的张天翼，取代了严文井；另新增加了五名编委：袁水拍、周立波、赵树理、艾芜。

从此，秦兆阳从这个他为之奋斗奉献、呕心沥血的国字号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彻底消失了。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叹也夫！

1958年4月12日下午，作协党组开会做出决定，把秦兆阳

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在7月25日宣布他被开除党籍的前两天，刘白羽告诉他，他的结论材料已经交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意思显然是，让他不要再抱幻想了。

秦兆阳如五雷轰顶，如坠万丈深渊。

晚上，他躺在床上，望着深不可测的漆黑的夜，一夜不曾合眼。天不亮，他就悄悄起了床，穿上衣服，像游魂一样出了门，身不由己地在附近的胡同里游荡。

天色蒙蒙发亮的时候，他竟然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刘白羽家的门外。

他站了一会儿，才抬起手来，敲了敲门。

“谁？”好半天，屋里才问了一声。

“我。”

里边半天没有动静。他在房檐下坐了下来，等着里边的人，屁股下的石阶，又凉又湿。

又过了好一会儿，屋里传出了起床声，窸窣窣窣的穿衣声、穿拖鞋声、刘和夫人的说话声。之后，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刘的半个高大的身子露出来，说了一句：

“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嘛！”

秦兆阳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浑身发冷，几乎颤抖起来，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转身就走，突然，有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发现床上没有人，就……赶紧出来，悄悄地，跟着你……你是想最后再求求他吗？死了心吧！没指望了！”

是他的妻子，理解他、心疼他、牵挂他的妻子。

夫妻俩一起走出院子，站在寂静无声的胡同里，抱头痛哭……

秦兆阳被戴上了一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荆冠”，有如“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老胃病犯了，身体垮了，精神溃了”。

绝望中，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悼叶赛宁的诗：“死，容易；/活着，/困难。”他咀嚼着，体味着，又在后面续写了两句：“只有直面困难，/才是真正的勇敢！”

几个月后，他被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发配到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贬谪之地柳州的机械厂，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涯。从此以后，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女儿秦晴没有在父亲的脸上看到过笑容。

1961年冬，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但没有恢复党籍。为此，他不知痛哭过多少回。他这个自称是“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一直哭到1979年被“改正”。但哭泣似乎并没有稀释他的痛苦，有两三回，竟然哭出了严重的眼病！

摘帽后，他也曾想北上回京，但又很犹豫。1991年10月28日，在接受陈徒手关于郭小川1959年挨整情况的访谈时，他说，郭小川有一次找我谈话，说“你在信中为丁玲说话，闯了大祸”；“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他担心自己和当年整他的某些人难以共事，一旦归去，会落得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凄惨境地，还不如留下来。

于是，他决定留在广西，把妻子从京城接来，在偏远的柳州安家落户。儿女们则留在北京。

不久，他暗暗发下宏愿，要写一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巨著，就悄悄地闷着头写起小说来。这就是着力挖掘和描写贫苦农民的革命力量，充满了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精

神和理想主义气息，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平的平原》。后来，又曾改题为《两辈人》。出版时，书名定为《大地》。

直到1979年3月，他的“右派”问题彻底“改正”之后，他才得以重返阔别了二十年的北京。他不愿意再回到让他伤心、痛心、寒心的作协。他做《人民文学》副主编时挂名主编的严文井，已从干校回人文社主持工作，他和韦君宜都欢迎秦兆阳到人文社工作。这样，秦兆阳就到了人文社，担任刚刚创刊的《当代》杂志主编，第二年又担任了副总编辑。

在他这位众望所归的主编的率领下，《当代》杂志形成了“严肃、深刻、尖锐、厚重”的风格，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刊发了《芙蓉镇》、《活动变人形》、《古船》、《白鹿原》等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名著。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原名《遥远的山镇》，作者后来改为《芙蓉姐》，《当代》发表时，由秦兆阳定为《芙蓉镇》。

秦兆阳是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延安和解放区走进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怀有一种系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怀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是把自己的编辑工作，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当做一项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事业，来对待、来追求的。

这是秦兆阳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和他经历类似的那代人的共同点。

他还像在《人民文学》工作时一样，在家里读书、写作、看稿子，经常接待年轻作者，给新作者写信，谈修改意见，有些稿子仍然亲自动手修改。直至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让女儿为他读《当代》上的文章……

他这一生所写的理论批评文章、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加起

来已有数百万字。还留下了十几本战地笔记，是抗战时期他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从事游击战争时随手记下的，非常珍贵。

但他不喜欢别人称他是“作家”，说如果一个人非要有个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他是以自己干了一辈子编辑工作为自豪的。他把自己的包括看稿、改稿、退稿、编稿、谈稿、约稿在内的工作，称为“磨稿”，并有诗叹云：

磨稿亿万言，
多少悲欢泪。
休云编者痴，
我识其中味。

1994年10月的一天，正在编辑室的北窗下伏案发稿，忽然听到了秦兆阳不幸病逝的消息，放下笔，黯然久之。

他1938年就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后到华北大学美术系任教，四十年代在冀中前线从事异常艰苦的革命文艺工作；五十年代他主持《人民文学》的工作，“新时期”以来又执掌《当代》的帅印。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他在半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与当代中国文坛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都命运攸关。

我走了一辈子路，深知走路之难。

我做了一辈子事，深知做事之难。

晚年，秦兆阳在一篇散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浩叹。

他一生的荣辱、悲喜与沉浮，简直折射着一部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想到此，不禁喟然叹息：一个文学时代，“果戈理到中国也

要苦闷的时代”(陈白尘语),随着秦兆阳的辞世,也许永远地消逝了。

2006年1月21日于朝内166号北窗下

2010年4月26日修订

原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培元著:

《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人

——编辑家秦兆阳逝世十周年

杨春兰

也许我们对王蒙、路遥、蒋子龙、陈国凯等这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一席之地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以及发表这些作品的《人民文学》《当代》非常崇敬，然而在这些优秀的作家、作品和刊物的背后，我们却遗忘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他就是这些作品的编辑者、这些优秀作家的发现者和培养者，《人民文学》副主编和《当代》主编——秦兆阳。直到有一天，我的导师告诉我秦兆阳是中国20世纪一位杰出的编辑家，我才慢慢地开始关注他。当我研读了有关他的一部分资料后，一种再现编辑家风采的责任感驱使着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真的想为这位优秀的文学家、编辑家写点什么，因为秦兆阳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和编辑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不平凡的人生

秦兆阳，1916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苦的教师家庭，从小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梦想着将来可以成为一名

画家。他先后就读于汉口市立第一中学、武昌乡村师范、陕北公学分校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曾发表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中篇小说集《女儿的信》，童话集《小燕子万里飞行记》，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穿云山》《大地》，评论集《论概念化公式化》和《文学探路集》等，这为他从事文学编辑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曾任冀中《黎明报》社长，1945年至1948年先后任《前线报》副社长、《歌与剧》月刊主编、《华北文艺》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作为一个大型文学期刊的编辑，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也有理由编辑出一本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刊物，但不幸的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他却因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经手发表了几篇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而蒙冤。“文革”结束后，秦兆阳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北京，于1980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主编，1987年离休后继续担任《当代》主编直至1994年去世。

二、宝贵的编辑思想

1. 做文坛托星人，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1]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

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2. 尊重作者权益，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

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2]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

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

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3. 感知体验生活,融生活于审稿。秦兆阳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他有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这为他审理稿件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基础。《芙蓉镇》的终审过程体现了现实的生活体验对编辑审稿、取舍稿件的重要性。当时,秦兆阳听了龙世辉的口头汇报后,便决定把《芙蓉镇》发《当代》头条。

秦兆阳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参加过解放初期的土改,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作品中涉及的内容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找到原型。秦兆阳曾说过:“编辑鉴审,关键是编辑要有生活,要懂创作。龙世辉汇报时谈到,李国香与芙蓉姐谈话算她赚了多少钱,这种生活我见得多了。这写得很真实,我发表作品都从生活出发……像这些,是生活经验的问题。”^[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编辑鉴审实质上是对社会生活的鉴审,发现作品的含义在于发现生活。

4. 认真对待稿件,坚持“沙里淘金”。编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缔构者,在人类文化的缔构过程中,承担着将优秀的文化传播给读者的任务,所以编辑对待每篇稿件都要认真谨慎,不能轻易肯定,也不能轻易否定,对准备采用的稿件要千琢万磨。

“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这是秦兆阳几十年编辑工作的真实写照。他常常为了编稿子,忘记回家,忘记吃饭,而且从不轻易放掉任何一篇稿子,有时很容易被别人忽视的稿子经他救治都会成为经典之作。肖平的小说《三月雪》是编辑下班后,秦兆阳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

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并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秦兆阳的“沙里淘金”“起死回生”救活了一篇篇稿件,也救活了一个个作者。

他曾说:“有时救活一篇作品就是救活一个作者。”

作为一代文学家和编辑家的秦兆阳离我们远去已有十年之久了,但他的丰富的文学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事业上的宝贵财富,他独特的编辑思想对现今的编辑工作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秦老逝世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作为缅怀!

参考文献

- [1] 陈国凯,《一本书的诞生》,选自《青春》,1981年第12期。
- [2] 叶文玲,《唯向秋风恸——悼恩师秦兆阳》,选自《当代》,1994年第6期。
- [3] 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6页。

黄昏时的记忆

张 洁

什么是“老”？看看旧时的群体照，一边站着的人，一个个地没了，不但人走了，连记忆中的许多事也跟着一起走了，甚至“片甲不留”。渐渐地，照片上只剩下了自己，而这个自己也被自己忘得差不多了。

偶尔，昙花一现地闪过一个记忆。很莫名的，因为那个记忆，未必因为特别而牢记，比如秦兆阳先生。

我和秦兆阳先生不熟悉，很不熟悉，他过世时，我不在国内，连一纸悼念的文章也没有做过。可是那天，眼前突然闪过他的影子，毫无缘由地。在他过世十五年后。

在我们一生中，与之打过交道的人有过多少？到了垂垂老年，能进入你回忆的又有过多少，即使你曾经为之寻死觅活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去过他在五四大街附近的小四合院，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人学”。我那时连走背字，四面楚歌，整治我的人无孔不入，连与世无争的秦兆阳先生也不放过，以为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一些置我于死地的杀手锏。

事后他请我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多说，只是提请我注意。

我和他真是没有什么“交情”，他也完全不必为一个名声不好、文路难卜、默默无闻的小辈操心。

那个幽然深暗的小院，就像沉默不语的秦兆阳先生，缺乏“表演”的嗜好，虽然只去过一次，比起日后见识过的豪宅，更让人难忘，因为它有一种与主人相得益彰的品位。

读过秦兆阳先生的文字，印象中他的文字、学问很深，诗词很有功夫，让我心中倾慕。

不知他的背景，比如是否去过延安？后来才知道他去过。于是为自己的胡言乱语惭愧至深，比如，“写不出小说的所谓文人，只好去闹革命”。

如果想起秦兆阳先生，“沉默”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但他的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一种语言。

其实所有的“沉默”都是语言，有些是“噤若寒蝉”，有些是“默认”，有些是“老佛爷，您圣明”……

而秦兆阳先生的沉默，是“不同意”、是“反抗”。

也许我理解错了，如果我错了，那就恳请秦兆阳先生的在天之灵原谅，如我这样的叛逆者，很容易把他人的心思，按照自己的路子一并思考。

我记得您，先生。

2008年6月

我所认识的秦兆阳

柯云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多部长篇小说是先由《当代》发表,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有《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

那段时间秦兆阳先生已经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任《当代》主编。听编辑部朋友讲,他这个主编绝非挂名,凡刊物发表的重要作品须经秦老亲自把关,他不仅会对稿件提出具体中肯的修改意见,有时还会披挂上阵亲自改稿。

我和秦老接触比较多的一次是长篇小说《衰与荣》发表之前。

由于此前《当代》已在1984年和1986年分别发表过《新星》和《夜与昼》,于是,当我完成《衰与荣》的写作时,时任《当代》副主编的朱盛昌和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亲自到我居住的山西榆次看稿。看稿的过程很顺利,两位均表示满意,又说这样的“重量级”稿件回京后还要向秦老汇报。据我了解,当时秦兆阳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一般稿子就由朱、何两位汇同编辑部的编辑们定夺了,但重大题材或可能引发争议的作品要呈秦老亲自审阅把关,《衰与荣》就在此列。我自忖有前两部作品顺



1992年，秦兆阳与作家柯云路及《人民文学》杂志编辑赵国青合影

利发表为基础，且朱、何两位编辑部负责人十分支持《衰与荣》，秦老那里应当不会有重大问题。然而，就在我回京等待“意见”的几天，编辑部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说秦兆阳先生已看过部分章节，对作品有很大的保留，甚至提出“不发”或“缓发”。

我当然有些“没想到”，朱盛昌解释说，由于视力差，秦老已没有精力看稿子的全部了，只能先听编辑部汇报，然后借助放大镜看可能发生争议或出现问题的部分。《衰与荣》全篇六十万字，描绘了京都近百个人物，几十个家庭，特别突出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心理及挣扎，和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观念嬗变与冲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看，有些内容是“尖锐”的。

记得我当时对朱盛昌颇有些意见，觉得编辑部这样的做法不妥当，一部六十万字的作品，只挑出其中的十来万字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尖锐”内容拿去给秦老审读，很容易通不过。

两天后，秦老请我到他家里面谈，一同去的还有朱盛昌和何

启治。

那是1987年10月，外面还很暖，但屋里阴凉，已生起煤炉，穿着一件中式小棉袄的秦老正拿着放大镜坐在沙发上看稿。见我进来，秦老笑吟吟地站起握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并不谈稿子，而是拉家常问起我在榆次的生活，平日怎样写作。听我说除了写作基本不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和应酬时，秦老脸上现出真诚的羡慕，说：“你们是赶上了好时候，能够在生命最好的阶段写作，而我，现在虽然有很多想法，但身体已经不行了。”

秦兆阳先生的遭遇我早就听说过一些，也算文艺界比较著名的“右派”了。1957年，他因发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受到批判，继而被打放到广西柳州工厂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回到北京。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秦老刚刚四十一岁，正是我完成《衰与荣》的年龄。想到这些，不由得对老人更多了些理解和尊重。秦老显然并不愿回忆历史，很快把话题转到了现实。他说自己现在身体不行了，不仅不可能去外地旅游，就连在北京文艺界的活动也极少参加。他指着堆在四处的稿子说：“有限的精力只能看看稿子了，是工作，也是一份责任。”

秦老坦率告诉我，《衰与荣》他已断断续续看了一部分，编辑部希望能在1987年的最后一期发表，他还有些犹豫，想和我交换一下意见。他觉得特别需要斟酌的是书中关于上层生活和上层人物的描写，担心会惹来麻烦。秦老说：“对我个人，麻烦是无所谓的，我年纪大了，无官无欲，怕的是给刊物和编辑部惹来麻烦。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阵地很不容易，要好好的保护，不要因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原因而被停刊。”他举了一些被点名和受到处分的刊物和报纸。然后说，我不欣赏匹夫之勇，要的是大智大勇。他又说，你还年轻，创作的时间还很长，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要的是能够长期坚持创作并且作品能够发表，这才是最

重要的。哪怕暂时受一点委屈包括做一点妥协,哪怕有些作品暂时发表不了,都要从长计议。话说到这里,他开始一一历数他的朋友们二十多年前怎样由于一部作品一篇文章而获罪,以至于被戴帽被流放被批斗,他说,虽然现在平反了,但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仍能保持创作能力的更是少之又少。

秦老那天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既要保护作家,还要保护刊物”。

秦老把“保护”二字看得很重,但他又强调,保护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能够“战斗”。他以骄傲的口气一一历数《当代》这些年发表的引起强烈反响的好作品,认为这才是脚踏实地地推动历史。

后来听朱盛昌说,为了更加稳妥,秦老曾将编辑部的全体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都读一读《衰与荣》,并各自谈谈自己的意见。当年那些年轻的编辑洪清波、周昌义等都全力支持了《衰与荣》。秦老终于郑重地做出决定,在当年的最后一期和次年的第一期《当代》全文发表《衰与荣》。

我是又一次在秦老家中听秦老亲自告诉我这个决定的,心里自然很高兴。记得秦老对我说,他少年时雄心勃勃,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办过报纸也办过刊物,算是有些阅历了。但是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在一到五年的时间,发表同一个作家的系列作品近两百万字,为“五四”以来所仅见。这句话落到了我的记忆深处。秦老又说,我要感谢你对《当代》支持。当然,这也是《当代》对你的支持。既然决定发表了,我是主编,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那次谈话已过去二十多年,秦老也早已离开了我们,我常常会忆起与他的这段交往。

怀念秦兆阳先生!

说不尽的秦兆阳

章 仲 锷

1981年我自《十月》调至《当代》杂志时,《当代》是双主编,秦兆阳和孟伟哉。领衔的是老主编秦兆阳——他已过世十几年了,此文权当我对他老人家的祭奠吧。说他是“老”主编,是因为他“反右”之前就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发过一批“毒草”小说(后来被称为“重放的鲜花”),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红豆》(冯宗璞)、《美丽》等,还有几篇报告文学。他不仅是编辑家,还是作家和评论家,书法和绘画也很有造诣,颇具中国传统文人的风范,而今的作家里是不多见了。我读过他当年写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更有一篇“文革”时在“论”上纲的文章,以何直为笔名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江青谥之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算是文艺界的“黑八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获此“殊荣”,秦老发配到广西的处境可想而知。

我到《当代》时,秦老已落实政策回到他当年用稿费买的私宅,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池子的一座小院,由于是坐南朝北,他住的房子总是阴沉沉的,特别是冬日,条件比有双气的楼房

差远了。但秦老很恬淡，安之若素，在斗室里读书作画写文章，因身体不好，很少出门。我的印象里，此时秦老正在写他的长篇小说《大地》，一般约他写稿很难，请他写字绘画则很高兴。他的字和画都很有个性，画的梅竹都是虬枝挺立的老梅和疾风中的劲竹，似乎以此释放他胸中的块垒。他曾送给我和我妻子几幅字画，其中有一给我写的条幅，是拟作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诗句：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我体会这是夫子自况，也是对我的鼓励。后来我还把自家的书房起名“磨稿斋”，请书法家董寿平题写刻匾，悬之门楣。至今睹物忆人，常思编辑作嫁之辛劳和秦老诲人不倦的身影。薪火传承，这样的耕耘者和园丁，已是稀世难寻了。

秦老并非挂名主编，也看稿子，特别是头条。有时几个副主编都去他那个小院“议政”，研究刊物的大政方针。我记得有一些作者都去他家面谈他看稿后的意见，例如刘心武的《钟鼓楼》，李斌奎的《啊，昆仑山》（该长篇小说的名字也是秦老改的）。从他的一贯观点来说，比较看重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不奇怪的。新时期之初文学圈里有一种说法，把当时影响较大的几个大型文学双月刊称为“四大名旦”，即《当代》为正旦；《十月》为刀马旦；《收获》为老旦；《花城》为花旦。之所以有人把《当代》称为“正旦”，是认为它比较“正统”，这点即使今天仍是无可厚非的。或许还是另一位主编孟伟哉的解释比较到位，叫做“稳健的解放派”，其实这也是整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风。《当代》在秦老主持时曾发过一些很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如《布礼》（王蒙）、《代价》（陈国凯）、《芙蓉镇》（古华）、《新星》（柯云路）、《蛇神》（蒋子龙）、《古船》（张炜）、《白鹿原》（陈忠实）等。报告文学如《中国姑娘》（鲁光）、《热流》（张锲）、《励精

图治》(程树榛)、《强国梦》(赵瑜)等,这几乎都是作者的成名之作。出书也如此,历届茅盾奖和其他全国奖以及“五个一工程”等,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名列前茅(例如茅盾长篇小说奖往往每届都五占其二三)。所以有种说法,说人文社“什么(奖)都有,就是没钱”(老社负担重,离退休的高级编辑和职工几乎占总人数的过半)。这是题外话了。

秦老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似乎并未到职。他不仅不曾出过国,连外地也很少去。他并非隐逸之士,除了身体的原因外,据有的同志讲,他其实是看不惯,又不肯随俗说违心的话。几次出国的机会他都推掉。他私下里表示,若人家问起国内情况,如实说那些贪腐负面形象不合适,粉饰包装又做不来,索性就不出去了。也许有人觉得在当今这样的人太迂阔古板,我却以为像这样自砺自重、超凡脱俗、淡泊名利、出淤泥而不染、有古贤士之风的好人,委实太少了。很多作者都为他人的人格力量所感召,像文讲所(鲁迅文学院)第一期他辅导过的弟子蒋子龙和陈国凯,就始终对自己的老师念念不忘,每次来京都要去看望他。

我在《当代》杂志近十年,与秦老相处受益匪浅。我钦佩他的为人和为文(当然还有书画),赞赏他的敬业和治学精神。离开《当代》后我有两个心愿,一是为发他的作品尽点力,一是能够联合社会力量,为他举办书画展或在报刊上出期书画作品的专页。前者我做到了,在《中国作家》上发了他最后的中篇纪实文学《点线之间的笔记》;后者却落空了,只看到恁多不成器的“书画家”办展出专刊,而一介书生的我,在这方面无能为力给秦老完成这桩心愿,十分遗憾。

夫子匆匆归去道山,临终的遗言也如他一生那么朴实,不开

追悼会,没有遗像告别,留下的只有一位老革命、老作家、老编辑的美德和我与许多人无尽的追念哀思。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8年9月2日《采风》副刊

兆阳先生与《九月寓言》

汪兆骞

大凡历代杰出人物之能垂范于后世者，概由于他们具有中国人的正气与骨气，或曰具有高尚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

秦兆阳先生是生于忧患、经历坎坷、死于忧患的作家，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的渊博学识，平和淡泊的为人处世，他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道德风骨，值得人们怀念。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转年又奉调到秦兆阳先生任主编的《当代》当编辑，到先生辞世，凡十五年，先生耳提面命让我受益匪浅，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兆阳先生身体不好，常有小疾，我便向社里要车陪他去看病，又经常到先生家汇报工作，便自然熟稔起来。但后来因《九月寓言》，我便疏远了兆阳先生。关于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退稿事件，多年来不仅外界不知其详，便是编辑部内部也多不甚了了。

政治风波刚刚平息的1991年，一天兆阳先生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去他家。时节是夏秋之交，坐落在北池子的兆阳先生家，菊花开得正艳，先生在四合院深处的书房前散步。进得书



秦兆阳穿棉衣戴帽子围着围巾,在家中工作

房,先生开门见山地说:“已与朱盛昌、何启治两位副主编商议过,我决定将张炜的《九月寓言》撤下来。你与张炜是好朋友,由你亲自跑一趟龙口,将文稿退给张炜。”

我有些不解,因为《九月寓言》是编辑部约稿,经审定通过,决定在1991年第五期《当代》上全文发表,并且已分别进行了加工,我负责“首领之家”等部分。在审读过程中,大家认为张炜继《古船》之后的这部《九月寓言》,是部独特、厚重之作。小说以山东胶东小平原一个村庄的生活为背景,“表现了朴实的土地之子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文明进化所形成的矛盾冲突”,“讴歌了神圣的劳动和坚韧顽强的甚至是原始的生命力”(何启治审稿意见),是部好作品。

兆阳先生做出退稿决定后,沉默了,面有凝重之色。

我有些任性和率直,毫不掩饰地表示不赞同先生的决定。我说,违背承诺,单方毁约,《当代》的诚信何在?《九月寓言》与

《古船》相比，早已收敛了对现代性向往和焦虑的锋芒，从写汪狸镇家族争斗、苦难和变迁，退守到对偏僻穷困的小村生存状态的观照，表达了张炜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对人性诗意的坚守，这构不成对主流权力话语的叛逆和冲击，政治上是安全的。

我还对兆阳先生说，张炜曾对我说过，能够一贯坚持地固守一种精神，即使是陈旧的，至少看上去很陈旧，是并不容易的事。从道义上讲，我们应该支持张炜对这种精神的坚守。

兆阳先生听得很有耐心，但偶尔从他那慈祥而深邃的目光中，我读出了智者对浅薄者的宽容。于是我继续说，《九月寓言》是对物质化现实的绝望后，寻求精神的栖息地。当外界的纷纷扰扰的欲望，终于消融在九月散发着丰收庄稼的芬芳之中，张炜守护住了一个和谐的精神家园。《当代》如能继《古船》之后，再次推出《九月寓言》，或可成就一桩文坛的辉煌。

兆阳先生听完我有些激动的陈述，说：“持有你这样观点的人，编辑部还有些。明天，我到编辑部去谈我的看法，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动身去见张炜。”

第二天，兆阳先生到编辑部作了一个很长的讲话，一是讲刚刚平息不久的政治风波；一是讲特殊形势下的办刊安全；一是很简约地讲撤《九月寓言》的理由。在我记忆中，兆阳先生讲得最多的是寓言的多义性和隐喻性，听罢，我还是不得要领。最后兆阳先生说：我知道有些同志对退《九月寓言》仍不理解，但在非常时期，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也出于无奈，其是非曲直就不必争论了，责任由我承担。

那会开得很沉闷，最后宣布由我来执行退稿任务。

我送兆阳先生回家，有些为难地对先生说，对于《九月寓言》的处理，我尚且想不通，何以说服张炜，先生是否修书一封，免得我交代不清，有辱使命。先生很爽快地点头，让我晚上

去取。

第二天，登车上路，到了济南，又换乘由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朋友准备的汽车，一路游山玩水，到了张炜挂职市委副书记的龙口。老友见面，先叙友情，又看了龙口的好风光，吃了龙口自产的丰盛海鲜，甚是欢愉。到了晚间，张炜带我到他的住处，一边吃西瓜，一边海阔天空地聊，我怎么也不好意思提《九月寓言》。张炜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就从我游移的眼神中看出端倪，他用浓重的胶东口音说：“大哥，你有话要说，尽管直说吧。”

我把兆阳先生的信函递给他，然后从提包里取出他的文稿。那是用三合板夹着的沉重整洁的手稿，如同一件艺术品。这巨著起稿于1987年11月，完稿时是1989年6月，最后改定于1991年4月，整整四年时光，凝聚了张炜多少心血，熬尽了张炜多少精、气、神，以致作品完成之后，就大病一场，住进了医院。

张炜看罢兆阳先生的信，站起身，走到面海的窗前，窗外是一轮明月。他突然问我：“大哥怎么看？”我不能违拗兆阳先生的意见，直接评论《九月寓言》，却顺口说了句萧伯纳的名言——一切伟大的真理，最初都被当作亵渎。张炜笑了，我惊讶于他那脸庞是那么清秀，笑起来充满了自信。他把书稿放在书柜顶上，笑曰：“无法藏之名山，只能束之高阁了。”

回家之后，我向兆阳先生复命，并带回张炜对先生的问候，我还杜撰了一句，说张炜非常理解先生的苦心。先生竟然微笑点头。

说实话，我对先生退稿之举，是想不通的。想当初，张炜的《古船》在《当代》发表之后，有些人对张炜对赵四爷、赵多多等农民革命家的野蛮、残忍的质疑，颇不以为然，认为歪曲了历史，兆阳先生却对张炜说，如果思想再解放一些，《古船》会更深刻，这无疑是对张炜的有力支持。那么，《九月寓言》已从《古船》退

避三舍，缘何要以寓言的多义性为由退稿呢？惟一可以解释的是兆阳先生被那场风波所震撼，思想保守了。是的，兆阳先生因一篇批判教条主义的檄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而获罪，二十多年的坎坷经历，毕竟并不遥远，况且，便是真勇士，也有荷戟独彷徨的时候，有时我又似乎理解了兆阳先生。

1992年，上海《收获》全文发表了《九月寓言》，又一次震动文坛。

那年秋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我在《当代》摊位上当班，兆阳先生应邀而来，在给读者签售之后，已近黄昏，我陪先生在公园散步。兆阳先生竟重提《九月寓言》，他说，当初眼疾甚重，无法全读，看了一部分，主要听汇报。最近他又让家人读了一遍。他说《九月寓言》里的精神固守，包蕴着大地的苦难和诗意的栖息，小说已进入了诗性和哲学的层面。此外兆阳先生仍坚持他对《九月寓言》的批评：处理历史、道德与审美关系上的失当。

我惊惶于先生的“虚己而乐闻”，“不以先进略后生”的精神，改变看法，对《九月寓言》重新作出准确精妙的评价。更让我感动的是兆阳先生虚怀若谷，说对《九月寓言》的错误判断，太多考虑刊物的安全，是初衷，但多虑而失察，酿成判断失误。这是一个老编辑的失职，对张炜不公，对《当代》也是一大损失。

先生说完这番话，似乎得到一种解脱。

夕阳下，兆阳先生凝重的脸庞上，添了些许轻松，眼镜后的目光沉着而悠远。

“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先生的人品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其灵魂朗如日月，清如水镜。在文坛厮混三十多年，我很瞧不起那帮无聊文人。沽名钓誉，蝇营狗苟，而兆阳先生却是“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引一句范仲淹的话，便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流年似水，转瞬就年近古稀，青灯古卷听雨声，半是儒家半释家，我早已心静如水，看淡云卷云舒。寥寂时，客厅里常换挂作家字画，邵燕祥、文怀沙、陈忠实诸师友的丹青墨宝，滋润着我快要结茧的灵魂。有时，也挂秦兆阳先生赠我的几幅竹荷，借以怀念师长。凝视先生的竹荷，我早读出先生借竹荷的风骨吐胸中的块垒。那占去半幅素纸的苍劲墨荷下，是一群游弋的小鱼，挺拔的荷梗支撑的苍老荷叶，为小鱼遮挡着风雨。哦，那分明是兆阳先生对文学对后辈的关爱和庇护，尽管他的双肩是那么羸弱……

戊子年仲夏于抱独斋

2008年

“板先生”秦兆阳

黄秋耘

我在文坛上的挚友，在广州的有吴有恒，在北京的有秦兆阳。秦兆阳宅心仁厚，性不伤物，近似吴有恒，而淳朴则过之。秦幼年时在家乡读子曰馆，乡人都管他叫“板先生”。湖北土话：“板”就是“迂”和“直”的意思。可见秦之迂、直是性格使然的。

一个人小时候“板”一点还不要紧，入世以后还是一味“板”下去，不懂得权变，不知道灵活性，就非闯大祸不可。记得1956年文艺界发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秦兆阳适请创作假在外。大家都知道，秦兆阳从来不会拉帮结派，与丁、陈素无瓜葛之嫌。他不想参加运动，只要静悄悄地躲起来就是了，谁也不会想到他，要把他揪回来。可是他偏偏要引火烧身，主动写一封长信给作协党组书记声言反丁、陈的斗争实质上只不过是丁（玲）、陈（企霞）与××、××之间的宗派纠纷，所以不准备回作协参加运动了，请求作协党组延长他的创作假。由于有这一段话，秦兆阳就非打成右派不可。但这封信的内容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就揪住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来大做文章，硬说这一谬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右的表现。调子是上头定

出来的,谁还敢提出异议呢?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提倡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

原载 10 月 17 日《羊城晚报》

赤壁风骨

——《东坡赤壁文化丛书》序

刘醒龙

拜谒东坡赤壁，最早是在一九八四年春天。

其时还住在山里，因为陪同外省两位文学前辈，而搭乘长途客车前来古城黄州。那一次，我们沿着一条清静的道路缓缓前行，景象分明很陌生，心里却有一种熟悉仿佛是与生俱来。多年后，有机会在这路旁某文化单位工作，父母来小住，才晓得，自己就是在这路旁一所普通房舍里出生的。清静的路悄然通向一扇朴素小门。门后石壁苍红，正在偏西的太阳，诗意地将人带到二赋堂前。

从这以后，不记得来过多少次。在黄州的几年间，因为相隔几百米，不用挪步，站在窗后，就能将越来越沧桑的东坡赤壁揽入情怀。再往后，我这过客一样的黄州之子，又一次离别去远。偶尔有机会回来小住，不只是深情牵挂，重要的是为文之人，面对古来宗师，在品格操守上再行受戒。

要进二赋堂，须得迈过那道高洁门槛。

这样说，非是怀想此地可曾光彩照人。坡仙显圣处，早就是如此落寞寂寥，如此宏阔高远，如此简易却渊博大千，如此素洁



1991年5月，秦兆阳与来京参加青创会的湖北作家刘醒龙、刘益善、陈应松、邓一光、叶大春、徐鲁等合影

而霓裳万方。虽然听不绝大江东去风流浩叹，清凉赤壁与清凉东坡，才是地理人文的天撮之合。正是有此一段天下无双的合璧，汤汤鄂东五水，才没有写成一部从头到尾的天灾人祸血腥乱世史。称为古老也不够形容筑城久远之黄州，岁月城池四围，被新王朝猛将毁了又毁！又被旧皇族顽军烧了又烧！闻风而起的暴众和运筹帷幄的官兵，更将鄂东之地涂炭多少，败坏江山何止千年？东坡之前，一江两岸散落的莫不是社稷碎片。东坡往后，五水其间破碎依旧，所散落的更有家国的灵肉诗情。

是东坡成就了赤壁，抑或赤壁美名了东坡！

天造地设，就是从九天洒落一滴甘露。眉山苏轼断断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做了赤壁东坡，如此归结，只能是神圣引领去向。

想来亦非人道是某时某地某事。当年孤鹤横江，惊涛卷雪，哪会相信小小乡谚：河东三十，河西三十！水天南逝，万顷沧桑。

涓涓细流的宿命，竟然也是望东而去的茫茫大江之茫茫真理！亘古江河，流尽性情之水。烟云过隙，激浪无痕，留下东坡赤壁怀古，更流出对星月山水楼阁怀古之怀想。

一声吹断横笛，吹断的还有江涛，空凭许多乱石淘沙，枯苇残荷，铺陈在诗词清流与天才赤壁之间。果然是大江东去了，滩涂浅水，龟鳖霸道，虾蟹横行，终不过是风尘之数，成不了风流！

于是判断，鄂东之地，物产中最了得的是人之风骨。

不比将帅之争以胜败结论，功名之下万骨横陈。诗文哲理以心灵为天下，以真理为至尊。前者极欲统治生命，后者唯愿生命力不断推陈出新。美学是无需雨露的滋润，风雅是掩映文哲的经典。赤壁之水源流五水之上，赤壁之楼风范古城四围。黄州以远各自拥有如苏子东坡的奇迹：黄侃、熊十力、闻一多、胡风、秦兆阳等，风骨挺拔几乎构成中华晚近以来的精神圣界。

多年前，赴北京某文坛盛会，偌大都城，我等独独寻觅一所古旧院落，拜见在混沌面前特立独行的秦兆阳先生。那清瘦、旷寂、沉缓的气韵，使人在大隐隐于市学说之外，无法不生大傲傲于市的关联。按此品格来分辨，古往东坡，今来赤壁，前有苏子，后继为谁？是才子自风流，有幸得之面授，秦先生思哲其深，才情其远，分明是与苏子风骨相传。一根脊梁无影无形，却顶天立地，扛起飞天横祸，所荫护的是大道之道义，是大德之德行。

本是山水的壁垒，能傲然立世，不只是鄂东学子后续之造化，亦在于诗情弟子们不以先师风雅而附庸，才有东坡赤壁真如圣迹，无以落下坡仙之外半笔污墨。一江流远，惟楚有才，鄂东为最。其言所指，当然是在风华与才情之上，沿袭楚狂屈原的孤鹤与长虹般气节。

有风骨的大地,拒绝生长邪恶奸佞。

东坡赤壁是大道与大德的天赐。有此人文质量,一江五水
终将获得清洁与丰饶。

2009年12月22日于东湖梨园

原载2010年1月6日《人民日报》

醉 舞

李 斌 奎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哦,昆仑山!》。这是一部描写驻守在新疆喀喇昆仑山巅的解放军指战员爱与死的故事。小说原发表于《当代》杂志。当时秦兆阳先生任刊物的主编。负责我作品的责任编辑章仲鄂先生是位热情而极有责任心的长者,他对我说,秦兆阳先生很赞赏你的这部书,他想见见你。我自然十分高兴!其实,在此之前无论是章仲鄂,还是秦兆阳先生我都不认识。他们是从自然来稿中发现并选用了我的作品。那时,像《当代》这种大型期刊的老编辑们不仅功力深厚,而且为人质朴十分清廉。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是纯洁而高尚的。他们一直把培养作家、服务于作家、出版好作品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至今想起来,仍令人崇敬。

那是一个下午,当我走进秦兆阳先生的办公室时,有点吃惊。那间屋子给我最深的视觉印记是——陈旧而简单。而最大最注目的是一张画案。画案上堆满了画稿。我进屋时秦兆阳先生正在专注地挥毫泼墨。虽然刚刚初秋。先生却穿着一件黑色的薄棉衣。身子单薄而瘦弱。当他抬头同我打招呼时,他的深邃而郁郁的目光令人为之一震。

对于先生,在此前我虽未谋面,却早已有知。我的知是因为他的那篇名满中国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此文发表于1956年,而我却是在“文革”时的大批判中读到的。那时,我是一个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文学青年。啃着发凉的糜子面馒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到的。尽管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被列为反党反社会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迁,秦兆阳三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不仅是位作家还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

听了我这番话,秦兆阳先生的脸上居然飘起一片红晕,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说:“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我很少写东西了!得看稿子啊。”先生的话语里带着几分自责几分无奈。

接着我们的话题又转到部队,及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看得出,他对军事文学充满了兴趣与关注。不过当触及文学的评论,听了我对文艺界门户之见及文学评论的一些疑虑时,先生并没有马上答复,他眼睛望着远处,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啊,我们许多的文学评论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文学本身。文学评论不评论文学这是最致命的!”

多少年过去了,当我看到有的文学评论家,或以评论当做做官的垫脚石;或用评论当做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武器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的远见与深刻,即文学评论的泛政治化,与最终的商品化,不但首先废掉了评论家本身,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自然文学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了真正关注文学的评论,像没有了一面照亮文学之路的镜子,文学的被污染与迟滞也是必然的。

每当想到这些时,我常常凝视着先生送给我的一幅画。这幅画是先生的作品,画面上独有一枝在秋风中挺立的荷花。题

款为——“任秋风吹破罗衫羞答答醉舞翩跹”署名“老芹”。如果说一个人在梦中和醉酒时是最真实的,那么秦兆阳先生的一生都在醉舞!他是一位令人崇敬的最真实的文学家与文艺理论家。

→
→
→

1967年，和父亲有关的一段经历

秦万里

1967年的时候，我十五岁。十五年的生活之中，似乎很难找到自己的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我很瘦，还有点驼背，喜欢低着头走路，谁也不看，谁都不理。也根本没有人愿意理睬我。我每天说话的对象，基本上只有母亲。我不需要去上学，因为学校都停课了。但我并不想为了不能上学，向阅读这篇文章的朋友们诉苦。事实上，在学校停课之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我并不喜欢念书，我淘气，经常惹祸，总爱和老师作对。因此，父亲母亲就总是把我带在身边。随着老爹政治命运的沉浮，他们把我从北京带到广西柳州，再从柳州到南宁，从南宁又到桂林。

父亲被调往桂林，是为了帮助当地的一位作者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当时母亲在南宁附近的乡下搞社教，父亲便把我带到了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的住处就在漓江的支流桃花江边上。那一段日子很快活，我们父子俩经常爬上一座美丽的山峰，鸟瞰缠绕在群山之间的漓江，远眺雾气笼罩的苍茫一片的大地。父亲迷上了收藏石头，找到一块漂亮的石头，能让他高兴好几天。我认识了新的同学，其中关系最好的要数李延灵，他的父亲

是个南下干部，担任桂林旁边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母亲是那个县的妇联主任。我们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他是一个快活的男孩儿，很会玩儿，具备了当一个孩子王的能力。李延灵教会了我游泳，然后带我去横渡漓江。我们去爬山去钻洞，晚上回来，附近的桃花江就是天然大澡堂。我还在水里拉过屎，引来在下游戏水的几个女孩子的尖叫和痛骂……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延灵的父母双双遭到批判，又在1968年的大武斗中，双双失去了生命，留下他和两弟一妹四个孤儿……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老爹又被招回南宁，接受批判和改造。

愿意阅读这本纪念集的朋友们肯定知道秦兆阳是谁，我就不介绍了。反正父亲母亲还有我，在1967年的境遇不是很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和我的姐姐一起，住在一个出身好又讲义气的亲戚家里，躲过了最初的运动风暴。后来我随着大串联的浪潮，回到广西南宁市。同在南宁市，我和母亲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广西教师进修学院，父亲一个人住在城市另一头的文化大院。这是因为“隔离审查”，也是为了“划清界限”。但我并不真的那么傻，我很爱我的母亲，也很爱我的父亲，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情感，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本能。面对那种压抑的政治气氛，我抱着一种抵触的情绪。而面对那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我又长了见识，也长了心眼儿，学会了用一个调皮男孩儿的特殊方法，进行自我保护。

回到南宁以后，我又去了一趟桂林，为的是把我和父亲的小家搬回来，当时父亲急急忙忙赶回南宁挨斗，没顾上。母亲也要在单位里随时接受审查，不能请假。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就这么一个小男孩儿，不但把家搬了，还没忘记带上父亲最喜欢的两块

石头。真是倒霉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后来,这两块石头又被我运回北京,摆在了父亲的书房里。

我又见到了李延灵,他帮了我不少忙。李延灵也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他成了孤儿的时候,也只有十五岁。1968年冬天,我告别母亲去冀中平原插队落户,路过桂林时又去看望了他,当时他在桂林郊区某工厂当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是十六块五毛。没有见到他可怜的弟弟妹妹,他们全都进了孤儿院。在那间阴冷的工厂集体宿舍里,两个好朋友合盖一条没里儿没面儿的棉套,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李延灵是个有志气的人。以后,他咬着牙努力工作,陆续把三个弟妹从孤儿院接出来,一个一个拉扯成人,自己也在艰辛的奋斗中成长,如今已经是一个管理三家大型酒店的老总。他的经历,是一段令人心酸也让人敬佩的经历。我们现在仍然保持着友谊。

从桂林搬家回来后,我去探望父亲。我准备了几件从桂林带回来的父亲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个装了红烧鱼的饭盒。几样东西装进一只破提兜里,显得鼓鼓囊囊。那时候,所有的红卫兵们、革命群众们,都眼睁睁地盯着“有问题”的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渴望发现点什么“动向”。所以,这鼓鼓囊囊的破提兜,引来了一点小麻烦。

我骑上一辆蓝颜色的旧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那个破提兜,沿着一条窄窄的甬路,朝大门口方向行进。在拐弯的地方,我被一个人叫住了。我在进修学院的院子里见过这个人,他好像是这里的一名干部。

“小鬼。”在两广这种地方,人们喜欢管小孩子叫小鬼。

我怕的就是被人盘问,如果他搜查我的包,就会发现我是去探望父亲,一发现我去探望父亲,就“划不清界限了”,就会给母亲招来麻烦。但是他在前面挡着,我只好跳下自行车,站住了。

“去哪里？”他用一双转动十分灵活的眼睛，盯住我那鼓囊囊的破提兜，一只手还搭在了我的车把上。

“玩儿去。”

“还带这么多东西？”

“你他妈的管得着吗？”这句话我是在心里说的。我很着急，也很生气，使劲琢磨着怎么脱身。

“带的什么？”

一着急我突然蹲下了，两只手离开了车把，要不是他的一只手撑着，车就倒了。他显然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不由得一愣。蹲下之后才想出来应该怎么办，我干脆坐了下来，开始脱鞋，假装鞋里进了石子。这么一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他帮我扶着车，我坐在地上清理鞋里的石子。他的表情变了，变得有点尴尬，有点后悔，甚至还有点焦急。自行车的支子在左边，而他恰好在右边站着，又不便于转过来把车支上，更不好扔下自行车转身离去。我并不是有意制造了这个局面，一个十四五岁孩子的反应还没有那么快，但我看出了他的尴尬和焦急。有人从边上路过，奇怪地看了我们一眼，别人会以为，他真的在帮助一个狗崽子扶自行车，会说他立场有问题。在那个年代，无论你是谁，只要稍不注意，就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我故意拖延时间，穿上一只鞋，又清理另一只，然后才站起来。

“谢谢。”我接过自行车，飞快地骑跑了。

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竟然让一个小狗崽子耍了一把。这件事情让我高兴，也增加了勇气。我曾经想过，当时他要是抢过我的破提兜，强行搜查一番又会怎样呢？要是他松了手，让自行车砸在我身上，那又会怎样呢？但是他没有，而是在事情变得被动以后，畏缩了。为什么？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真是想不透。

我经常去看望父亲，几乎每次看望都会带去一条烧好的鱼，或者其他的什么可口而又好消化的饭菜。他参加革命之后，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了严重的胃病，吃不惯单位食堂的饭，这样，给他送饭就显得挺重要的了。有了那一次的经验，我特意买回一个扁扁的铝制饭盒，这扁饭盒有一个提梁，分上下两层，下面可以放鱼汤，上面再放点儿别的。这样，当我把装着饭盒的破提兜挂在车把上的时候，它看上去基本上是空的，就不容易招来怀疑的目光了。我还学会了假装从容，就是经过大门口的时候，绝不和守门人对视，而是眼睛看着那块写着“出入下车，来访登记”的牌子，用脚尖轻点一下地面，或者假装抬头看看天上的飞鸟、路边的树梢，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状，骗腿上车，通过关口。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大家一致对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后来有些人发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后可能还会当权，于是便在内心深处有了一些想法，于是便有人提出“欢迎某某某同志站出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干革命”，而有些人却不以为然，一定要“打倒走资派，将革命进行到底”，或者是欢迎另外一位同志，“站出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干革命”。

广西的红卫兵分成了 A 派和 B 派，我们哪派也不能参加，却从感情上支持 A 派，因为 A 派不特别“左”，对“有问题”的人温和一些。父亲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虽然受过不少挫折，却仍然感情用事，不考虑自己的身份，不考虑 A 派势力薄弱，是少数派，竟然表态支持 A 派红卫兵组织，还为他们写了文章。有一次武斗，是 B 派进攻 A 派，地点就在文化大院，他竟然进入了 A 派的据点，对人家表示声援。后来据点被打破了，别人忙着逃跑，他却痛不欲生，差点跳了楼。这一切，都为他今后进一步倒

霉,埋下了种子。

有一段时间,红卫兵们忙于打派仗,放松了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这样,就给我去看望父亲提供了方便。正常情况下,父子俩见面是三五天一次。我们交流各自知道的小道消息,谈论时事和对运动的见解。父亲在“劳动改造”的时候,认识了画家涂克和搞戏剧的郑天键,这两位“牛鬼蛇神”朋友经常去父亲的小屋串门聊天,有时还会在一起下一盘围棋。父亲和母亲的性格不同,母亲考虑问题比较周全,遇到事情比较冷静,但性格比较压抑,总有永远不能化解的忧愁。而父亲则不是,冲动的时候归冲动,快活的时候归快活,比如见到了涂克,见到了郑天键,见到了我。他和涂克聊绘画,和郑天键聊戏剧。有时候甚至还会幽默一把,让那间小屋传出努力抑制的笑声。母亲的单位是B派占了绝对优势,气氛就更“左”,更压抑。所以父亲的小屋,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经常提醒父亲,到了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再那么冲动。

A派和B派都拼命扩大势力范围,占领高楼作为据点,然后在楼房的顶部竖起高高的杆子,杆子上安装好多个高音喇叭,每次播音的开始都要播放东方红乐曲,结束时再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大部分时间用来广播文章口号,攻击对方,某某事件的事实真相,某某组织的严正声明,最最强烈的抗议,最最紧急的呼吁等等,等等,一时间整个城市叫嚣呐喊,好不热闹。还有更热闹的。为了压倒对方,为了争夺据点,便开始了武斗,武斗是逐步升级的。开始的时候,只是用了挤的方法,派一支队伍,硬往人家楼门里挤,里面的人则手挽手地用力拦住,有人“一二一二”喊号子,有人摇动红旗,有人急了,有人恼了,有人动起了拳脚,大呼小叫,臭汗淋漓,斗志昂扬,群情激奋。那场面不仅热闹,还会激动人心,特别是在你心里有倾向性的时候,真有点看足球赛

的味道。我就观看过一次,那一次是 A 派赢了,他们冲进了广西日报。我把消息告诉父亲,父亲高兴了好半天。他天真的希望,A 派能够在运动中取得胜利,这样,自己的前途也许好些。

武斗严重的时候我就不能去探望父亲了,因为道路会被封锁。人们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没有理智,开始使用棍棒长矛、砖头石块。不知是谁还发明了巨型弹弓,将整根的自行车内胎绑在板凳腿上,找来圆滚光滑的卵石当子弹。这样的弹弓射程可达两百米以上,威力相当之大。还嫌不够,有人动用了基干民兵的枪支,有人冲击抢劫了部队的武器,还有人从农村开来了拖拉机,在拖拉机周边焊上钢板,当坦克使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响成了一片,和打仗没有什么两样。空气中有了血腥的气味,死人了,发生“惨案”了,有关方面就出面制止,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双方停下手来,进行并无诚意的谈判或“联合”。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进入了十五岁。我以十五岁的目光,观察着眼前的混乱。

那是 1967 年的仲夏时节,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利用武斗暂时停止的机会,再一次去探望我的老爹。自行车上挂了那个破提兜,我仍然假装从容,“漫不经心”地出了教师进修学院的大门,来到门前的马路上。那是一条沙石路,自行车轧在上面发出嚓嚓的声音,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出了大门,等于逃离了母亲单位那种压抑的氛围,暂时来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

沙石路上的行人很少,偶尔有汽车路过,卷起浓浓的尘埃。太阳像火一样烤着我薄薄的脊背,汗水很快就湿透了衣服。但我并不在意去感受炎热、尘土或者那种恐怖的氛围,只是用力的蹬车。因为武斗,已经好久没见到父亲了。我过了一座小桥,再骑一段,上了一条千疮百孔的柏油路,十分钟后到了市区。市区

里行人也不多,开了门的商店寥寥无几。所有被当成武斗据点的楼房,都被占领者们用砖头把窗子砌死,只留一个小小的枪眼。远远的,我看见了当时南宁市最大的百货大楼。百货大楼对面,相隔一条马路,是桂剧院,这里是两派武斗经常激烈交战的地方,A派占领百货大楼,B派占领桂剧院。事先我就想好了,要快速骑过这一危险地带。

母亲是实在担心父亲的境况,才同意我出来的,出发前千叮万嘱咐,令我快去快回快去快回。还说见到父亲一定嘱咐他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但是这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情景,好奇心驱动,使我停了下来。

百货大楼近旁围了一小群人,一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正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百货大楼楼顶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一篇声讨文章。

人群围观的,是死人。至少有六具尸体摆在马路牙子上,是枪打死的,胸前或头部有子弹打的洞,血液已经凝固了。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孩子,是小男孩儿,看样子比我小,最多只有十岁出头。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大,是胸部中弹,不知为什么嘴巴张得老大,样子十分狰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却不知为什么并不那么惊讶,不害怕,也不恶心。我的对面站着一个小黑瘦黑瘦的男孩儿,和我年龄差不多,他脸上同样没有一丁点儿的恐惧,甚至还露出一抹莫名其妙的笑容。也许孩子的神经远比大人健康。

百货大楼楼顶上的高音喇叭还在进行“最最强烈的抗议”,继续声讨B派的“滔天罪行”,那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也在向人们讲述事情的经过。这时候,响起了枪声,是桂剧院方向传来的,空中出现一股淡淡的青烟。我赶紧推起自行车飞跑,几乎是同时,百货大楼方向也响起了枪声,子弹嗖嗖地呼啸着从头顶飞过,空中的青烟也浓了一些。黑瘦男孩儿跑在我前面,我们是朝

着穿越双方交火点的方向跑的。我是给老爹送饭，不穿越这里就不能到达，他过去干什么呢？我就不清楚了。穿越危险地带以后，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看热闹。在那个崇拜战争和英雄的年代，对于两个男孩子来说，能亲眼目睹一场枪战，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枪战只持续了几分钟，我继续赶路。再往前走，要经过展览馆和广西日报，这里又是两派对峙的地点。这条路叫民主路，是当时南宁市最好的街道之一，干净也幽静，两旁有很多凤凰树，使这条马路永远是阴凉阴凉的。那天的民主路很安静，没有发生战斗。不过广西日报门前戒备森严，有全副武装的人员把守，对面展览馆的楼顶上也架着机枪，双方虎视眈眈。这时候我有点紧张，再骑几分钟就能到达父亲所在的文化大院了，如果那里也有人把守怎么办？盘问我怎么办？编个瞎话吧，就说来找同学，同学的名字我知道，我在民主路小学上过学。况且文化大院里有很多单位，文联、作协、文化局、杂技团、歌舞团什么的，来往的人很杂，还是比较容易蒙混过去的。

远远的看见大门口了，果然有两个全副武装的人把守，手里端的是冲锋枪，头上戴着柳条编的安全帽。我告诉自己不要慌张，还是用脚尖点了一下地面，假装很从容，很遵守“出入下车”的规定。好，过去了。眼睛的余光觉得左边那个人看了我一眼，但是没问。我的心怦怦跳着，终于来到父亲的小屋门前了，散发着父亲气息的小屋，温馨的小屋。门没有关严，敞开了一条小缝。我高高兴兴地推开了它。

里边的情景却让我傻了眼：没有人，床板掀翻了，抽屉在地上，地上挖了好几个大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父亲失踪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才知道，父亲是被 B 派的红卫兵组织抓走了，就关在桂剧院的顶层。那天枪声响起的时候，这位全国

有名的大作家、“黑八论”之一的创作者，正坐在桂剧院肮脏不堪的地板上，充当一名特殊的阶下囚，而他的儿子却在楼下的马路上，自以为很勇敢地“冲破封锁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他。他每天就睡在肮脏不堪的地板上，连一顶南方人生活必备的蚊帐都没有，全身布满了被蚊虫咬的红疙瘩。没有人帮他去买烟，他就捡红卫兵小将们扔下的烟头，用报纸卷着抽。那些人抓父亲是为了要钱。在那个时候，要钱倒不一定是为了揣进自己的腰包，红卫兵们长期“闹革命”、打派仗，当然不能每天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也需要吃饭，需要购买生活用品，需要活动经费。父亲被迫给在北京的姐姐写了信，让寄钱去。在父亲被抓的前后不久，红卫兵们也抄了我和母亲的住处，是为了找钱。将父亲的住处挖地三尺，也是为了找钱。看来，“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是真理。

来我和母亲住处抄家的，是几个中学红卫兵。他们不跟我们母子说话，不审问，也不呵斥。进了门就拉开了抽屉，打开了箱子，找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他们一身臭汗，满脸奔波疲惫的痕迹，摆出一副“革命者”的严肃模样。其实他们也就比我大上两三岁。领他们来的，是个成年人。他原来是进修学院函授部的干部，后来参加了B派红卫兵组织，就成了一名负责人，每次通知我母亲去挨批斗、受审查，都是他来。每一次都态度强硬，理直气壮。这一次仍然如此。他说话非常简单：

“你们俩站在一边。”

我们就站在一边。

“面向墙壁。”

我们就面向墙壁。

“把钥匙拿出来。”

我们就拿出钥匙。丝毫没有反对的愿望……

我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闷,每天只能面对母亲那张忧郁的脸。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曾经就知道疯玩儿的淘气包,这时候最难熬的是寂寞。

我和母亲住在一座二层小楼的一层,小楼里没有厕所,厕所距小楼有一百多米,要经过一条窄窄的甬路。这种不方便似乎并不使我烦恼,反而成了寻找快乐的途径,因为去厕所的路上至少可以看一看蓝天,看一看大树,吸一点新鲜空气。我成了一个尿频的人,平均一小时就要去一趟厕所。我在小甬路边上捉到一只螳螂,回来拿线拴上,以后又在甬路边的草地上捉来小虫蚂蚱什么的,饲养这只“宠物”。我发现,螳螂吞噬蚂蚱和狮子猎豹捕捉牛羚的情景没有什么两样,那弱肉强食的场面,满足了一个无聊男孩儿的好奇心。直到现在,我还对螳螂的习性动作记忆犹新,有谁知道,螳螂一次能吃下一只和它身体差不多大小的蚂蚱,每一根触须或小腿都会捡起来吃掉,它在饱食一顿之后,还会像猫一样洗它那三角形的脸,样子还真有几分可爱。

我还喜欢上了买菜做饭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骑上我那辆蓝色的旧自行车,穿过进修学院门前的沙石路,来到一个自由市场,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谁是什么出身,我可以大模大样地和卖鸡蛋的农妇讨价还价,可以蹲在一个小摊位前挑挑拣拣。我掌管钱财,可以自作主张地想买什么买什么,一条鲤鱼,或者一块鲜肉,买好后藏在破提兜里,免得人家说我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为乱,因为打派仗,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人顾得上“批判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自由市场里的东西很丰富。有时候,自由市场上还会出现一个卖跌打丸的精壮汉子,这种人一般都有很好的口才,还会硬气功,能当众用手指将一块陶瓷碗碴捻得粉碎,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耍猴儿的,卖牙疼水儿的,表演快速补锅卖焊锡块儿的……这些三教九流、社会沉渣,这些具有先见之

明的、在批判金钱万能的时代就知道金钱重要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乱哄哄的边陲城市，大显其神通。

在去厕所的路上，或者是从自由市场买菜回来，有时候，还会碰上那个眼珠转动很灵活的人。他再也没有拦住我问点什么，更没有把手搭在我的车把上。不过，他那双转动灵活的眼珠，仍然会不由自主地盯在我的破提兜上。有时候，也会遇到那位领人来抄家的函授部负责人，他喜欢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我，看得我心里发毛，只好低着头与他交肩而过。但是时间一长，我也就习惯了，就暗暗的在心里和他较劲。“妈的看什么看。”我在心里这么说，突然抬起头来，迎向他的目光，而他的目光就反而会躲闪开去。在通往厕所的这一百多米长的小甬路上，我不会遇到一个和我说话的人，却能看到不同的目光，有的审视，有的敌意，有的漠然，也有的同情或友好。

记不清又发生了几次武斗，只记得第二年春夏之交的一次。那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厉害的一次。政治形势对 A 派越来越不利，有的人投降了，有的人回家了，剩下一些坚定分子，被“消灭”了。那个晚上枪炮声异常激烈，如同夕夜的鞭炮。枪声响了整整一夜，死了很多人，抓了很多俘虏。俘虏被捆成一串一串的，有的在当天夜里就被枪毙了。在这个晚上，我真正的感到了恐怖。

几乎是同一时段，广西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几乎是同一时段，李延灵的父母遭到了杀害。

又一次和父亲断绝了联系。广西日报的对面是展览馆，展览馆是 A 派的总部，广西日报是 B 派的据点，那里的战斗最激烈。而文化大院距离展览馆还不足四百米。父亲的情况怎样，让人不敢设想。

在武斗结束后一两天，广西南宁市发了一次大水。大水是

一夜之间悄悄到来的。那天早上我起床去上厕所,发现楼道口前面的甬路已经被水淹没了。水涨得很快。到了中午,水漫进了房间。下午,房间里的水已经到了膝盖。院子里,有的地方已经有一人多深,可以游泳了。大水让我想起了美丽的漓江,想起了和李延灵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要先想办法把母亲转移走,她矮胖,肢体不灵活,而且不会游泳,一点都不会。我开始设法制作一只竹筏子。教师进修学院有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从那里找来六七根做脚手架用的竹子,用绳子和几根细一点的竹竿,将大竹子连接在一起,再找来一扇破门板,固定在一排大竹子上,竹筏子做得松松垮垮的,不怎么样,但乘坐一个人没问题。然后我去接母亲,让她坐在上面,我在水里推。我们来到另外一座楼的二层,那是一个大房间,已经有“难民”往里搬家了。安顿好母亲,我再回去取东西,被子、席子、蚊帐、水桶、锅碗瓢盆、一口箱子、一只烧木柴用的小泥炉,往返了好几趟。运完东西,又找来一些砖头,将自家的床垫高,再把无法搬走的东西放在上面,以免被水泡了。等全折腾完了,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当时母亲的身体很糟,加上不会游泳,再加上为了父亲的事情正处在焦虑痛苦当中,就根本帮不上我的忙,但我一点不烦,一点不觉得累,也没有生出受苦受难的委屈来。反而感觉到一种趣味,是一种成年人很难体会到的,操劳和玩耍相结合的趣味。

大房间原来是一间集体宿舍,有不少分上下两层的单人木床。这时候男女混杂,住了好几家人。开始的时候,女人们忙着挂蚊帐铺席子,男人们忙着扎竹筏运东西,谁也不理谁。后来发现,来这里的都是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这是管理人员有意安排的。就谁也不用嫌弃谁了,人们开始互相帮助,互借用工具用品,也开始聊天。先是说自己家进了多深的

水,再说什么什么东西被水泡了,家里进来一条花皮大蛇等等。后来有人小声地告诉大家,进修学院铁丝网外面漂过来一具尸体,是用绳子捆着的。我和母亲互相看了一眼,没说话,但我们都看出了对方眼神里的忧虑。屋子里的其他人虽然也处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但毕竟是全家人在一起。而我的父亲,却在另一个地方,无法通消息,也不敢向任何人打听。他生死不明。

第二天,大水仍然在上涨。家里的水已经超过了两米,我回去取东西的时候,需要在房间里游泳。幸好我们避难的那座楼房是建在一个小土坡上。有人带回来消息,说自由市场因为地势高,暂时还没有被水淹。我找来一根长竹竿,撑起我自制的竹筏子,买菜去。

大门口的水足有三米多深,门前的沙石路成了一条航道。由于水面的升高,人站在竹筏子上也感觉很高,建筑物和树木就显得矮了。我模仿漓江渔民们的动作,用手里的长竹竿努力往水下的地面上撑,小竹筏子慢慢听使唤了,沿着完全被水面覆盖的沙石路,缓缓而行。沙石路的中段原来有一条小河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这时候大水已经漫过了桥面,也漫过了木制的桥栏。这里的水流很急,必须让竹筏从桥面上过去,把竹竿撑在桥面上,还必须快,否则就会被冲到深不见底的水面。我跟在前面一只大竹筏子后面,沿着它前进的路线,闯过了这一关。

自由市场虽然地势高,却也几乎是三面环水了。卖东西的小贩不多,但我还是买到一些东西,一个白萝卜、一捆小白菜、葱、姜,还有一条大鱼,大鱼才两毛钱一斤,可能是因为发大水,鱼好抓。又想到了爱吃鱼的父亲,这一次是不能给他送饭了,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人在哪里也不清楚,还怎么送饭?父亲会游泳,不会被淹死。但是,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B派会怎么对待他呢?那些已经在武斗中发了疯的人们,会放过他吗?

我把自由市场的收获装进提兜，绑在竹筏子上，往回返。路过小桥的时候，前后都没有竹筏子，我认不清哪里是桥面，偏离了方向，竹竿撑不到底了，急流一冲，心里一慌，就翻到了水里。在此同时，我看到了一个人，准确的说，是一具尸体，被一丛树枝挂住，所以没有被冲往别处。他面朝下，双手被反捆着，身穿一件黄绿色的上衣，头发和衣服上都粘满了乱草。我闻到了一股十分难闻的臭气，天气很热，他已经开始腐烂了。

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挣扎着爬上了竹筏子，又是怎么逃离了那一段流速很急的水面。落水和看见尸体的事情都没有跟母亲说，有什么用呢，只能加重她的心理负担。幸亏把买的东西绑在了竹筏子上，没丢。我洗菜，刮鱼鳞，在楼道里点燃了小泥炉，别人家也在改善伙食，在这种时候，谁也不顾忌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楼道里很热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香味，充满了浓烟，也充满了一种掺杂着忧郁，掺杂着伤感的温馨。一个女人呼喊着一个孩子的名字，很多孩子都在院子里游泳，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东方红乐曲。鱼炖熟了。浓烟熏出了我的眼泪。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洪水退了。

从此以后，没有了 A 派这个组织，也没有了武斗。社会相对安定了下来，学校也复课了。胜利者们可以腾下手来，专心对付“阶级敌人”，对付“牛鬼蛇神”了，清查、外调、召开批斗大会。“牛鬼蛇神”的队伍“壮大”了起来，参加过 A 派的骨干分子被迫加入其中。当然，绝大多数 A 派成员还是活了下来，一个个都低着头做人。

仍然没有父亲的消息，也不敢去看望他。

这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母亲不在，她最近也“忙”了起来。要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参加劳动，要接受审查，要写交代问题的材料。我进了家门还不到五分钟，有人敲门，是那位函

授部负责人。他仍然说话很简单：

“跟我来一下。”

我就跟他走。来到发大水时避难的那个大房间，房间里上下两层的木床已经被搬走，摆上了大大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多岁，瘦高个，宽肩膀，大眼睛，长得很精神。女的四十多岁，小眼睛，微胖。我在文化大院里见过这位长得很精神的男子，便猜出他们是父亲单位的人。

函授部负责人出去了。很精神的男子说：“坐。”我坐下，心里有点紧张。小眼睛女人向我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应该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要揭发你的父亲秦兆阳，要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把他彻底打倒……我没太好好听，脑子却飞快地转动起来，我有要坦白的事情吗？好像没有。父亲还需要“彻底打倒”，那说明他还活着，他没有死。想到这里，我的紧张消失了，不由得高兴了起来。

“你笑什么，严肃一点。”很精神的男子说。

我可能是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被人家一吼，赶紧闭上嘴巴，严肃了。我一直是个淘气的孩子，经常被老师叫去训话，被训话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笑，老师一吼，就用力闭上嘴，“严肃”一下。在挨训方面，我还是有承受力的。

“他是不是给你买过一个高级半导体？”很精神的男子接着问。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显得有点没水平，使我看轻了他们。

“是我妈买的。”我回答得很随便，却很肯定。

“不对，是你爸，买半导体是为了拉拢你。”

“就是我妈买的。”

“你不老实。”

“就是我妈买的。”

“你爸自己已经交代了，再不老实就通知你的学校。”这一

次他拍了桌子。

仅仅是拍桌子而已，看来他们不敢打我，他们虽然吼，样子却还是斯斯文文的，不同于背着枪参加武斗的那些人。“他自己已经交代了”这句话，更证实了我刚才的猜想，父亲还活着，他没有死。父亲是全国有名的大作家，他们不敢把他怎么样。想到这里，我又一次暗暗高兴，忍住了没笑，胆子却进一步大了起来。

“是我妈买的，不信你问我姐去。”心想，我姐在北京呢，你问个屁。

“现在不跟你说半导体了，说粮食，老实交代。”

“粮食，什么粮食？”

“你给你爸通风报信，想让 A 派来进修学院抢粮食。”

确实有关于粮食的事情，有那么一天，进修学院来了不少卡车，运来很多粮食，把一座小礼堂装得满满的。

“那是聊天的时候随便说说的。”糟糕，我自己承认了去看望父亲的事实，自己承认了“划不清界限”，我的“假装从容”都白费了。

“是通风报信，你爸他用心险恶，想破坏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他让你探听消息的？他给你买了一个半导体，拉拢你，让你帮他干坏事。”

“不是。”

“你不老实。”

小孩儿斗不过大人。他们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一回答就被抓住把柄，怎么申辩都没用。我发现自己落入了圈套，我应该说“没有”，什么都不承认。发现落入圈套之后，我就干脆不说话了，什么都不说，问什么都不回答。

“怎么不说话了？”

“说什么你们都不信。”

“因为你没说实话，怎么样，还是老实交代吧。”

沉默。

“这样的话，我们会通知你的学校。”

沉默。

“你真的想顽抗到底？”

沉默。

“你不考虑你自己的前途吗？”又拍了桌子。

还是沉默。

喜欢拍桌子就拍吧，不怕手疼就行。反正你们不敢打我。什么他妈的前途不前途的，总归是要去插队的。事情僵到了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爹，我是犯上了拧脾气，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和老师犯拧，一犯拧就什么都不怕了，为这没少挨母亲的打。有本事你们就陪我一夜吧，我干脆靠在椅子背上，做出一副小无赖的样子。我也越来越生气。我想好了，他们要是打我，我就拼命喊叫，让所有的人都听见。

这件事情已经由政治目的变成了跟一个小孩儿较劲，越较劲就越没有结果。两位同志显然没料到会这样，他们有点骑虎难下了。

这时候，屋子里进来一个人。他是我们的邻居，他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高个，白净，健壮，是个东北人。据说也有历史问题，但他支持 B 派，为人又机灵，很会来事儿，所以很吃得开。他把很精神的男子叫了出去，悄悄对他说：“算了吧，这孩子特别拧，可能不会有结果的，算了吧。”他的声音很小，但我听见了。其实，这位白净的东北人并不了解我，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当然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很拧，他很可能是为了救我。

事情过去了，过了很久我才想，如果那天人家打我一顿又怎

么样,如果他们不动手,而是叫来一帮年轻的红卫兵打我又怎么样?有这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打了也就打了,打死了也就打死了,过后再平反嘛,再追究凶手嘛。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人们最疯狂的那段时间,被抓进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监狱。是不是有人为了保护他而有意为之?无从知晓。

当然,后来武斗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但是,不该结束的也结束不了。1979年,父亲的政治问题平反了。他又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又开始了 he 热爱的编辑工作。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杀害李延灵父母的凶手,于九十年代在四川被抓获。

苍天有眼!

一辆老永久牌自行车

秦 晴

我骑的一辆老永久 26 型女车,父亲也很喜欢骑。他常说,这车搬着轻,骑起来更轻,上下也方便。他今年七十五岁高龄,每逢精神身体允许,偶尔也骑车出去走走。家人不放心,他就说,没关系,车好骑。所以我常故意将车骑走。我知道,除了这辆“老久”,家里其它的自行车他是不骑的。

听父亲说,抗战的时候,部队缴获过自行车,有一辆归他使用。一次多亏他骑着车才逃过日本鬼子的追击。后来钻进青纱帐,只好把车扔掉。解放战争时,姥姥家仍处于敌我拉锯地带,为工作方便,父亲用一把小手枪换得一辆自行车。国民党进村扫荡,闻知此事,把姥爷捆起毒打,非逼姥爷交出手枪不可。那辆车差点要了姥爷的命。

建国初期,父亲下乡体验生活,买了一辆国产飞鸽男车,挂上漂亮的车兜子,骑上它跑遍冀中平原。不久,他写出全国第一部歌颂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回城时他把车送给了乡下的表舅。那时在北京,机关、宿舍离得很近,实在用不着骑车或坐车。

那一年,父亲被下放到广西柳州郊区的一个工厂劳动改造,

住在厂子后面一间放工具的小竹棚里，与耗子为伴，自然用不着交通工具。然而他却花高价买了一辆老掉牙的旧日本车（买新车凭票），天蓝色的漆所剩无几，样子十分古怪。一个人实在是太苦闷太寂寞太孤独了，节假日便骑着破车到野外去，让痛苦的心绪在色彩纷繁的大自然中得到抚慰。骑着车在纯净的天地间走走，恐怕是当时他唯一的享受和消遣。这辆车一直伴着父亲，由柳州到桂林又到南宁，直到“文革”被抄走。有人说，秦兆阳骑日本车可见贼心不死，竟也变成一条令人哭笑不得的罪状。1967年深秋，我到广西，正赶上派性斗争白热化，人们无暇顾及父亲这些“死老虎”，他倒是能有几天相对安定自由的日子。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满街的桂花树亭亭玉立，残香犹存。我走进父亲的小屋，只见他面带喜色，正擦一辆新车，是一辆漂亮的永久13型男车。刚刚买回来。当时父亲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一桌一凳和床板都是借的，现在屋里突然出现这么一辆闪光锃亮的新车，真令人满目生辉。父亲十分爱惜，拿着布和改锥擦来拧去，像是要把所有的感情和全部的愿望都寄托在此。我走后不久，这辆车又被抄走。我深知父亲一向不以身外之物为重，但这一回却不同。我懂得他又一次失去了什么。

记得1962年，父亲自下放后第一次回京，天天足不出门。一是因为无处可去无人可访，二是因为离京几年后原本的呆气愈加变得厉害。他一上公共汽车就出事，甚至两次夹伤手脚。然而父亲对我们的爱心却很细。当时自然灾害刚过，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商店里有了高价自行车。一辆永久女车，标价是二百二十元。太贵了！我眼巴巴地望着。父亲看在眼里，没有说话。一个星期后我从学校回家，一辆崭新的绿色女车立在面前。我的快乐使父亲脸上露出欣喜之色。我懂得，父亲因自己的遭际而给我们带来的重负，心里总像留着亏欠。所以我们一旦有某

种愿望,他总是尽力满足;我喜欢蝴蝶和树叶标本,父亲在柳州,甚至跑到很远的山里采集,夹在本子里写上名称给我寄来。想到这些,欢乐常会生出忧郁的尾巴。但毕竟有了欢乐。

每逢周末,父亲就在东华门教我和妹妹学车。在父亲的保护下,我一跤没摔就学会了。我永远忘不了他用力扶着车把拼命跟着车跑的情景。多少年来,每当我看到“老久”,总会情不自禁想起那瞬间难得的快乐,和父亲对我们的拳拳爱心。

“文革”末期我分配在京郊教书,天天来回五十里。或迎夏日黎明,或顶冬日星空;“老久”驮着我,早去晚归,无论酷暑严寒。那时我还很年轻,又是孤身一人在京,还要承受很重的政治压力,唯有把心血倾注在工作上。好在有“老久”,骑上它的那份轻松和自如,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安慰和惬意啊。有了它出门相随、进门相伴的服务,犹如感受到父亲的种种关照。1969年那次下冰雹,我刚好正在途中,顷刻间天昏地暗,核桃大的雹子铺天盖地而下,冰水没过车轮,我骑着“老久”一路披荆斩棘安全到家。“深挖洞”那年,街道上指定每人交二十块砖坯,可城内无黄土,只好又求助于“老久”。我骑车赶到西直门老城下,装了一麻袋黄黏土,谁想车轻土重,前车轮不停地乱蹦,推都困难,更别说骑了。无奈,我拼命按住车把,历时三小时,才好歹步行到家。多亏了“老久”!

父亲1975年回到北京后,出门常以“老久”代步。他因呆气闹过不少笑话,其中一次与“老久”有关。那次他去王府井书店买回一捆书,提着很重,后悔没骑车。我以为他确实忘记骑车去。第二天早上我要骑车出门,却不见“老久”。父亲说昨天明明还看见了,夜里大街门也是锁上的,怎么一夜就不见了呢?一定是让小偷偷从房上将车钩走了,便命我赶紧到派出所报警。待我回来,父亲正后悔不已。他记起昨天是骑车出门的,只是忘了

放在哪儿了。最后我终于在一家旧货店门前找到了它。原来父亲骑车出门先去了旧货店,然后又步行去书店。只因他的记忆忽然间断了片刻,生生让大家虚惊一场。父亲笑了。

父亲恢复工作后,上班、看病、会友仍然爱骑“老久”。一直坚持到他七十多岁。这几年我国经济繁荣,产品花色品种越来越多,“老久”实该淘汰,但父亲舍不得,我也舍不得。

“老久”劳苦功高,年年需要保养。我很矛盾,保养好它,父亲难免又要骑车出门,令人担心。但又暗自希望父亲能像过去一样常能骑车出去走走,去书店、去邮局或看看画展,以解寂寞,以增强他不老之信心。

我爱“老久”,因它默默地奉献;我爱“老久”因它浸注着融融的父爱,因它满载着艰辛、忧伤和欢乐。

原载《八小时以外》

享受宁静的秦兆阳

——记我的父亲

秦万里

“爸又找不着家了，到了咱们二条不往里拐，还往前走，我从后边看见他了，没叫他，看他能走到哪儿去……”大姐从早市买菜回来，笑着对大家说。过了一会儿，父亲呆头呆脑地回来了，大家便一起嘲笑他呆。像他这么呆的少有，骑车出去买馒头，买完馒头走着回了家，第二天才发现车丢了，弄得母亲紧张得要命，以为半夜院里进了贼……丢车是前好几年的事了，近两年家里人一致反对他再骑车，又不愿麻烦单位派车，他便很少出门，只是每天早晨去散步。

父亲的晚年应该说是幸福的，因为子女们都很爱他，关心他。但是他这人不但呆而且很怪，你关心多了，反而招他发火。比如他身体出了点什么小毛病，什么地方发炎了，你给弄来点什么什么素，告之服法用量，他吞下两片，过了一两个小时，感觉没有好转，便又吞下两三片，等你下班回来，一小包药已经所剩无几了，于是孩子们便急了：“这抗菌素又不像果味 VC、山楂丸什么的，哪能瞎吃呀……”“文革”后期他在一个劳动改造学习班的时候就是因为吃四环素吃多了，身体弱得连走路都没劲儿，



秦兆阳与儿子在家中合影

还要去劳动。如今当然不用劳动了，“您倒是接受点教训呀，倒是听听别人劝呀！”可他老人家偏不，劝他去医院也不爱去，“挂号、拿药，又要跟单位要车，啰里吧嗦的，最后还不是给你点什么什么素？”他这个人最怕啰嗦，最讨厌啰嗦，你说多了他便要发火。

摸透了父亲的脾气，大家有时便派我妻子去和他谈事儿，因为我妻子平时很少“啰嗦”，说话比较温和婉转，又是“儿媳妇”，总有点面子，使他容易接受。他最爱冲二姐犯倔，因为二姐最关心人，关心得最细微，这在他看来，便是“啰嗦”。吃饭的时候，二姐说：“爸，你应多吃青菜，这小白菜炒得可香呢……”“爸，这炖鸡里有不少小骨头渣子，小心硌坏了你的假牙……”“我知道，你不要管！”父亲打断二姐的话，倔声倔气地说。二姐也就闭了嘴，再多说他就烦了。

“真是老怪物，就欠还来一回‘文化大革命’，把他关起

来,就知道需要人关心了。”母亲有时候也说几句气话。五七年反右时,父母被下放到广西,只把我一个人带了去,因此“文革”时期只有我一个在父母身边。那时我和母亲在她的单位宿舍,父亲住在城市的另一头,他自己所在的机关里。为了表示划清界限,父亲和母亲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却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只有我经常偷偷地去看望他,有时还带去一些他最爱吃的清水煮鱼,父子俩一起吃顿午饭,给他讲一讲妈妈这边的情况,讲一讲“战斗队”们互相打得如何热闹。那时候他很寂寞,很需要一个亲人在身边。但后来就连这一点安慰也得不到了,他被“无产阶级革命派”们抓了起来,关在一座剧院的阁楼里。南方蚊子很多,他们连蚊帐也没有让带去,他被蚊子咬得全身上下布满了红点。更难受的还是多少天没有一个人跟他说一句话,没有一本书,一支笔。他寂寞得受不了,捡起地上所有的废纸,读完上面的所有文字,又把废纸揉成小球,自己和自己下棋,下着下着竟入了进去,着了魔,自己和自己厮杀得昏头涨脑。唉,倒是挺会自己“找乐儿”的。

他确实挺会给自己“找乐儿”,一旦找着了一种“乐儿”,就会走火入魔地钻进去出不来。“文革”时期有一阵子广西两派闹武斗,顾不上“修理”他们这些人。趁这工夫他也不知怎么迷上了做木头盒子,买了一堆斧头刨子什么的,整天叮叮当当地折腾,做出来的木头盒子还真是精致漂亮,透着灵气,够得上一个好木匠的水平。那些盒子直到现在还用着呢,装他的画笔和自刻的印章。

近几年,父亲由于视力越来越差,身体时好时坏,所以不大写作,《当代》的工作也管的少了些。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就练他的书法,画他的画。当然更是走火入魔。他自己和自己叫劲儿,总是不满意,越不满意越要干,画了一张又一张。人家写字画画

大都是轻轻松松,拿得起放得下,他却钻进去出不来,又紧张又激动。你说他累不累?我有时就劝他:“爸,你悠着点吧,别累坏了,就又画不成了。”二姐也会跟着唠叨几句,话说多了自然又招他烦,又要挨倔。果然,过不多久他就会累得身体弱下来。

他干什么事情都是这么执著,五十年代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时候,没白天没黑夜的看稿改稿,累得不行了,就在玻璃板上冰一冰脑袋;前几年管《当代》工作的时候,总是把需要他看的稿子逐字逐句地读,有时还要亲自动手逐字逐句地修改。为这也累坏过身体,但如果发现了一部好稿子,在全国引起了好的反响,他便得到莫大的喜悦,向老伴和子女们宣扬一番。

在身体弱得什么也干不了的时候,他便一个人坐在那里眯着眼想想事儿,想什么呢?什么都想,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小鸟儿关在笼子里懂不懂得痛苦,想人类的愚蠢与聪明,人生的悲哀与欢乐,想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大自然的神秘与美妙……他总是在想着,思索着,脑袋瓜子永远停止不了活动。子女和他自己的朋友们曾劝他练练气功,但他没有接受。恐怕他根本就练不好,据说有些气功的基本要求就是脑子里不许想别的,他成天琢磨那么多事儿怎么入得了境?还是让他在自己的境界里漫游吧,对于他来说,宁静就是一种享受,思索便是一种快活。

我这篇小稿结束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里的帆布躺椅上闭目养神,并不理会院子里其他人的高谈阔论,只是不时睁开眼眺望一望天空中的云朵。他一定又在驰骋他的思索了。我不禁想起了写在《大地》卷首的诗句:

最应该记住的最易忘记
谁记得母乳的甜美滋味
最应该感激的最易忘记
谁诚心亲吻过亲爱的土地

历史的河流啊，长流不息
流的是历史的深沉的思绪

父亲，也许我们根本不该对你抱怨什么，在受尽了磨难的一生中，你付出了很多很多，但也许你又得到了人世间最珍贵的。唉，你这个可敬可爱又让人无可奈何的怪老头呀。

原载 1992 年 10 月《作家通讯》

丁香无语

——父亲秦兆阳剪影

秦 晴

我家小院里有两棵丁香树，一棵白丁香，是一九七九年父亲平反时种的，一棵紫丁香，是一九八八年种的。种的时候它们都很小，只有一手指粗。

白丁香长得很茂。第二年就开花了。像一个健康成长的孩子，一年一个模样，很快蹿过屋顶，遮住半个小院，夏日来临，煞是阴凉。如云的白丁香年年盛开；随着淡淡的清香，将珍珠般的小花洒在绿叶枝头，显示一份文雅，一份洁净，甚至一份谦逊。

小小的紫丁香已经种上四年了，去年张开不多的几穗花。这是一棵扭曲的小丁香，是谁扔在街头被我们捡回来的。家里已有一棵白丁香，万一这是一棵紫丁香呢？这么想着，就种上了。种上以后，它就扭扭曲曲地长，像一个先天驼背的孩子。

平时父亲很少话语，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母亲受了他的影响，平时也没有更多的话。早几年，他们身体壮实的时候，母亲年年在小院里种些丝瓜。搭丝瓜架便是父亲的责任。由于架子搭得简单，而丝瓜又长得快，几乎天天还需在架子上补充拴些绳子，以便给丝瓜蔓不断地铺路搭桥。做这些事情，父亲一声不



秦兆阳在自家院内丁香树下

吭,母亲说在哪儿拴,他就在哪儿拴。吃过晚饭,大家在院中一边乘凉,一边观察丝瓜的生长情况。父亲也观察。但他很少发表评论。只要母亲说哪个丝瓜该摘了,他就搬个凳子走过去,站上,默默地摘下就是。父亲人瘦,腿脚一直很灵便。

这两年,母亲不再种丝瓜,父亲也不再搭架子。一般花花草草的事他从不干涉。但父亲不喜欢小而扭曲的丁香树。

“把它拔掉吧。”父亲皱着眉头说。

“万一是一棵紫丁香呢?”

“那也不要。”

“为什么?”

“长得七扭八歪,一点不直正,实在难看。”

原来如此。

但大家舍不得。一是希望它是棵紫丁香,二是希望它夏日能挡住西屋东晒的阳光。



秦兆阳与大女儿小孙女在丁香树下

父亲依着他的性情没有再说什么。他从不勉强别人做什么。对无关紧要的事偶尔表表意见,也常是那么一句半句的,说完就完了。但我心里明白,父亲实在是不喜欢扭曲的东西。他喜欢挺拔和直正。

我小时有些驼背习惯,为此他很忧虑。下放广西劳动后还特意写来一封长信,给我讲人的健康之美。他说,不管怎样,人要活得直正。可惜那时我很任性,也实在不能全部体会父亲的心意,信没有保存下来。倒是当年我给父亲写的信,他至今还保存着。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父亲自己的腰板始终是挺直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辛苦积劳,都没能使他改变这一习惯。挺胸做人,不但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追求。他一辈子就是这么挺胸走过来的。至今七十六岁高龄,他的腰背仍挺得很直。

我会从遛早儿、晨练的人群里，一眼便发现他细长直立的身影。他作的画儿多是风竹和风荷，还有伟峻的石壁，从他的画儿上能感到风的力量，更能体会到翠竹和清荷在风中挺立的韧而不拔的精神。竹与荷的洁净清廉、与世无争、宁折不弯，正是父亲人格的写照。

今春四月，紫丁香突然盛开，开得紫云满树冠，像遮着一把花伞，开得小院四处溢香，令人欣喜，令人心醉。一穗穗紫云般的丁香迎着太阳，傲然立在绿叶之上，又是一份独特的青春妩媚，一份出奇制胜的骄傲。紫丁香不同于白丁香的娴静，它那一穗一穗涨满的六瓣小花由淡紫到深紫，给小院闹出一片灿烂，一片辉煌。丁香无语。父亲站在丁香树下晒太阳，也无语。

那一日，天空晴好，阳光明媚，有些许小风，吹得丁香叶沙沙啦啦地响。父亲又在院中独自散步。他微昂着头，照例不语。当他在丁香树下伫立时，你会感到他头上的白发是那么和谐地融进了丁香花的朦胧之中。一会儿，父亲走进屋来，坐在沙发上。

“到底是紫丁香香啊！”他的语调带着感叹，眼睛看着茶几上的花瓶。瓶中插着一束丁香，有紫的，也有白的。给花瓶插花，是母亲每日的功课。

“我们好像离不开丁香树。”我说。

父亲说：“记得吗？那一年我的屋前死了一棵丁香树。姥姥说，这不是好兆头。后来便是反右。姥姥的话果真应验了。”

我知道，父亲的话头是接着当年《人民文学》编辑部院中的紫丁香说的。他没有再说下去。阳光照着他的脸、白发和很高很亮的额头，平静而安详。父亲的脑子很好——对于该说的事情。父亲的额头很有水平——他并不否认。

当年小羊宜宾3号的编辑部院里,有一大片丁香林,还有一架紫藤。春夏之交,紫丁香与紫藤萝花竞相开放,彼此争艳。然而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花香。丁香林的花期早晚不一,那扑鼻的馨香延续的时间很长,在人们的案头前,在茶余饭后,你会随时感受到它们默默无语却令人欢愉的服务。

政治暴雨倾盆而下的时候,父亲不再有忙碌的工作,只有沉默。那一年我十一岁。我在初夏的一个夜晚,就在父亲的门前,就在丁香花瓣满地的丁香林下,父亲生平第一次与我长谈,像对一个大人。谈他的穷苦身世及对革命的追求。他无法预测自己将面对什么,但他期待理解,需要向人诉说。记得那个夜晚,四周黑洞洞的,对面葛洛叔叔家的灯早已熄掉。父亲充满感情的话语使我不愿抬头,当他偶尔侧过身去时,才敢悄悄看他一眼。那时父亲刚过四十岁,瘦削的脸,鼻梁笔直,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高高的额头。父亲专注地倾心谈着,像对一个平辈的朋友。我听着,鼻子发酸,局促不安。

我从小便习惯了父亲的不语,常跟着他散步或逛书店。揪着他一根手指。与弟、妹比,享受一份独有的殊荣。我们常从小羊宜宾经过人民美术出版社门口,走到护城河,有时甚至走到古观象台。我知道,父亲在想事的时候,嘴巴闭得很紧,最好不要打搅他。但他轻松的时候,会高兴地往护城河里打漂亮的水漂儿,或是在野地里来几个侧手翻。这是他儿时最爱玩的游戏。父亲即使高兴也不会主动讲什么,除非问他。倘若真问他点问题,他的讲解会很耐心。要是去书店,得坐三轮车,车钱极便宜。我最喜欢跟他逛东安市场,那里的店铺五花八门,卖什么的都有。但我必须随时用眼睛盯住他,不然他会忘了我而独自回家。

此时父亲的谈话令我感到异样,令我进一步感觉到已经开

始的政治压力。我不住地点头，父亲则看着黑暗的深处。一种很庄严很神圣又很朦胧的气氛将我们笼罩在丁香林的阴影之中。树影斑驳，树叶沙沙地响。父亲心底似乎藏着难言的痛苦。一时间，我由激动而变得茫然，又像是突然被谁凭空拔起，恍若长大了许多。

1958年夏离开小羊宜宾3号后，以为再与丁香无缘。

我不知道父亲说的死了丁香这件事，只记得姥姥那阵子常偷偷磕头祷告，生怕别人看见。父亲并不迷信，但当年这个关于丁香的细节却深深留在他的心里。

没有风的日子，父亲搬把椅子，也给母亲搬一把，两人就在树下相对而坐，闻花香，晒太阳。母亲晚年多病，话语很少。父亲更是一直如此。他年轻时一直忙于工作，壮年时期又在不断地“改造”之中，难得静下心来陪伴母亲。现在到了老年，倒是别有闲暇。那是一幅很淡的水墨画儿。每天上午或下午到了一定的时间，父亲就过来与母亲一起听广播，他们爱听广播剧或者小说连续广播。一边听，一边闭目养神。偶尔也作一字半句的评论。小院静悄悄的，一棵弯曲的紫丁香，一棵高大的白丁香和两位怡然自得闭目静坐的老人。小时候，他们给我们讲故事，现在他们老了，又都患有眼疾，只好求助于收音机了。

父亲住在后边两间低矮的南屋里。南屋早被宣布为危房，但他仍住在那里。一是因为安静，二是因为没有地方可搬，三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翻修。很少有人去打搅他。当他有事做的时候，相当自在，看书，写文章，写字画画儿。父亲不语，但我们时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要想知道他在不在家，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他的咳嗽声就行。经常有这样的对话：半天没看爸了。他在，刚才还听见咳嗽声呢。是的，父亲还有个特点，就是咳声

极响。早在小羊宜宾3号住的时候,我们在前院就能听见中院他的咳声。1957年以后,父亲在沉默中烟更勤,咳声更响。除了咳嗽声,我们很少再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次长谈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他的意愿多数由母亲转达给我。后来我才悟出,母亲也是靠经验和感觉猜测的,因为父亲不言语,又需要别人的帮助和理解。母亲那时很难。

1958年冬,从家人的神情和母亲为父亲料理衣物的匆忙中,得知父亲将要去东北。没有人正面对我说此事。弟、妹还小,母亲不但要顾念心情极其恶劣的父亲,还要照顾八十多岁的姥姥。同时还要承受各种压力和批判。我发现母亲还经常挑些穿不着的衣服和值钱的旧书去委托商店。原来父亲已有两年不领工资,自认能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稿酬维持生活,现在既无权写文章,自然断了生活来源。原定他十月动身。记得那个星期日下午,返校前,我像平常一样,在外面只轻轻喊了一声:“爸,我回学校去。”那会儿屋里正好有客人,我听见父亲“唔”了一声,接着椅子又响,心里生怕他出来,便逃也似的跑出门去。一星期后我回家,发现父亲没走。母亲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他去广西。父亲的情绪表面好些,仍是不语。我的心却着实压在重石之下。每星期回家,内心都非常矛盾,既希望他在家,又希望他已离京。父亲不语,也不闲着。他做木工活儿,把鸡窝做得很漂亮,犹如童话中的大屋顶房子。家里继续笼罩在沉默之中。父亲不说他走的事,我也不问。只有姥姥天天祷告,祈求菩萨保佑。一个星期日,我得知父亲已拿到第二天的火车票。母亲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再走,我却总想逃避。回校前,我想在屋外喊他一声就走。没想到父亲正送一位抗战时期的堡垒户老房东出门。他刚理过发,穿一身出门的衣装,显得年轻了。客人让他保重,他应着。我说:“爸,我回学校去。”父亲的

脸色突然一变，嘴唇哆嗦说不出话，一把将我搂住。我强忍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父亲的心脏在急速跳动，泪水不停地滴在我的头上。就这样，那一年冬，我们分别，没有一句告别之言，更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我想起五岁的时候，父亲请了长假，和母亲带着弟、妹到老家下乡体验生活。我一人留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转年春天，父亲进京，特意赶了几十里路到颐和园后面的幼儿院看我。他领我去后山玩，我指给他看我和小朋友常游戏的小河沟和碉堡。我想家，父亲知道，但他不能带我走。临别，送我到大门口，父亲不说再见，我也不说，只管径直往里跑，头也不回一下。老师迎上来抱起我，父亲趁机走掉。当我确定真的看不见他身影时才敢回头。用沉默代替语言，这种特有的交流方式，从小父亲就传给了我。

夏天来了，傍晚在小院中乘凉，甚是惬意。父亲搬把躺椅放在丁香树下，静静地坐着。微风吹来，丁香树叶照样沙沙啦啦地响。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小羊宜宾的丁香林，常有一抹回味漫上心头。自离开以后，我再也没有走进过那个院落。父亲1979年曾去过一次，是去看吕剑叔叔。我不知他会有何种感慨。我自认没有父亲的豁达。现在那个院落已被夷为平地，代之以高楼。今年偶尔路过那里，又望见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牌子，而它的近邻，那个灰砖的院落，那两扇大门，那块“人民文学编辑部”白底黑字的方牌子，只有悬在时间记忆的长河之中了。时间无限，记忆却有限。历史的创伤虽然难以熨平，但终究越来越淡了。

“天因多情故不老，地缘心热始常青。”丁香不语，却沙沙啦啦地响，宛如一曲心底的诉说。父亲不语，每每陷入无尽的思索之中。你会从他清朗平和的神态中感到他的神思离你很远。他

甘于寂寞,也耐孤独,却让心灵始终充满激情,遨游在广阔无边的大海,天地和日月、星辰之中。

原载《天津文学》1993年第一期

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的奶葡萄

秦 晴

那是一九七二年寒假，他刚出学习班，还没见到母亲，已在招待所住了两天，准备我来南宁后一块再回母亲的住处。父亲被解放我是知道的，但没有想到他会到车站接我。父亲说：“我解放了。”语气中流淌出一股相对的舒畅和兴奋。我多年来紧箍的心自然也轻松许多，开朗许多。

我心中舒出一口长气，叫了一声“爸”。父亲接过我的行李，转过身，扬起脖子就往前走。父亲的背很直，身体依旧瘦削，动作仍然很敏捷，我无声地跟着他。自一九五九年父亲下放广西后，这可以说是他心情最好的一次见面了。多年来，不管我们多久未见，不管我们在分离的日子里经历了多少磨难，不管我们的相见多么艰难，我们也是这般平淡。我们的目光只一瞥，便躲开了，总是用心灵去感受近在眼前的亲人，或是在对方不经意的時候，偷偷地看上一眼。

有时，父亲的话会突然响在耳边：“小晴，如果哪一天万一我不行了，你可要受得住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说这话时的情景。我和他并排坐在医院的单人沙发上，中间隔着茶几。他没有看着我，只是看着对面的白墙。我也没有看他，像往常一



1952年7月，秦兆阳和他的两个女儿在东总布胡同22号

样，刚说完那几日报纸上他感兴趣的话题，正陪他静静地坐着。不想父亲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与此同时，正好窗外大风卷起的枯枝落叶打在玻璃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吸着我，我没动，仍看着那些枯叶，整个人在一刹那僵住片刻。但我的心听见了他的话，我一时什么也没有说。我不能说什么，也想不起应该说什么。我的心很沉重，但只要不去深想，就觉得能承受得住。这已是一九九

三年底的冬日。父亲的病体暂时看还不大要紧。但我知道，他再也不能经受什么。家里的平房无暖气，厕所又在院子里，致使他连续不断感冒发烧，肺气肿越来越严重。而他对青霉素等药物过敏，如果再反复得病是很难控制的。他知道全家人为他的身体，为他过冬无处安身的问题一直焦虑不安。他更知道他在我心中以及我生命中的位置。所以，好像是不经意的，很平常地顺便说了那样一句话。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完全是担心我承受不了。我心重，对他感情很深，他是深知的。

而我觉得此话父亲到底说得早了点。我是早就做好准备，拼尽全力守护父亲，照料父亲的。我几乎天天去医院看他。本

来不信气功的我，为了父亲，也开始到中山公园听课，买教材，认真地学，录上音，到医院一遍一遍地教给父亲，只希望他的身体会好起来，只希望把我的信心传输给他。我只希望我能代替他的眼和手，帮助他记录下更多他想写的东西。

但此时，我只想安慰他，也只能用安慰排解他的愁绪。我说：“爸，没准明年我就能分到房了，我还能帮您做点事情。”父亲的表情于平和中带着一丝愁苦。听了我的话，现出片刻宽慰：“那当然好，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还能做不少事情，盼着吧！”虽说半信半疑但毕竟重又生出几许希望。几年了，究其所有原因的本质，因我与公公陈企霞恰巧在同一单位，致使这最后一份期盼最终没有实现。

人在无奈之中，常常会偏于理性，或是人为地想出一些理由来排遣，寻求救援。也许是生活在文学圈子里，耳边常能听到“人生”、“命运”之类的词语。也许是父亲的不幸去世引发我思索一些问题，甚至爱去追逐一些事的前前后后，前因后果。我也不由得回顾自己所走的路，回顾起人生给我和我的家庭所安排的命运。

我知道自己是在胡思乱想。我想，从父亲到我，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在一种缠绕之中。这是一种谁都不能怪罪的缠绕，不能怨天，也不能怨地。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吧。命运与环境，与机遇，与性格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命运到底是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家先生延安常这样好奇地问我：真奇怪，那会儿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怎么没见过你呢？我和你爸在院子里打乒乓球的时候，你在哪儿？

噢，那会儿你太小了，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呢。

是的，我那时是太小了，小得不应该记住一些事情，但是我

却记住了。我记住的事，也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的事。过去的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院，一九五七年以前是中国文联、文协（即后来的作协）所在地。是公公陈企霞一九四九年三月进北平以后为公家买下的。

公公是从平山到良乡后进城的。那时在《华北文艺》社，欧阳山任主编，公公任副主编，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编辑。父亲一九四八年到《华北文艺》，照理说，他与公公从那会儿就由于工作关系认识并熟悉了。但当时他们并没有结成什么特别的友谊，仅仅是同志，或者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谁能想到，就在他们走进二十二号院时，命运中便被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二十二号院，也给我的童年记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时候，觉得它的门很大，很有气魄。猛一看，会以为这院落是过去某王爷的府第。其实，据公公说，它可能是一个搞间谍的日本军官建的。日本投降后，又落到一个国民党将军手里。传说这两个人都在此死于非命。因此风传此宅很不吉利。但在为公家物色房子的时候，公公还是看上了它。他说共产党还讲什么迷信！

进了大门，院子正中是一座假山和水池，内中有些水草和龟儿。印象深的是大门内两边的游廊，它们连环迂回直通假山后面的主楼以及后面的小洋楼。主楼虽然只有两层，但房间很多，建筑挺讲究、气派。当时，一层有图书馆、会议室、资料室等等。楼上住着人。

我知道，儿时的眼睛总带着一些迷惘，少不了它的局限性。但这座楼房带有西洋的建筑味道是不会错的。地面是条纹的镶木地板，墙壁四周是黄棕色的护墙板，但最亮眼的是隔扇上凹凸不平的五颜六色的花玻璃，总使我联想到水晶宫奇妙的神话世界或是《一千零一夜》里的皇宫。图书馆直通到房顶的书柜，又

常常让我觉得森严和高不可测，使我不大敢将地板踩得更响。大人下班以后，才猛地跺上两下，听一听木地板和花玻璃震动的回声，那种奇妙和神秘的快乐就成了孩子捣乱后的满足。去资料室或去人事室找母亲，总要路过直通二楼的楼梯，站在楼下向上张望，再伸长脖子踮起脚尖也只能看到楼梯的拐弯处。父亲带我上去找过艾青伯伯，而对楼上的另一户——陈企霞一家却没有一丁点印象。

父亲下乡前在《人民文学》工作时，就住在主楼后面的平房里，邻居是高大英俊的古立高叔叔。周末从幼儿院回家，母亲将两张软椅对接起来，便是我的床了。父亲曾说过，真没想到，我们同企霞家成了亲家。那会儿父亲在《人民文学》编小说，公公在《文艺报》搞评论，同样是文联文协的两个主要刊物，鸡犬之声相闻，但信息却相当的不通。《文艺报》批评《人民文学》的某篇小说，常常是见了《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人才知道。当时《文艺报》担负着文艺批评的主导作用，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在紧张的思想气氛下又展开了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过火批判，接着电影《关连长》、小说《腹地》等都在劫难逃。父亲从当编辑的角度出发，针对《文艺报》过火的批判倾向，相继写了几篇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文章。公公后来在临终前的病榻上，曾回顾自己那段时间的工作，称自己为“棍子”打了人，那种丝毫不强调客观大形势的无私的自责，很让人感慨和敬佩。那时父亲和公公显然没有私人友谊，显然事先没有交换过任何意见。即使三十年后，当他们平等地坐在一起，一切都很明了时，也仍然没有面对面地就过去的争论谈论过什么。公公的工作岗位以及他的性格，父亲的性格气质，还有文学家特有的个体脑力劳动的特性，使他们没有超过文章和同志以外的接近和理解。

公公陈企霞有一双尖锐而犀利的眼睛，他不凡的经历，通过自学而渊博的学识，他的自傲自强，幽默诙谐，他特有的工作能力和魄力，他对部下的爱护，使他手下的人敬他，服他，爱他。也有些人怕他，不理解他，因而也就远离他，我知道那个站在楼前的台阶上，带着南方口音大声说笑的人叫陈企霞，他戴一副无边眼镜，镜片闪闪亮。不笑时，目光严肃，油亮油亮的后脑勺，让人莫测。几十年后，我真正走近公公，走进他的生活时，他诙谐地笑着解释说：“人们都以为我一直在上头油，其实这油是不请自来的。”

一九五四年夏，父母从乡下回京住在和平里，我开始上小学。周六回家，先到东总布胡同，等母亲下班，再一同回和平里的家。母亲在东侧游廊边上有一间小屋，我放下书包，摸些糖果，便跑出去游荡。奇怪的是，我始终没见过也总在院子里荡来荡去的，我那儿时的先生延安。沿游廊往里走，东边有一跨院，那里有食堂，有张天翼伯伯住的小楼，还有一架很大的葡萄。直到一天父亲带我去看体弱多病的张伯伯，从他的小楼出来，我才真正发现，那不是一架通常的紫葡萄，而是绿色的长粒葡萄。它端坐在饭堂前面的西墙下，架子是用很粗的圆木搭的，结实结实，高高的，像一座长方形的绿伞帐。葡萄下面的虬枝如我的胳膊粗，盘根错节地从架的北边攀上去。

我曾问父亲：葡萄不是紫色的吗？

也有绿的，它像马奶一样，也叫奶葡萄。对于不爱说话，尤其不爱议论吃物的父亲，这解释应算详细，可我不大满足。

绿葡萄甜吗？我转过脸又问母亲。父亲会心地一笑。

我喜欢扬起头，看那高高的、密密的挂在架顶上的奶葡萄。即使我从食堂搬个凳子，站上，也是够不着的。但我还是爱扬起头傻看。夏日的葡萄架，阳光穿透树叶，晶明透亮，叶脉清晰可

见，绿色中流溢出一种耀眼的、纯洁的灿烂。串串奶葡萄由深绿到翠绿，到浅绿，绿得透明，甚至熟得裂开口，咧开嘴。清亮亮的葡萄汁慢慢渗出头，悬着悬着，迟迟不肯滴落下来，这可忙坏了不请自来的马蜂们。哦，那葡萄汁是它们的泪吗？是被马蜂蜇痛了吗？是快乐的泪，因为它成熟了，因而很甜很甜。父亲的话我信。于是我扬起头，张着口，傻傻地盼着它们滴落到嘴里。看着那层层茂茂的枝叶盘旋缠绕，理也理不清，就像姥姥手中的乱麻绳，很难找到头。我又生出个给葡萄梳头的愿望。

梳头？你说得对，父亲听了我的想法，笑着说，剪枝就是梳头，每年春天都要给它剪枝，不然就不会长出又多又大的葡萄来。

可是能梳通吗？

傻孩子，葡萄的头是梳不通的，它本身就需要缠在一起，没有缠绕是长不了葡萄的。

孩子的愿望，有时十分强烈，有时又是飘忽不定的。对于绿色的奶葡萄，当时只是属于偶然的好奇罢了。但那瞬间的想法，虽说只是一闪而过，却不知为什么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一看到奶葡萄，每每还能捕捉到当年的那种感觉——葡萄泪以及绿色的缠绕，那是一种解不开化不开的绿色，像是一种不解之缘。

到了一九五五年夏天，母亲显得更忙了。我们已搬到四十六号院居住，虽然离二十二号院只有两分钟的路程，但母亲仍不能天天回家住。暑假的夜晚，屋里闷热，我每天将乡下带回的炕桌摆在屋前，躺在上面玩耍乘凉。母亲常常是吃过晚饭又去上班。对面住着父亲的一位领导，他是个面孔严肃的高个子，一副居高临下、与人拉开距离的神态，常穿一身白绸睡衣在院里散步。我躺在炕桌上，视线刚好与他丝绸裤角上的丝线绣边平行。

随着他的两脚一掀一掀，几朵小花在周围飞舞。实在想不到，公公和父亲的命运，以及同院的许多我所见过的伯伯、叔叔的命运都与此人有关。从大人物的言谈中，除了胡风，还能听到丁玲、陈企霞的名字，表情和说话的语气是严肃的。原来，事情竟是那么巧，那段时间，公公被监禁在二十二号院西边的小屋。而母亲作为人事兼保卫干部去值夜班，正是看守公公。四十六号院没有假山和葡萄架，但三个大院栽满了茉莉花和蝴蝶花。当我和小伙伴们游戏于其中的时候，自然很少再去想二十二号院的寂寞了。

延安说，你即使再去二十二号院我们也碰不上。他父亲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九日被隔离后，他们很快便搬到贡院西街去了。那天中午，刚刚洗过澡的公公，穿着睡衣被带走后，母亲曾奉命去他家要他的手枪，当时没找到，但随即很快找到后，是延安将持枪证、六粒晶晶的子弹和红绸包着的手枪亲手交给母亲的。这段细节，延安在他《我的父亲陈企霞》一书中写到了，但没有点明去收手枪又负责看管他父亲的人，就是我的母亲——他后来的岳母。我想，只有中国的历史，只有中国历史上因时代产生的起落，才会出现这种想不到的巧合。

公公爱喝酒，在被关押期间也喝。这好比在他暴怒的性格上添上一把火，喝酒后他少不了大吵大闹，骂对他的不公正，使得二十二号院的深夜不能平静。而母亲那会儿则必须坚守岗位，在值班室里又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啊。公公的勇气和胆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年代，谁也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气魄，努力去为自己抗争，谁也不敢冲到会议室去，当众指着鼻子厉声斥责某人，谁也抗不住好容易奋斗到解放，却被关在自己人手里的滋味，更何况那些其大无比的“帽子”，谁又能顶得住呢？总之，公公一向过于自信的特点，这会儿就显得更不平常了。结

果呢，他先是被定为反党集团。后来被平反，但随着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到来，问题重提，面对轮番的批判，面对不应轻信的承诺，最终难逃厄运。之所以会有最后这个结果，是因为他最后一时的脆弱和轻信。为此，他痛苦了一辈子，有口难说。

就我所知，从性格上讲，父亲和公公是很不同的两个人。父亲表面有些呆气，但内心有诗人般的浪漫热情和冲动气质。公公则头脑清楚，更偏于理性。在政治斗争中父亲过于认真，他直来直去而显得幼稚，因而有受到了伤害又担当不起的脆弱。公公与父亲相比则成熟得多，坚强得多，他善于雄辩，有主见，他太坚持原则又不怕对领导提出不同意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本质上的耿直，对事物对人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他们善于独立思考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他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实干家，都想认真负责高标准的通过工作做出成绩。但公公在文艺问题上受左的教条主义影响深一些，他的思路是“难道生活真是这样的吗？”更多的不是从文学本身，而是从政治上思考问题。而父亲则常常独自生活在文学创作的思考之中，生活在他的小说和评论中。他的思辨性限于文学广阔的现实主义发展上，对于长期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则不感兴趣。他对“丁陈问题”早有过批评意见，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之前，随着事态的发展，他认为对“丁陈问题”的讨论，“应该是为了达到团结”。而按照当时那样的做法，“就会形成丁陈——周刘之间互相明争暗斗，而其他一些同志变成了被双方利用的工具，于是伤害了他们双方，也使其他同志受愚弄、受伤害，那么，团结的目的怎样达到？”基于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这封给邵荃麟的信中最后还说明“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摘自1957年6月14日给邵荃麟的信）

父亲真是一个一心为党工作的呆文人，实在不谙世故，也厌烦无休止的斗争，早在这之前，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学术范围之内已受到批判了，不该再招惹什么，但他身上有一种少有的纯洁，只是想做真正有用的事情，因而对丁陈问题的做法客观地提出看法。谁料想，这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十八年以后，大概是一九七七年吧，一位从浙江路过京城的朋友来看望父亲，带来一点陈企霞的信息，说他在杭大教书。一九七九年天空豁然开朗，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了父亲的平反问题。很快丁玲、陈企霞也得到平反。父亲那几年相当地快活，那是文艺界一辈老人互相看望最频繁，也是共同语言最多的日子。几十年多难的经历与不通音讯，使这些人倍感亲切，过去的隔膜与不解一扫而光，只有真诚的祝福，只有相互的拥抱和开怀的大笑。他们不止谈政治和文学，也谈家人和孩子了，仿佛经历过一切以后，真正回落到人间。陈企霞来看父亲了，照样是光光的后背头，黑亮的头发已添了几丝白发。“老秦啊，你现在是大名鼎鼎了！”这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令父亲有些尴尬。“我说的是事实嘛，先是反面，现在变成正面。对了，对了，我是来吃饭的。”公公在等待平反期间住在饭店里，天天跑出来看熟人朋友，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心中装满快乐和希望。父亲说，企霞同志生性骄傲，这话出自他口，令人感慨。这么多年，他仅仅在教书，好时间过去了，能没有遗憾吗？公公住到团结湖后，父亲去看望过他。我想如果没有这二十年的经历，他们之间是不会有这种来往的。

那个夏日的傍晚，延安第一次和我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小桌子上沏了茶水，放着洗好的马奶葡萄。

“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我还和您打过乒乓球。”他对父亲说，“我守着乒乓球台，只要有年轻的叔叔经过，我就缠着他

打……”

“好像记得，我年轻时很爱打球的。来，吃葡萄，洗了的。”父亲拖着他的南腔北调。

“我记得二十二号院有架奶葡萄，特甜。”

“当然，还是奶葡萄好吃。”父亲表示同意。

“甜了爱招马蜂，我就被蜇过一次。”听他一说，那架熟悉的奶葡萄蓦地出现在眼前，密密匝匝的枝叶，晶莹剔透的葡萄珠裂开嘴儿，渗出汁来。

“那会儿你挺淘气，这些年你都在乡下？”父亲笑着问他。

“因为家庭问题，两次被剥夺录取资格，第三年才上了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公社一级的学校，去领工资，有时就领到一袋粮食，翻山越岭背回去。”

他因生于延安而得名，朴实与磨难与他共存，这也是我们感情的基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缘分竟影响到父亲，使他最后一线希望难以实现。

延安也戴一副眼镜，目光真诚温和，为人既不圆滑，也难见锋芒，仍保持着五十年代的纯真，只是偶然露出的幽默感，带点他父亲的影子。公公从小对他很严厉，再加上因家庭影响带来的遭遇，养成一种拘谨的性格和作风。平时，在公公面前他常感不自在，每每局促不安。坐在那里，两只长胳膊像是多余的，不知将它们收到哪里才好。眼睛或是看着地面，或是看着自己的长脚，盼我接过公公的话题与他父亲应对，使谈话和气氛活跃起来。我知道，他心底极爱他父亲，只是不会表现在嘴上。他这种性格上的变化，不免叫我感觉到一种悲剧性的意味，于是有些话就更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了。

走近公公陈企霞，确实感受到他极强的个性，也感受到了他的慈爱。他目光的穿透力与他瘦弱的身体极不相称。他口才极

好,语言锋利幽默,很富感染力。相反,在公公面前,我倒自在得多。我喜欢听公公的故事,喜欢他的谈笑风生。谈起过去的一些人和事,我能有所接应,有一种相通的感觉,这使公公有了谈话的对象。在他最后的几年,衰老使他甚感寂寞。我以自己对他的全部理解,关心他,照顾他。我相信,公公是能体会到我这一份心意的。记得一九八五年大年三十,父亲与公公见了最后一面,直到公公去世,他们之间的信息一概由我传达。

一九九四年的炎夏,是父亲与我们同在的最后一个夏日。从四月份以来,我们不分昼夜地看护他,这时他已经能够自己拄棍慢慢行走几步了。我记得六月份,当父亲第一次扶着椅子从病床上站起来,走了两步的时候,他与我们会意的笑容竟是那样天真,那样充满希望。回到家,天气越来越热,我天天揪着心看天气预报,生怕湿热高温的天气再给父亲的病体带来不适。父亲分明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平静地说:“不必那么紧张,你要知道,有些事防不胜防。”又说:“要么现在就开始写吧。”他太想完成他想写的东西了。我安慰他:“爸,日子长着呢,等你再好些吧。”“也好。”父亲点头。日子就在颤抖的希望中一天天过去。每天,我和家人都盼着傍晚的到来,这样,父亲就可以坐在小院里靠着躺椅上乘凉了。躺椅总是放在西屋门前的紫丁香树下,那儿比较阴凉,旁边种了一簇玉簪花,时而溢来阵阵清香。东墙根下原本每年都要种些丝瓜豆角,但自从蹿出一棵葡萄后,便不再种了。现在是第一次挂葡萄,很小很小的三嘟噜。父亲说,要是奶葡萄就好了,没核儿。他眼睛不好,看不清,我数了数,每挂顶多二十粒。父亲说明年就结多了。他天天乘凉,拿着一只小收音机听广播,静静坐在那里,看着家人的活动。一天,他看着对面的紫葡萄说,再上些肥会结得更多呢。

果然,今年葡萄结了十几挂,是很紫很大的那种,但父亲再

不能看到了。已是深秋,谁也不去摘那些葡萄。它们成熟了,裂了口,滴出泪来,然后悄悄坠落在地,无声无息。已是深秋,无需再企盼什么。我又想起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院的奶葡萄,我忘不了它。它们于枝叶的自然缠绕中,悬在那里,极多极多,碧绿,晶莹……

写于1995年秋,改于1996年初春

原载1997年第四期《当代》

追忆父亲

秦燕子

我的父亲秦兆阳是湖北黄冈人。秦家祖辈都是农村的教书先生,没有田产,更不会做生意,所以家境贫寒。

或许是为了生计而忧愁,或许是因为性格,有时候爷爷一天都不说一句话。特别是到了年关,家里更是充满了忧郁压抑的气氛。总是担心新的一年没有人来请爷爷去教书。如果没有人来请,那么第二年全家的生活就没有着落,甚至面临没有饭吃的困境。由于自尊,爷爷从不去那些大户人家走动,只是在家里等。父亲小学毕业之前,爷爷突然去世,使父亲更加孤独无助,后来在老师和舅舅的帮助下才得以初中毕业。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奶奶只好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父亲和叔叔回娘家。

在那个时代,已经出嫁的女人带着孩子回娘家吃白饭,是很让人看不起的。奶奶为了儿子只能忍住屈辱和悲哀。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把一粒谷糠从碗里挑了出来,他外公看见了,便拿起筷子向父亲头上打去。奶奶马上站起来,拉着儿子就走,一路走一路哭,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娘家。爷爷奶奶的自尊性格遗传给了父亲,他一生耿直,不会圆滑,宁折不弯,不愿求人,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并且也是那么沉默寡言。



秦兆阳怀抱二女儿，在东总布胡同 22 号

1937 年，父亲在免费的武昌乡村师范毕业，也找到了一个工作，收入虽然微薄，但全家尚可勉强糊口。就在这时，发生了“七七”事变！国家危亡时刻，忠孝不能两全。父亲这个不幸而又热血沸腾的青年，痛下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离家之前，父亲只告诉母亲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恐怕一时回不来。

少言寡语、深明大义的母亲，什么都没问，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儿子送出了老远老远，也许已经意识到这就是永别了吧！她站在村口目送儿子远去，直到他消失在路的尽头。从此，她那瘦弱的身影就永远定格在父亲的记忆中了。谁会想到，抗日战争加上解放战争会经历那么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知道，他奔赴延安之后，弟弟因为家境贫寒，难以维持生计，结婚后到岳父母家生活，寄人篱下，没有能力照顾母亲，更没有钱给她治病。就这样，他可怜的母亲没过几年就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1994 年，父亲因突发大面积心梗，躺在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一天夜晚他对我说：“我离开家后，就剩你奶奶一个人，那些年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而我，却似乎朦胧地看到了那从未谋面的奶奶的形象。我甚至还痛楚地想过，爸爸，你当初为什么不留在家里，呵护你无助

的母亲？如果是那样，今天的你命运将会如何？你还会是一个著名的右派吗？然而，历史是无法更改的，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救国……没有能够奉养自己亲爱的母亲，这是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新中国成立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父亲生活最安定，精神最愉快，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他像战争时期一样满腔热忱全力以赴忘我地工作着。他曾写过一个小故事：很多人围坐在大锅旁，每个人拿着一双长长的筷子，只有每个人都夹起食物送到对面人嘴里，大家才能都吃饱。这形象地反映了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生活理念，反映了他希望全社会成为和谐大家庭的美好愿望。

对于父亲来说，彻骨的疼痛何止一次。或许正是因为当年那个热血青年的一腔热血尚未冷却，或许又是因为无法改变的耿直性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拒绝参加整“丁陈”的批判会。结果，他自己成了右派。

1957年，父亲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征求了数位党组织领导的意见后，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后来这却成了他的罪证。当然还有别的罪证，比如编发了一些现在看来很优秀的作品。

1958年，上面的结论下来了，父亲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这对于父亲，是精神上的灭顶之灾。爱之愈深痛之愈切。二十年前，他离开他的母亲，离开故乡，舍生忘死投身到残酷的斗争中，几次死里逃生。他是要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然而……他被同志当成了敌人，也不能再做所热爱的事业，这些都令他痛不欲生。我想，他当时所以能活下来，主要是我母亲的理解和安慰，还有对孩子的牵挂。我的姥姥，还有抗日时期保护过父母的堡垒户，都是最朴实的农村妇女，她们出于战争年代对父亲

的了解和淳朴的直觉,坚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当时年幼懵懂的我听她们议论说,父亲是被埋在沙土里的珍珠,总有一天会发光的。在亲人的信任安慰下,父亲渐渐平静下来。

1958年夏天,我们家搬离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宿舍。当时父亲还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劳动改造,他在家等待上面的通知。工作起来从来不知道休息的父亲,这一回被迫歇下来了。以前他住的那间《人民文学》宿舍,那是他的宿舍又是他的工作室。他面朝窗户背朝门,日日夜夜都趴在那张写字台上,写呀看呀。他很少顾及他的孩子们,他给我们的最深印象,都是趴在桌子上写字的一个背影。

一场政治风暴把一个父亲抛回到孩子们身边。原来父亲并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书呆子,他手很巧,他还有一颗不泯的童心。他会自己动手制作皮影,做好了和我们一起演。他甚至找来一些破木板,为家里养的鸡做了窝,是童话故事里那样的小房子。他还利用鸡毛掸子的藤条,给弟弟做了弓箭。他和我一起欣赏画册中的世界名画,边欣赏边讲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天给我和弟弟读小说《苦儿流浪记》,我和弟弟一边一个坐在他身边,为那个哀伤的故事流泪,也享受那一份独特的父爱亲情。

后来我想,我的父亲,他不就是一个心灵游荡的苦儿吗?他这一生,遇到的苦难多,得到的幸福少,他一生苦苦追求的,是心灵的家园。在那一段短暂的时光里,终于能有时间爱抚一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来到一个童话的世界,忘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疼痛。这样的日子虽然不长,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让我们学会欣赏艺术欣赏美,要有一颗善良、富于同情、乐于助人的心。

不久,父亲接到通知,要他去广西柳州机械厂劳动改造。那一天,妈妈去火车站送行,姐姐在学校住校,只有我和弟弟留在

家里。面对空空荡荡的房间,我发现父亲的背心还在床上,捧起背心,那上面还留着父亲的气息,我们姐弟相拥大哭一场。

父亲到柳州机械厂后,心情压抑,加上饮食不惯,在战争年代落下的严重胃病又犯了。夜里胃疼得根本不能躺下,只能拿东西顶着胃部一夜坐到天亮。妈妈怕父亲出事,就带着弟弟调到广西工作。

1961年11月,父亲被摘掉“右派”帽子,心情开始愉悦起来。这样的心情可以从他当年画的画看出来:三只小燕子穿过摇曳的柳枝迎着春风飞翔,题字是:“最喜春光无限好,万里辛勤将春找”。我想,这愉悦一方面是因为又可以开始从事他热爱的文字工作了,另一方面,是以为自己不再是另类,也许不会再影响孩子们的前途。这幅画里的三只小燕子寄托着他对孩子的爱和欣慰。

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战斗的艰苦岁月里,父亲这个有着浓重口音的南蛮子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生死之情,他热爱那片土地,热爱那里质朴、豪爽、讲义气又有几分狡黠的人民。于是,他心里立下宏愿:要写一部书献给那片土地,献给那里的人民,献给那满是疮痍厚重的历史。

摘掉“右派”帽子后,没有职务在身,正可以静下心来实现愿望。他的愿望得到了当时的广西宣传部长陆地的支持和帮助,于是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两辈人》。改革开放后,父亲继续《两辈人》的修改和写作,将其更名为《大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短暂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暴,过了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那个时期重点批判的“黑八论”之一。父亲经历了批斗游街,牢狱之苦,两派武斗的生死死死,经历了比反右斗争还要残酷多少倍的政治

迫害。父亲曾经绝望过，他又遭受了一次彻骨的痛。

母亲当然也受到了牵连，那时候他们的工作单位都在南宁市，为了“划清界限”，不得不分别住在两个地方，母亲作为“牛鬼蛇神”的妻子在广西教育学院挨批斗，父亲在他的文化大院受折磨。他们不敢通信更不敢互相看望，怕给对方带来更多的罪名，联系双方的纽带只有十五岁的弟弟。那年广西南宁发大水，大街上，机关大院里，到处都成了一片汪洋。没有人会帮助他们，弟弟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他用竹子绑了个筏子，除了照顾母亲，还要撑着筏子去买粮买菜，看望父亲。

弟弟看望父亲，武斗激烈的时候要冒生命危险，尤其是要经过两派抢占争夺的据点，那里时常会有子弹飞过。有一次，他到父亲住的地方，发现屋里被翻得底朝天，人也没了踪影。后来才知道，父亲被红卫兵抓走关起来了。那段时间亲人两隔，生死不明，前途未卜，内心的煎熬是难以描述的。真不知道父亲这个木讷执拗、身体瘦弱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许是家人的牵挂支撑着他，也许是想写一部表现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的夙愿支撑着他？抑或是忠诚的信念支撑着他？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时常想，尽管受了很多折磨，但父亲终于等到了动乱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比起那些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人来，真是幸运。

1979年父亲落实政策回到北京。重新工作后，父亲好像焕发了青春，他写道：“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欣逢柳绿春时雨，策马长途学健儿。”他又开始全力以赴了。看稿子，夏天没有空调，他在地铺上铺张席，坐在上面，穿着裤衩，光着膀子，脖子上搭条湿毛巾；冬天屋里煤炉抵挡不住严寒，他内穿毛衣外穿厚厚的棉袄棉裤，围着围巾，戴着帽子，全副武装。

他又回到了五十年代在《人民文学》任副主编时的工作状态。那几年他推出五十年代的新人，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他又和《当代》杂志社的同事们一起，推出新时期的新人。

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给我讲了《资治通鉴》里的一个小故事：一个人挑着甑（古时做饭用的瓦锅）到集市上去卖，不小心身后的甑掉到地上打碎了，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集市上的人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他说：“甑已破矣视之何益？”这就是父亲的胸怀，他把被剥夺了的二十年光阴，当成了一个被摔破了的罐子。他希望他的家人们都忘记过去的痛。确实是这样的，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抱怨。我记住了这个故事，这故事使我受益终生。

但是，生活中仍然会有遗憾，仍然会有难以克服的困难。1993年冬，父亲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因为平房室内温度太低，也许是在半露天的厕所解手受了风，他又一次感冒发烧喘个不停。家中的土暖气已经修整更换了好几次，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温度依然不能提高多少。我们说：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一套有暖气的楼房吧。但父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他忍受着寒冷，或许，这比忍受政治迫害好受多了。

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居住条件不行，父亲应该住院，可那时候住个院很难。后来，经弟弟的妻子辗转托人，父亲才住进海军医院。1994年元旦前我去医院看他，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但肺部还未痊愈。他告诉我，医院表示了让他出院的意思。爸爸出院去哪里呢？家里太冷，肯定不行。

当时我住在与人合居的四十三平米的两居室中的一间，另一间住的人搬走后一直空着。我回家和我爱人一商量，就把空着的那间房的门锁撬了，打扫打扫安上床，第二天就把父亲接回了家。过了些天，又把母亲也接到家里。我住的地方相当于七

层,没有电梯,父母都是弟弟背上楼的。我爱人在报社工作,写完的稿子他经常读给父亲听,父亲总是微笑着,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偶尔议论两句。看得出来,父亲的心情很好。父亲把抽了一辈子的烟也戒了,屋里有暖气,不必再受风寒,他肺部的炎症不再明显,身体渐渐康复,一直住到停了暖气才回了自己的家。父亲在我家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我爱人看我们撬了门锁也没人找麻烦,就张罗着粉刷房子,计划冬天再把父母接来住,没想到,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1994年春末,父亲因胆结石住进了协和医院,手术很成功,术后从观察室转到普通病房。病房很大,有二十多病人。父亲的病床对面有一个危重病人,呼哧呼哧很响的呼吸机折腾了两天两夜,父亲也就两天两夜无法入睡。那一天,他突发大面积心梗,又引发肺部的炎症,医生发出病危通知。在重症监护室的日日夜夜,我们姐弟三人轮流陪护。

父亲从容平静地面对病痛与死亡,他只是心疼我们,他对医生说:“我这个病是不是要拖很长时间啊,我的孩子原来都很年轻,现在都憔悴了,他们太累了。”

他仍然没有抱怨。但我分明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无尽的遗憾。他渴望再写出一部好作品,渴望画他的画,写他的字……他才只有七十八岁。

这无尽的遗憾,是父亲心中最后的痛,也使我难以释怀。我也经常想起那个关于打碎甌的故事,或许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痛,我们应该愉快面对未来。

后 记

编辑这样一本纪念集的愿望,已经萌生很久了。

如今,它终于将要和朋友们见面,这值得庆幸,也特别令人感动。因为它是在当下商品大潮覆盖之下的出版环境中得以出版的。这要特别感谢以潘凯雄先生为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们,还有《当代》编辑部的朋友们。自秦兆阳离开这个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编辑部已经换了好几届领导,但人们仍然记得,有一位老人曾经为一本享有盛誉的杂志,为文学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这确实值得庆幸也令人感动。

在社会上,在文学界,同样有很多人记得秦兆阳这个名字。有五十年代的老读者撰文怀念他。有的朋友,当初是文学青年,如今自己也已经成为著名的老作家了,还在 21 世纪的某一个白天或夜晚忽然想起那个早已离去的老人,于是便发表文章追忆一段往事。还有一些他的同辈人,一些如今仍然健在的老人,也还在念叨他。一些年轻人也产生了好奇,为什么在聚会的时候,在酒桌上或闲谈中,那些老人一提起秦兆阳的名字就会肃然起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将这样一本纪念集编辑出版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与这本纪念集的编辑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李频、王瑞二同志主编的《编辑家秦兆阳研究》。李频也是秦兆阳的老朋友。

说是老朋友,其实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他们的交往是精神的交往。《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与这本书不同,是研究性质的。早在认识秦兆阳的时候起,李频就准备进行这样的研究了。这本《编辑家秦兆阳研究》得以出版,也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将那些充满情感的文字全部收集到手。由于容量的原因,我们也无法将收集到的文章全部放入这本书当中。在此,特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向所有撰写了文章或者仍然没有忘记那位老人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1年8月